臺灣史研究

第 21 卷　第 2 期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編 輯 委 員 會

《臺灣史研究》第 21 卷第 1 期

主任委員：謝國興
主　　編：謝國興
執行編輯：陳培豐、劉士永
編輯委員：李文良、吳聰敏、許雪姬、陳培豐、陳翠蓮
　　　　　黃美娥、詹素娟、劉士永、鍾淑敏、蕭阿勤
助理編輯：林文凱、曾文亮
編輯助理：李安瑜、劉鴻德
編輯顧問：李壬癸、李亦園、杜正勝、胡　佛、曹永和
　　　　　許倬雲、麥朝成、賴澤涵、莊英章

TAITWAN HISTORICAL RESEARCH

Editorial Board

Chairperson	Kuo-hsing Hsieh		
Editor-in-chief	Kuo-hsing Hsieh		
Executive Editors	Pei-feng Chen	Shi-yung Liu	
Editors	Wen-liang Li	Tsong-min Wu	Hsueh-chi Hsu
	Pei-feng Chen	Tsui-lien Chen	Mei-er Huang
	Su-chuan Chan	Shi-yung Liu	Shu-min Chung
	A-chin Hsiao		
Assistant Editors	Wen-kai Lin	Wen-liang Tseng	
Editorial Assistant	An-yu Lee	Feng-ted Liu	
Advisors	Jen-kuei Li	Yih-yuan Li	Cheng-sheng Tu
	Fu Hu	Yung-ho Tsao	Cho-yun Hsu
	Chao-cheng Mai	Jeh-hang Lai	Ying-chang Chuang

目　　　錄

《臺灣史研究》第 21 卷第 2 期

研究論著

真實與想像的空間交錯：
以臺南大天后宮的建築形制及功能為例／毛紹周 ……………………… 1

生豬貿易的形成：
十九世紀末期臺灣北部商品經濟的發展（1881-1900）／曾品滄 … 33

認識與想像臺灣的社會經濟史：
1920-1930 年代臺灣社會史論爭意義之重探／林文凱 ……………… 69

戰後臺灣的免疫學專科化：國際援助、學術外交與邊界物／許宏彬 … 111

研究討論

近二十年來應用歷史地理資訊系統的回顧與展望：
以臺灣區域史研究為例／李宗信、顧雅文 ……………………………… 167

書評

評介吳蕙芳著，《基隆中元祭：史實、記憶與傳說》／鄭螢憶 ……… 197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本期刊接受 103 年度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

《臺灣史研究》
第 21 卷第 2 期，頁 1-32
民國 103 年 6 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真實與想像的空間交錯：
以臺南大天后宮的建築形制及功能為例*

毛紹周**

摘　要

第一級古蹟「臺南大天后宮」建築群於明鄭時期肇建，迄今已有三百餘年，因各種歷史原因，現今留存與建築相關之各種文獻資料並不完整。又因各段時期之社會交替與變遷，使此一空間場域的各部特有名稱或功能交錯結合了各種歷史事件，並以傳說方式不斷被創造出疑似遊走於真實與虛構之間的場域功能，使此建築群在各歷史時期之形制與功能，充滿著是否曾經真實存在此場域之各種疑點。

本文論述以蒐集各相關文獻史料並結合傳統建築空間之理法原則，再與目前所認知的名稱現象進行比對，推論除了現行所認知各時期的歷史名稱之外，是否存在另外第三種以上的可能性結果，進而試圖剖析與還原最接近真實的深層答案。

關鍵詞：施厝衙、皇帝殿、〈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臺南大天后宮、官廳、宗人府、監軍府

---

* 本文部分內容曾以〈論《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在「正殿」位置疑案中所衍伸出的幾個問題〉、〈臺南大天后宮之「宗人府」建築群傳說探討〉、〈臺灣傳統廟宇建築中之「官廳」功能初探：以臺南大天后宮官廳為例〉等三個題目，分別於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第十七屆第一次（2005 年 6 月 18 日）、第二次（2005 年 11 月 26 日）、第十八屆第一次（2006 年 5 月 27 日）等三次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中宣讀，感謝大會評論人林會承、楊仁江、閻亞寧等教授悉心指正，內容亦經大幅修正。最後，承蒙方真真教授與貴刊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寶貴修正意見，及貴刊編輯細心校閱，使本文疏漏得以減少，謹在此致上誠摯感謝。

** 中原大學設計學博士學位學程博士生

來稿日期：2014 年 3 月 27 日；通過刊登：2014 年 7 月 7 日。

一、前言
二、寧靖王府邸與「大明正朔」的安奉之處考
三、寧靖王府邸「監軍府」與「宗人府」傳說考
四、施琅與「施厝衙」傳說考
五、朱一貴的「皇帝殿」傳說考
六、大天后宮「官廳」功能考
七、〈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所衍伸出的「正殿位置」疑案
八、結論

一、前言

全臺祀典臺南大天后宮（以下稱大天后宮，參見圖一）位於臺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二段227巷18號，民國74年（1985）8月19日經內政部公告為臺閩地區第一級古蹟。大天后宮建築群的肇建歷史可溯源至明永曆15年（1661）鄭成功進取臺灣後，明寧靖王朱術桂於永曆17年（1663）挈眷東渡，[1] 在赤嵌城南，興建寧靖王府邸，又稱一元子園，亦即現今大天后宮與武廟的大部範圍。清康熙22年（1683）施琅率清軍大敗鄭軍於澎湖後，鄭克塽派使請降；寧靖王見大勢已去，從容自縊殉國，自縊前將其府邸捐為佛庵。施琅領臺後，係將平臺之功盡歸媽祖庇佑，因此又將原寧靖王府邸改建為崇祀媽祖之廟宇迄今。

此建築主體歷經明、清、日治、民國等時代變遷，三百餘年來不斷在主流或非主流社會的各種層次之中，並於不同時期的政治、經濟、宗教等背景影響下，不僅建物功能數度改易，也見證了臺灣各階段的歷史與社會演變。但在此同時，這個獨特的空間場域，也因發展歷程中的多重樣貌，其建築與空間亦形成了數個真實與想像交錯的形制及功能，有待釐清。

[1] 蔣毓英，《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卷九：人物　勝國遺裔〉，頁119。

圖一　大天后宮、武廟空照圖（左）暨地籍圖（右）
大天后宮坐東朝西；武廟坐北朝南

資料來源：亞新國土科技測製，《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像片基本圖：臺南》(臺北：內政部，2004)，圖號：93r008-068；〈大天后宮(寧靖王府邸)〉，「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下載日期：2014年6月23日，網址：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DA09602001447&version=1&assetsClassifyId=1.1&menuId=308&iscancel=true。

大天后宮建築空間因歷史久遠和不同時代更迭所造成的動盪過程，社會各界在其各種建築形制與功能的詮釋問題上，都遭遇了史料不全的研究困難，目前各種推論與加入各種想像的口語傳說，就在這種情形下大量地進入該場域並試圖建構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一般傳說多認為，現今大天后宮正殿曾是明鄭時期奉明正朔的殿堂，做為頒曆等集會時的場所；正殿南側（左側）曾建有宗人府，北側（右側）為監軍府，[2] 正殿南、北兩側殿堂後各有一井，稱為龍目井。[3] 故本文首先就對大天后宮在明寧靖王府邸時期，「大明正朔」[4] 是否於該宮正殿安奉，主體建築群兩側之「宗人府」與「監軍府」等兩場域是否於歷史中真實存在，施琅是否真將該場域私充為「施厝衙」[5] 等問題，進行各種歷史脈絡的延伸印證。

---

[2] 「明永曆18年(1664)，鄭經從金門迎明寧靖王朱術桂，……以監軍身分渡臺，鄭經為了表示禮遇，在當年臺江東岸邊的高灘地，興建府邸。中堂左側立宗人府，右側立監軍府，……，稱「一元子園」，供朱氏居住，成為明代王室在臺香火之象徵……。」參見曾吉連，《祀典臺南大天后宮志》(臺南：祀典臺南大天后宮管理委員會，2001)，頁66-67。

[3] 「正殿南側，有鄭經所建的宗人府，以為安置隨軍東渡來臺的明鄭宗室，北側亦有鄭經所建的監軍府，做為寧靖王辦公廳堂……殿堂後各有一井，稱龍目井，如龍之雙目。」參見石萬壽，《臺灣的媽祖信仰》(臺北：臺原出版社，2000)，頁232。

[4] 「鄭經建宮殿奉明正朔後，為表示尊重明室，乃請代表永曆帝監明鄭軍的寧靖王，入居殿後齋房……據採訪及現存遺跡推測，奉明正朔的殿堂，在今奉祀媽祖的正殿，……做為頒曆等集會時的場所。」參見石萬壽，《臺灣的媽祖信仰》，頁232。

[5] 「施琅率師入鹿耳門，強占一元子園為宅第，稱施厝衙……。」參見石萬壽，《臺灣的媽祖信仰》，頁238。

康熙 60 年（1721）臺灣發生朱一貴事件，據傳朱一貴曾將大天后宮改為其王宮。[6] 筆者亦質疑朱氏將大天后宮稱為「皇帝殿」傳說的真實性。

接著探討該宮北側建築群在歷史上的形制問題。蔣元樞從乾隆 40 年（1775）開始至乾隆 43 年（1778）完成臺郡天后宮整修。整修後留下了一份目前該宮最早的建築圖文〈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保留了大天后宮當年的古老原型。臺郡天后宮即現今的大天后宮，該圖說收錄於《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中，內容分有軍政、文教、民生、習俗等四大項。屬習俗項之圖說八套，其中〈重修關帝廟圖說〉、〈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重修海會寺圖說〉、〈重修龍王廟圖說〉、〈重修風神廟並建官廳馬頭石坊圖說〉等五套建築圖說中，出現了名為「官廳」之建築圖樣，在臺灣傳統建築形制中留下具有特殊意涵的建築名稱。[7]

前述五座習俗屬項之建築群，目前尚存有當年之「官廳」建築體者，僅餘臺郡天后宮。可惜此座「官廳」於民國 60 年（1971）間亦將第二進改為奉祀三寶佛之後，原有之「官廳」功能幾近消失；今臺南地區在《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中附有「官廳功能」的廟宇已全然無存。據查訪臺南市清代舊屬臺灣府範圍，非該圖說內之寺廟建築中，位於成功路上的觀音亭與興濟宮（大道公廟）中間之官廳，為目前尚保存官廳名稱者，但平時鮮少開放，功能亦無法完全顯現。本文亦在「官廳」形制之功能性作進一步探討。

最後探討該宮過去至現在的正殿位置改迭問題。〈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中廟埕的戲臺、旗竿臺現均已不存，然而該圖說顯示，當時之正殿位於第二進，但現今的正殿卻是位於第三進。本文將針對兩個空間為何互換錯易的理由，或圖說的內容記載是否有誤等問題進行討論。

為了追溯、還原更接近真實的歷史空間，筆者擬使用場域持有者的視域，進行真實與想像兼具的思考方式，來觀察此一建築群的部分空間形制、功能疑點及歷代的興修歷程。本文部分汲取二元論（binary oppositions）的對立批判模式，以質疑現有的認知結果，作為目前二元選擇之外的第三種、或更多重選擇性的三元辯證（triple dialectic）[8] 基礎。其過程中，除重新檢視多件既定成俗的舊有認知之

6　「這是後世稱大天后宮為皇帝殿的由來。」參見曾吉連，《祀典臺南大天后宮志》，頁 70。
7　蔣元樞纂輯、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3）。
8　三元辯證（triple dialectic）：Lefebvre（列斐伏爾）批判一切形式的範疇式或二元邏輯。堅持兩個項

外，並嘗試開啟它種可能性的替選方案，再藉由多元性思考的解構過程，進行探討大天后宮在歷史場域中的諸多疑案，並試圖揭開大天后宮建築群更深層的自身歷史，重新梳理被當前社會認知所建構之想像空間。

二、寧靖王府邸與「大明正朔」的安奉之處考

今人所傳寧靖王朱術桂府邸當年為安奉大明正朔之處，頒布皇曆之所在。[9] 鄭成功自明永曆 3 年（1649）始奉永曆帝朱由榔為正朔，直至清康熙元年（1662）永曆帝在滇中遇害為止，朱明王朝應已正式結束，但鄭氏在臺灣仍繼續堅持使用永曆年號。永曆 15 年鄭成功攻取臺灣，試圖延續這個將被消滅的朝代，當時不少朱明王室遺族相繼渡海投靠臺灣鄭氏政權，奢望鄭氏能完成將要絕望的復明大業。康熙 22 年澎湖一役施琅大敗鄭軍之後，鄭氏軍臣決議降清。當時在臺的朱明王室遺裔尚計有監國魯王世子朱桓、瀘溪王朱慈爌、巴東王朱江、樂安王朱浚、舒城王朱竣、奉南王朱熺、益王宗室朱鎬等。其中唯寧靖王朱術桂聽聞施琅率大軍克取澎湖之時，全家即於府邸自縊以身殉國，其餘在臺諸王均同時一併具降，向帶領清軍平臺的福建水師提督一等侯施琅呈繳原受封金冊。[10] 朱桓等宗室數人降清之後，施琅將各遺裔遣送內地，移交給各督、撫，聽其主官裁示安插歸鄉。[11] 目前在文獻史料中，尚無發現刻意加害前朝在臺之朱明王室遺族的事例。

目以及圍繞它們而建立的對立及二元反對永遠不足夠，總有另一個（Other）項目。參考 Edward W. Soja（索雅）著，王志弘、張華蓀、王玥民譯，《第三空間：航向洛杉磯以及其他真實與想像地方的旅程》（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 8-9。

9 「此一供奉明正朔的殿堂，應是鄭經以公帑建造，是為當時臺灣最雄壯南方式的宮殿。」參見石萬壽，《臺灣的媽祖信仰》，頁 232。

10 所謂「金冊」，根據《明史》記載：「親王冊寶：冊制與皇太子同。其寶用金，龜紐，依周尺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文曰『某王之寶』。池篋之飾，與皇太子寶同。寶盝之飾，則雕蟠螭……親王世子金冊金寶：承襲止授金冊，傳用金寶……郡王，鍍金銀冊、鍍金銀印，冊文視世子。」參見張廷玉等撰，《仁壽本二十六史・明史》（臺北：成文出版社，1971），〈卷六十八　志第四十四　輿服四〉，頁 32327。

11 「據稱流落多年，貧窘銷用，見各住草地耕種度活。茲朱桓等宗室數人，應載入內地，移交督、撫，聽其主裁安插。」參見江日昇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外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 60 種，1960；1704 年原刊），〈卷之十：康熙癸亥六月至十二月〉，頁 442。

所以明鄭時期，各東渡臺灣的朱明王室血脈不只寧靖王一人，而王室地位也非最高，或許能夠推測各王都應有各自的府邸，只是現皆不存。而各王府邸之史料紀錄，也許因兵燹或記事者覺得宅邸主人為苟且偷生之士，不值登載而盡皆散軼。

再者，鄭成功去世之後，雖朱明宗室相繼渡臺，但目前亦無發現史料明確記載鄭經曾奉任何渡臺宗室為正朔。假設有此崇奉，在臺的大明正朔地位亦應由監國魯王[12] 世子朱桓來承接，如為寧靖王，監國魯王的宗室地位則不知將至於何處。

永曆 16 年（1662）朱由榔在昆明遭縊死之後，在臺灣的鄭氏臣民仍繼續堅持使用永曆年號，直至永曆 37 年（1683）鄭克塽降清為止。英國劍橋大學莫德林學院（Magdalene College）現藏《大明永曆二十五年歲次辛亥大統曆》[13] （圖二），其封面即印有：

> 嗣藩頒製皇曆遙頒未至本藩權宜命官依大統曆法考正刊行俾中興臣子咸知正朔海內士民均沾厥福用是為識[14]

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所藏《大明永曆三十一年大統曆》（圖三），其封面亦印有：

> 皇曆未至本藩權依 大統曆法命官考訂刊行俾中興臣子咸知 正朔用是為識[15]

除以上字樣外，尚印有鄭經「招討大將軍」朱砂關防，政治象徵意義濃厚。[16] 內文也未提及此曆於寧靖王府頒布，現今其他文獻史料亦尚未取得有力記載，證明寧靖王府為供奉大明正朔的殿堂。故如欲證明該王府為供奉大明正朔之處，應再提出更為有利的史料佐證，才能將此說法納入大天后宮正式的歷史脈絡之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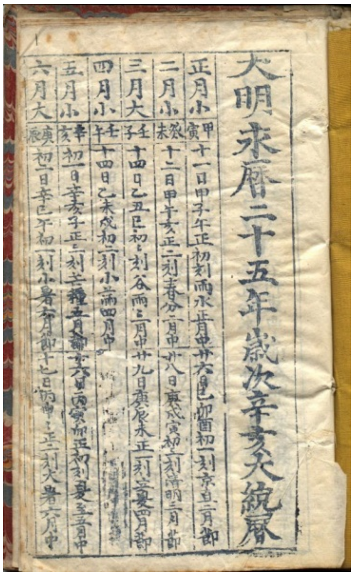
12 徐鼒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小腆紀傳》（文叢第 138 種，1963；1887 年原刊），〈卷七：紀第七　監國魯王〉，頁 109-121。

13 〈Southern Ming calendars〉，「SERICA」，下載日期：2013 年 5 月 21 日，網址：http://oldchinesebooks.wordpress.com/2012/01/02/southern-ming-calendars/。

14 參見黃一農，〈從湯若望所編民曆試析清初中歐文化的衝突與妥協〉，《清華學報》26: 2（1996 年 6 月），頁 193-194；黃建中，〈明嗣藩頒製永歷〔按：曆〕二十五年大統曆攷證〉，《大陸雜誌》15: 10（1957 年 11 月），頁 313(1)。

15 〈Southern Ming calendars〉，「SERICA」，下載日期：2013 年 5 月 21 日，網址：http://oldchinesebooks.wordpress.com/2012/01/02/southern-ming-calendars/。

16 黃一農，〈從湯若望所編民曆試析清初中歐文化的衝突與妥協〉，頁 193-194。



圖二　《大明永曆二十五年歲次辛亥大統曆》

資料來源：〈Southern Ming calendars〉，「SERICA」，下載日期：2013 年 5 月 21 日，網址：http://oldchinesebooks.wordpress.com/2012/01/02/southern-ming-calendars/。

圖三　《大明永曆三十一年大統曆》封面

資料來源：〈Southern Ming calendars〉，「SERICA」，下載日期：2013 年 5 月 21 日，網址：http://oldchinesebooks.wordpress.com/2012/01/02/southern-ming-calendars/。

三、寧靖王府邸「監軍府」與「宗人府」傳說考

明寧靖王府時期之建築舊制俱已亡軼，留存建築相關文獻資料極少，無法一窺當年盛景。目前根據各界研究與現場遺跡推測，其範圍建制應與大天后宮現存建築大同小異。現今坊間一般認為，寧靖王府邸建築群內最少應同時具備兩種行政功能單位，一是「監軍府」，另一則為「宗人府」。

何謂宗人府？根據《明史》記載，明洪武3年（1370），明太祖朱元璋設置大宗正院，洪武22年（1389）改為宗人府，設宗人令一人，左、右宗正各一人，左、右宗人各一人。明初以親王任宗人令，後來事權歸於禮部勳戚大臣所管，其執掌皇族的屬籍，定期續修宗譜，登記皇九族宗室之嫡庶、名封、嗣襲、生卒、婚嫁、謚葬之事，凡宗室所有陳情，代為轉達於上，選宗族中有才能者，錄有罪過者。[17]

大天后宮（明寧靖王府邸）建築群正身四進以坐東朝西的建築群為中心主軸線（圖一）。大天后宮主軸北側，文獻資料顯示乾隆30年（1765）間，蔣允焄[18]曾增建官廳（更衣亭），成為現在的三進建築群。余文儀在《續修臺灣府志》中，留下了建造「官廳」的文字紀錄：

> 乾隆三十年，知府蔣允焄重修，廟前另置官廳一座。[19]

現存於大天后宮之乾隆30年〈重修天后宮增建更衣亭碑記〉，該碑記說明了籌建過程：

> 太守蔣公 念籌建之未周 規模之未□ 非□人任 度□廣謀經營 覓地廟右二畝許 構廳三進 為更衣所[20]

---

17 張廷玉等撰，《仁壽本二十六史‧明史》，〈卷七十二　志第四十八　職官一〉，頁32362。

18 蔣允焄，貴州貴陽人，丁巳進士。乾隆28年8月任臺灣府知府；乾隆29年12月護任分巡臺灣道。參見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文叢第121種，1962；1764年原刊），〈卷三：職官　官秩〉，頁127。

19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七：典禮　祠祀〉，頁328。

20 〈重修天后宮增建更衣亭碑記〉（乾隆30年〔1765〕），碑現龕於全臺祀典臺南大天后宮大雄寶殿前門南面牆上，高231公分，寬81公分，花崗岩材質。

乾隆 40 年間，蔣元樞之〈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也記錄了下列內容：

> 廟之右畔 有屋三進為官廳[21]

據傳大天后宮北側建築群為明寧靖王府時期之「監軍府」舊址，並在監軍府建物規模的基礎上，再增建成為目前的三進建築群，[22] 目前宗此說法者最為普遍，但卻無法從歷史文獻中得到證實。由上三段記載，應能說明大天后宮北側原來並無「監軍府」建築，而現存之三進建物，是後來由蔣允焄在主建築群主軸北側另外覓地增建的三進全新「官廳」，故宗此官廳原為監軍府之說者，應更進一步發掘史料與更新論述。

現大天后宮主建築群主軸北側之三進建築，第一進為頭門，第二進供奉三寶佛，第三進供奉觀世音菩薩，第三進後有一井名曰「龍目」（圖四）。以目為名者大多對稱有雙。王府主軸南側龍目井現隱入民宅廳堂之後方（圖五），假設此井真為當年王府所有，井之西方建有對稱於中主軸北側監軍府的建築物來呼應傳統空間中的禮法精神，此種推論應也只是合理假設。

圖四　王府主軸北側觀音殿後之龍目井

圖片來源：2004 年 9 月 29 日，筆者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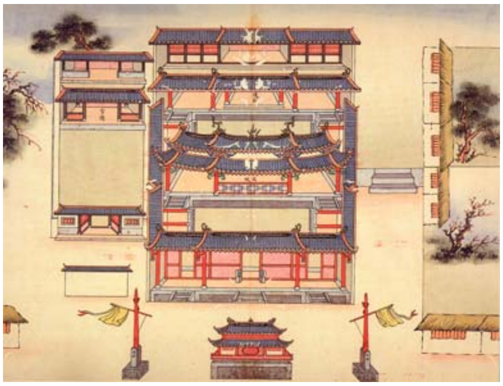
圖五　王府主軸南側龍目井，現隱入民宅廳堂之後方

圖片來源：2004 年 12 月 8 日，筆者拍攝。

---

[21] 〈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收於蔣元樞纂輯、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頁 71。

[22] 石萬壽，《臺灣的媽祖信仰》，頁 248。



圖六　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

圖片來源：〈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頁 70-71。

民間與國內學界均一致盛傳此一推論中之建築物，為明寧靖王之「宗人府」舊址。但目前並無法在歷史文獻資料中找到臺灣有「宗人府」記載，現今原地基建有永福路二段 227 巷之數戶民宅，也無法進行大規模的考古挖掘行動。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蔣元樞從乾隆 40 年開始[23] 至乾隆 43 年完成[24] 的〈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25]（圖六）顯示，此座疑似「宗人府」的建築物體在這次的重修紀錄中就已不存在。假設寧靖王府南面果真有宗人府建築存在，寧靖王其職應兼宗人令，但南明史料均查無記載寧靖王曾任此職或與此職相關之工作紀錄。因此即使宗人府此說為真，寧靖王其宗人令職亦也應是虛職，無實際作用，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鄭成功曾被賜予朱姓，稱為「國姓爺」，其宗室地位與朱明王族遺裔相當。徐鼒父子所著《小腆紀傳》之監國魯王傳記中記載：

> 朱成功以宗人府宗正禮見王，贄千金、紬緞百端；安插從官，饋月餼；后有譖王於成功者，成功禮儀漸疏。[26]

---

23 謝金鑾、鄭兼才纂，《續修臺灣縣志》（文叢第 140 種，1962；1807 年原刊），〈卷二：政志　壇廟〉，頁 64。

24 〈重修天后宮碑記〉（乾隆四十三年〔1778〕），現位於大天后宮拜殿，高 248 公分，寬 83.5 公分，花崗岩材質。

25 〈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頁 70-71。

26 徐鼒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小腆紀傳》，〈卷七：紀第七　監國魯王〉，頁 121。

以上為鄭成功以國姓與宗人府宗正身分參見監國魯王，後因旁人挑撥，而兩人漸行疏遠的紀錄。

陳衍所著《福建通志列傳選》中之鄭成功傳記，亦出現國姓爺為宗人府宗正之職稱：

> 唐王即位福州，芝龍以擁立功進爵平鹵侯，引森入見。……賜國姓，更名成功，命為御營中軍都督、儀同駙馬都尉、宗人府宗正。自此，中外稱曰「國姓」。[27]

以上均記載鄭成功位居明室之宗人府宗正銜。假設寧靖王府南面果真建有名為「宗人府」屋宇，而宗人府事權又歸鄭氏所掌，與朱術桂並無相關，那麼此建築體與寧靖王府邸主體建築的關連性就更為疏遠，甚至不能將其稱為寧靖王府邸建築群的一部分；或者，其中又隱藏另一段鄭氏政權與朱明遺裔之間不為人知的秘密故事。綜上所述，此一疑似宗人府建築之神秘面紗，仍有待進一步將其揭開，且更深入地發掘探討。因此本文目前無法同意如各界所認定此一傳說中的建物功能即為「宗人府」的普遍說法。而此一疑似宗人府的神秘空間是否曾經真實存在？筆者認為，大天后宮北側現存建物曾為「監軍府」功能之說，目前並無法從史料或各界研究中得到有力證實，在該宮南側是否曾經存在傳說中疑似「宗人府」的建物，更應以不確定的保守態度存疑之。

四、施琅與「施厝衙」傳說考

施琅平臺後是否曾經霸占寧靖王府邸，成為所謂的「施厝衙」？[28] 目前各界學者、人士使用大天后宮曾為「施厝衙」之說，大多是引用石萬壽所論述內容。但石氏卻未詳述「施厝衙」說法的出處為何。

27　陳衍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通志列傳選》（文叢第 195 種，1964；1922 年原刊），〈福建通志列傳選　卷一：鄭成功〉，頁 57。

28　「施琅率師入鹿耳門，強占一元子園為宅第，稱施厝衙……。」參見石萬壽，《臺灣的媽祖信仰》，頁 238。

以性善[29] 視角觀察，若當年真有施琅水師進駐的事實，至今保存完整之明寧靖王神位與寧靖王捐宅為庵之觀音殿等，應能成為施琅水師保護此建築群之具體證物。如施琅有貪圖享樂之竊占行為，當年他應可再霸占鄭氏政權中其他更具崇高象徵意義的場域，如承天府署、東寧總制府、北園別館或朱明在臺其他王室遺裔府邸等做為所謂的施厝衙，但在各種文獻中卻不見有如此行動的相關記載。這些具有象徵性意涵的官署、王府等，在清領之後大多任其消失（如除寧靖王府之外的其他王室府邸）或轉為宗教寺廟（如北園別館成為海會寺），或轉作他途（如承天府署成為儲藏兵器火藥的倉庫、[30] 東寧總制府改為陳氏宗祠）。筆者認為施琅僅竊占全家均於府邸內自縊死亡之寧靖王府邸成為「施厝衙」，卻放棄霸占其他宅邸似乎不甚合理。

康熙 22 年施琅率清軍大敗鄭氏政權後，民間或前或後陸續出現許多如天地會等反清復明組織，[31] 這些受前朝影響之殘存舊勢力，在民間宣傳上可能遺留大量的污名化耳語；或漢民族的歷史記事者、文士等，在民族主義思想影響下產生此一輕衊施琅之說。

改建寧靖王府邸為媽祖廟之原始動機，目前各方亦說法不一。施琅在《靖海紀事》中記錄此次平臺戰役媽祖多次顯聖助戰，生動地表現先民對非結構的自然地理現象描述，這是一種人類對缺陷知識[32] 的聯想，對未知世界祥異空間的一種結構化或秩序化的解釋，與在各種不同文化時空中實踐行為時所得的區位價值概念。在自然界發生超出人力變化時，預知或神話的想像空間就會應運而生。

另一較普遍說法，認為施琅因畏懼平臺之功高震異族君主，而將大敗鄭氏政權之功績具歸媽祖護佑，以保全身家性命。但此說目前也僅止於推測，並無較具

---

29 孟子實證了人性之善，實證了人格的尊嚴，同時即是建立了人與人互相信賴的根據，亦即提供了人類以無窮希望向前、向上發展的根據。參見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頁 186。

30 李元春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志略》（文叢第 18 種，1958），〈卷一：勝蹟〉，頁 42。清軍入臺之前，鄭氏遺臣俱以皆降，目前亦尚未發現其他史料中顯示清領臺灣之後，裁廢之承天府、署因戰火波及破壞，至無法進駐之記載。

31 參見林豪，《東瀛紀事》（文叢第 8 種，1957；1870 年原刊），〈卷上：戴逆倡亂〉，頁 1-2；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文叢第 102 種，1961），〈卷首：御制詩（二）〉，頁 39。

32 缺陷知識：人類世界對空間的一種自我定位的根本需求，將未知世界的事物結構化或是秩序化的一種想像的知識。參見 Yi-Fu Tuan（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頁 79。

說服力的實證。這樣的解釋方式似乎又流於以漢族本位傾向的偏倚視域，使用漢族人之單方視角，來詮釋施琅改建寧靖王府為媽祖廟之主要動機。

如能跳脫上述普遍通行的兩種說法之外，各種答案亦可能將會應運而生。過去的寧靖王府邸目前已成為宗教聖域，若以性善視角看待施琅此一治世之法，建立以媽祖信仰來教化臺島之民為由，進而保存靖忠遺跡，使朱術桂靖忠精神長存人世。[33] 再則，觀察施琅與臺島相關事蹟之中，從為臺島子民力爭留臺，上「請留臺灣疏」[34] 到疏請減輕臺民賦稅負擔，建設臺灣成為海疆重鎮的努力皆可看出端倪，這些事蹟關係日後臺灣的命運前途極大。

康熙帝重用施琅，直至康熙 35 年（1696）3 月 21 日死於任上，享年七十有六；施琅由太子少保、靖海將軍、靖海侯、右都督、管福建水師提督事原銜，加贈太子少傅、予祭葬，加祭二次，謚「襄壯」。康熙帝甚至於康熙 37 年（1698）9 月 11 日、14 日、16 日連續三次遣福建分守興泉道、布政使司參議加四級王之麟諭祭，慎重非常。與鄭成功當年逼殺施琅並斬其父兄相比，康熙帝可謂施琅之伯樂也。

據清代各時期所修之方志、文獻等資料，幾乎均一致記載大天后宮現址為明寧靖王府邸改建而成。施琅當年為報鄭成功殺其父兄之仇，肩負沉重的叛臣身分，是否心中又另存暗自欽羨、感佩寧靖王與五從死媵妾無懼生死之忠義節操，因而不斷利用各種名目刻意保護其王府。他的這些舉動也許是為彌填內心漢民族情節的補償心態，民族主義思想作用於自身人格缺陷的心結之上。[35]

五、朱一貴的「皇帝殿」傳說考

康熙 60 年鳳山縣令出缺，時臺灣知府王珍和其次子徵收糧稅苛刻，橫徵暴斂使百姓怨聲載道，在苛政的前提下，再加上政治、經濟、自尊、異民族統治壓迫等因素，人類本能的反暴政、反強權、反抗異族統治的民族主義心態便一觸即發。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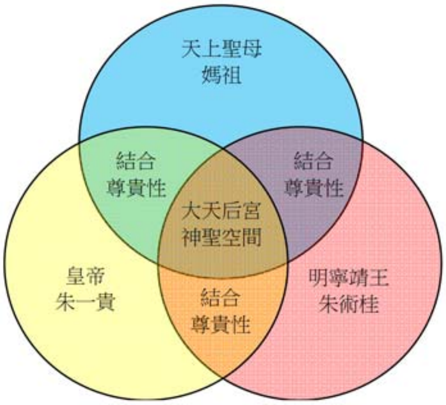
33 明鄭政權降清後，在臺之朱明皇族均呈繳金册一併具降。唯寧靖王朱術桂率妻妾侍女等，為保全節，自縊殉國。

34 高拱乾，《臺灣府志》（文叢第 65 種，1960；1696 年原刊），〈卷十：奏議〉，頁 231-234；施琅，《靖海紀事》（文叢第 13 種，1958；1684 年原刊），〈欽定八旗通志名臣列傳〉，頁 85。

35 目前各界對施琅與其部將強佔墾地之論述頗多，且論述形態多滲入兩岸統獨意識之國族主義視角，筆者並無意圖加入其論戰行列，本文只單就建築措詞部分論述之。

一個本以養鴨為生的農民朱一貴，在缺乏精確知識的封閉環境下，編造出自己為朱明皇室後裔的虛構身世，訓練一群會表演排隊的鴨子來增加自己的天命背景，進而更以洲仔尾海中浮出玉帶七星旗[36] 的自然異象作為起義的神諭。在民智未開的社會中，操作數則神話，並且導引了朱一貴的追隨者，追隨他在自我虛擬世界裡的神聖地位。以想像力與缺陷知識所構造的神聖事蹟，這些事蹟可能與真實只有少許相關或完全無關，但朱一貴的幻想世界卻在當時知識貧乏的社會中被建立起來，且被寄予熱望，起義後短短半個月之間造成全臺俱陷，朱氏進而擁坐堂上，接受眾人膜拜、高呼萬歲。但此一短暫政權最後還是因內部分裂導致神話幻滅，終被南澳總兵官藍廷珍與水師提督施世驃所弭平，悲劇收場。

今人多傳朱一貴當年攻陷臺灣府時即以大天后宮為登基之處，信者甚至稱該宮為「皇帝殿」。[37] 筆者推論此一傳說的形成因素，主要是立基於反清復明的前提，而大天后宮又存有前身為明鄭時期「王府」的直接印象；世人常將由直接經驗（intuition）所形成的概念性，引伸為想當然爾而為之的正當性，進而將虛擬的故事結構化、合理化，且不願深入證實史料的真實性，再經由不斷地以訛傳訛，最後終於成為虛構的事實。



圖七　朱一貴皇帝、媽祖、明寧靖王三者交錯結合，
只為彰顯大天后宮的尊貴空間。

圖表來源：筆者繪製。

36 謝金鑾、鄭兼才纂，《續修臺灣縣志》，〈卷五：外編　兵燹〉，頁 369。
37 曾吉連，《祀典臺南大天后宮志》，頁 70。

根據現存文獻資料中記載，朱一貴之登基處應是以「臺廈道署」為王府，鮮有以大天后宮者。[38] 而大天后宮為皇帝殿之說所以流傳，可能是大天后宮的媽祖信士醉心於「皇帝」二字至高無上的尊貴意象，進而為信士自身所尊崇媽祖信仰與其前身為寧靖王府邸的意象相連結；三者交錯結合之目的，或許只是大天后宮信眾為了彰顯其建築主體為一座層級尊貴，且無可比擬的「神聖性空間」之虛構性說法（圖七）。

六、大天后宮「官廳」功能考

大天后宮主軸北側現有硬山頂建築三進。由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乾隆30年〈重修天后宮增建更衣亭碑記〉、〈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圖六）的建築彩圖等史料可以瞭解，大天后宮右側三進建築當時的功能稱為「官廳」或「更衣亭」之用，並指出此三進建築為覓廟右方之地二畝許興建而成。

圖八　第一、二進之間的天井兩旁為淨果臺

圖片來源：2005年10月17日，筆者拍攝。

---

38 朱一貴原名朱祖，岡山養鴨。作亂後，土人呼為「鴨母王」。賊夥詭稱海中浮玉帶，為一貴造逆之符。既得郡治，一貴自稱「義王」，僭號「永和」；以道署為王府。參見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文叢第74種，1961；1741年原刊），頁489。

大天后宮主軸北側建築原有官廳之空間功能現幾已全面更易。目前第一進之門外懸掛大雄寶殿門匾；第一、二進之間的天井兩旁為淨果臺（圖八），可供祭祀前清洗鮮果、祭品之用；第二進功能現為祀奉三寶佛像，三寶佛分別為釋迦牟尼佛、藥師佛、阿彌陀佛，左、右兩側祀韋馱、伽藍二位護法尊者；第三進為祀奉觀世音菩薩之所。據傳當年明寧靖王對觀音信仰奉之甚虔，廟方亦言此觀音乃明鄭時期寧靖王存遺之物，施琅入臺後遂移至此殿，供奉至今。[39] 佛龕內另配祀善財童子、龍女、地藏王菩薩、十八羅漢等。

（一）寺廟建築中官廳的功能性問題

傳統寺廟建築中「官廳」一詞，在詞語理解上應有特定專屬的定義方式，這裡並非指官署專有的衙門建築。

「官」在這裡的解釋應具有下列意涵：1. 形容上有公家、公有之意，指非私人所有；例：官屋、官田。2. 有專司某種職能的物體之意；例：器官。3. 對人或物的一種尊稱，且有較為高尚、高等或高級之意；例：官人、官話、官窯。「廳」在此是指特定的空間或場域。因此本文中的官廳在名稱意涵上，應指具有特定功能的公眾空間或場域之意。傳統寺廟建築中屬官廳的屋宇部分，一般都為主建築群體之附屬建物，所以在字面含意之外，應該也有更超出字面之意的特殊功能。

官廳的功能性為何？乾隆 30 年〈重修關帝廟增建更衣亭碑記〉中記錄了官廳建築的空間作用：

> 宮斯土者 值享祀朔望 入廟行禮 典甚鉅也 但地當康衢囂市 官僚後先至者 坐集階前 踧踖不安 士民來叩謁 佇竣門外 或避官司去 殊非所以廣昭誠敬也 ……每入廟 常以規制未完 汲汲動念 爰倡義聿新殿宇 於廟左側 構亭數椽 縻金若干兩 俾文武庶司 驂乘軺停 鷺鵷候集 得以肅冠裳而齋儼恪[40]

---

[39] 曾吉連，《祀典臺南大天后宮志》，頁 126。

[40] 〈重修關帝廟增建更衣亭碑記〉（乾隆 30 年〔1765〕）碑位於臺南市南門碑林，高 245 公分，寬 83 公分，花岡岩材質。

上列碑文記錄了關帝廟[41] 之官廳功能，文中敘述此空間可用於舉行祭祀大典時，官吏們可作為停車、下轎、準備、休憩或接見百姓仕紳等之所在，並於入廟祭祀之前，作整肅頭冠衣裳、端正儀容之處。

〈重修天后宮增建更衣亭碑記〉中，亦詳實記載了此建築之增建緣起並將作何使用：

> 后宮在郡西偏 殿宇峨峨 廟貌奕奕 □甚都 而外乏廨舍 每當大禮舉行班聯候集 坐立階除 踧踖無餘地 夫嚴對越 效駿奔 將事之誠也 整冠裳一齋莊 未事之敬也 雖三日七日□□庶司告虔有素 而戴星披月 稅駕停驂 曾不得從容靜穆之地 凜潔齋以相見 何以交神明而昭慎重歟[42]

大天后宮官廳與關帝廟官廳均為蔣允焄同時籌建，二廟背景亦同為列入春秋祀典的官建廟宇，所以碑文中明顯表現以官方形制為主的官樣記述方式，二碑對官廳的功能敘述也都大同小異。但總體來說，二廟均非只是單純接受官員們祭祀活動的專屬單位，對一般平日前來參拜的庶民百姓，廟方開放和積極的態度應與一般廟宇相同，宗教傳布的基本原則亦當如此。當然，此官廳功能應更不只用於春、秋兩季的祭祀大典而已。〈重修天后宮增建更衣亭碑記〉碑文中云：

> 亭既成 士民樂□公之能盡誠敬以事神也 請鐫諸石 此□足以見禮化之行洽乎人心之同然者矣[43]

根據碑文中之描述，官廳功能亦能適應每一位入廟的參拜者。所以每位信眾要進入廟宇祭祀之前，必定要先進入官廳此一過渡空間，並以此作為方便休息、更整衣冠、點理祭品、端正情緒，安排進入廟宇祭祀前之準備。昔日士人在外行走塵土飛揚，每凡登堂入室之前必先撣塵，以示對屋主的尊敬。明、清時天子祭天地、宗廟之前，亦必先至具服殿（亭）更換祭祀禮服，甚至在多日之前就早已齋戒沐浴，潔淨身體、端正心神，以示對天地神祇的尊敬。此一端正儀容的禮儀，

41　為今之祀典武廟，位於臺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二段 229 號。

42　〈重修天后宮增建更衣亭碑記〉。

43　〈重修天后宮增建更衣亭碑記〉。

直至國民政府播遷來臺早期，都還可看到進入各政府單位機關大門的玄關之內，必設置大型「整容鏡」，入室之前先照照鏡子、看看自己儀表有無失禮之處，這與官廳的過渡功能有異曲同工之妙。在大天后宮北側原為官廳功能的三進建物中，第一、二進間之淨果臺可謂過去隆重祭祀的儀式性行為之最後殘跡（圖八）。

（二）官廳如何作用於參拜信眾

人類在空間中生活，並在生活的軌跡之中創造適合特定活動的訊號，這些訊號引導人們產生各種內、外在的動作與情境，這樣的特定空間就成為儀式性的空間，人們進入此空間中即被潛移默化了精神並引導意志，且行禮如儀。

從狹義的說法來看，「儀式性空間」即一般人所認知的儀式活動，是指要舉行或進行一特定儀式的空間場所，並在此空間場所中舉行類似戲劇展示般的活動演出，參與其中的每一個人都各自扮演一特殊的角色，並且占據一特定的位置。例如：每年陰曆 3 月祭祀媽祖誕辰，並與各路神明一同舉行盛大的繞境活動。參與者在其中扮演了政府官員、祭祀人員、法師、乩童、信徒、攤販、記者、看熱鬧者、或研究者。這些人都被安排、設計到儀式之中，且被引導進入他們在這個空間場域中自我身分所應處的位置，並各司其職。此類動態的儀式性行為，在一般認知上亦較容易被人所理解。其實在官廳中進行如更換禮服、整理祭器、潔淨果品等動作，亦是儀式性行為的動態表現之一。

從廣義上來說，「儀式性空間」是表示任何具有儀式性特質與實質意義的空間與物體，而這些空間和物體當然包括上述動態的儀式行為，也涵蓋了靜態的精神意象表現。何謂靜態的精神意象表現，簡單來說，就是在特定的空間場域中，自我自然的感受到特殊的意義，例如雄偉、安全、溫馨、快樂、悲傷、平和、懺悔、莊嚴、吉祥、威嚇、神秘等等的各種內在感覺。〈重修天后宮增建更衣亭碑記〉中解釋了從外界塵囂喧鬧的凡塵世界，進入莊嚴肅穆的神聖場域之前，先進入官廳這個過渡空間之景象：

> 地雖窄而氣象寬也 近市囂而到此心肅也[44]

---

44 〈重修天后宮增建更衣亭碑記〉。

大天后宮官廳場域的儀式性功能，在以上碑文中亦描述官廳空間靜態的儀式性，所表現出的內在精神意象。

大天后宮宗教建築群是個神聖的場域，神聖有極其尊貴聖潔與不可褻瀆之意，而神聖與污濁是對立、不可混淆的，所以需要將二者隔離開來。為讓此神聖的場域能夠得到完全的整潔純淨且不會受到任何的污染，那麼參拜者由世俗域[45]的污濁空間進入到純淨的聖域空間，就應該經過一個淨化的過程，而官廳正好提供了這樣的一個過渡空間。尤其大天后宮在前清時期是列為春、秋兩祭之祀典官廟，且當時管理臺灣宗教事務的最高行政長官「僧綱」[46] 亦住錫於此，建築形式與參拜儀式上受到儒、釋、道[47] 三家倫理的嚴格規範，此一場域當然也就成為傳統禮教的物化形式。

宗教廟宇中的儀式性功能，和其他世俗域的空間功能不同，廟宇是一具有特殊開放與關閉功能的異質空間。[48] 大天后宮的異質性預設亦有其特定的開放與關閉空間的儀式性功能，好讓該宮聖域中每一個特定的神聖層級空間既獨立，又可以相互影響其他空間的特殊預設。因此大天后宮神聖空間中的儀式性規矩，為有別於一般可自由隨意進出的公共空間，附屬於旁的官廳就是一個管制由外界污濁的世俗域進入到純淨聖域前的過渡空間，並且強化了大天后宮此傳統廟宇的場域異質性。獨立的官廳在有意識或無意識的社會性規則運作下，以各種儀式性行為管制大天后宮的進出方式，如休息、更換禮服、整理祭器、潔淨果品、端正思想等。這些以示虔誠或尊敬的儀式性動作，都是受到空間意涵背後強大的道德或文化上隱喻性意義所驅使，並通過這些空間權力的管制方式，獲得人的行為和空間場域的層級區劃，創造了安全的保護幻想世界，即另一個真實完美的理想空間。

---

45 世俗域：凡屬於宗教的、與某種神靈相聯屬的空間，如古代埃及、羅馬、希臘及希伯來的神殿，或中世紀基督教堂、日本神社、瑪雅神廟等，都可歸之為聖域之屬；而在這些神聖的空間領域之外的空間，則應定義為世俗域。參見王貴祥，《文化・空間圖式與東西方建築空間》（臺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頁 280。

46 關於僧侶住錫於大天后宮之論述，請詳參毛紹周，〈地方場域歷史的再確認：初探臺南大天后宮的住持僧侶〉，《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11（2008 年 12 月），頁 1-46；毛紹周，〈再探臺南大天后宮的住錫僧侶〉，《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15（2010 年 12 月），頁 129-152。

47 儒：指科舉出身的官方儒生；釋：指駐錫於大天后宮的僧綱為臨濟宗僧侶；道：為大天后宮媽祖為道教神祇。

48 關於異質空間的論述，可詳參 Edward W. Soja 著，王志弘、張華蓀、王玥民譯，《第三空間：航向洛杉磯以及其他真實與想像地方的旅程》，頁 214-218。

參拜前先進入此間的過渡時空，在沉靜心靈之外，並保證每位參拜者進入大天后宮建築群主體之後，均能感受到神聖場域的完美力量，這更彰顯了外界世俗域的所謂真實空間，其實是更為虛幻痛苦的五濁惡世。[49] 二百多年來，凡參拜者到大天后宮進行祭祀活動之前，一定得先入此廳進行進入聖域謁見媽祖與祭祀眾神前的準備工作，並且安心定神、整理情緒，待肅穆精神、滌淨塵囂喧鬧世俗的污濁之氣後，就可以進入莊嚴靜穆的神聖場域。

七、〈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所衍伸出的「正殿位置」疑案

現大天后宮建築群正身四進中心主軸線，第一進為三川門，進入第一進與第二進中間是一大天井，天井兩側有捲棚式迴廊；第二進為歇山重簷捲棚式拜殿，其花崗岩龍柱相傳為明寧靖王府邸時期遺物。第二進與第三進之間隔著一小天井，第三進現為正殿，其臺基較第二進高出許多，臺基正面尚存一凸出螭首，傳說亦是寧靖王府時期之遺物。第四進為最後一殿，現為聖父母殿。據傳寧靖王與五位媵妾均於此殿前壽樑先後投環殉節，目前明寧靖王神位即供奉於此。

乾隆40年，臺灣府知府蔣元樞（江蘇常熟，舉人，4月任）整修了大天后宮，從乾隆40年開始[50] 至乾隆43年完成。他在此次整修中留下了一份目前大天后宮最早的建築圖說〈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見圖六），此圖說保留了大天后宮當年的古老原型：

> 舊時廟制 前為頭門 門外有臺 以為演戲之所 門內兩廊咸具 中為大殿供奉神像 其後正屋二進 襍祀諸神[51]

圖說附文記載頭門即三川門，當時的屋頂屬於三川脊硬山式，[52] 三川門外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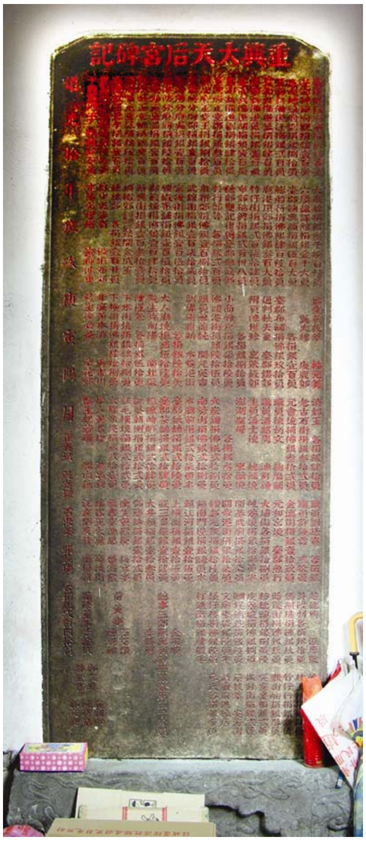
49 五濁惡世：佛教用語，五濁分別為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

50 謝金鑾、鄭兼才纂，《續修臺灣縣志》，〈卷二：政志　壇廟〉，頁64。

51 〈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頁70-71。

52 民國48年（1959）將屋頂改建為假四垂頂。

一座酬神用的戲臺，進門之後兩邊有迴廊，第二進為大殿，內供奉媽祖聖像，但現今的第二進為拜殿。第二殿的後面兩進，圖說曰：「襍祀諸神」。襍通雜字，也就是說現在的拜殿就是當年的正殿，而現在的正殿也就是當年的後殿（圖六），乃作陪祀其他神祇之功能，此於〈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圖、文之中皆有明確標示。圖中第四進左、右兩間，表現以檻窗及檻牆所圍合之非開放性空間，推測當年住持、僧侶等應在此間居住。但以上對此一圖說的詮釋與推論，目前因廟方當年的紀錄均已不復存在，更乏人針對此問題進行討論，部分學者亦質疑蔣元樞記載有誤。[53] 在此謹就該圖是否正確問題，嘗試探討、還原當時建築真實型態之其他可能的空間樣貌。



圖九　道光十年〈重興大天后宮碑紀〉

圖片來源：2004 年 12 月 1 日，筆者拍攝。

---

[53] 如石萬壽對蔣元樞〈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附文有不同看法：「頭門內的二廡廊今存，二殿之內為再拜殿，圖說云為大殿，似記載有誤。」參見石萬壽，《臺灣的媽祖信仰》，頁 249。

按照傳統建築體系的組織規律，是以「間」為基本單位來構成每一「進」的單座屋宇，然後幾個「進」又連結組成一完整的建築群。每個基本單位看似獨立，組合起來卻是一個具有完整功能的主體。大天后宮的建築內在又隱含儒、釋、道（儒代表官方士大夫，釋代表住持僧侶，道代表媽祖信仰）三家精神思想一定的秩序性與規則性，其建築形制，在融合傳統的美學意識與使用者功能性的多重要求下，於不同時期創造、組織了不同功能要求的神聖空間，戮力追求以各種方式體現雄壯、莊嚴、深層的內、外部景觀。參拜者從外部之廟埕進入開始，透過深入內部，經過一層層不同建築環境的間與進，使人與神聖的情景在交融中產生一系列身體與空間交錯的複雜感受，從而激發參拜者對大天后宮媽祖信仰最深沉的崇拜之心。

嘉慶 23 年 3 月 16 日寅時（1818 年 4 月 21 日），大天后宮中殿及後殿發生大火，損失慘重。[54] 但臺灣各界很快地組織了媽祖信眾並重建了大天后宮，道光 10 年（1830）修建竣工時留下的〈重興大天后宮碑記〉[55]（圖九），清楚鐫刻著從個人到各路神明信仰圈、官方部門、工商團體、[56] 地方社團等，當時遍布全臺各界的捐款名錄與金額，當中可以看出各地人民信眾和各公、私單位對重建的重視。在基地面積有限與外觀不變的前提下，此次災後的重建工作，爭取創造、將神聖的場域空間做最大延伸，應是此構思改變的最主要出發點。根據本文研判，極有可能是在此次大火後，將鎮殿媽位置從第二進移到了現在的第三進，但重建後的硬體外觀與乾隆 43 年時的相比，直至今日幾乎沒有太大改變。

臺灣傳統建築「進」與「進」的高低是以遞增到遞減的方式作順序，有如手掌從拇指到中指、再到小指，高低起伏的身體圖示來鏡射構築一建築體。大天后宮亦是從三川門向第二進遞增至最高，成為歇山重簷式三間寬架構，現為臺灣最高大的捲棚式屋架[57]（圖十）。清代屋頂的規制有嚴格的等級之分，依次序分別

---

54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三月十六日寅時，天上聖母廟災，中殿及後殿俱燼，神像、三代牌位蕩然無存。住持僧所蓄銀錢俱鎔化。惟大門一列尚存。」參見陳國瑛等採輯，《臺灣采訪册》（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頁 125。

55 〈重興大天后宮碑記〉，碑現龕於大天后宮拜殿右牆，高 142 公分，寬 81 公分，花岡岩材質。

56 當時稱為行郊，府城的工商團體大多是為北郊蘇萬利、南郊金永順、港郊李勝興等三郊為主導中心之工商團體。有關三郊，可參見石萬壽，〈臺南府城的行郊特產點心：私修臺南市志稿經濟篇〉，《臺灣文獻》31: 4（1980 年 12 月），頁 70-98。

57 臺南大天后宮「拜殿擁有臺灣最高大的捲棚式屋架」說法出自曾吉連，《祀典臺南大天后宮志》，頁 99。

圖十　拜殿內高大壯闊的捲棚式木構屋架

圖片來源：2004 年 12 月 1 日，筆者拍攝。

圖十一　第二進為等級較高的歇山重簷式架構

圖片來源：2004 年 10 月 6 日，筆者拍攝。

為重簷廡殿、重簷歇山、廡殿、歇山、懸山、硬山等，其他如捲棚、盝頂、攢尖等形式則尊卑等級較為模糊。[58] 在嘉慶大火之前，按照蔣氏〈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記載的正殿（第二進）位置，根據禮制，其桁檁應為奇數且有正脊，屋頂也為尊貴的歇山重簷式（圖十一）。現在的正殿（第三進）為硬山式，按照常理並無理由將尊貴的媽祖置於建築等級較次的第三進，而讓祭祀者錯亂的在尊貴的第二進參拜，卻又向位於等級較次之第三進內的媽祖行謙卑的奉祀之禮。

再者，第二進與第三進皆為分開的個體建築，傳統上拜殿（亭）與正殿分離，並以一小天井作為區隔之例相當罕見，[59] 且第二進前置有御路石（圖十二），正殿與第二進分離卻無此尊貴性裝置，此於理法上亦較有爭議。人類對大小、尊貴的本質，大都有一種自然的基礎分辨能力，經由不同文化的訓練、洗禮亦會稍有不同，但越高、越大、裝飾越華麗便是越尊貴的基本原則大致不變，就如《禮記‧

---

58 林會承，《臺灣傳統建築手冊：形式與作法篇》（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87），頁 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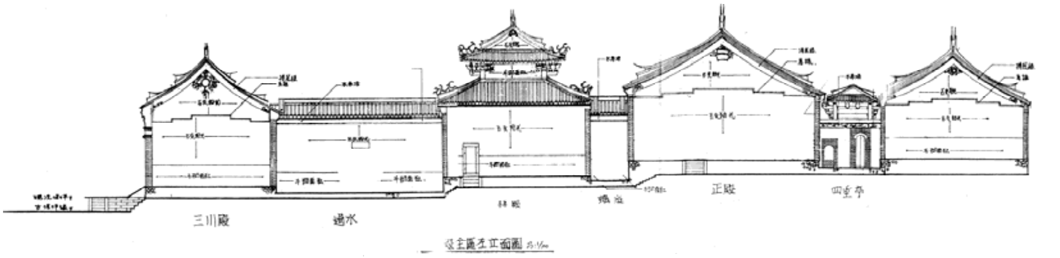
59 李乾朗介紹臺南大天后宮之形式：「最大的特點是拜亭為獨立式的歇山頂（即第二進），因此與正殿之間尚留有一段小天井，對於其狹長而封閉的空間無疑是非常成功的突破。」參見李乾朗，《臺灣建築史》（臺北：北屋出版事業公司，1980），頁 118。

圖十二　位於大天后宮第二進前之御路石

圖片來源：2004 年 9 月 29 日，筆者拍攝。

禮器》中所云：「禮，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大為貴者……有以高為貴者……有以文為貴者。」[60] 大天后宮的第二進建築體，明顯比第三進高大且華麗，且似乎與禮制不符，有違「官建祀典」之士大夫嚴謹的尊卑與秩序原則。附近幾所歷史悠久的大廟，如祀典武廟、天壇等，均是以歇山重簷式作為正殿屋頂的建築方式。祀典大天后宮目前的硬山頂正殿搭配歇山重簷頂拜殿的特例（圖十三），似乎應有更特殊的理由來支持此種作法。

所以在有限的面積中，要將神聖的場域創造出最大的空間延伸，但又必須維持外觀完整的前提之下，當時負責重建工作的傳統匠師，可能因此而發揮了靈活



圖十三　以硬山式正殿搭配歇山重簷式拜殿是傳統建築中的少見特例

資料來源：趙工杜，《第一級古蹟大天后宮（寧靖王府邸）修護工程結算書》（臺北：博風技術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出版年不詳），無頁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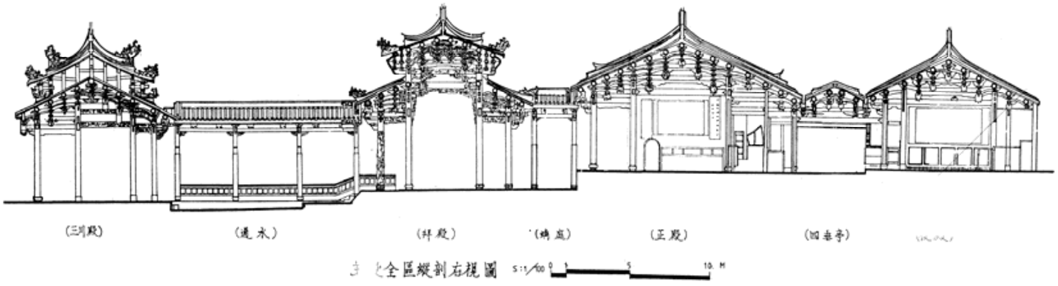
[60] 姜義華注譯、黃俊郎校閱，《新譯禮記讀本》（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 358-359。

變化的巧思，完成了這個全新的複合式案例。筆者初步將此作法的可能性整理推測如下：

第一、將第二進內部桁檁改為偶數的捲棚式架構，但歇山重簷屋頂壯麗的外觀維持不變。此一改變使第二進成為似有其尊貴性、等級較高的歇山重簷屋頂，但又有不列入等級之分的捲棚式架構（圖十、圖十四），巧妙的將其轉變成無法分級的模糊地帶。

此種將屋頂形式，靈活改變成無法分級的技巧，在臺灣傳統的漢式建築中常見各種實例。例如在三川門的硬山式屋頂上，重疊另一座歇山式屋頂的「假四垂」手法等。[61] 這都是為了增加屋宇的華麗氣勢，但又不違背傳統禮教層級序列式樣的變通性做法。

第二、大天后宮的廟基建築在由東向西的順勢下坡地形，由於地形緣故，第三進地基比第二進高出許多。將媽祖金尊移往第三進，不但擴張延伸了媽祖的聖域範圍，且讓整個參拜動線從位於最下坡的廟埕與第一進，進入高大華麗的第二進，再進入地基最高、最深長的第三進來參拜神聖尊貴的媽祖金身。



圖十四　第二進為等級較高的歇山重簷式架構，
但又有不列入等級之分的捲棚式架構

資料來源：趙工杜，《第一級古蹟大天后宮（寧靖王府邸）修護工程結算書》，無頁碼。

61　臺南大天后宮之三川門，於民國四十八年（1959）亦重建成假四垂屋頂。參見曾吉連，《祀典臺南大天后宮志》，頁 85。

一次又一次的高潮迭起，狹長空間之中的壓迫感消失了，卻增加了深遠仰望的空曠感，讓朝拜者強烈感覺到媽祖深不可測的神聖力量。這種延長縱深，將神壇與入口位置盡量延伸拉長的設計方式，與西方教堂長軸型的建築配置又有異曲同工之處。此空間設計邏輯的改變，應與重建當時出資最鉅的府城三郊商團有密切關係；三郊與西方商行之間密切的海上貿易，其視野觀念與文化經驗的累積均不同於傳統常民，這些海外交流頻繁的美感經驗，或許都曾在此應用於重建工程的設計思維之中。

臺灣府知府蔣元樞留下的這份〈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成為本文推測、還原大天后宮當時空間形制的重要依據，讓我們能夠更進一步深入探討當時建築意匠們使用什麼樣的境象概念，經由透過觸覺、視覺、甚至聽覺、味覺、嗅覺的感覺經驗，去詮釋創造大天后宮新、舊空間和時間交錯複雜與矛盾的空間意象。此圖說的發現，更成功地帶領本文從一個從未曾被質疑的空間形制現狀，進入大天后宮另一個可能曾經存在的空間歷程。

最後，在祝融廢墟中建立起新的大天后宮，注入了更多的其他機能。此種將過去為正殿功能的第二進，改易到現在的第三進作為正殿，這類改變空間、重新規劃的想法，大火之前或許只是一個想像。人類現實世界中大部分的幻想是無法實現的。但現實中有些幻想被實現之後卻又成了人類沉重的夢魘，可是若沒有幻想的世界和想要改變的欲望，人類生命又將失去進步的動力。大天后宮內部空間的改變與否成為嚴重的課題，此一問題已經不是單純提供人類居住，而是包含「天、地、神、人」完整四重性主體的建築空間設計。修復的匠師在如此壓力之下，對大天后宮過去空間中所有的欠缺之處進行全面指認，進而創造出最大的實用空間，成功地將正殿從原來的第二進向後推移至第三進，並利用此次大火後的重建機會，讓來自四面八方的各界信眾心中所期待、增大聖域範圍的幻想成為真實，轉變過去空間較狹小的正殿印象，使其成為過去，並用最自然的方式，將舊大天后宮原有的空間意象與新的大天后宮成功結合。至此重建後的大天后宮，也因府城郊商大力支援而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咸豐 6 年（1856）5 月，大天后宮再度進行整修。臺灣自嘉慶以來，社會日趨穩定，商業行為也逐漸發達，各種行號所組織的商業團體逐漸成形，此時官府

正將大天后宮的主控權逐漸地釋出，進而由各商號與工商團體所形成的「行郊」集團進駐祭祀，並逐步取代官方，主導府城各廟宇的運作。

臺南地區當時最有力量的商號組織，主要是由北郊、南郊與港郊所主導的三郊商團，這三郊所組成強大的經濟實力，在當時的臺南地區幾乎已無其他商號能相抗衡。而大天后宮在大火後的重建工作，三郊亦積極介入並爭取主導權。從道光 10 年（1830）修建竣工時所鐫刻的〈重興大天后宮碑記〉中，可看出帶領主導總其事者即為蘇萬利、金永順與李勝興等三位行郊首領；至咸豐 6 年重修完成所留存的天后宮〈捐題重修芳名〉[62] 碑記（圖十五）所記錄的捐款額度，可以瞭解此時民間行郊正展現他們超強的經濟實力，並且試圖運作、移轉大天后宮的權力結構。此時期官方力量已逐漸減弱，府城富有的行郊商紳，所代表社會民間上層之結構力量，正積極地加入大天后宮。由於三郊商團擅長海上貿易活動，大天后宮的祭祀圈也因此進入了大航海時代的範圍。此時西方列強在東南沿海與南洋各地所建立殖民色彩濃厚的西式建築，特別是基督教教堂深邃的空間觀，對大天后宮重建後的空間布局，在設計觀念上也可能因此產生了部分的影響。

當官方所帶有嚴謹等級秩序觀念的儒教空間圖式逐漸褪去顏色時，大天后宮在嘉慶 23 年至道光 10 年（1818-1830）之間，逐漸走入了民間高層，並迎向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而正殿位置的更易過程，也在幾無痕跡的狀況下隱入了歷史之中。

圖十五　大天后宮〈捐題重修芳名〉碑記（咸豐六年）

圖片來源：2004 年 12 月 1 日，筆者拍攝。

---

62 〈捐題重修芳名〉，碑現懸掛大天后宮大雄寶殿山門內，高 70.5 公分，寬 325.5 公分，碑為木質。

八、結論

在探討歷史建築物與聖域建構者所結構之神聖空間上，本文提出了部分有別於目前認知的視角與看法。從明寧靖王府邸的肇建開始，以真實空間中的人、事、時、地、物開始辯證，到想像空間中理想與幻象的描述，直到真實與想像兼具的另一種可能性之結局，以重新建構大天后宮神聖空間作為前提，在盡量向在場者身分靠攏的過程中，發現各種有關歷史性、社會性、空間性等形制與功能問題，於本文中提出各類的另一種可能性答案。

首先，本文質疑明寧靖王府邸主體南側曾存在宗人府建築的空間真實性，在過程中，對各界普遍認為寧靖王朱術桂的大明正朔地位與兼任宗人府宗人令職稱提出不同看法，並發掘了鄭成功擁有朱明王朝之宗人府宗正職銜的歷史性文獻。筆者認為寧靖王府邸在明鄭時期應沒有何種無可取代的重要性，且於各史料中也沒有明確記載該王府即是代表朱明宗室「正朔」形制的禮法建築，建築主體也無法以「奉明正朔」之崇高地位來支持其南側應有「宗人府」屋宇的真實存在，亦不能以北側有疑似「監軍府」屋宇，所以南側亦應有「宗人府」屋宇以相對稱，來確認此一史料未載之迷樣建物。在目前普遍的認知中，對大天后宮北側建物興建於明鄭時期並曾為「監軍府」功能之說，筆者也無法從現有的歷史文獻中得到充分證實。因此文史各界應重新對此建物最早的興建時期與建物功能，再進行更充分的文獻論述或推論依據，才能證明目前普遍的認知說法。

現大天后宮建築群的肇建與得以保存至今，目前可以肯定的遠因大都與「施琅」關係密不可分。在「施厝衙」名稱的疑案中，本文去除「漢奸」與「叛將」的民族主義思考模式，以文獻調查方式推導出其他的可能性答案，此種方式或許能更清楚看到施琅與明、清兩朝另一深層的面貌。

對於朱一貴事件中，大天后宮曾被朱氏改為「黃帝殿」之野史傳說，筆者以該場域的社會性背景來推論、分析了形成原因。質疑此說可能為大天后宮信徒所聯想之虛構名稱，其目的是為了提高該宮場域本身無可比擬之神聖性，進而連結成形的想像性說法。

此外，筆者亦從歷史紀錄中，發掘了〈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中的歷史訊息，探討大天后宮在嘉慶 23 年之前正殿所在的正確位置；並連結了傳統建築的倫理規律、儒釋道精神、歷代重修紀錄、嘉慶大火紀錄、三郊商團海外經驗的空間想像、建築匠師的境象意念等各個視角，推論出現行拜殿空間應為嘉慶 23 年前之正殿所在，現正殿空間則為當時之後殿。

筆者在大天后宮官廳空間功能的解讀過程中發現，祭祀前先進入該場域是為了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下轉化成動態或靜態的儀式性行為，並以導引崇祀精神與信仰意志為最終目的。大天后宮的神聖場域相對於外界一切的世俗域，官廳的過渡功能成功地隔絕了世俗域，並於此空間的沉澱時間中，創造了人類在缺陷知識中求助於祥異的幻想世界並追求幸福完美的基本渴望。這創造出來的幻想空間，使人類居住的世俗域相形之下更顯虛幻，信眾更努力追隨媽祖信仰，並試圖將世俗域營造成更為接近幸福完美的理想化世界，但在營造的過程中恰好更彰顯了世俗域的雜亂無章。

因此在參拜者與大天后宮聖域的結構化過程中，先進入官廳內進行之動態與靜態的準備動作，將內、外兩個空間做了進階式的短暫隔絕，讓聖域的幻象經由短暫的時空轉換變得更為真實，這樣的功能亦使真實的世俗域轉變成虛塵幻境。所以在祭拜前先進入官廳進行洗滌身心靈的精神儀式，進而讓進入聖域後的信眾更加增強其尊貴聖潔的神聖感應，這也正符合了碑記中「地雖窄，而氣象寬也；近市囂，而到此心肅也」的官廳主要功能。可惜，民國 60 年大天后宮管理委員會之主事者，將第二進官廳改為今之大雄寶殿供奉三寶佛，[63] 原有官廳之空間功能現今也不再被重視。

筆者在蒐集本文之史料與傳說的過程中發現，對空間的詮釋應是主觀和客觀同時兼備。大天后宮建築群部分的形制及功能問題，經由筆者所提出上述列舉之歷史空間疑點之外，應該仍然能夠繼續發掘更多遊走於真實與想像之間的各種議題，並能再次進入臺灣建築文化中更深層的思考面向與辯證方向，推導出更多元、更逼近真實景況的各種可能性答案。

---

[63] 曾吉連，《祀典臺南大天后宮志》，頁 85。

引用書目

〈重修天后宮碑記〉(1778),碑現位於大天后宮拜殿。

〈重修天后宮增建更衣亭碑記〉(1765),碑現龕於大天后宮大雄寶殿前門南面牆。

〈重修關帝廟增建更衣亭碑記〉(1765),碑現位於臺南市南門碑林。

〈重興大天后宮碑記〉(1830),碑現龕於大天后宮拜殿。

〈捐題重修芳名〉(1856),現懸掛大天后宮大雄寶殿山門內。

〈Southern Ming calendars〉,「SERICA」,下載日期:2013 年 5 月 21 日,網址:http://oldchinesebooks.wordpress.com/2012/01/02/southern-ming-calendars/。

〈大天后宮(寧靖王府邸)〉,「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下載日期:2014 年 6 月 23 日,網址: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DA09602001447&version=1&assetsClassifyId=1.1&menuId=308&iscancel=true。

Soja, Edward W.(索雅)(著),王志弘、張華蓀、王玥民(譯)

2004 《第三空間:航向洛杉磯以及其他真實與想像地方的旅程》。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Tuan, Yi-Fu(段義孚)(著)、潘桂成(譯)

1998 《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

毛紹周

2008 〈地方場域歷史的再確認:初探臺南大天后宮的住持僧侶〉,《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11: 1-46。

2010 〈再探臺南大天后宮的住錫僧侶〉,《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15: 129-152。

王貴祥

1998 《文化·空間圖式與東西方建築空間》。臺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石萬壽

1980 〈臺南府城的行郊特產點心:私修臺南市志稿經濟篇〉,《臺灣文獻》31(4): 70-98。

2000 《臺灣的媽祖信仰》。臺北:臺原出版社。

江日昇(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0(1704) 《臺灣外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6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余文儀

1962(1764) 《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2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李元春(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58 《臺灣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1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李乾朗

1980 《臺灣建築史》。臺北:北屋出版事業公司。

亞新國土科技(測製)

2004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像片基本圖:臺南》,圖號:93r008-068。臺北:內政部。

林 豪

1957(1870) 《東瀛紀事》,臺灣文獻叢刊第 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林會承

1987　《臺灣傳統建築手冊：形式與作法篇》。臺北：藝術家出版社。

姜義華（注譯）、黃俊郎（校閱）

2012　《新譯禮記讀本》。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施　琅

1958(1684)　《靖海紀事》，臺灣文獻叢刊第 1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徐　鼒（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3(1887)　《小腆紀傳》，臺灣文獻叢刊第 13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徐復觀

1975　《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高拱乾

1960(1696)　《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張廷玉等（撰）

1971　《仁壽本二十六史・明史》。臺北：成文出版社。

陳　衍（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4(1922)　《福建通志列傳選》，臺灣文獻叢刊第 19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國瑛等（採輯）

1983　《臺灣采訪冊》。臺北：成文出版社。

曾吉連

2001　《祀典臺南大天后宮志》。臺南：祀典臺南大天后宮管理委員會。

黃一農

1996　〈從湯若望所編民曆試析清初中歐文化的衝突與妥協〉，《清華學報》26(2): 189-220。

黃建中

1957　〈明嗣藩頒製永歷〔按：曆〕二十五年大統曆攷證〉，《大陸雜誌》15(10): 313-316。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1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10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趙工杜

出版年不詳　《第一級古蹟大天后宮（寧靖王府邸）修護工程結算書》。臺北：博風技術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劉良璧

1961(1741)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7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蔣元樞（纂輯）、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

1983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

蔣毓英

1993　《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謝金鑾、鄭兼才（纂）

1962(1807)　《續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21, No. 2, pp. 1-32, June 2014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Spatial Hybrid of Reality and Imagination: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the Great Matzu Temple

Shao-chou Mao

ABSTRACT

The Great Matzu Temple of Tainan, a Grade I historical monument, was built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years ago during the Ming-Zheng era. For various reasons, related information and literature remains limited and scarce. Moreover, along with the social change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names and functions of these ancient buildings also vari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then historical events. Passed down through legends and folklores, such names and functions were constantly recreated. Hence, the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these historical buildings became hybrids of reality and imagination; and their actual existence or authenticity became questionable.

In the light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theories and principle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contemporary recognized names and functions of these ancient buildings against related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Whether there exist other possible names and functions is further explored for more in-depth analysis and for reconstructing the actual reality.

Keywords: Shi Cuo Ya, Huang Di Dian, “A Diagrammatic Explanation for Renovation of the Great Matzu Temple of Tainan”, The Great Matzu Temple of Tainan, Guang Ting, Zong Ren Fu, Jiang Jun Fu

《臺灣史研究》
第 21 卷第 2 期，頁 33-68
民國 103 年 6 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生豬貿易的形成：十九世紀末期臺灣北部商品經濟的發展（1881-1900）*

曾品滄**

摘　要

本文除了論述豬與豬肉在臺灣漢人農業生產與日常消費的重要性外，更試圖藉由分析十九世紀末期臺灣北部發達之生豬進口活動，說明清末開港活動對當地民眾之經濟與日常生活的影響。

本文研究顯示，清代臺灣豬隻的生產與消費活動發達。以十九世紀後期為例，養豬事業是臺灣最普遍的家庭副業，就商品價值而論，也是當時臺灣最重要的產業之一。造成生產活動興盛的主要原因，包括：養豬成本低廉、豬肉高度商品化、養豬活動有助於水稻作與旱作等農業生產等。但更重要的是臺灣民眾對於豬肉的珍視與嗜食，豬肉既是日常膳食材料，也是祭祀、宴會或餽贈的重要物品。

雖然豬隻的生產與消費活動發達，但在 1880-1900 年，臺灣北部卻從中國閩、浙沿岸大量輸入生豬，形成興盛的兩岸生豬貿易活動。依據本文分析，生豬貿易的出現與發展乃十九世紀末期臺灣北部開港後經濟轉型的重要特徵。它一方面顯示當時的臺北有通貨膨脹的現象，致使豬肉價格上漲；另一方面，也反映臺灣北部在開港及成為臺灣政治中心後，造成本地的農業生產體系發生變化，使豬隻生產減少，但豬肉的需求卻因民眾消費能力的提升而增加。由此顯示，十九世紀末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已深刻影響民眾的日常生活。

關鍵詞：豬、豬肉、開港、帆船貿易、日常生活消費、家庭副業

---

* 本文初稿曾以“The Development of the Pig Trade: Economy and Consumption in North Taiwan, 1881-1900”為題，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與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共同主辦之 *Dialogues between European and Asian Commercial Documents: Trad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Knowledge Making in Modern East-Asia* 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 年 11 月 1 日至 2 日），承蒙與談人林玉茹教授及與會多位學者提供建議與修正意見，投稿期間亦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指出若干缺失，特此申謝。此外，本文為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東亞社會文化秩序之建構與解構」研究計畫項下成果之一，承蒙補助，謹此致謝。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來稿日期：2014 年 1 月 10 日；通過刊登：2014 年 5 月 26 日。

一、前言
二、最普遍的家庭副業：十九世紀後期臺灣的養豬活動
三、豬肉品的消費及其在地方市場的流通
四、有利可圖：兩岸生豬貿易的開展
五、臺灣北部商品經濟的發展
六、結論

一、前言

豬肉是傳統華人社會最重要的副食品之一，也是最常被使用且受歡迎的動物性蛋白質來源。尤其在華南與臺灣，無論是日常膳食、節慶祭祀、宴會或餽贈，豬肉都是重要甚至是必須的物品。一旦人民有足夠的經濟能力，通常會消費更多的豬肉品，消費量的變化與人民所得高低往往呈正向關係。[1] 另一方面，豬隻因屠體太大且保鮮困難，除非舉辦盛大的慶典，否則居民通常選擇出售自家飼養的豬隻，再經由市場交易取得食用所需的豬肉品。因此，豬肉品具有高度商品化的特質，乃地方市場上經常可見且不可或缺的商品之一。也因為具有上述兩項特質，豬肉商品的交易活動，不僅可反映地方市場的若干特性，透過市場的豬肉價格與交易量，更可以理解民眾生活水準的變化，並間接反映整體經濟的發展趨勢，成為經濟發展與生活水準變化的重要指標之一。一般而言，經濟狀況愈佳、生活消費水準愈高者，豬肉的消費量隨之提高，市場價格也呈現上漲趨勢；經濟環境不佳，人民的豬肉消費量減少，市場價格也隨之下降。

[1] 對於豬肉在明清時代華南漢人社會中的使用，可參看許多相關報導，如中川中英《清俗紀聞》、米田祐太郎《支那の商人生活》等。在這些記述中，無論是日常膳食、祭祀、宴會或餽贈，豬肉或是以豬肉製作成的火腿和醃肉等，都是重要的材料。另外，又如曹幸穗《舊中國蘇南農家經濟研究》，或方行〈清代江南農民的消費〉也都可發現，豬肉是漢人生活中重要的消費品；方行甚至將食用豬肉之「葷食」次數的增加，當作農民生活水平提升的重要依據。參見方行，《清代經濟論稿》(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頁 126-140。

十九世紀後期是臺灣經濟從兩岸貿易走向國際貿易的關鍵年代，因為開港的影響，臺灣的蔗糖、茶葉、樟腦等源源不斷地向海外輸出，至於鴉片、布料、煤油等華、洋百貨，也透過貿易活動大量輸入臺灣。一如研究者所指出，清末中國開港通商的結果，使這些口岸地域形成通商口岸經濟圈，不只國際貿易活躍，各口岸彼此間的商品流通也更為頻繁，商品經濟愈加大範圍且深入地滲透到原來的農業社會中，打破其原有的封閉性，從而使人們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消費型態發生明顯的變化。[2] 許多臺灣史的研究者也有相似的論點，但通常僅著眼於生產關係或商業體系的變化。如凃照彥認為，開港之後，並非如東嘉生所稱由來自歐美的資本掌握本地農業生產和貿易，而是本地的商人資本及高利貸資本大大地拓展了在島內農村的活動餘地，島內形成所謂的本地式經濟勢力，他更認為是開港通商的結果，帶給臺灣社會前所未有的高度商業性農業發達，使臺灣在日本占領之前，即已達到相當高度的貨幣商品經濟階段。[3] 黃富三也認為，1860 年開港後，臺灣貿易再度與世界市場掛勾，原有的「農商連體」特色不僅未減弱，反而進一步強化。[4] 至於林滿紅則在《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一書中，更廣泛且全面地討論茶、糖、樟腦出口對於整體經濟環境的影響。[5]

然而，商品經濟除了在生產與貿易發生作用外，如何滲透到人們的實際生活中，並在日常消費上發生顯著的影響？林滿紅的說法是，臺灣在出口更多茶葉、蔗糖與樟腦的同時，人們除了消費更多的鴉片外，也進口許多華、洋產品，如衣

---

2 濱下武志著，高淑娟、孫彬譯，《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清末海關財政與通商口岸市場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 276-405。至於開港後通商口岸民眾生活消費發生的變化，如陳計堯即曾以麵粉消費為例，說明開港之後促進了亞洲內部複雜的貿易網絡，上海、天津等糧食貿易中心逐漸轉變成生產、製造中心，而消費者基於機器製麵粉價格低於稻米的因素，增加了麥粉的消費。參見陳計堯，〈近代中國的開港、工業化與通商口岸之糧食消費的變遷（1870-1936）〉，收於海洋史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港口城市與貿易網絡》（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2），頁 221-290。

3 凃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出版社，1993），頁 20-25。東嘉生認為在開港之前，臺灣的「郊」都是獨占的流通機構，握有市場的支配權，臺灣農村的社會與經濟均受其影響。開港後，歐美近代資本主義的商業資本入侵，以高利借貸的方式掌握本地的農業生產，並取得貿易支配權，剝削了本地農民的利潤。除此之外，臺灣經濟內部的發展，並未有根本的影響。參見東嘉生著、周憲文譯，《臺灣經濟史概說》（臺北：帕米爾書店，1985），頁 52-55。

4 黃富三，〈臺灣農商連體經濟的興起與蛻變（1630-1895）〉，收於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頁 3-36。

5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 156。

料、人參、絲、玉等，並使用中國磚瓦建蓋房屋。[6] 但這些商品除衣料外，大多不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並不易準確反映商品經濟發展對居民整體日常生活所帶來的影響。至於謝美娥在論述清代臺灣糧價變動時曾指出，1880 年代臺灣北部受到開港通商的影響，種植茶葉的土地面積增加、稻作減少，以至於產量自給不足，由原來的稻米出口轉變成進口，北部消費者有逐漸依賴進口糧食的現象。[7] 然而，此一稻米進口說仍引起若干質疑，林文凱以日治初期各小港口的進、出口統計資料為依據，認為清末中式帆船與非條約港的航運和貿易活動其實仍相當發達，且臺米尤為其中重要的出口商品，臺灣貿易體制並未劇烈改變。[8] 換言之，十九世紀後期的開港貿易，其商品經濟滲透的範圍與程度為何，臺灣民眾的生產、生活消費是否因而發生明顯變化，目前尚不易釐清，仍有賴更多的證據進行討論。

本文主要目的，即試圖透過豬肉商品的市場供需狀況及價格變動，分析十九世紀後期臺灣北部民眾之農業生產活動與日常生活消費水準的變化，檢視商品經濟發展帶來的效應，並以此說明開港貿易對當地生活造成的具體影響。文中除了論述臺灣養豬事業與豬肉消費的特色外，更將對 1881-1900 年代存在於臺灣北部的生豬進口現象，提出合理解釋。關於生豬進口，已有若干研究者進行討論，如松浦章〈清末及日治時期中國大陸產豬對臺灣的移入〉和〈清代浙江溫州與臺灣的航運關係〉等，[9] 惟這些論文著重說明清代以來生豬進口、以至日治中期轉變成出口等過程，至於進口的原因則僅歸因於本地豬肉消費量大，忽略了背後的社會與經濟變遷等結構性因素。本文要旨除了探討導致生豬進口的各種原因外，也

---

6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頁 156。

7 謝美娥，《清代臺灣米價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8），頁 392-404。

8 謝美娥的研究，主要分析海關報告中對於米穀進出口之描述與數字，其認為經由海關輸出的米穀來源地，包含了大部分臺地主要米穀生產區，因而海關數據所顯示的進、出口變動應有代表性。至於林文凱則認為，從日治初期的調查報告中可以發現，許多米穀的出口並不經由淡水、基隆等海關，其數量也未出現在海關報告的統計數字中，故謝美娥的米穀進口說應存在誤差。參見林文凱，〈再論晚清臺灣開港後的米穀輸出問題〉，《新史學》22: 2（2011 年 6 月），頁 215-252。

9 松浦章，〈清末及日治時期中國大陸產豬對臺灣的移入〉，收於松浦章著、卞鳳奎譯，《清代臺灣海運發展史》（臺北：博揚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 151-170；松浦章著、楊蕾譯，〈清代浙江溫州與臺灣的航運關係〉，收於松浦章編著，《近代東亞海域交流史》（臺北：博揚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頁 3-30。另外，朱德蘭曾於福建師範大學閩臺區域研究中心主辦之「第十三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2011 年 11 月 26-27 日），發表〈日治時期臺灣與沖繩的貿易品：以稻米、生豬為例〉一文，惟未見正式發表。

將論述臺灣人對豬肉的生產與消費型態，以彰顯豬隻在本地民眾生活上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生豬進口現象的重要意義。

本文使用的資料除了清末的海關貿易報告、《申報》、西人的回憶錄與日記、方志或民間的帳簿外，更多倚賴日治初期日人所進行的各種調查、統計資料。相較於清代的海關貿易報告，日治時代之調查報告對於港口各種進、出口業務的掌握更為精確、完整，尤其是兩岸商業活動中依舊盛行，但清代海關報告卻較少記錄的帆船貿易部分。然而受限於資料特性，本文將不以開港作為研究的起始點，而是擷取開港貿易影響效應最顯著之十九世紀末二十年（包括日治時期的前五年，即 1881-1900 年）來作為觀察的樣本。此外，為論述精確起見，本文所指臺灣北部，也以受開港貿易影響最顯著的臺北盆地為主要討論焦點。

二、最普遍的家庭副業：十九世紀後期臺灣的養豬活動

十九世紀後期初次來到臺灣旅行、經商的西人，或是因戰爭、統治需要而進入臺灣的日本人，對臺灣漢民族所居住城市或鄉村的主要印象，除了狹隘的街道，陰暗、空氣流通不良的屋舍，綁著小腳的女人，以及打著赤膊的苦力等，隨處覓食的豬隻也是常見的景觀之一。舉凡城市的街道上、正在收割作物的田間、販賣小吃的攤販旁、屋宅前後，還是旅館的床下，豬隻幾乎混雜在所有漢人生活的空間裡（參見圖一）。[10] 佐倉孫三《臺風雜記》就稱：「臺人嗜豚肉。每家必畜豚，少三、四頭，多八、九頭。屋之內外，宅之前後，……。溺水狼藉，尿糞堆

---

[10] F.L.S. Collingwood, "A Boat Journey across the Northern End of Formosa, from Tam-suy, on the West, to Kee-lung, on the East; with Notices of Hoo-wei, Mangka, and Kelung,"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11: 4 (1867), pp. 167-173; J. B. Steere, "Steere's Letter from Formosa--LXXIII Tamsui Formosa, Published in 24 April 1874 *Ann Arbor Courier*"; Michael Beazeley, M. Inst. C.E., "Notes of an Overland Journey through the Southern Part of Formosa, from Takow to the South Cape, in 1875, with an Introductory Sketch of the Island,"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n.s. 7 (Jan. 1885), pp. 1-22，以上均轉引自「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下載日期：2014 年 1 月 5 日，網址：http://cdm.reed.edu/cdm4/formosa/texts.php；笹森儀助，《臺灣視察日記》（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頁 12。馬偕醫師於 1871-1883 年的日記也經常提到在旅途中與豬隻共宿旅社房間的經驗。參見偕叡理（George Leslie Mackay）原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 I ：1871-1883》（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 38、44、79、89-90、170 等。

圖一　1850年代的臺灣人及其飼養的家豬

資料來源："Formosan Hut,"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995 (24 Sept. 1859), p. 294，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授權使用，編號：2006.008.0022。

積，怪臭撲鼻；而家人視之如孩兒，愛撫成育。」[11] 即便是人口稠密的城市中，也不乏市民飼養豬隻。據1860年代來臺旅遊西人Collingwood之經驗，臺灣鄉村幾乎隨處可見居民飼養的豬隻，至於如大稻埕或滬尾（淡水）等城鎮，也可發現家豬在街道上遊蕩的身影。[12]

前述佐倉孫三所指「每家必畜豚，少三、四頭，多八、九頭」，可能是其觀察某些養豬人家所得的印象，若以整體臺灣的家戶來考量，此數目未免太多。十九世紀末期臺灣家庭人口平均每戶約5人上下，[13] 要所有的人家養育三、四頭以上的豬隻，恐非易事。根據1906年出版的《桃園廳志》，上等家庭一家三口的殘羹剩菜大約可以飼養1頭豬，下等家庭則是一家五口之廚餘才可養1頭豬；[14] 至於經常有農業廢料的農家，飼養的數目當可比這個數目更多，但要飼養達 8、9頭以上的數量，恐得有相當的田園和豐富農產的農家，或是有各種食品糟粕的豆

---

11 佐倉孫三，〈畜豚〉，收於佐倉孫三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風雜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107種，1961；1903年原刊），頁36。

12 F.L.S. Collingwood, "A Boat Journey across the Northern End of Formosa, from Tam-suy, on the West, to Kee-lung, on the East; with Notices of Hoo-wei, Mangka, and Kelung," pp. 167-173.

13 據1898年的資料，該年全臺本島人口共266萬4,511人，户口數為52萬9,547户，平均每户人口為5.03人。參見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編，《臺灣總督府第二統計書》（臺北：該課，1900），頁35。

14 桃園廳編纂，《桃園廳志》（桃園：該廳，1906），頁158-159。

腐店、麵店、釀酒店等商家，[15] 非一般家庭能輕易達到。

1896-1899 年某些廳、縣所留存的調查資料，可提供若干較精確的養殖豬隻數字。例如 1896 年一份關於宜蘭的農產調查文件稱，宜蘭地方的農家幾乎戶戶養豬，概數約 1~2 頭，平均算來應為 1.5 頭，照此估算全宜蘭管內約養育 3 萬頭豬。該報告也稱，這些豬隻大者 300 斤，小者 70~80 斤，一般約 120~130 斤，每頭豬的養育期約 1~3 年，4 年以上者甚少；至於養豬的工作，主要由婦女承擔。[16] 上述的描述與估算，主要根據本地人長久以來的經驗而得，雖數字不甚精確，但有其可信度，可反映水稻作為主之宜蘭地區農家養豬的大略狀況。

至於嘉義、臺南、鳳山等以旱作為主的臺灣南部地方，則曾有臺灣總督府（以下簡稱「總督府」）殖產部技師於 1898 年進行畜產調查。調查報告顯示，該年嘉義、臺南、鳳山分別飼養豬隻 24 萬 8,000、7 萬 4,800、13 萬 500 頭，總數 45 萬 3,300 頭，三者平均每戶養殖頭數分別為 2.82、1.77、2.09 頭。若以這三縣的總戶口數 20 萬 4,930 戶、總養豬頭數 45 萬 3,300 頭來計算，則平均每戶應飼養 2.21 頭豬。上述的統計是將養豬風氣較不盛行的臺南城、嘉義城等城市地區也一併計算，若單以鄉村的農家來說，此比例應該更高。[17]

無論是臺灣南部的 2.21 頭或宜蘭農家的 1.5 頭，這些數據大致可顯示，十九世紀後期臺灣種植旱作和水稻作的鄉村普遍養豬，其風氣甚至比明清時期或 1930 年代的中國江南都要來得興盛。據李伯重的研究，明清江南各作物農戶的養豬數量，無論是水稻區或桑區，皆只有 1 頭；[18] 另外，卜凱（John L. Buck）對 1930 年代中國農家的家畜調查資料也顯示，中國每戶農家平均養豬頭數為 1.01 頭，水稻區則為 1.37 頭。[19] 曹幸穗對中國江蘇省南部的農家經濟研究則指出，當地家

---

15 如小野新市調查，豆腐店、製麵店、製酒坊等因為有許多豆渣、糟粕等廢料可用來飼養豬隻，其飼養規模往往較一般民家來得大，甚至可達數十頭或百頭以上。如臺北擺接堡崁頭厝王旺氏 1893 年開始養豬，原本只有十數頭，後因從事釀造業，養豬數量增至七十餘頭、甚至百頭以上。參見小野新市，〈養豚業調查〉，《臺灣農事報》19（1908 年 7 月），頁 32-36。

16 〈宜蘭廳管內農業牧畜調查報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4506 冊 15 號，殖產門農業類，1896 年 11 月 1 日。

17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編，〈嘉義以南畜產業〉，收於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編，《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報文》（臺北：該部，1899），第 2 卷第 2 冊，頁 296-297。

18 李伯重，《發展與制約：明清江南生產力的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 332。

19 ロツシング・バツク（John Lossing Buck）著，三輪孝、加藤健譯，《支那農業論：支那に於ける土地利用》（東京：生活社，1941 年第四版），下卷，頁 77-78。文中也引用 1934 年中央農業實驗所的報告，指出當時中國每百户農家的養豬頭數為 126.3 頭。

畜數量少，以至於「畜牧業占副業收入的比重均在 1/10 以下，在農家經濟中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20] 以臺灣和大陸相比較，可反映十九世紀後期臺灣的養豬事業盛況。

分析清代臺灣養豬活動盛行的原因，除了豬肉消費活動發達（參見下文）外，養豬具有的成本效益也是重要原因。在臺灣養豬的成本甚低，且出售豬隻大多無須負擔租稅。[21] 以飼料來說，除少數添加的豆餅或魚雜外，無論是廚餘、農業廢料、田間的野菜甚至人糞等，幾乎不用耗費金錢。臺灣向來為糧食盛產之地，稻米產量豐富，米汁、米糠等廚餘或廢料所在多有，許多農民也經常利用輪作的方式在農田種植番薯、恭菜（茄茉菜）等作為豬隻飼料使用。[22] 至於臺灣南部平原以及沿山地帶多為旱田，更栽培大量的番薯、豆類等作物，無論是番薯的根、莖與葉，或各種豆粕，皆含豐富營養，十分適合飼育豬隻。加上這些地方曠地頗廣、豬隻可隨處尋覓各野生食料，其養殖活動較之城市或水稻作地區更為興盛。1896-1897 年日人曾進行嘉義支廳和臺南縣之家畜調查，雖然這些資料有調查不完整的缺陷，以致數量有偏低之嫌，但仍可以看出，臺灣西部以旱作為主的麻豆、善化、

表一　1895-1896 年嘉義、臺南每戶養豬頭數調查

堡名	鹿仔草	大槺榔西	大槺榔東下	麻豆	善化里東	善化里西	學甲
養豬頭數	0.668	0.601	0.954	1.199	2.286	1.278	1.744
堡名	茅港尾西	茅港尾東	佳里興	哆囉嘓東下	新化北里	新化里西	新化西里
養豬頭數	1.884	2.684	1.732	4.732	5.116	3.735	2.418

說　　明：本調查資料主要是由地方頭人呈報給官廳或日本之調查人員的數據所製成。因調查時間分別在 1895 和 1896 年，當時南部因戰爭受害尚未完全恢復，故數據有失實、偏低之嫌。相鄰兩堡的養豬數經常有天差地遠之別，如大坵田西堡每户養豬數只有 0.025，其南鄰且生活環境相似的鹽水港堡則有 1.615。本表主要選擇若干農業生產方式較具代表性之里堡的數據進行比較，以凸顯其間差異，並不代表這些數據完全可靠。

資料來源：〈家畜頭數調（元臺南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9761 冊 10 號，內務門殖產部家禽家畜類，1897 年 1 月 1 日；〈嘉義支廳管內區轄户口調〉，《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9706 冊 1 號，內務門庶務部户籍户口類，1896 年 1 月 1 日。

---

20 曹幸穗，《舊中國蘇南農家經濟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頁 149。

21 僅嘉義縣曾於 1860 年代創設豬隻買賣市場，徵收豬户稅，每年豬户首需提供官方約 56 元的豬户稅，作為每年 2 次孔廟祭典之用；豬户首則以管理豬市的名義，向豬隻買、賣雙方徵收每頭豬 7 錢的手續費。參見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編，〈嘉義以南畜產業〉，頁 296-297。

22 恭菜又稱莙薘、茄茉、厚茉菜，是經常作為飼料使用的蔬菜。臺灣種植恭菜的紀錄頗多，如《臺灣縣志》就稱：「莙薘：一名厚薘菜。葉厚而滑。」參見陳文達著、王禮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縣志》（文叢第 103 種，1961；1720 年原刊），頁 10。

學甲、茅港尾、佳里興等堡，其養豬比例大抵皆在 1.5 頭以上，至於沿山地區的哆囉嘓東下堡、新化北里、新化里西堡、新化西里，更分別高達 4.732、5.116、3.735、2.418 頭；以水稻作為主的鹿仔草、大槺榔西、大槺榔東下等堡，則多略低於 1.5 頭（參見表一）。這些數據顯示以種植番薯、花生、甘蔗、豆類、陸稻為主的旱作地區，比起單純種植水稻的水田作地區，可飼養更多的豬隻，而沿山地帶的養殖活動又比平原地區更發達。

至於人力，則是仰賴家庭的次要勞動力——婦女，《臺風雜記》即稱：「閨畜豚是婦女之手業」，[23] 宜蘭的農業畜牧調查報告和《桃園廳志》也記載養豬的工作主要由家中婦女負擔。[24] 澎湖廳長在 1897 年的報告中甚至認為，豬隻是當地婦人最貴重的動產之一。[25] 清代臺灣漢人婦女——尤其是福佬籍者多數纏足，無法負擔田間各種高強度的勞動工作，通常只在家打理家事或從事女紅等，[26] 從事養豬活動正可充分運用此一次要勞動力，無需額外增加人力成本，可說是一項划算的事業。

雖然如此，養豬仍需若干成本，如購買仔豬的費用，以及閹割、交配、祭祀等雜支，[27] 一旦飼養殖豬隻過多，超過廚餘與農業廢料的供給能力，就得另外購買米糠、豆餅等飼料；且養豬帶有若干風險，如飼養過程中豬隻因病死亡等。清代到日治初期，豬隻疫疾頗盛，導致養豬人家蒙受不少損失；為規避豬隻死亡所帶來的風險並強化專業技術，養豬事業逐漸分化成生產仔豬和肉豬兩個部分。如南部彌濃（今美濃）許多養豬戶專以養育母豬、繁殖仔豬為主要事業，所生產的仔豬再販賣至臺南等地區，由該地的養豬戶飼育成肉豬銷售；[28] 中壢也以繁殖仔

---

23 佐倉孫三，〈畜豚〉，頁 36。

24 〈宜蘭廳管內農業牧畜調查報告〉。

25 〈淡水及基隆二港ノ外輸入豚禁止ニ關スル影響取調〉，《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89 冊 5 號，稅關輸出入門輸出入禁止類，1897 年 5 月 19 日。

26 據 1905 年的統計，臺灣農家婦女共計 94 萬 6,284 人，其纏足比例為 55%，共 52 萬 3,389 人，以農家戶數 36 萬 6,257 戶來計算，平均每戶農家約有 1.5 位纏足婦女，其中又以福佬籍占絕大多數。這些婦女的工作主要是飼養雞豚、裁縫刺繡，以及各種家事等，至於田間勞動，則較為不便。參見邱振成，〈論婦人纏足與國家經濟之攸關〉，《臺灣農事報》36（1909 年 11 月），頁 77-79。

27 臺灣傳統養豬，通常會將公豬閹割，因此時常委請專人進行閹割手續；為繁殖小豬，飼養母豬的人家，也會以金錢雇請俗稱「牽豬哥」的公豬飼養者，提供體態健美的豬隻，與自家飼養的母豬進行交配。參見文山南仙，〈豬哥〉，《民俗臺灣》2: 11（1942 年 11 月），頁 15-16。此外，養豬人家也需要經常祭祀「豬椆公」，祈求神明保佑豬隻健康成長。

28 小野新市，〈阿緱廳下の養豚〉，《臺灣農事報》49（1910 年 12 月），頁 42-48。

豬為盛，所生產的仔豬主要供銷臺北、宜蘭。[29] 但整體來說，養豬事業的成本仍然偏低。據日人 1900 年的統計，臺灣養豬飼養費用，約只有豬隻賣出後所得收益的一半；[30] 畜產技師小野新市於 1907-1908 年的調查則顯示，其收益更高於支出的一倍以上。[31]

另一方面，豬隻高度商品化也助長飼養風氣的盛行。這些隨地便溺、到處覓食的豬隻對漢人來說，不只是他們肉食的主要來源，更正確來說，是重要的財富、每日辛苦照護的存錢筒。養豬人家除非有特殊的需求，否則所生產的豬隻幾乎均透過出售來換取現金收入。若依上述養豬成本僅賣出後所得收益的一半加以計算，十九世紀末期養豬的收益，以飼養期約 2 年、重量約 130 斤的豬隻，在 1895 年的售價約 18 元計算，[32] 扣除每隻約 9 元的成本，可有 9 元的淨利收入，即飼養一頭豬每年平均的淨收入為 4.5 元。每戶農家若養豬 3 頭，平均每年約可獲得 13.5 元的淨收入。1898 年山田伸吾所調查的臺北縣下農家，養豬的收益大約也是這個水準。[33] 這對當時一個技術性工人每日薪金約 0.5 元、苦力約 0.25 元，每月薪金分別約 15、7.5 元來說，[34] 可說是一筆不小的補助，對家庭經濟頗有助益。

然而，養豬所帶來的經濟利益並非該事業繁盛的唯一因素，農家希冀從豬隻身上取得豬糞作為農作物的肥料也是原因之一。豬隻強大的消化能力可將人類無法利用的廚餘和農業廢料，轉化為具有肥料價值的豬糞，而豬糞又是農民慣用之廄肥中的重要來源，因此中國農業自古以來即重視養豬。《沈氏農書》即稱：「種田養豬，第一要緊。」[35] 臺灣雖是清朝海外的一處新墾地，養豬取糞同樣受到本

---

29 桃園廳編纂，《桃園廳志》，頁 158-159。

30 〈臺灣の養豚業に就て〉，《臺灣協會會報》34（1901 年 7 月），頁 37。

31 以小野新市對臺北廳擺接堡清水坑庄某養豬户的農家調查為例，該户農家每年約投入 200 圓資本，賣豬的收入則高達 600 圓。參見小野新市，〈養豚業調查（續）〉，《臺灣農事報》20（1908 年 8 月），頁 41-43。

32 平野勝，〈臺北の實況〉，《名家叢談》1（1895 年 9 月），頁 76-82。文中敘述當時臺北一頭豬的價格大約是 18 元。

33 在山田伸吾調查的農家中，第一例農家養豬 7 頭，每年平均獲得 28 元，每頭豬每年平均可得 4 元。至於其他的例子，則未説明是每年的獲利，或是養豬成熟後（約 2 年）的獲利。參見山田伸吾，《臺北縣下農家經濟調查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1899），頁 185-207。

34 參見〈商工業ニ係ル十種類調查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9691 冊 6 號，內務門殖產部商工業類，1896 年 4 月 1 日。本處技術性工人主要指木工、泥工、石工等，至於非技術性工人如苦力等，每日薪金則僅 0.25 元左右。

35 沈氏撰、錢爾復訂正，《沈氏農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頁 15。

地移墾農民的重視，施添福的研究甚至認為，「用糞」是臺灣水稻生態系統可以持續性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許多水稻作農家都會從事養豬以取糞作肥。[36] 因為豬糞大有效用，清代、日治皆有以「拾豬屎」為業者，將拾取的豬糞販售農民施肥。[37]

無論如何，養豬不只可以幫助家庭增加收入，更可取得大量廄肥，使以水稻作和旱作為主的農業生產活動更具效益，在以農業為主的十九世紀臺灣，養豬事業可說是臺灣最普遍且重要的家庭副業。

三、豬肉品的消費及其在地方市場的流通

臺灣漢人養豬風氣盛行、豬肉品高度商品化，其根本原因源自漢人對於豬肉的嗜食，且將豬肉當作最重要的肉食品。1896 年一篇日人的報導就稱，臺灣人對於豬肉的喜好，就好像日人對魚類一樣，皆是日常食膳所不可或缺。[38] 石坂莊作《臺嶋踏查實記》甚至統計，在總數約 240 種的支那料理中，約有七、八成皆以豬（豬肉品）作為材料之一；[39] 這些膳食使用的豬肉品當然不只豬肉而已，也包括油脂、血液、骨頭及各種內臟，除從中攝取各種營養外，也利用這些物質豐富食餚的口感與氣味。許多漢人移民甚至認為豬油具有滋潤腸胃的效果，可對抗移墾地風土侵害人體，故三餐菜餚喜用豬油調理，如《噶瑪蘭廳志》稱：「至煎熬烹調，盡用豬油。甚至蒸麵和丸，不敢拌以他油。蓋水土薄利，浣衣易潔，而充腸亦易枯，非脂膏不足以資潤澤。」[40] 因為豬肉品功效多、用量大，幾為日常生活所不能或缺。《臺灣日日新報》稱：「島民豬畜一物視為養頤上品，比米穀稍遜，比牛、羊、雞、鴨尤為緊要，每一下箸非此不下咽」，[41] 豬肉是臺灣人日常飲食中地位僅次於米糧的重要食料品。

---

36 施添福，《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1），頁 143-170。

37 〈一日一商：拾猪屎〉，《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3 月 25 日，第 5 版。

38 〈豚の輸入高及費消高〉，《臺灣新報》，1896 年 11 月 20 日，第 3 版。

39 石坂莊作，《臺嶋踏查實記》（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899），頁 153-154。

40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文叢第 160 種，1963；1852 年原刊），頁 198。

41 〈謀及畜產〉，《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10 月 16 日，第 4 版。

事實上，豬肉品不只作為食料品而已，更被大量使用在祭祀、宴客及餽贈方面。無論是小型祭典的「三牲（豬、雞、魚）」，或大型祭典的「五牲（豬、雞、鴨、魚、蝦）」，皆須使用豬肉；[42] 更隆重的慶典甚至使用全豬，祭祀後除自家食用、宴客外，也會將部分肉品作為禮品分贈各親友，是分享福分的象徵。[43] 比起日常的膳食消費，這些禮俗和祭祀在豬肉品的使用上更具有約束力，因此，許多經濟條件不佳或講求生活儉約的家庭，即使平時不常消費豬肉，也會在舉辦祭典時購買豬肉，既供祭祀，也在儀式後食用、宴客或餽贈。

對於豬肉的喜好，不只漢人，包括生番或熟番等族群，也都以豬肉作為重要的食物來源。尤其是十九世紀的熟番，其原本重要的肉食來源——鹿肉，因日漸稀有，無論是日常膳食、祭祀等場合，需用豬肉的情況與漢人無明顯差異，如竹塹社在光緒年間的番租使用帳目中，就有〈社內中元普度猪羊牲粿計谷陸拾石〉等條目。[44] 臺南四社熟番做向，尪姨也需向阿立祖供奉檳榔、燒酒諸物，並宰豬一隻。至於其宴飲請客，最重視「豬、牛、酒之物」，無論是祭祀或宴會，豬肉皆是不可或缺。[45] 只是，許多生番、熟番居於近山，除自家飼養、購買或漢人餽贈等來源外，獵捕山豬也是取得豬肉的重要方式之一。

因為多重需求，豬肉品的消費在臺灣社會中有其必要性和規律性。所謂的必要性，意指臺灣人家庭即使生活貧窮，平時吃不起豬肉品，但為祭祀或宴客需要，也會在重要節日消費豬肉品；比起雞、鴨、魚等其他副食品，「最為千家所必買者，無如猪肉一端」，[46] 是最重要的民生必需品之一。至於規律性，即許多民眾的豬肉品消費與年節祭典活動產生緊密的關聯，形成規律性的消費活動。清代官員稱臺灣民眾在每月初一、十五等傳統祭祀神明的日子，許多人都會到市場上購買肉品，因此市上販賣豬肉的小販特別活躍，他們用作招徠客人的號角聲格外頻

---

42 如1871年臺南石鼎美家族之祭祀簿所記錄的祭祀用品，所謂五牲即包含中牲、邊牲和下牲。中牲為豬頭帶前腳一付，邊牲為雞和鴨，下牲為魚和蝦，但也可用乾魷魚、乾魚翅或蝦捲等代替。參見朱鋒，〈祭祀物品簿〉，《臺灣風物》17: 1（1967年2月），頁70-71。

43 曾品滄，〈辦桌：清代臺灣的宴會與漢人社會〉，《新史學》21: 4（2010年12月），頁1-53。

44 〈清單〉，《淡新檔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編號：17211-042。

45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文叢第52種，1959），頁55-70。文中「做向」或作「做饗」、「作向」，為臺灣熟番向祖靈或神明祈禱、祭祀的儀式，有公向和私向之分。參見國分直一，〈四社平埔族の尪姨と作向〉，《民俗臺灣》3: 3（1943年3月），頁6-10。

46 〈市價兩漲〉，《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2月23日，第4版。

繁、響亮。[47] 至於重要的慶典活動，如端午、中元普渡、農曆新年或神明聖誕等節日，豬肉的用量往往更多、消費量更大，如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日記所載，1882 年 2 月三角湧（今三峽）大拜拜，共宰殺 300 頭大豬，每頭均重達 300~400 磅（約 136~181 公斤，亦即 227~302 斤）。[48] 1900 年前後的大稻埕，屠獸場每日宰豬 40~50 頭，到了該地城隍廟賽會時，一天屠宰的生豬竟高達三百多甚至四百頭之數。[49] 一般民眾家中舉行婚喪喜慶，也常「刣豬公拜拜」，以全豬祭祀。較特殊的案例是 1891 年 9 月霧峰林家頂厝錦榮堂為羅太夫人舉辦六十晉一壽誕，共購買 40 頭豬、1 隻大羊，以作為祭祀、宴客及餽贈之用。[50]

因為豬肉消費與祭祀、宴客活動緊密相連，在許多日治時期所進行的生活消費調查中，可以發現人們經常支出高額的祭祀費用，卻不見任何豬肉的消費紀錄，這主要是豬肉消費隱藏在祭祀費用所致。也因為豬肉經常供作祭品，為確保豬肉新鮮和型態完整，人們所消費的豬肉品通常以生鮮肉品為主，如肉脯、香腸等豬肉製成的加工品，並非主流。至於醃漬而成的鹽肉，經常是使用斃死豬製成，多為窮人或貪圖便宜者購買。[51]

因為豬肉品的用途廣泛且不可或缺，其消費量與消費額皆相當龐大。關於臺灣每年豬隻的消費量，日治時期總督府曾按年度進行家畜養殖、屠宰數量之統計，因豬隻屠宰後主要供給本地食用，故豬隻屠宰頭數大概可視為消費頭數。惟日人統治之初，各地屠獸場管制規則尚未完整建立並實施，私宰情況嚴重，其屠宰數量不可盡信，約至 1903 年以後，隨著各地屠獸場建立，以及屠獸場取締規則、屠獸檢疫制度的嚴格實施，豬隻的屠宰始有較完整的統計數字。若以 1903-1908 年的統計來看，此 6 年度的豬隻屠宰數量、每人每年消費豬隻頭數參見表二。

---

47 丁紹儀，《東瀛識略》（文叢第 2 種，1957；1873 年原刊），頁 32。

48 偕叡理（George Leslie Mackay）原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Ⅰ：1871-1883》，頁 499。

49 〈倍加於昔〉，《臺灣日日新報》，1900 年 6 月 13 日，第 4 版。

50 〈光緒十六年置錦榮堂交官往來總抄簿〉，《霧峰林家錦榮堂帳簿群》（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編號：LN01_4_09_002，無頁碼。

51 〈屠夫欺人〉，《臺灣新報》，1897 年 2 月 4 日，第 1 版；〈販猪失利〉，《臺灣新報》，1897 年 10 月 12 月，第 1 版。鹽肉即醃肉，許多從中國大陸前來臺灣的豬船，船上也經常備有食鹽，一旦豬隻斃死，即以鹽醃漬，等待上岸後出售。參見松浦章，〈清末及日治時期中國大陸產豬對臺灣的移入〉，頁 151-170。

表二　1903-1908 年臺灣豬隻生產、進口、消費分析表

年度	全臺養殖頭數	基隆、淡水進口豬隻數量	屠宰頭數	人口數	平均每人每年消費頭數
1903（明治 36）年	876,908	24,917 （321）	504,153	3,030,076	0.166
1904（明治 37）年	976,327	14,266 （1,024）	525,587	3,079,692	0.171
1905（明治 38）年	1,017,777	11,208 （678）	557,628	3,160,054	0.176
1906（明治 39）年	1,074,316	12,441 （982）	558,955	3,193,708	0.175
1907（明治 40）年	1,146,196	841 （1,136）	564,357	3,223,968	0.175
1908（明治 41）年	1,230,597	631 （2,954）	609,201	3,252,589	0.187

說　　明：「基隆、淡水進口豬隻數量」一欄，未刮弧部分為自中國大陸輸入的數量，括弧部分為自日本移入的數量。此外，1903-1908 年也有豬隻輸出的數量，但數量不多，分別為 2,144、2,955、843、1,580、444、842，不過輸出目的地不明。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編，《臺灣貿易四十年表：自明治二十九至昭和十年》（臺北：該局，1936），頁 183；小島一生，《臺灣畜產統計》（臺北：臺灣畜產會，1941），頁 27、34；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編，《臺灣總督府第十二統計書》（臺北：該課，1910），頁 427、439；如是空生，〈臺灣の養豚〉，《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3 月 15 日，第 6 版。後兩份資料對於養殖豬數量有些許誤差，本文以〈臺灣の養豚〉一文為準。

從表二可發現，這六年中，全臺豬隻總消費量都在每年 50-60 萬頭之間。時間越往後，豬隻的屠宰數量隨之增加、人均消費量也逐漸增多，此為明治年間豬肉消費的重要趨勢。但若因此認為十九世紀末期或 1903 年之前的人均消費量應低於 1903 年以後，恐有爭議。十九世紀後期臺灣北部地區豬肉自給不足，大量仰賴進口；1895 年日本統治臺灣後，有鑑於進口豬隻容易傳染病疫，且每年耗費太多金錢用於外購豬隻，先是 1897 年將豬隻進口活動限定於淡水和基隆兩港，其餘港埠不得進口，隨後在 1899 年利用臺灣實行新關稅之際，將進口豬納入徵收範圍，每隻豬徵收原價值 10%的關稅，[52] 並實施豬隻檢疫制度，嚴格規定病豬或斃死豬不得進口、屠宰、販售，藉由種種措施抑制豬隻進口活動，大大降低生豬進口數量，從每年十餘萬頭降至數萬餘頭。之後又陸續於 1904、1906 年分別增課 5%、10%的關稅，達到 25%，使中國大陸進口豬與本地豬的市場價格不

52 〈大稻埕入津船舶〉，《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5 月 18 日，第 2 版。

相上下，進口活動終於逐漸消失。[53] 另一方面則大力獎勵民眾畜養豬隻，設法控制本地豬瘟的感染，並進行豬種改良，使全臺的養豬頭數逐漸增加，至 1908 年高達 123 萬餘頭時（參見表二），大約達到臺灣島內豬產自給自足的狀態。換言之，1899-1907 年應是進口額受到徵稅和檢疫影響而減少，但本地養豬事業又還無法完全滿足本地需求的年代，豬隻消費量應屬偏低的情況。

相較之下，1899 年之前的畜養事業雖然也無法滿足本地的需求，但在未徵收關稅且無檢疫制度下，得以自由地從對岸中國輸入大量豬隻，每年可達數萬頭至十數萬頭不等（參見表三），進口生豬價值甚至一度達百萬元以上，故推測當時臺灣人的豬隻消費量應高於或至少不低於 1903 年的人均消費量 0.166 頭。這數字若換算為豬肉（不包括豬血、內臟、骨頭等其他豬肉品），約為 6.6 公斤左右。[54] 雖然低於 1938 年的每人每年 8.122 公斤，[55] 但若以該年每戶平均人口數 5.32 人計算，[56] 每年每戶所消費的豬肉約為 35.112 公斤，和 1930 年代滿鐵調查報告中江蘇南部地區每戶每年消耗豬肉 22.85 公斤（45.7 市斤）相比，則高出許多。[57]

因為豬肉消費量不少，每年每戶人家花費在豬肉上的金額也相當可觀。據舊慣調查的紀錄顯示，無論上等家庭或中等家庭，豬肉消費都是最重要的副食品項目，其數額遠高於生、熟魚，蔬菜，雞鴨，雖低於白米，但也幾乎達到白米消費

表三　日治初期生豬進口數量表

年度	1896	1897	1898	1899	1900	1901
進口數量（頭）	42,090	139,959	114,669	52,968	37,477	29,001
價值（円）	179,009	734,314	1,009,498	660,549	562,126	408,170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編，《臺灣貿易四十年表：自明治二十九至昭和十年》，頁 183。

53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財務局稅務課編，《臺灣稅務史：上卷》（臺北：該課，1918），頁 627-630、736-737。1899 年實行的關稅定率法中，並無「豚」一項，應是比照「鮮肉」的稅率徵收，參見〈關稅增課と本島物價〉，《臺灣日日新報》，1904 年 12 月 14 日，第 2 版；藍田俊郎、星武，《臺灣海港獸類檢疫史》（臺北：臺北州港務部檢疫課，1936），頁 24。

54 換算方式如下：當時市面上販售豬隻的重量約 120-130 臺斤（72-78 公斤），若以 125 斤（75 公斤）計算，每隻豬的取肉率以 53%計算（參見 1937 年醫學士葉貓貓撰寫之《臺灣人食ノ榮養學的考察・前編：食糧統計ヨリ見タル臺灣人食ト其批判》〔臺北：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衛生部，1937〕，頁 108-232），則每隻豬約可取肉 39.75 公斤，人均消費量 0.166 頭，約為豬肉 6.6 公斤。

55 葉貓貓，《臺灣人食ノ榮養學的考察・前編：食糧統計ヨリ見タル臺灣人食ト其批判》，頁 108-232。

56 1903 年全臺總户數為 56 萬 9,470 户，總人口數為 303 萬 76 人，平均每户 5.32 人。參見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臺灣總督府第七統計書》（臺北：該課，1905），頁 211。

57 曹幸穗，〈舊中國蘇南農家經濟研究〉，頁 211。

額 2/3 的程度。若干中等家庭或職工家庭，豬肉（或豬肉和魚）的消費額甚至略高於白米，可見豬肉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從該調查中也可看出，經濟條件越好、生活費用越高的家庭，豬肉的人均消費量也相對較高。[58]

因為消費活動暢旺，豬肉品成為地方市場的重要商品，其商品市場規模至為龐大。如以 1903 年之屠宰量 50 萬 4,153 頭為標準，生豬總價值高達 591 萬 1,463 元，約與該年臺灣輸出茶葉之總價值 596 萬 3,473 元相當。即使減去進口豬隻價值 35 萬 8,699 元，單以本地所產豬隻的價值 555 萬 2,764 元也高於同年臺灣主要農產品蔗糖的 382 萬 7,542 元產值，[59] 是僅次於稻米、茶葉的第三大農產商品。若以豬隻屠宰後的零售價值來計算，規模應當更為驚人。依此推測，即使有物價變化或人口增減等因素影響，在飲食消費習慣未有明顯改變的情況下，十九世紀後期臺灣島內應存在一個高達數百萬元的豬肉商品市場。

雖然市場流通的生豬和豬肉品價值龐大，但受限於地形阻隔、運輸成本過高，以及生鮮肉品保存困難等因素，臺灣全島並未形成一個高度統合、各地區互相流通的豬肉品消費市場，而是呈現幾個範圍有限且彼此獨立的地方市場圈。以臺南府城（臺南市）為例，它是臺灣最大的豬肉消費市場之一，豬隻來源除了府城內若干養豬人家外，府城外安平縣（今臺南市南部）的各個里堡是最主要的供應地。猶有不足，則是由鳳山縣（今高雄市）東北部包括蕃薯寮、阿里港等地供應，以二、三十頭豬為一群，向臺南市街輸送販賣。[60] 從其範圍來看，臺南的豬肉市場圈除安平縣外，也包括鳳山縣北部一帶。

另一個較大的豬肉市場圈為臺北盆地，與臺南地方市場圈不同者，該市場圈

---

58 在上等家庭三個家户的例子中，每年的豬肉消費金額分別為 150、144、72 元，如果加計豬內臟、豬油等，則為 252、230.4、126 元，分別占副食物與嗜好物費用的 41、33、40%，是最重要的副食品項目。在中等家庭的幾個例子中，第一例在食物費中未見豬肉一項，但這並不表示未曾消費豬肉，可能隱藏在交際、祭祖、年節祭費裡面。第二例之一，每年豬肉品消費 41.6 元，比白米消費額 36 元還多，約占所有食物相關費用的 23%，是最重要的食物消費品項；第二例之二，每年消費豬肉 19.2 元，雖少於白米的 30 元，但仍在所有食物消費額中占有第二重要的位置。至於其他商人、農家或工人的豬肉消費額，則時常被涵括在「副食費」或「魚肉費」中，未特別標示出來，不易進行單獨比較。但從大工、車夫之「魚肉費」往往較之白米費用更高的情況來看，豬肉的費用應在其飲食費中占有相當高的份量。參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臺北：該會，1905），下卷，頁 512-596。

59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臺灣總督府第七統計書》，頁 671、783。

60 中神長文編，《臺南事情》（臺南：小出書店，1900），頁 16-17；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編，〈嘉義以南畜產業〉，頁 296-297。

許多豬隻仰賴進口，每年數量達數萬或十數萬頭，主要供應艋舺、大稻埕和臺北城內消費，也有若干運銷大嵙崁、景美等市街的紀錄。[61] 雖然臺北盆地對生豬的需求量頗大，但未曾見到從臺灣南部、中部，或新竹、宜蘭等地輸入的紀錄，顯然彼此之間呈現獨立的狀態。

除了這兩個重要的市場外，各廳、縣大抵也都分別形成一個獨立的地方市場圈，雖然彼此之間有生豬流通，但僅限於鄰近地區。[62] 也因此，整個臺灣的生豬流通範圍，被析分成數個地方市場，彼此流通性不高，這也使得每個地方市場的豬肉價格，可以更準確地反映當地生豬的生產、消費狀況，並間接呈現當地市場的商品經濟發展景況。

四、有利可圖：兩岸生豬貿易的開展

雖然臺灣農家盛行養豬，但直至十九世紀末期，臺灣本地生產的豬肉遠不足以供應內需，必須從外地輸入相當的數量，輸出地主要為中國沿岸。日人統治臺灣後，也曾試圖從琉球八重山等地輸入豬隻，但數量不多。

臺灣從中國大陸進口生豬的活動早在荷據時代即已出現，惟當時每艘船進口的數量頗為零星，尚未構成規模化的商業活動。[63] 但到了十九世紀後期，兩岸之間的生豬貿易開始以商品化的性質進行，大量且持續性地輸入。最早記錄的文獻為 1881 年〈淡水貿易報告〉，據淡水海關官員針對從大陸來臺之中國帆船的調查、統計，該年度共自大陸進口生豬（pigs）4,000 頭到淡水。[64] 接著，1882-1891 年的淡水海關十年報告也提到，海關官員某次對停泊在滬尾口（淡水港）的 13 艘

---

61 〈販猪失利〉；〈罕有是事〉，《臺灣新報》，1897 年 10 月 31 日，第 1 版。

62 〈淡水及基隆二港ノ外輸入豚禁止ニ關スル影響取調〉。如鹿港每年約需從澎湖輸入 200 頭的豬；至於臺中地區不足之數，則從彰化輸入，如彰化不足，則從嘉義地方輸入。

63 以 1647 年 3-4 月為例，3 月 20 日有二艘戎克船從澎湖載來了 44 頭牛、16 隻山羊、5 隻豬和 100 隻雞；4 月 7 日又輸入 30 頭牛、2 隻山羊、11 隻豬和 70 隻雞；隔天又載來 53 頭牛、12 隻山羊、8 隻豬和 91 隻雞；又隔數日，再從澎湖載來 35 頭牛、6 隻山羊和 4 隻豬；到了 4 月 19 日，又從澎湖輸入 23 頭牛、17 隻豬和 25 隻雞。總計兩個月間共輸入 185 頭牛、36 隻山羊、28 隻豬和 286 隻雞。參見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臺南：臺南市政府，2002），第 2 冊：1641-1648，頁 602-629。

64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主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1867-1895）》（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第 1 冊：1867-1881，頁總 543。

帆船進行調查，從泉州來的5艘帆船中，有一艘的貨品是豬隻，溫州來的3艘帆船，則全載有生豬等貨品。[65] 很顯然地，這些生豬主要由中國帆船載運入港。然而，1874年海關官員同樣針對淡水和基隆的帆船進行調查時，卻未發現有載運生豬的現象，主要的輸入貨品多為紙、陶器、布料、鹽、油、酒、麵條等工業品或食品。[66] 這些資料顯示，生豬貿易很可能是在1880年代才興起的貿易活動，初始僅數千頭的規模，溫州和泉州一帶是主要出口地，但因豬隻免稅，通常是小型帆船從產地附近的小港口直接載運出口（參見下文），而非經由溫州、廈門等通商港口，因而未在當地的海關報告中出現，只有淡水等海關的關員在調查帆船貿易時才偶然提及。

到了1890年代，進口生豬的數量似乎明顯擴張，溫州的海關貿易報告也在1893、1895年陸續提到有帆船運銷生豬到廈門和臺灣，[67] 這顯示帆船運銷生豬已不再限於小港口，產地也不只是小港口附近的鄉村地區，因為規模龐大，少數商人甚至直接從溫州市區利用通商港口輸出臺灣，因而被記錄在當地的海關貿易報告中。1895年5月日本統治臺灣後，臺灣海關對於進口生豬開始有明確的統計和詳細的調查紀錄。雖然初期統計仍未完全，僅及於幾個大港，但已可看出當時臺灣生豬進口活動的大致輪廓。以1895年6-12月為例，當時雖然兵馬倥傯、人民離亂，作為民眾生活必需品的豬肉，需求仍然存在，單單淡水港一地即自對岸中國進口4,021頭生豬。[68] 1896年隨著局勢略為安定，淡水港的進口數量彈升至3萬3,185頭，該年全臺共進口4萬2,090頭；[69] 到了1897、1898年，臺灣社會秩序大致穩定，以及日人對各大、小港口的進、出口貨品得以確實掌握後，進口額陡然上升，全臺進口數量分別為13萬9,959、11萬4,669頭。直到1899年開

---

65 H. B. Morse（馬士）撰、謙祥譯，〈1882-1891年臺灣淡水海關報告書〉，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史．六集》（臺北：該室，臺灣研究叢刊〔以下簡稱「研叢」〕第54種，1957），頁103。

66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主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1867-1895）》，第1冊：1867-1881，頁總130。

67 中華人民共和國杭州海關譯編，《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經濟社會概況：浙海關、甌海關、杭州關貿易報告集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頁541-547、548-551。雖然1893年的報告中指出，載運豬隻的帆船是航向廈門，但若從當時閩南等地皆普遍出口豬隻到臺灣來推測，船隻真正的目的地應為臺灣，可能只是途經廈門，加載其他貨品。

68 即從日本政府開始接手淡水海關關務的1895年6月11日起算，至該年12月31日止。參見〈豚の輸入高及費消高〉。

69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形勢概要》（臺北：該會，1902），頁227-228。

徵豬隻進口稅後，進口數量才又告下降，1899、1900 年分別為 5 萬 2,968、3 萬 7,477 頭（參見表三）。從這個趨勢研判，早在 1890 年代，臺灣進口生豬應該已發展成一項興盛的貿易活動，每年可達數萬頭。至於 1897、1898 年高達十數萬頭的進口量，可能是 1895 年因戰爭影響，本地居民大量放棄飼養所致；從仔豬到成豬的時間（hog cycles）約需 2 年，即使 1896 年逐漸恢復飼養活動，仍會造成往後兩年供給不足，故 1897、1898 年進口數量的擴張，應屬特別現象。換言之，在一般狀況下，臺灣北部每年約需進口生豬數萬頭。

因為貿易活動暢旺，但豬隻在航行中卻又容易死亡，從而一度興起豬隻保險事業。1900 年大稻埕商人林望周等人鑒於進口生豬數量龐大，曾組織臺灣家畜保險株式會社，從事進口生豬的海上保險業務。[70] 據該會社的家畜保險資料顯示，投保的進口家畜（絕大部分為生豬）分別來自溫州、臺州、興化、泉州、福甯、福州等地。其中來自溫州府的生豬，占所有比例 53%。[71] 這可間接反映當時臺灣進口生豬的來源遍及福建省和浙江省南部沿海，但以溫州最為主要。

因為豬隻進口量相當大，進口價值達數十萬甚至百萬元以上，再加上進口豬隻疫病嚴重，頗引起日本治臺當局的關切，除了記錄其進、出口數量外，也曾對該貿易活動進行若干調查。據日本官員對兩艘來自溫州之豬船船主所進行的口訪調查顯示，這些豬隻的主要輸出地為浙江省的溫州、錫屯、謙□（？）、嘉場，和福建沙埕、山沙、海山等鄉村地方，是以小型帆船載運豬隻出口。其進口豬隻到本島，以農曆 11 月到隔年 3 月之間最多，其他月分則從事刀魚、鰻魚、紅鱠等漁業。由溫州地方進口的物品除了豬隻外，還有穀物、紙、紹興酒等，回航之際則裝載由香港、福州進口到淡水的石油、布類等再出口貨物。[72] 進口地主要為淡水、基隆，新竹舊港與後壠兩個港口也有進口紀錄，舊港於 1896 年輸入豬隻

---

70 〈臺灣家畜保險株式會社營業認可申請書處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4665 冊 14 號，殖產門山林原野類，1901 年 6 月 1 日；〈臺灣家畜保險株式會社書類（元臺北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9203 冊 1 號，殖產門畜產類，1900 年 1 月 1 日。臺灣家畜保險株式會社於 1900 年向臺灣總督府申請設立，主要發起人為林望周、陳江流、木下新三郎等十餘人，主要從事家畜罹病、死亡時進行賠補等保險業務。但從第一期營業書報告中可發現，該會社在 1900 年 8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共 5 個月中，共計保險豬隻 10,665 頭，牛 1 頭，山羊 1 頭，其中，被保險豬隻皆來自對岸中國。易言之，該會社主要業務為中國大陸輸臺生豬的保險。

71 〈臺灣家畜保險株式會社書類（元臺北縣）〉。

72 〈輸入豚疫調查ノ為高橋昌淡水ヘ出張復命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4517 冊 6 號，官規官職門出張類，1897 年 4 月 1 日。

1,251 頭、1897 年 4,942 頭，後壠在 1897 年則有 1,609 頭。[73] 其他如臺中梧棲、彰化鹿港，以及南部的安平港、打狗港等，在 1897 年以前也偶有進口的紀錄，但數量零星。[74]

臺灣北部是生豬的主要進口地，從若干報導也可發現當地人所食用的豬肉高度仰賴進口生豬。如 1898 年《臺灣新報》即稱，臺北各市場所賣豬肉，十年前〔按：約指 1880 年代〕皆取諸本地生長之豬，至當時（1898），則多從泉州、興化等地運來。[75] 1899 年的報紙也稱，臺北各處屠場每日宰豬不少，當地所飼養的生豬已不敷食用，唯視泉州、溫州諸口岸陸續運來，方有可應用。一旦遲一、二個月不來，則豬肉價格隨即暴漲。[76]

綜合上述的進口數量統計，以及這些豬肉消費報導，1881-1900 年臺灣本地豬隻的生產已無法滿足本地的消費需求，尤其是北部地區，逐漸仰賴進口生豬。其中，1880 年代這種供需失衡的狀況尚不嚴重，本地豬仍是主要的貨源。到了 1890 年代，進口生豬的數量越來越龐大，在臺北、基隆等地已取代本地飼養的豬隻成為主要的肉品來源。至於其他地方雖有進口，但數量不多。

伴隨著本地豬肉匱乏而發生的另一經濟現象是豬肉價格上漲。據日人調查，臺灣的物價在日人領臺之前二十年（光緒元年〔1875〕）即呈現騰升的現象（參見表四）。以豬肉價格為例，1875 年每斤 0.116 元，1885 年 0.138 元，到了 1894 年則高漲至 0.247 元，尤其 1885 年之後，豬肉價格飆升的現象更為顯著。雖然該份資料未說明調查的區域，但依日人以臺北為政治、經濟活動的主要據點來看，很可能是出自對臺北的調查。然而，到了 1895 年，不僅生豬進口數量大幅減少，價格也相對低落，該調查顯示當年度的豬肉價格為每斤 0.15 元；1895 年 5 月來臺的日人也記錄當時（約 6 月）臺北的豬肉價格為 0.15 元，基隆為 0.16 元。[77] 關於該年度豬肉價格回落的原因，推測與乙未戰爭的動亂有關，當時許多官員、軍人返回中國大陸，也有不少本地的地主或商人避居對岸中國，原來經常從大陸來

---

73 淡水稅關編纂，《明治三十年淡水港外四港外國貿易景況報告》（神户：淡水稅關，1898），頁 71-72。
74 〈豚に就て（一）〉，《臺灣新報》，1897 年 4 月 8 日，第 3 版。
75 〈猪肉暢銷〉，《臺灣新報》，1898 年 1 月 1 日，第 1 版。
76 〈豚價復起〉，《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1 月 10 日，第 3 版。
77 平野勝，〈臺北の實況〉，頁 76-82；香風外史（市毛淺太郎）編，《征臺顛末》（水户：市毛淺太郎，1897），頁 239-240。

臺工作的工人亦停止渡臺，使城市的豬肉消費大幅減少。

但隨著局勢逐漸穩定，豬肉消費也隨之恢復，但因本地飼養不及，遂造成 1897、1898 年分別進口高達 10 萬頭以上的生豬，豬肉價格也大抵在每斤 0.2 元以上。據 1898 年的報紙稱，十年前臺北各市場所賣豬肉，一元銀幣可買肉 10 斤（每斤 0.1 元），少亦 6、7 斤（每斤約 0.15、0.16 元），但到了 1897、1898 年，大約每元銀以 4 或 5 斤為度（即每斤 0.25、0.2 元），甚至年節將屆日子，一元只能購買 3 斤多的豬肉（每斤 0.3 元以上），價實騰貴。[78] 必須說明的是，雖然這個價格和 1890-1894 年的肉價相當或略高，但因當時的工資和米價普遍高於清末，[79] 故實際上豬肉的相對價格應不高於清末時期。這可能得歸因於這兩個年度生豬進口量增加，豬肉供給充裕所致。

相較之下，臺灣南部的豬肉價格雖也上漲，但較為平穩。1896 年日人在嘉義、臺南、鳳山等地區所進行的畜產調查顯示，在該年之前，豬肉價格已有每年微幅上漲的趨勢。1896 年嘉義每斤豬肉約 0.14 元，臺南 0.15 元，鳳山 0.13 元，[80] 1897 年臺南市場的豬肉價格略漲為 0.16 元。[81] 石坂莊作《臺嶋踏查實記》之中一份

表四　清末臺灣豬肉價格表

年度	1875	1876	1877	1878	1879	1880	1881	1882	1883	1884	1885
價格（元／每斤）	0.116	0.118	0.119	0.123	0.124	0.125	0.126	0.124	0.127	不明	0.138
年度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1892	1893	1894	1895	
價格（元／每斤）	0.137	0.136	0.24	0.138	0.245	0.244	0.246	0.248	0.247	0.15	

說　　明：上述的統計可能是以清代的銀元為基準，和 1895 年以後通行的日圓幣值有若干差異。但即使如此，其上漲的趨勢仍是肯定的。

資料來源：〈東西南北〉，《臺灣慣習記事》3: 2（1903 年 2 月），頁 78-81；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下卷，頁 515。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只記錄 1875、1885、1895 年的豬肉價格，其中 1875、1885 的價格與〈東西南北〉完全一樣，推測是出自相同的調查紀錄，惟其比〈東西南北〉多了 1895 年，故表中該年度的數據引用自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

78 〈升降靡常〉，《臺灣新報》，1898 年 3 月 23 日，第 1 版。

79 吳聰敏，〈1895 年前後臺灣的產出、工資率與物價〉（1999 年）（未刊稿），下載日期：2014 年 2 月 3 日，網址：http://homepage.ntu.edu.tw/~ntut019/ltes/wp1895.pdf。

80 〈魚鳥獸肉調查（元臺南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9785 冊 5 號，內務門殖產部雜類，1897 年 9 月 1 日。

81 〈臺南商況：臺南市場種々〉，《臺灣日日新報》，1897 年 2 月 25 日，第 3 版。

可能出於 1898 年或更早的豬肉價格統計則顯示，臺北、宜蘭的價格為每斤 0.17 元，新竹、臺中 0.16 元，嘉義 0.14 元，臺南 0.15 元，鳳山 0.13 元。全臺豬肉價格以臺北最高。[82]

雖然上述各種豬肉價格略為參差，但仍可看出臺灣各地豬肉價格在 1875-1894 年不斷上漲。其中北部的價格上漲趨勢尤其明顯，豬肉價格甚至高於中國浙江、福建沿海等地區，也因此導致生豬大量進口。據 1896 年載運生豬來臺的船主向日本官員表示，他們是在溫州地方以每一元 7 斤（每斤 0.14 元）的價格購得生豬，載運到淡水後，再以每一元 5 斤（每斤 0.20 元）左右的價格賣出；日本官員則質疑這些船主短報價差，認為實際的利潤應該更高（即溫州當地的豬肉價格應更低）。[83] 英國駐淡水領事 Bonar 估計，這些船主每進口一頭豬，可獲得 3 元的利潤。[84] 依此推算，每艘中國帆船若每次載運約 120 頭的生豬，不加計回程所載貨物的利潤，即可得到高達 360 元的厚利，而全臺每年十萬頭以上的進口生豬，將帶給這些進口者高達三十多萬元的巨利。也因此，即使這些進口豬隻經常在船上發生疫病、暴斃等情況，船主仍有利益可圖，可以源源不斷地進口豬隻。至於臺灣南部地區的豬肉價格並不特別高於對岸中國，進口現象自然也較少。

五、臺灣北部商品經濟的發展

豬肉價格上漲，可能的原因包括：因為通貨膨脹，導致包括豬肉在內的各種物價上漲。清末若干紀錄顯示，此現象確實存在，如 1885 年中法戰爭期間，臺地——尤其是臺北的物價，較之中國大陸昂貴許多，頗引人矚目。1885 年 1 月 1 日的《申報》就報導：「今臺北之土惡水劣，……米麵視內地價惟倍，豬肉每斤二百數十文，青菜每斤念（廿）餘文，雞蛋每枚二十文，……。」[85] 上述報導可

---

[82] 石坂莊作，《臺嶋踏查實記》，頁 154-155。

[83] 〈輸入豚疫調查ノ為高橋昌淡水ヘ出張復命書〉。日本官員曾質疑這些船主的說法，認為其所報價格差距太小、無利可圖，有隱瞞事實之嫌。

[84] Herry Alfred Constant Bonar, "Report on the Trade of North Formosa for the Year 1897," in Robert L. Jarman, ed.,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1861-1960* (Slough: Archive Editions, 1997), v. 5: 1894-1899, pp. 525-538.

[85] 〈海客新語〉，《申報》4212（1885 年 1 月 1 日），第 1 版。

能是中法戰爭期間所發生的特殊狀況。但戰爭結束後物價卻無明顯回落的現象，1888 年劉銘傳即在奏文中抱怨「臺灣為海外巖疆，……百物均形昂貴」，希望清廷可以允許增加臺北官員的養廉費用。[86] 1895 年來臺的平野勝也說，臺北的物價甚高，蔬菜價格竟和日本東京一樣；[87] 1898 年日本駐福建領事官員調查泉州的物價，發現當地物價、薪資較之臺灣低廉許多，其中豬肉一斤僅約日幣 0.16 圓水準。[88] 1899 年一篇比較臺灣與廈門物價的報導也稱，兩地僅隔一衣帶水，但臺灣的物價比起廈門卻昂貴不少。[89] 由以上幾種描述推測，豬肉價格上漲原因，有部分應來自清末到日治初期臺灣北部整體通貨膨脹的影響。

但更重要的原因，應與臺北地區的豬肉供需變動有關。如前所述，1881-1900 年生豬進口的現象主要出現於臺灣北部，尤其是以大稻埕、艋舺、臺北城為中心的臺北地區，而豬肉價格上漲的趨勢，也以臺北最為顯著。可以想見，在這二十年間北部的豬肉供需關係應有巨大的轉變。當時的人將生豬進口的部分原因歸於豬疫的影響。然而，盛行豬疫的地方不只臺北，臺南、臺中等地皆為重要疫區；[90] 至於進口豬隻，更經常在其原產地即有染疫的情況，故臺北的疫情實非特例。再者，進口豬隻為多年存在的現象，縱然某些年分特別嚴重，導致本土豬隻大量死亡，也不應是構成豬隻長期進口的主要原因。況且，即使臺灣豬隻疫情盛行，對於整體養豬事業的影響仍屬有限。以 1900、1901 年為例，全臺豬隻因染疫而病死或被撲殺的數量，分別為 2,237、1,117 頭，[91] 比起全臺每年數十萬的消費數量，影響程度不高，許多豬隻即使染疫暴斃，也常被民眾製成鹽肉加以消費。進言之，造成臺北地區生豬進口現象的因素，應就整體農業生產環境與生活消費型態的變遷思考，而非僅歸諸於短暫之疫情。

---

86 〈為臺灣移駐巡撫新設藩司等官應需俸廉役食暨臺灣道兼理臬司養廉分別議給酌增恭摺仰祈聖鑒事〉，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撰，《明清臺灣檔案彙編》（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09），第 95 冊，頁 285-287。

87 平野勝，〈臺北の實況〉，頁 76-82。

88 〈對岸地方物價勞銀の低廉〉，《臺灣日日新報》，1898 年 7 月 22 日，第 2 版。

89 〈臺廈物價〉，《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8 月 19 日，第 3 版。

90 如 1897 年的《臺灣新報》即報導，臺中、臺南皆有豬瘟盛行的現象。參見〈猪瘟大作〉，《臺灣新報》，1897 年 7 月 29 日，第 1 版。

91 「臺灣獸疫豫防規則」（律令第四號）實行始於 1898 年 3 月，然而時至 1900 年，臺灣各地仍普遍發生豬疫現象。參見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形勢概要》，頁 228-229。

以下即從北部豬肉的供給與消費，也就是農業生產與消費需求等兩方面進行考察：

（一）農業生產環境的變遷

臺北盆地民眾所消費的豬隻，除進口外，即由本地生產，進口活動的存在，亦代表本地生產數量不足以滿足需求。為實際理解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係，以下即以 1900 年的生產、屠宰與進口數據進行分析。該年的屠宰數據雖然可能因屠宰制度尚未完整建立，許多鄉間可能仍有私宰現象而產生若干誤差，但進口數和現存家畜數則因日本治臺當局對於港口活動的嚴密稽查，以及北部治安的掌控，而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另一方面，政權轉換之間的動亂至該年已漸平息，人民生活秩序恢復，飼養活動也漸次復甦；至於日人在推廣養殖家畜方面則尚未見明顯成效，大致可反映 1880-1890 年代的普遍狀況。

1900 年的家畜養殖調查資料顯示，臺北盆地內各辨務署（臺北、基隆、深坑、滬尾，以及大嵙崁辨務署轄下之海山堡），轄下共有本島人居民 8 萬 5,388 戶，養豬 6 萬 4,397 頭。若以每頭豬的飼養期兩年計算，每年的可能屠宰數僅有 3 萬 2,199 頭。然而，該年當地屠宰場的豬隻屠宰數卻高達 5 萬 4,066 頭，[92] 兩者之間差距高達兩萬餘頭以上；若將私宰的數量也考量進去，則差距將更為明顯。這也就是為何該年臺灣北部必須進口 3 萬 7,477 頭豬隻的原因，本地產豬嚴重不敷所需。

本地豬隻無法滿足需求，主要是每戶居民的養殖數量偏低所致。將該地域轄下養豬頭數，除以本島人居民戶數，平均每戶僅養殖 0.75 頭，此數值不僅低於前述臺灣南部或宜蘭等地區甚多，也低於當年全臺的每戶養豬平均值 1.2 頭。如果說進口生豬的活動是自 1880 年代以後即已存在，則此養殖豬隻數量偏低以致供給不足的現象也應是 1880 年代就已逐漸產生。

---

92 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編，《臺灣總督府第四統計書》（臺北：該課，1902），頁 57-58、368-369、383-384。據該統計書，包括大加蚋、芝蘭一、芝蘭二、芝蘭三、擺接、興直、文山、石碇、八里坌等堡，1900 年共現存養殖豬隻 4 萬 7,064 頭，屠宰豬隻頭數為 5 萬 4,066 頭。因當時豬隻的養育期約 2 年左右，故大概只有半數（2 萬 3,532 頭）的現存養殖豬隻可能在該年度被宰殺（此數量稱為「可能屠宰數」）。換言之，該年屠宰的 5 萬 4,066 頭豬中，僅有 2 萬 3,532 頭是由本地所生產，約 3 萬 534 頭豬非本地生產。必須說明的是，當時許多鄉間尚存在私宰的風氣，這些私宰的豬隻數量並不包括在總督府統計的 5 萬 4,066 頭豬內，如果加上這些私宰的數量，則實際屠宰數與現存豬隻可能屠宰數之間的差距會更大，也就是非本地所產豬隻的數量更多。

何以臺北地域的豬隻畜產量在這段時間內如此低落？推測其原由，應與 1870 年代以後該地區農業生產環境的變遷有關。臺北原為種植水稻，以及若干如苧麻、大菁、甘蔗等旱作為主的農業區域，每年向大陸出口稻米、苧麻或黃麻、豆、糖、菁（染料）等物資，如《淡水廳志稿》就稱：「貨之大者莫如油、米，次麻、豆，次糖、菁」，[93] 至於盆地四周的淺山地區，除竹、木、果子等外，亦不乏番薯、稻米等作物。[94] 到了 1870 年代，伴隨著茶業的發展，北部山區湧入不少種植茶樹的人口，茶作面積也逐漸蔓延。尤其是 1880 年代之後，隨著茶業的興盛，茶樹種植面積快速擴展，使臺灣北部原來的農業生產體系，包括栽培的作物、生產方式皆面臨改變，養豬活動也因此遭遇若干阻滯。包括：許多原來在山區的作物，如番薯，竹、木等，皆改易為茶樹，即使在平地，也有若干田地改種植焙茶用的香花等園藝作物。茶樹或香花為多年生植物，所生產的產品除供人類飲用的茶葉外，幾無可餵養豬隻的農業廢料，茶農養殖豬隻只能依賴廚餘或山區的野生植物等，豬隻的飼料來源減少。再加上清代臺灣茶作因土地肥沃且氣候適宜，不需施用肥料，農民們也無需養豬取糞，[95] 養殖的動機自然減低。至於畜牧的人力，也容易受到影響，原來在家中負責養豬工作的女性，因為有了採茶或檢茶的工作機會，容易出現排擠的效應，無法經常在家進行畜養活動。以上茶作對於養豬事業的種種影響，也可從數據反映出來。以種植茶樹為盛之文山堡、石碇堡等為例，1900 年該地戶數共 1 萬 3,612 戶，只養豬 1 萬 3,158 頭，其比例尚不及 1，[96] 較之旱作與水稻作農業區差距甚大，茶業發展對養豬事業發展有著顯著的影響。

另一方面，茶業的昌盛，帶動大稻埕、錫口（今松山）、水返腳（今汐止）、三角湧（今三峽）等城市或市街的發展，形成都市化的現象，為顧及市區清潔的必要，也對養豬活動加以限制，不僅總督府在統治臺灣之初即禁止民眾在市區街路上放牧豬隻，居民也「漸曉潔淨之法，大都不敢養豚，恐積污穢」。[97] 以臺北

---

93 鄭用錫編纂、林文龍點校，《淡水廳志稿》（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頁 159。

94 臺北盆地四周的淺山地區，許多山畲林地常被用來種植地瓜、竹木、芒蔗等，如石碇、基隆、三貂等堡之環山一帶，多種植地瓜、竹木；至於狹小的河階平原則被開墾成水田，鑿陂灌溉。參見曾品滄，〈清代汐止地區的拓墾與地主菁英階層的發展〉，《國史館館刊》27（1999 年 12 月），頁 49-72。

95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主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1867-1895）》，第 1 冊：1867-1881，頁 561-562。

96 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編，《臺灣總督府第四統計書》，頁 368-369。

97 〈肉價漸低〉，《臺灣日日新報》，1898 年 5 月 24 日，第 1 版；〈畜產獎勵〉，《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7 月 16 日，第 3 版。

地區人口稠密的大加蚋堡為例，1899 年有 1 萬 6,751 戶，卻只養豬 6,778 頭，比例僅 0.4。以上種種的改變無疑將導致本地整體的養豬活動減少，進而產生生豬供給不足的現象。

（二）消費需求的改變

人口增加，作為生活必需品的豬肉用量勢必隨之增加。臺灣開港後，臺北地區的人口呈現急遽增長之勢。早在 1892 年，海關官員即提及在此之前十年間，當地人口數字突飛猛進，以乘坐輪船往返的旅客為例，前來的旅客較離去者多了 2 萬 1,436 人，他估計，艋舺、大稻埕及臺北城三地人口大約 10 萬人。[98] 雖然後者的數字因缺乏詳細的調查過程較不可信，但前者的精確統計，仍可看出臺北人口急增的程度。到了 1895 年因政權轉變，總督府開始有較為明確的人口統計資料。據 1900 年 12 月的調查，艋舺、大稻埕、臺北城等三處市區的人口共 6 萬 9,672 人，較之臺南市街、安平市街的 5 萬 3,148 人來得更多，[99] 是全臺最多人口的城市。如加上基隆、淡水，以及附近各街市，臺北盆地內的城市人口將逾 10 萬。[100]

這些人口的來源，一部分是與當地農工商業的發展有關，包括：進入山區從事茶樹栽培的農人，從中國大陸移入、到大稻埕等城市製茶與販茶的工人或商人，為採掘金礦蜂擁而來的掏金者，以及因北部經濟昌盛，而吸引前來的各種服務業或手工業人口等。另一部分則是臺北於 1875 年設府，以及 1888 年成為臺灣省政治中心後，因政治地位提升而進駐的官員、書吏與軍人。如 1887 年淡水海關關員的年度報告中稱，前一年從中國內地來臺北任職的官員人數大幅增加，且尚有許多人來到此地尋找職務。[101] 隔年（1888）的《申報》也稱，臺北自辦通商以來，各省熟悉洋務者紛紛渡臺投效，[102] 這些官員或書吏主要集中在新建的臺北城內。1895 年日本統治臺灣後，清朝官員、書吏與軍人雖然離開，但隨即由日本殖民統治者加以填補，據 1900 年的統計，臺北三市區共有內地人 1 萬 2,719 人。這些移入者的增多，勢必增加本地豬肉等日常必需品的消費量。

---

98 H. B. Morse（馬士）撰、謙祥譯，〈1882-1891 年臺灣淡水海關報告書〉，頁 98。

99 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編，《臺灣總督府第四統計書》，頁 130-132。

100 包括基隆街、滬尾街、大嵙崁街、錫口街，以及臺北盆地內其他街市，共 10 萬 2,969 人。

101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主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1867-1895）》，第 2 冊：1882-1895，頁總 715。

102 〈臺嶠郵音〉，《申報》5522（1888 年 9 月 2 日），第 2 版。

然而，若將消費量增加的原因完全歸諸於移入人口，恐不盡符合實情。清末時期，臺北地區增加的人口中有許多是薪餉微薄的士兵或工人，豬肉的消費能力有限；到了日治時代，移入的日本人雖眾，但當時的日人對於豬肉的用量不多，相較於臺人嗜食豬肉，他們更嗜好魚肉、牛肉等，至於「猪肉一項，……東來仕宦（日本官員）嗜好者少」。[103] 以 1907-1911 年五年的統計為例，當時日本國民每人每年牛、羊、豬、馬肉的消費量合計僅 0.9 公斤，其中又以牛、羊肉居多。[104] 到了 1913 年雖上升至 1.09 公斤，但牛肉仍居半數以上。[105] 即使在臺日人的豬肉消費受本地人影響而偏高，然單以豬肉一項，應不至超過 2 公斤。假設以 2 公斤計，全年臺北日人所消費的豬肉只有 2 萬餘公斤，換算下來亦不過 640 頭豬隻的數量。[106] 比起臺北每年進口數萬頭以上的生豬，可說是微不足道。故豬肉用量增加的部分原因，可能得歸因於本地人生活消費能力提升。

1880 年代以後，臺灣北部茶業，煤、金礦業的發展，造成許多財富流入，使本地的茶農與工人可以普遍受惠，以 1896-1905 年的統計為例，茶工一天的工資平均 25-30 錢，較一般農夫的 20 錢為高；[107] 至於採煤的礦工約為 40 錢。掏金者一般來說可獲得 70 錢，即使付給礦權者租金 20 錢，也仍有 50 錢之多。[108] 這樣的工資因此可吸引許多對岸中國的勞工到臺北工作；而臺北都市化與政治地位提升的結果，也使收入較高的官員與各工商人士大量移入，更有助本地經濟環境的改善。這些條件雖然可能造成本地貨幣供給增加，導致前述的整體物價上漲，但在居民收入增加幅度超越豬肉價格上漲幅度的情況下，仍有利於本地民眾消費能力的提升，使民眾可以消費更多的豬肉。雖然目前缺少清末或日治初期可信賴的

---

103 〈物價騰貴〉，《臺灣新報》，1898 年 1 月 13 日，第 1 版。

104 〈獸肉問題の解剖（二）：肉價の高き所以〉，《中外商業新報》，1913 年 6 月 1 日，版次不詳，轉引自「神戶大學附屬圖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新聞記事文庫」，下載日期：2014 年 1 月 22 日，網址：http://www.lib.kobe-u.ac.jp/da/。

105 〈列国人の食肉量〉，《日本新聞》，1913 年 8 月 1 日，版次不詳，轉引自「神戶大學附屬圖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新聞記事文庫》」，下載日期:2014 年 1 月 22 日，網址:http://www.lib.kobe-u.ac.jp/da/。文中稱平均每位日本人的年食肉量為 2.4 封度，約 1,089.6 公克，其中牛肉約占一半以上，次為豬肉和馬肉。

106 1 萬 2,719 人，每人消費 2 公斤，共計 2 萬 5,438 公斤，以每隻豬約可取肉 39.75 公斤計算，共約 640 頭。

107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頁 191。

108 James W. Davison（戴維生）著、蔡啟恒譯，《臺灣之過去與現在》（研叢第 107 種，1972），頁 325、338。

家計調查資料來檢視不同地區民眾的消費能力，但從若干的例證仍可顯示，臺灣北部的豬肉價格，雖然在 1890 年代大幅攀升，但人均消費量似乎未受影響。以 1898 年為例，淡水、基隆的進口額為 11 萬 4,669 頭。單以此（不包括本地飼養的豬隻）作為臺北之消費額，該年臺北盆地人口共有本地人 43 萬 4,895 人，加上來自外國（主要是中國大陸）的居留者 5,100 人，[109] 算來每人平均約消費 0.26 頭，比起前述（表二）1903-1908 年全臺民眾的人均消費量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這個數據仍有商榷的餘地，但以其進口量之大且集中於臺北，仍可反映臺北地區民眾的消費量並未因豬肉價格高昂而減少，就如同該年《臺灣日日新報》所稱，「今豬兼自泉州、興化運載來臺，一月計銷萬餘頭亦不見多，一圓銀買肉五斤左右人又不嫌其貴，足見臺人重祭祀、多應酬，用度奢侈，舉一可概其餘也」。[110]

綜合以上論述，生豬的大量進口主要是十九世紀末期臺灣北部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它一方面反映當地農業生產體系改變，人們專注於商品化農產品——茶葉的生產，以至於原來自給自足的豬肉等產品轉而依賴外地進口。另一方面，茶業、礦業的發達，也促進本地消費活動的擴張，不僅因移入者眾而導致消費人口增多，每個人的消費能力也可能因經濟條件改善而增加，故即使豬肉價格偏高，本地的消費量並未因此減少。事實上，生豬進口並非只是個別現象，在十九世紀末期的臺灣北部，許多民生用品，包括稻米、生雞、花生油、豆類、鴨蛋等，皆有仰賴對岸中國進口的情況。[111] 至於如木炭等生活燃料亦感到缺乏、價格高昂，為取得足夠的木炭當作燃料，北部地區甚至興起植林事業。[112] 顯見當時臺灣北部在開港貿易與設省等經濟、政治情勢的影響下，商品經濟高度發展，地區性自給自足的農業產銷體系已有明顯變遷的現象，包括日常生活消費領域在內，北部民眾與島外貿易活動產生日益廣泛且深刻的連結。

---

109 即大加蚋堡、芝蘭一堡、芝蘭二堡、芝蘭三堡、興直堡、擺接堡、海山堡、文山堡、八里坌、基隆堡、金包里堡、石碇堡、三貂堡等，總人口數為 43 萬 4,895 人。參見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編，《臺灣總督府第二統計書》，頁 36。

110 〈猪肉暢銷〉。

111 松浦章著、卞鳳奎譯，《清代臺灣海運發展史》，頁 34-95。

112 曾品滄，〈炎起爨下薪：清代臺灣的燃料利用與燃料產業發展〉，《臺灣史研究》15: 2（2008 年 6 月），頁 37-78。

六、結論

豬肉是臺灣重要的民生必需品，豬隻的生產與消費活動向來發達。以十九世紀末期為例，養豬事業是臺灣最普遍的家庭副業，若以 1903 年的豬隻屠宰價值為依據，也是商品價值僅次於稻米和茶葉的重要產業。造成生產活動興盛的主要原因，不只是本地養豬成本低廉、豬肉具有高度商品化、養豬活動可使水稻作和旱作等農業生產更具效益等，更重要的是臺灣民眾對於豬肉的珍視與嗜食，豬肉不僅作為日常膳食材料，也是祭祀、宴會或餽贈的重要物品。

雖然豬隻的生產與消費活動發達，但 1880-1900 年間臺灣北部卻自中國閩、浙沿岸大量輸入生豬，形成興盛的兩岸生豬貿易活動，每年可進口達數萬頭，1897、1898 年甚至超過十萬頭以上。本文研究顯示，生豬貿易的出現與發展乃是十九世紀末期臺灣開港後經濟轉型的重要特徵，一方面顯示當時的臺北因貿易活動發達造成財富流入，而有通貨膨脹的現象，致使豬肉價格上漲，高於對岸中國，對岸的生豬也因此可以源源不斷地輸入臺灣。另一方面，它也反映臺灣北部在開港、以及成為臺灣政治中心後，農業生產與生活消費發生明顯的變化。包括：商業利益逐漸滲透到臺灣北部的城市、甚至鄉村等基層，越來越多人投入茶葉或礦業等外銷商品的生產活動，改變該地區原來以水稻作或旱作為主的農業生產模式，這也使臺北盆地本來自產自足、甚至外銷的農業生產活動發生變遷，包括豬肉在內的農產品，因自產不足，轉而尋求外部供應；城市人口增加和消費能力的提升，也有助於推升豬肉需求量，並進一步促進生豬的進口活動。上述現象顯示，開港通商對臺北的影響已非單純的增加茶葉、煤炭等商品的出口而已，它涉及整個北部農業生產體系的變遷，及民眾日常生活消費活動的發展。

此外，生豬貿易的例子也顯示，開港通商後臺灣北部的國際貿易活動增加，與大陸的商貿關係也發生改變，本地開始依賴閩、浙等地供應生活所需的部分農產品，而這些商貿活動主要透過帆船運輸。也因為如此，即使開港之後，臺灣與中國各港口之間仍存在著活躍、繁忙的帆船貿易活動，它們載運生豬、鴨蛋或其他無須課稅的農產品，在各港口之間頻繁地移動。但也因為這些商品均毋須課稅，未能在清代海關等檔冊中顯現出來，以致人們容易忽略這些商品的流動，以及帆船貿易的重要性。

引用書目

《申報》

《臺灣新報》

《臺灣協會會報》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慣習記事》

“Formosa Hut,”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995 (24 Sept. 1859), p. 294，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授權使用，編號：2006.008.0022。

〈光緒十六年置錦榮堂交官往來總抄簿〉，《霧峰林家錦榮堂帳簿群》，編號：LN01_4_09_002，無頁碼。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淡新檔案》，編號：17211-04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文號：189 冊 5 號、4506 冊 15 號、4517 冊 6 號、4665 冊 14 號、9203 冊 1 號、9691 冊 6 號、9706 冊 1 號、9761 冊 10 號、9785 冊 5 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Beazeley, Michael, M. Inst. C.E, “Notes of an Overland Journey through the Southern Part of Formosa, from Takow to the South Cape, in 1875, with an Introductory Sketch of the Island.”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n.s. 7 (Jan. 1885), pp. 1-22，轉引自「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下載日期：2014 年 1 月 5 日，網址：http://cdm.reed.edu/cdm4/formosa/texts.php。

Collingwood, F.L.S., “A Boat Journey across the Northern End of Formosa, from Tam-suy, on the West, to Kee-lung, on the East; with Notices of Hoo-wei, Mangka, and Kelung.”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11: 4 (1867), pp. 167-173，轉引自「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下載日期：2014 年 1 月 5 日，網址：http://cdm.reed.edu/cdm4/formosa/texts.php。

Steere, J. B. “Steere’s Letter from Formosaa--LXXIII Tamsui Formosa, Published in 24 April 1874 *Ann Arbor Courier.*”，轉引自「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下載日期：2014 年 1 月 5 日，網址：http://cdm.reed.edu/cdm4/formosa/texts.php。

〈列国人の食肉量〉，《日本新聞》，1913 年 8 月 1 日，版次不詳，轉引自「神戸大學附屬圖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新聞記事文庫》」，下載日期：2014 年 1 月 22 日，網址：http://www.lib.kobe-u.ac.jp/da/。

〈獣肉問題の解剖（二）：肉價の高き所以〉，《中外商業新報》，1913 年 6 月 1 日，版次不詳，轉引自「神戸大學附屬圖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新聞記事文庫」，下載日期：2014 年 1 月 22 日，網址：http://www.lib.kobe-u.ac.jp/da/。

吳聰敏，〈1895 年前後臺灣的產出、工資率與物價〉（1999 年）（未刊稿），下載日期：2014 年 2 月 3 日，網址：http://homepage.ntu.edu.tw/~ntut019/ltes/wp1895.pdf。

Davison, James W. 戴維生（著）、蔡啟恒（譯）

1972 《臺灣之過去與現在》，臺灣研究叢刊第 107 種。臺北：臺灣銀行。

Morse, H. B. 馬士（撰）、謙祥（譯）
1957 〈1882-1891 年臺灣淡水海關報告書〉，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史・六集》，臺灣研究叢刊第 54 種，頁 85-107。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ロツシング・バツク（Buck, John Lossing；卜凱、柏克）（著），三輪孝、加藤健（譯）
1941 《支那農業論：支那に於ける土地利用》，下卷。東京：生活社。
丁紹儀
1957(1873) 《東瀛識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山田伸吾
1899 《臺北縣下農家經濟調查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小島一生
1941 《臺灣畜產統計》。臺北：臺灣畜產會。
小野新市
1908 〈養豚業調查〉，《臺灣農事報》19: 32-36。
1908 〈養豚業調查（續）〉，《臺灣農事報》20: 41-43。
1910 〈阿緱廳下の養豚〉，《臺灣農事報》49: 42-48。
文山南仙
1942 〈豬哥〉，《民俗臺灣》2(11): 15-16。
中神長文（編）
1900 《臺南事情》。臺南：小出書店。
中華人民共和國杭州海關（譯編）
2002 《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經濟社會概況：浙海關、甌海關、杭州關貿易報告集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方　行
2010 《清代經濟論稿》。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平野勝
1895 〈臺北の實況〉，《名家叢談》1: 76-82。
石坂莊作
1899 《臺嶋踏查實記》。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如是空生
1912 〈臺灣の養豚〉，《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3 月 15 日，第 6 版。
朱德蘭
2011 〈日治時期臺灣與沖繩的貿易品：以稻米、生豬為例〉，發表於福建師範大學閩臺區域研究中心主辦，「第十三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2011 年 11 月 26-27 日。
朱　鋒
1967 〈祭祀物品簿〉，《臺灣風物》17(1): 70-71。
邱振成
1909 〈論婦人纏足與國家經濟之攸關〉，《臺灣農事報》36: 77-79。

江樹生（譯註）

2002 《熱蘭遮城日誌》，第 2 冊：1641-1648。臺南：臺南市政府。

李伯重

2002 《發展與制約：明清江南生產力的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沈氏（撰）、錢爾復（訂正）

1967 《沈氏農書》。臺北：藝文印書館。

佐倉孫三（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1(1903) 《臺風雜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10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林滿紅

1997 《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文凱

2011 〈再論晚清臺灣開港後的米穀輸出問題〉，《新史學》22(2): 215-252。

松浦章（著）、卞鳳奎（譯）

2002 〈清末及日治時期中國大陸產豬對臺灣的移入〉，松浦章著、卞鳳奎譯，《清代臺灣海運發展史》，頁 151-170。臺北：博揚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松浦章（著）、楊　蕾（譯）

2010 〈清代浙江溫州與臺灣的航運關係〉，收於松浦章編著，《近代東亞海域交流史》，頁 3-30。臺北：博揚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嘉生（著）、周憲文（譯）

1985 《臺灣經濟史概說》。臺北：帕米爾書店。

凃照彥（著）、李明駿（譯）

1993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出版社。

香風外史（市毛淺太郎）（編）

1897 《征臺顛末》。水戶：市毛淺太郎。

施添福

2001 《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桃園廳（編纂）

1906 《桃園廳志》。桃園：桃園廳。

笹森儀助

1985 《臺灣視察日記》。臺北：成文出版社。

淡水稅關（編纂）

1898 《明治三十年淡水港外四港外國貿易景況報告》。神戶：淡水稅關。

國分直一

1943 〈四社平埔族の尪姨と作向〉，《民俗臺灣》3(3): 6-10。

陳文達（著）、王　禮（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1(1720) 《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0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計堯

2012 〈近代中國的開港、工業化與通商口岸之糧食消費的變遷（1870-1936）〉，收於海洋史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港口城市與貿易網絡》，頁 221-290。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陳淑均

1963(1852) 《噶瑪蘭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6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曹幸穗

1996 《舊中國蘇南農家經濟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偕叡理（Mackay, George Leslie）（原著）、王榮昌等（譯）

2012 《馬偕日記 I ：1871-1883》。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主編）

1997 《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1867-1895）》。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黃富三

2012 〈臺灣農商連體經濟的興起與蛻變（1630-1895）〉，收於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頁 3-36。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葉貓貓

1937 《臺灣人食ノ榮養學的考察・前編：食糧統計ヨリ見タル臺灣人食ト其批判》。臺北：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衛生部。

曾品滄

1999 〈清代汐止地區的拓墾與地主菁英階層的發展〉，《國史館館刊》27: 49-72。

2008 〈炎起爨下薪：清代臺灣的燃料利用與燃料產業發展〉，《臺灣史研究》15(2): 37-78。

2010 〈辦桌：清代臺灣的宴會與漢人社會〉，《新史學》21(4): 1-55。

濱下武志（著），高淑娟、孫 彬（譯）

2006 《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清末海關財政與通商口岸市場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編）

1899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報文》，第 2 卷第 2 冊。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

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編）

1900 《臺灣總督府第二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

1902 《臺灣總督府第四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

1905 《臺灣總督府第七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

1910 《臺灣總督府第十二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

臺灣總督府民財務局（編）

1936 《臺灣貿易四十年表：自明治二十九至昭和十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財務局。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財務局稅務課（編）

1918 《臺灣稅務史：上卷》。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財務局稅務課。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59 《安平縣雜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5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撰）

2009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 95 冊。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鄭用錫（編纂）、林文龍（點校）

1998 《淡水廳志稿》。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謝美娥

2008 《清代臺灣米價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

1902 《臺灣形勢概要》。臺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1905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下卷。臺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藍田俊郎、星武

1936 《臺灣海港獸類檢疫史》。臺北：臺北州港務部檢疫課。

Bonar, Herry Alfred Constant

1997 "Report on the Trade of North Formosa for the Year 1897." In Robert L. Jarman, ed.,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1861-1960*, v. 5: 1894-1899, pp. 525-538. Slough: Archive Editions.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21, No. 2, pp. 33-68, June 2014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Emergence of Pig Trad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Economy in North Taiwan, 1881-1900

Pin-tsang Tseng

ABSTRACT

Through tracing the emergence of pig trade in north Taiwa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mportance of pigs and pork i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daily consumption of Han people in Taiwan; and more importantly,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the opening up of the port trade on the economy and living standard of local people in late-Qing Taiwan.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pig had been flourishing in Qing Taiwan. Pig husbandry was the most popular household sideline, and its considerable commercial value made it an important business at that time. Factors accounting for the popularity of pig husbandry included the low cost of raising pigs for peasant households, the high commodification of pigs,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pig rearing to rice cultivation. Another major reason is the Han's preference for pork. Not only was pork consumed a lot in daily diet of Han Taiwanese, it was also used at banquets and religious worships as well as sent as gifts.

Despite the widespread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pig on the island, north Taiwan also had swine imports from Fujian and Zhejiang between 1880 and 1900.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emergence of pig trade wa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after the opening of ports in north Taiwan. On one hand, pork prices rocketed because of inflation; on the other hand, after the opening of ports, north Taiwan has become the political center, leading to restructure of its loc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hile domestic pig husbandry decreased, the demand for pork increased as a result of rising local consumption with better financial conditions. In sum,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economy in north Taiwa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resulted in distinctive changes in the economy and daily life consumption of Taiwanese people.

Keyword: Pig, Pork, Port-opening, Junk Trade, Daily Consumption, Household Sideline

《臺灣史研究》
第 21 卷第 2 期，頁 69-110
民國 103 年 6 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認識與想像臺灣的社會經濟史：
1920-1930 年代臺灣社會史論爭意義之重探*

林文凱**

摘　要

1920-1930 年代，東亞各地發生社會史論爭之時，臺灣也發生了影響深遠的社會史論戰，當時西方的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等近代性思潮大量引入臺灣，尤其以馬克思主義為主的社會主義思潮，深刻影響了知識分子對於社會變遷的近代性認識與想像。參與論爭的當事者依照不同理論觀點，對於臺灣與中國的近代社會經濟史作出不同的觀察，並據以提出對立的社會革命或社會改造方案。1980 年代晚期以來，隨著政治民主化言論空間大開，臺灣文學史與政治思想史學者重新關注這一論戰，詳細挖掘了這場論爭的內容與其歷史影響，並用以介入當時臺灣的政治與社會議題。值得注意的是，1990 年代以來社會經濟史學界對近代中國與臺灣社會經濟史的認識已有重大改變，西方與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與思想也已完全更新，但臺灣學界對該論戰的討論似乎仍本於之前的學術成見而展開，以致分析尚有許多不足之處。本文根據晚近以來對於社會經濟史以及社會主義史的研究成果，重新定位這場論爭與運動的歷史性質，以及其對當代臺灣歷史的意義。

關鍵詞：臺灣思想史、臺灣文學史、中國改造論、臺灣社會經濟史、全球社會主義史

* 本文部分內容乃國科會研究計畫獎助成果之一，計畫編號：NSC101-2410-H-001-078。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2013 年 9 月 21 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辦「重返臺灣的近代」學術工作坊，會中承蒙黃美娥教授、許雪姬教授與張重崗教授提供寶貴修改意見，謹在此致謝。另蒙本刊匿名審查人提供諸多修正意見，非常感謝。然文中如有任何問題，仍由筆者自負。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投稿日期：2013 年 10 月 28 日；通過刊登：2014 年 6 月 16 日。

一、前言
二、日治中期的臺灣社會史論爭
三、近年來清代與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研究成果對於過去經濟史觀的批判
四、戰後以來西方與日本社會主義實踐與思想史的轉變
五、結論

一、前言

日治中期，即1920-1930年代，是臺灣政治史與文化史上的重要年代，臺灣政治與文化菁英為了反抗殖民統治、爭取政治權力，推動了各種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對於臺灣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等近代思潮的傳播與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並開始認識與想像臺灣的近代政治、經濟與文化之歷史。主要運動包括爭取臺灣自治權利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1-1934）、訴求文化啟蒙的臺灣文化協會之成立（1921-1926）與其後的左、右派分裂和瓦解（1927-1931）、臺灣共產黨的成立與瓦解（1928-1931）、臺灣農民組合的建立與瓦解（1926-1929），以及臺灣民眾黨的成立與解散（1928-1931）、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的建立與瓦解（1930-1937）等。[1]

戰後初期臺灣的自由主義以及左翼運動雖短暫復甦，旋因來臺國民黨政府在政治與文化領域的嚴密控制而遭到嚴厲壓制，尤其在兩岸對峙的反共國策下，左派思潮幾乎匿跡。同一時期國民黨政府也刻意壓制臺灣歷史的研究，尤其是日治時期的研究，以上這些政治與文化運動更是學術禁忌。其後 1980 年代晚期解嚴

---

1 有關這些事件的主要經過，參見以下幾套普遍利用的史料：台湾総督府警務局編、戴國煇解題，《台湾総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状況（中巻）台湾社会運動史》（東京：緑蔭書房，1986）；連溫卿著，張炎憲、翁佳音編校，《臺灣政治運動史》（臺北：稻鄉出版社，2003年再版）；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下）》（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有關日治時期臺灣大事件紀錄，參見葉榮鐘，《日據下臺灣大事年表》（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

前後，臺灣政治與文化空間的控制稍稍鬆綁，各種民主與自由主義的文化思潮開始傳播，社會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也不再是禁忌。知識文化界乃重新探究日治中期以來的政治思想與文學思潮，並以其作為歷史先例用以對當時臺灣的政治改革與文化啟蒙運動發聲。[2]

日治中期臺灣社會史論爭，包括一連串的中國改造與臺灣社會改造論爭，主要是運用 1920-1930 年代流行於蘇聯與東亞的第三國際之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來分析中國與臺灣的社會經濟史，並據以提出有關中國與臺灣社會的革命或改良構想。應注意的是，1990 年代以來，中國與臺灣近代社會經濟史的研究陸續有了新的研究開展，並生產出很多新的經驗研究成果。然而，臺灣政治思想史與文學史學者如陳芳明、吳叡人、方孝謙、陳翠蓮等人在研究這些論爭時，[3] 主要關切其中涉及的民族主義史觀等政治文化議題，因而很少探討當時作為歷史言說主題的社會經濟史議題；即使有所論及，通常也只根據論爭當事人的文本進行討論，很少參酌新的社會經濟史研究成果探究這些言說是否足以適切描繪當時的社會經濟現實。至於另兩位左派史家陳映真、邱士杰，[4] 因為仍堅持第三國際的社會

---

[2] 有關臺灣戰後的政治與文學史的簡要系譜，參見蕭阿勤，《回歸現實：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 年第 2 版)；蕭阿勤，《重構臺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3] 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陳芳明，〈「中國改造論」：論戰與 20 年代臺灣左翼思想的傳播〉，收於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編，《第六屆「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文化與臺灣文化——延續與斷裂》(臺北：該院，2005)，頁 183-201；吳叡人，〈「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反殖民鬥爭與臺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1919-1931〉，收於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臺北：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2001)，頁 43-110；吳叡人，〈福爾摩沙意識型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1919-1937)〉，《新史學》17: 2(2006 年 6 月)，頁 127-218；吳叡人，〈誰是「臺灣民族」？：連溫卿與臺共的臺灣解放論與臺灣民族形成論之比較〉，收於陳慈玉主編，《地方菁英與臺灣農民運動》(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頁 199-229；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〇~一九五〇》(臺北：財團法人曹永和文教基金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方孝謙，〈一九二〇年代殖民地臺灣的民族認同政治〉，《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0 (2000 年 12 月)，頁 1-46。

[4] 陳映真，〈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批評陳芳明先生的〈臺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學》16: 9=189 (2000 年 7 月)，頁 138-160；陳映真，〈關於臺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答陳芳明先生〉，《聯合文學》16: 11=191 (2000 年 9 月)，頁 138-161；陳映真，〈陳芳明歷史三階段論和臺灣新文學史論可以休矣！：結束爭論的話〉，《聯合文學》17: 2=194(2000 年 12 月)，頁 148-172；邱士杰，〈從〈黎明期的臺灣〉走向「中國改造論」：由許乃昌的思想經歷看兩岸變革運動與論爭(1923-1927)〉，《史繹》35 (2007 年 11 月)，頁 69-140；邱士杰，〈從中國革命風暴而來：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與他的馬克思主義觀〉，收於文訊雜誌社編，《陳映真創作 5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

革命史觀的正確性，因此反覆援引馬克思與列寧等人的理論以申論論爭當時左派菁英社會經濟史認識的正確性，並用以批判陳芳明等人有關臺灣民族主義歷史詮釋的問題。

因為篇幅所限，本文不準備參與前述學者針對社會史論爭中涉及民族主義與階級史觀的諸多爭辯。本文關切的是，臺灣社會史論爭的核心主題是中國與臺灣社會經濟史的認識，其所提出的社會改造方案之有效性，邏輯上又是基於這些認識的有效性。然而，陳芳明等人以及陳映真、邱士杰等既有研究，卻都未曾仔細討論左、右派菁英的社會經濟史認識到底是正確的「歷史認識」，還是受到理論觀點與革命方略誤導的「錯誤想像」？因此，本文以為有必要參照近年來的社會經濟史研究成果，來重新探討這一社會史論爭的歷史意義。[5]

另一方面，二次大戰結束以來，世界各國陷入冷戰體系下，一方是美國和北約組織領導的自由民主制之資本主義政體，另一方則是以蘇聯和華沙組織為首的一黨專政之共產主義政體。共產主義政黨的國家基本上依照第三國際的革命實踐綱領，依序推進非資本主義模式的社會主義發展，然而革命並未成功，1989年前後蘇聯與東歐共產體制瓦解，開始模仿資本主義政體的社會發展方略。而資本主義政體的各國禁止第三國際設定的暴力社會革命，但是原為第二國際成員的各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除共組社會黨國際為名的社會主義國際組織外，並陸續透過合法的議會民主制掌握各國政權，推動或促進了歐洲社會福利體制的建立。[6] 至於東亞發生過社會史論爭的日本、臺灣與中國，前兩者屬於資本主義政體，先後建立了與西歐類似的社會民主體制；而中國則屬於共產主義陣營，戰後從內戰中取得政權後，參考第三國際的相關綱領推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

文集》（臺北：文訊雜誌社，2009），頁 241-299；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日本學界也有左派學者採取類似取徑，肯定論爭中的左派菁英之歷史言說，參見小林文男，〈日本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ルな思考：「中国改造論争」の意味と周辺（1）〉，《アジア経済》11: 9（1970年9月），頁40-51；小林文男，〈日本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ルな思考：「中国改造論争」の意味と周辺（2）〉，《アジア経済》12: 2（1971年2月），頁14-30。

5 值得注意的是，撰寫過陳逢源傳記的社會經濟史學者謝國興，曾為文分析過這一社會史論爭，他在結論部分以隱微筆調婉言主張右派陳逢源的觀點應該是比較正確的。但他在文中並未說明其判斷依據。參見謝國興，〈中國往何處去：1930年前後臺灣的左右論辯〉，《近代史研究》2003: 2=134，頁44-76。〔按：中國期刊無卷期而以年份標示者，不另列出版年〕。

6 〈Cold War〉，「Wikipedia」，下載日期：2013年9月15日，網址：http://en.wikipedia.org/wiki/Cold_War。

然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共」）的社會主義革命也未成功，因而於 1978 年之後在經濟上放棄社會主義模式，轉採改革開放的資本主義發展政策。

隨著西歐社會福利體制的成功與共產主義陣營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西歐與日本等地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也產生全盤的轉變，除批判第三國際時期的馬克思主義詮釋觀點，也慢慢放棄了推翻資本主義的原有目標，追求以資本主義生產、社會福利主義分配的新政略目標。與此同時，發展出相當豐富多元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對於各類政治、經濟與文化議題提出新的馬克思主義批判觀點，或者進一步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出後殖民與後現代主義的社會批判理論。值得注意的是，臺灣學界討論日治中期社會史論爭時，普遍都注意到當時臺灣與日本、中國和第三國際左翼運動與思想的網絡關係與連動的影響。但卻很少把這一受到第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引發的社會史論爭，放在戰後以來世界與東亞的社會主義運動史與思想史的整體脈絡下加以考察，尤其沒有注意到這些新的社會主義運動史與思想史對於第三國際觀點與立場的批判與揚棄。

因此，本文以下將根據晚近對於中國與臺灣社會經濟史以及世界和東亞社會主義史的新研究，重新定位日治中期這些論爭與運動的歷史性質，以及其對當代臺灣歷史的意義。以下分成幾個部分討論這些論爭，首先，簡要介紹由陳逢源、許乃昌、蔡孝乾、連溫卿與臺灣共產黨等右派與左派人士，所引發的中國改造與臺灣改造論爭。其次，說明近年來國際與臺灣學界有關清代以來中國與臺灣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進展，藉以指出日治中後期臺灣左派與右派思想家的社會經濟史認識的對錯之所在。其三，討論西方與東亞社會主義運動與思想史的轉變，以提供重新考察日治中期社會史論爭意義的更大參照性空間。最後，簡要說明我們應如何定位日治中期這場重要思想論爭的歷史意義，認清當時臺灣左、右派人士有關臺灣社會經濟史言說中的「認識與想像」。

二、日治中期的臺灣社會史論爭

約於 1920 年前後，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以及無政府主義等近代思潮同時傳入臺灣。當時無政府主義的思潮並未有效擴散，反而較早就已經消退了，但社會

主義與自由主義持續興盛並擴展開來。一開始左、右派政治與文化精英合力推動兩個重要的反抗殖民統治的運動——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文化啟蒙協會活動，然而隨著左派思潮的增強，左派人士開始不滿以右派民主抗爭為主調的既有活動型態與主張，逐漸地兩派人士的衝突開始浮上檯面。就在 1927 年臺灣文化協會內部的左、右派分裂前，右派（陳逢源）與左派（許乃昌和蔡孝乾等人）在當時本島人最重要的公共論壇《臺灣民報》爆發了所謂的「中國改造論爭」。這場論爭可以說把西方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各自的現代性認識與想像，尤其是社會經濟史觀與社會實踐路線，以對照方式傳播給當時的閱聽大眾。

這場論戰始於 1926 年 8 月底，陳逢源在《臺灣民報》上發表了〈最近之感想（二）：我的中國改造論〉，討論中國的局勢與改革之道。他一開始就引述馬克思的理論，並將其詮釋為「社會進化論」，宣稱馬克思主張社會進化有其必然的階段過程：資本主義若沒有發展到極致，無法有社會主義的實現。換言之，他並不否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想，但認為中國社會必須先發展出資本主義，才能進一步追求社會主義理想的實踐。

陳逢源認為中國社會雖已有零星資本主義的發展，但大部分仍然處於「封建體制」之下。[7] 當時的軍閥割據與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一方面造成封建體制的延續，另一方面也造成中國的資本主義無法發達。他認為中國的狀況與俄國不同，中國處於帝國主義侵略與支配下，因此不可能推動俄國共產革命的路線。中國必須追求國家的統一方能廢除帝國主義以及軍閥割據，也才能促成資本主義的發達。但他認為與其以武力統一，不如推動工商階級的勢力為良方，因為他們為了自身利益會追求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的撤廢，並協助打敗軍閥以及封建體制。陳逢源也指出想要促進中國資本主義的發達，應該鼓勵中國人集資組成股份有限公司，才能與擁有龐大資本的外國資本家對抗。總之，其中國改造論「總講兩句，不外是由資本主義這條路跑去便是了」。[8]

---

7 使用西方社會史家用來描繪西方中古社會的「封建」概念來描繪現代化以前的傳統中國，是1920年代社會史論戰以來的思想繼受結果，這一概念被當時左、右派的多數學者所普遍接受，但這其實是錯誤的概念套用，參見下一節的相關討論。

8 芳園（陳逢源），〈最近之感想（二）：我的中國改造論〉，《臺灣民報》120（1926年8月29日），頁8-10。

這篇文章立刻引發了左派社會主義者許乃昌的激烈回應，他對陳逢源的馬克思主義理解提出質疑；並宣稱依據其對於中國政治經濟狀況的「精密研究」，陳逢源並未真的認識中國，他的經驗觀察是明顯錯誤的。許乃昌主張馬克思的重點不只是社會進化論，而是必然且必須要推動革命；且他認為所謂的軍閥根本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中國的資本主義看似已有發展，但實際上都掌握在外國資本家手中，而只要外國資本主義在的一天，中國資本主義就不可能發展。

許乃昌依照其對當時處於國共合作時期的中國政治之觀察，主張國民革命有兩條路線：一是資產階級指導的妥協路線，國民黨右派戴季陶即如此主張；二是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的路線，即國民黨左派汪精衛與蔣介石所領導的〔按：當時蔣介石尚未清黨〕，強調國民黨左派與中國共產黨正朝向第二條路行進。許乃昌強調各國進化的路徑並不相同，中國現在既非封建主義也非資本主義，而是處於帝國主義時代特殊的「殖民地式中間階段」。如同俄國革命一樣，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有可能無須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就能夠經由打倒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即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跳躍入更高級的社會主義階段。[9]

其後，另一位左派重要成員蔡孝乾（1928 年臺共幾位創黨成員之一）則提出了類似於許乃昌的意見，強調因受到國際帝國主義與軍閥的雙重壓迫，中國已存在國際資本主義，且外國勢力已經掌握所有的資本主義力量，因此中國自身朝向資本主義道路的發展受到嚴重阻礙。即使中國的商工階級成立，鑑諸五卅反帝國主義運動經驗來看，他們並無實力打倒國際帝國主義，且往往成為反動者。因此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才能一舉完成經濟與政治革命，解救廣大人民的痛苦。[10]

之後陳逢源對於許乃昌的批評提出詳細的回應，除了重複前文的要點之外，他指出：一、俄國革命的性質與成果是值得懷疑的，那只是政治革命而非社會革命，只有共產黨員的獨裁，而非無產階級獨裁；二、中國的現狀，包括人民的生活願望，都比較適合發展國家資本主義或讓農民成為小資本家，而非實行共產主

9 許乃昌，〈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臺灣民報》126（1926 年 10 月 10 日），頁 10-13；許乃昌，〈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續）〉，《臺灣民報》127（1926 年 10 月 17 日），頁 10-12；許乃昌，〈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續）〉，《臺灣民報》128（1926 年 10 月 24 日），頁 9-11；許乃昌，〈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續・完）〉129（1926 年 10 月 31 日），頁 9-11。

10 蔡孝乾，〈駁芳園君的「中國改造論」〉，《臺灣民報》134（1926 年 12 月 5 日），頁 10-13。

義；三、中國的重點是統一國家、打倒軍閥、推翻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等，這是所有階級的要求，因此應先解救民族，以後再談解放階級；四、中國若能統一，取消不平等條約就能夠進入資本主義，在這同時主政者也必須實行社會政策，限制土地兼併、國際與私人資本的壟斷、實施勞動保護法令，並保障組織和言論的自由。[11]

這場論戰最後，是許乃昌的一個再回應，他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主張自己是以「無產階級的利益」為前提，並相信「無產階級將會創造新的歷史」。他批評陳逢源既未從事實際的中國資本主義研究，也未經過實地的研究調查，所提出的經驗、數據都是抄襲而來。與其相比，他主張自己則有堅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經驗研究的支撐。[12]

中國改造論討論的雖是中國，但對於論戰者來說言外之意當然是針對當時臺灣政治抵抗運動實踐走向的辯論。在這場辯論後不久，1927年初臺灣左、右派政治運動者就正式分裂，左派連溫卿在臺灣文化協會臨時大會上奪權成功，右派蔡培火、陳逢源、蔣渭水（先右後左）等人則退出文化協會，並重新籌組臺灣民眾黨。1928年臺灣島外的左派人士分別在日本與中國共產黨、以及共產國際的協助下籌組了臺灣共產黨，雖經上海日本警察的鎮壓，但仍在臺灣展開活動。[13]

這段期間，臺灣民眾黨與臺灣共產黨陸續提出一些針對臺灣改造的政治綱領與政治論述，左、右派人士也提出他們對於臺灣社會與歷史的看法，並藉以提出他們屬意的適當政治實踐綱領。本文特別關切的是，他們對於臺灣歷史，尤其經

---

11 芳園（陳逢源），〈答許乃昌氏的駁中國改造論（一）〉，《臺灣民報》130（1926年11月7日），頁11-12；芳園（陳逢源），〈答許乃昌氏的駁中國改造論（二）〉，《臺灣民報》131（1926年11月14日），頁11-12；芳園（陳逢源），〈答許乃昌氏的駁中國改造論（三）〉，《臺灣民報》132（1926年11月21日），頁10-11；芳園（陳逢源），〈答許乃昌氏的駁中國改造論（四）〉，《臺灣民報》133（1926年11月28日），頁11-12；芳園（陳逢源），〈答許乃昌氏的駁中國改造論（五）〉，《臺灣民報》135（1926年12月12日），頁8-9；芳園（陳逢源），〈答許乃昌氏的駁中國改造論（六）〉，《臺灣民報》136（1926年12月19日），頁11；芳園（陳逢源），〈答許乃昌氏的駁中國改造論（七）〉，《臺灣民報》137（1926年12月26日），頁11-12；芳園（陳逢源），〈答許乃昌氏的駁中國改論造〔按：造論〕（八·完）〉，《臺灣民報》139（1927年1月9日），頁12-13。

12 許乃昌，〈給陳逢源氏的公開狀（上）〉，《臺灣民報》142（1927年1月30日），頁11-12；許乃昌，〈給陳逢源氏的公開狀（下）〉，《臺灣民報》143（1927年2月6日），頁11-14。

13 有關臺灣文化協會分裂與臺灣共產黨組黨過程，參見吳叡人，〈誰是「臺灣民族」？：連溫卿與臺共的臺灣解放論與臺灣民族形成論之比較〉，頁199-229；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頁29-244。

濟史提出怎樣的看法，以及對於臺灣的經濟發展（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提出怎樣的實踐策略。

首先，是 1927 年 9 月 13、18 日，臺灣民眾黨在臺南舉行的「臺灣社會問題改造觀」演講會。演講成員包括韓石泉、王受祿、陳逢源、盧丙丁、彭華英、謝春木與蔣渭水等臺灣民眾黨的右派成員，他們的觀點基本上延續陳逢源在中國改造觀論爭中的想法，主張臺灣的資本主義尚不發達，並無本土的大資本家，主要的政治、經濟權力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且臺灣人的文盲普遍存在，人口大多是農民，並無大量近代產業的勞動者。因此認為政治運動的重心，不應是社會主義的階級革命，而是團結起來向日本人要求政治與經濟上的平等，並追求知識上的啟蒙；至於貧窮等社會問題，則應該採用社會改良主義的方式來解決。[14] 總之，這些右派成員的論點明顯是在回應當時奪權成功的臺灣文化協會左派成員，強調階級運動不可行，而且民族團結革命應該優先於階級革命。

這場演講之後，則引發了左派成員黃石輝的批判性回應，針對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的優先性，主張應該是階級運動優先而非右派所說民族運動優先。因為歷史顯示民族鬥爭只講求民族解放，鬥爭成功時往往僅對資本家與大地主有利，工人與農民仍然受到壓迫。所以民族運動只是部分的，民族運動其實是階級鬥爭的一部分，而階級鬥爭才是全體的，方能令大部分勞動人民獲得解放。[15]

其次，連溫卿在 1928 年針對中國改造論爭作出評論，認為這場長達將近半年的論爭，雙方的主題並非僅是表面的「中國改造」，而是有關「臺灣改造」的辯論。雙方爭辯的是「臺灣有資本主義也是沒有？」連溫卿認為右派的想法是：「臺灣雖沒有所謂的資本家，那自然就沒有資本主義的存在，所以臺灣要豫先使臺灣人的資本家發達起來，能夠到達和日本資本家對抗的地位，才是合理的，欲著到這個目的，需要以民族運動去進行的。」左派許乃昌的觀點則是：「臺灣雖有資本家也沒有發展到能夠獨立的地位，因為在臺灣的資本主義，已經鞏固了地盤

---

14 〈臺灣社會問題改造觀（一）：在臺南開會演講大要〉，《臺灣民報》176（1927 年 10 月 2 日），頁 7；〈臺灣社會問題改造觀（二）：在臺南開會演講大要〉，《臺灣民報》177（1927 年 10 月 9 日），頁 8；〈臺灣社會問題改造觀（三）：在臺南開會演講大要〉，《臺灣民報》178（1927 年 10 月 16 日），頁 8；〈臺灣社會問題改造觀（四）：在臺南開會演講大要〉，《臺灣民報》179（1927 年 10 月 23 日），頁 8；〈臺灣社會問題改造觀（五）：在臺南開會演講大要〉，《臺灣民報》180（1927 年 10 月 30 日），頁 8。

15 黃石輝，〈「改造」之政〔按：改〕造（一）〉，《臺灣大眾時報》9（1928 年 7 月 2 日），頁 13-14；黃石輝，〈「改造」之改造（二）〉，《臺灣大眾時報》10（1928 年 7 月 9 日），頁 11-13。

的緣故，而被壓迫、榨取的臺灣人，不是只限於少數資本家及地主而已，此外還有最大多數的勞動者及農民的存在，所以欲解放臺灣人，應該要主張階級爭鬥」。[16]

連溫卿從左派立場出發，認為右派的主張只是以少數的利害關係為根本要求，因此自然能和殖民當局的內地延長主義一致，也就是以獲得政治上的獨立為止；而左派的主張是以臺灣無產階級的解放為目的，且無產農民與勞動者的利害關係和地主與資本家並不一致，因此主張當然也就有所不同。從這個討論中，可以發現到右派陳逢源主張臺灣民族運動，應該先促進臺灣本土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的發達，然後才能談進一步的社會改革；然而左派則認為這樣的運動只會有利於少數資本家，無益於廣大無產農民與勞動者的利益。而潛藏在左派與右派不同主張的背後，則都是相信自己的經驗觀察之正確性，以及由此得出的實踐主張之可能性。

接著，我們注意到 1928 與 1930 年，連溫卿對於日本統治下臺灣社會經濟演變的分析，基本上是一種殖民地臺灣的經濟發展受到母國發展制約的「依賴理論」觀察：一、臺灣在晚清時期，尚未脫離封建制度；日治時期臺灣開始資本主義化，而且隨著日本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在日治中期臺灣也逐漸高度資本主義化。二、日治中期，臺灣社會已經分化成五個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轉化而成的新興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受薪階級與無產的工農階級，這其中封建地主階級與新興資產階級都已經被日本資本家收編，至於受薪階級則有可能支持工農階級領導的無產階級運動。三、日治中後期臺灣已經高度資本主義化，日本殖民政權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形式，因此臺灣應該進行的是社會主義革命。[17] 如同吳叡人的分析，連溫卿提出的是一個日本山川——勞農派的社會經濟史之分析與一階段革命論的主張。[18]

另一方面，1928 年臺灣共產黨也提出其〈政治大綱〉，該文件揭示了另一個「臺灣民族、民主與經濟發展的現代性史觀」：一、臺灣最初的住民是野蠻人生

16 連溫卿，〈臺灣社會運動概觀〉，《臺灣大眾時報》創刊號（1928 年 5 月 7 日），頁 15-16。

17 連溫卿，〈臺灣殖民政策的演進（一）：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及其發展〉，《臺灣大眾時報》6（1928 年 6 月 4 日），頁 12-14；連溫卿，〈臺灣殖民政策的演進（二〔按：三〕）：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及其發展〉，《臺灣大眾時報》7（1928 年 6 月 11 日），頁 13-14；連溫卿，〈臺灣殖民政策的演進（二）：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及其發展〉，《臺灣大眾時報》8（1928 年 6 月 25 日），頁 14；連溫卿，〈台湾に於ける日本植民政策の実態〉，《史苑》35: 2（1975 年 3 月），頁 61-83。

18 吳叡人，〈誰是「臺灣民族」？：連溫卿與臺共的臺灣解放論與臺灣民族形成論之比較〉，頁 209-210。

番，在十六世紀前半葉臺灣受到荷蘭與西班牙的殖民。1660 年代鄭成功將荷蘭與西班牙殖民政權逐出臺灣。漢人逐漸壓迫生番，將其逐入深山之中。土地完全被鄭氏與其部屬所分割占有。此後中國南部移入臺灣的漢人日增，所謂的臺灣民族就是此等南方移民渡海來臺所結成的。當時鄭成功一族對臺灣的統治完全建立在「封建制度」之上，同時也保存民族遺傳的風習。二、其後，清朝派遣封建領主駐在臺灣，依然採用封建制度統治此地。然後隨著時日推移，封建制度也日漸動搖。促成此種歷史變遷的主要動因是，當時臺灣人與西方諸先進國家開始貿易，內部的商業資本逐漸抬頭，因此迫使封建制度逐漸走上崩潰的道路。

三、十九世紀中葉，當臺灣與中、英、荷等國的商業關係逐漸繁盛起來，封建制度逐漸崩潰，初步的資本主義經濟展開，進入經濟變革時期，反抗滿清的民族運動也逐漸高漲。四、這時中日發生戰爭，清朝戰敗議定臺灣割讓，民族運動轉變為臺灣民主國的創設，主要目標為對抗日本侵略臺灣。這一革命運動的主力是資本主義的中層地主、商人及激進武士，他們雖然表現出一種全民大眾性的國民革命型態，但由於臺灣的資產階級尚未成熟，這個國民革命遭到橫暴的日本帝國主義壓抑。民主革命尚未成功，但革命過程中由於內部資本主義的成長，以及日本帝國主義掠奪性的改革，最主要的土地問題實際上起了一大變化，這是革命所收到的唯一效果。五、臺灣民主國雖然原擬建立一個民族獨立的國家，邁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但革命未成、已被日本強奪而成為殖民地，因此仍遺留很多封建殘餘。另一方面，殖民以來臺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完全是倚賴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成長起來的，而統治臺灣的日本帝國主義本身也存在著很多封建殘餘，因此現在的臺灣事實上還存在著很多的封建殘餘。

六、進一步來說，日治中期臺灣的經濟型態，乃是占據主要資本份額與支配地位的日本壟斷資本、少數幼稚的本土資本以及落後的農村非資本主義要素並存，這些難以解決的矛盾並存的狀態，正是臺灣革命發展的主要動因。七、臺灣的階級狀況，包括日本資本家、反動的本土資產階級、進步的本土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大地主、中地主、自耕農、貧農與農業勞動者、勞動者階級等。這些階級之中親日的包括日本資本家、反動的本土資產階級、大地主等階層，其餘階層則有抗日的傾向，支持民族革命。八、就革命傾向來說，一部分左派人士忽略了臺灣是日本殖民地以及臺灣封建殘餘濃厚的歷史事實，以致犯了幼稚病，拒絕

民主主義的革命，而希望一步就施行社會主義革命。臺灣革命最重要的問題乃是農民土地問題的解決，農民正是農村革命的主人公，然而農民本身經濟性格是散漫的，並非革命的主導者，而必須由無產階級來領導，因此臺灣工農必須聯合推動民主主義的革命，並將封建地主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土地沒收、分配給農民，完成反帝與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然後再進行進一步的社會主義革命。[19]

如果與共產國際的東亞革命理論、日本講座派理論以及中國革命理論相互對照就會發現，這就是所謂的二階段革命論。主張臺灣社會還不是一個成熟的資產階級社會，反對前述連溫卿基於山川勞農派主張的一階段革命論，而主張先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然後再推動社會主義革命。[20]

三、近年來清代與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研究成果對於過去經濟史觀的批判

1990年代臺灣民主化之後，如陳芳明、吳叡人、方孝謙、陳翠蓮、陳映真、邱士杰等臺灣政治思想史與文學史研究者，都對上述的社會史論爭進行過深入專門的討論。針對論爭中社會經濟史言說的處理方式，基本上有兩種：首先，如陳芳明、吳叡人、陳翠蓮、方孝謙等人，基本上並未討論這些歷史論述中左、右兩派的經濟史概念與其認識是否正確的問題，而只關切這些歷史論述中有關民族主義與階級論述的內涵與其演變的問題。[21] 的確，因為政治與文化意識與經濟現象

---

19 此一大綱，原文參見台湾總督府警務局編、戴國煇解題，《台湾総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状況（中巻）台湾社会運動史》，頁 601-612。從目前的臺灣史研究成果來看，這個大綱雖然有現代性啟蒙的重要意涵，但其對於臺灣民族建構、民主政治與經濟發展的認識皆有頗多錯誤，本文以下將僅針對經濟發展的說法加以檢討。

20 嚴格來說，要理解臺灣社會史論爭的經濟史論述，必須將其與蘇聯主導的第三國際、日本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等政治活動，以及蘇聯內部的革命史觀論爭、日本資本主義論爭與中國社會史論戰等學術論辯放在一起討論，分析其在政治與學術組織、人員與思想流派間的詳細關聯，方能理解其共同關聯以及在個別社會的獨特面向。但本文主要關切的是這些經濟史論述被後來的社會主義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推翻的過程，而非這些社會史論爭在東亞各地流通的機制，因此這些議題此處不擬加以討論。有關中國社會史論爭與日本資本主義論爭的學術關聯，可參見緒形康，〈1930年代の封建遺制論争、資本主義論争におけるアジアの影〉，收於緒形康編，《アジア·ディアスポラと植民地近代：歷史·文学·思想を架橋する》（東京：勉誠出版，2013），頁 193-219。但他的這一思想史研究，仍因缺乏對於晚近經濟史研究的認識，而傾向認為勞農派的經濟史觀點是正確的。

21 這些論辯豐富了我們對於日治時期臺灣政治思想史的認識，但本文不是以此為主題，因此以下不細

僅有間接關聯，而且政治與文化意識涉及社會建構的成分，因此輕忽社會經濟史面向的詮釋分析並不一定會直接危及這些學者所處理的政治思想史之詮釋；然而，如同我們以下以陳芳明為例的分析，僅侷限於文本自身的「歷史敘事」，而忽略對於這些文本所欲表述的「歷史事實」之比對，在許多時候仍然會妨礙我們對這些政治思想運動提出完整的詮釋。[22]

其次，如陳映真、邱士杰等偏向左統的學者，他們不只處理政治思想的議題，並對以上學者的詮釋提出批判，更重要的是他們本身是堅持第三國際理念的馬克思主義者，因此社會經濟史本身就是其研究主題。陳映真等人不僅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的正確性，同時也認為 1920-1930 年代臺灣共產黨與左派人士的經濟史考察基本上是正確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不僅是歷史研究者，而且是臺灣社會少數仍然信奉第三國際馬克思主義的虔信者，相信第三國際時期在東亞發展出來的馬克思主義之社會革命理論，有在當代延續下來的應然價值與實踐可能性。雖然是以臺灣的社會經濟史為分析主題，但他們的分析除參照馬克思與列寧等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外，僅參考了矢內原忠雄、凃照彥（早期作品）與劉進慶的經濟史作品，幾乎完全忽略了 1990 年代以來，臺灣史學界豐富的清代與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研究的新成果。

首先，我們注意到無論中國或臺灣改造論的分析者，基本上都採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觀點，將中國與臺灣的傳統社會定位為所謂的封建社會。一、馬克思主義根據西方不同階段的主要生產關係，概念化出人類社會演化的五個階段，原始共產社會、古代奴隸社會、封建農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是一套具有普世性的社會演化法則，依據這套法則西方社會在十六世紀前後以英國社會為首，才開始從中世紀的封建社會慢慢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而東亞各國社會史論戰中多數的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東亞社會包括中國與臺灣都是從十九世紀中葉受到西方衝擊之後，才開始從封建社會艱難地

述這些研究辯論的具體內容與貢獻和問題。

22 必須澄清的是，筆者並不認為任何（包括目前最新）的社會經濟史研究，能夠掌握絕對的「歷史事實」，因此本文對於臺灣社會史論爭提出的新詮釋自然也稱不上是最終的歷史定論，而僅能是另一個「歷史敘事」。然而，如果我們承認人類的歷史是有所關聯（無論是社會間的橫向關聯，還是同一社會的貫時演變），而且所有的歷史都具有當代史的意涵（因此是從過去到現在以及從現在到過去的雙重考察），那我們在重新詮釋臺灣社會史論爭時，沒有理由不把當代的臺灣經濟史研究與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和思想的最新反省放入我們的討論中，以求得一種相對較佳的歷史詮釋。

走向資本主義化的道路。[23]

1920-1930 年代，西方的社會科學，尤其馬克思主義剛引入東亞社會時，中國與臺灣左、右派學者們由於黨派意識與親身觀察的不同，對於當時的社會經濟變遷如何定位有著顯著的對立，然而他們對於更早之前的傳統社會觀點則較為一致。左派與右派基本上都認為面對西方衝擊前的清代（中國與臺灣）社會是所謂封建停滯的農業社會。主要的生產關係就是地主與佃農之間的封建地主制關係，這種關係雖然與西方中世紀的領主與農奴關係有些微差異，但基本性質是相同的。地主與佃農之間的關係是一種超經濟的身分性人格支配關係，而非一種經濟性的純粹契約關係，被綁縛在這種關係下的農民缺乏身體的自由，且社會階層相當固定，難以流動。地主從佃農手中收取的地租並非資本主義下的投資利得，而是一種藉由專制權力支持、維護的封建地租。同時在這種社會的物質生活中，市場與商品經濟即使有，也不太重要，主要是一種自給自足的共同體經濟關係。

除了以上參與臺灣社會改造論爭的左、右派，實際上 1940 年代前期清代臺灣經濟史研究的開創者日籍學者東嘉生，也是採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和史觀來分析清代臺灣經濟史。[24] 比起前述臺灣左、右派知識分子來說，在臺北帝國大學從事研究的東嘉生有機會接觸到較多的史料，因此儘管他仍用封建經濟論來分析清代臺灣經濟，但已提出一些與前述知識分子不同的看法。他注意到清代的臺灣經濟雖然一開始也是建築在身分制的封建土地所有關係之上，而且以半鎖國的

---

23 1920 年代以來，封建概念在中國社會變成普遍化的泛化詞語，被用來形容各類保守、腐朽的社會關係，如封建婚姻、封建習俗、封建官僚。但若依照西方封建概念的原意來說，中國歷史上只有周代可稱作封建時期，春秋戰國以來封建體制逐漸瓦解，秦漢以來則確立為郡縣制的王權社會。此後到民國創建為止，雖有部分時期或地區有封建體制的局部存在，但社會基本結構一直都以郡縣制為主體。有關封建論概念在中國社會史中的錯誤套用，參見 Arif Dirlik（德里克）著、翁賀凱譯，《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第四章，頁 80-116；馮天瑜，〈「封建」概念辨析〉，《社會科學戰線》2006: 5，頁 251-255；馮天瑜、樊良樹，〈關於「封建」概念的對話〉，《社學科學論壇》2007: 4(上)，頁 133-136。
另一個普遍用來指涉傳統中國社會的馬克思主義概念，則是亞細亞生產方式，其內涵則與古代奴隸社會和封建農奴社會有密切關係。但這個概念因為被史達林定位為托洛斯基修正主義者的概念，基本上不為第三國際的多數東亞左派所採用。有關亞細亞生產方式概念在中國社會史的應用，參見 Arif Dirlik 著、翁賀凱譯，《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第六章，頁 156-193；魯凡之，《東方專制主義論：亞細亞生產模式研究》（臺北：南方叢書出版社，1987）。

24 研究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的矢內原忠雄，對於清代臺灣經濟史的認識，基本上與前一節臺灣左右派人士看法一樣，即臺灣的資本主義化始於十九世紀開港之時的外國商業資本，但真正的發展是起自日本殖民統治時。參見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頁 41-42。

自給自足經濟為特徵，但在地主（大租戶）與佃農（小租戶）這種身分制的土地所有關係下，佃農的農奴性格成分極少，在其成立的當時，即帶有近代的市民社會性質。這是因為農產品市場的擴大，小租戶經由農產品的交易提高經濟實力，並且逐漸擁有土地典賣的小地主權，導致了封建地租關係的崩潰，也就是大租戶的地位低落與小租戶的地位抬頭。

但東嘉生認為這不是由臺灣社會封建體制的內部生成的，就是說不是其內部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是十八世紀末外來的大陸商人勢力所造成的〔按：前面臺灣共產黨的政治大綱，則主張十九世紀中葉開港之後才轉變〕。這些外來商人瓦解了原來居於封建地主階層的大租戶之經濟基礎，並促成擁有土地實權的小租戶經濟實力的提升，許多小租戶則又進一步把多餘土地佃耕給現耕佃人，但這種佃作關係不是封建性關係，而是資本家的佃作制度。總之，東嘉生參考馬克思分析十六世紀以來英國封建社會瓦解所提出的論點，主張臺灣的封建地主（大租戶）是在十八世紀晚期市場經濟的衝擊下而逐漸轉型的。[25]

這種想法儘管已經比 1920-1930 年代的封建停滯論更接近歷史事實，但實際上仍是不當套用了「封建」概念於臺灣的經濟現象上。近二十年來清代臺灣土地開墾史，尤其熟番地權史的研究者，如施添福、John Shepherd（邵式柏）、柯志明與筆者的研究顯示，清代臺灣土地開墾過程一開始就不是一種身分制土地所有關係，無論是大租戶、小租戶以及現耕佃人之間的兩層土地租佃關係，從成立起始就是一種經濟性的契約關係。而且其實來臺擔任墾戶、召集佃人從事開墾的大租戶（地主），很多一開始就是存著投資的心態來的，即利用開墾取得的大租權益進行米穀出口或地權買賣而營利。這些研究同時也指出，原先在臺灣平原上的原住民（熟番）土地的確為漢人所開墾，但他們的地權並非完全被掠奪，而是以收取番租的方式保留一定土地權益，他們也並未被趕入高山，而是部分留住原居地、部分遷移到沿山地區，幫助政府防守生番界。[26]

---

25 東嘉生著、周憲文譯，《臺灣經濟史概說》（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0），頁 168-170、198-202。

26 施添福，《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1）; John R.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的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林文凱，〈清代臺灣熟番地權的創設與流失：以竹塹社為個案的歷史分析〉，收於詹素娟主編，《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施添福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頁 133-183。

進一步從農產品市場的發展來說，如同筆者清代臺灣米穀出口史的研究所示，臺灣的貿易早在荷蘭與明鄭時代就相當發達，清代統治後不久儘管國際貿易(與東南亞和日本)就中斷，但與此同時臺灣與大陸間的兩岸貿易很快就發展起來，並超越之前的貿易量。因為臺灣僅生產農產品（一開始主要是米穀與蔗糖），無手工業的發展，因此所有的地主與佃農原本就需要把大量的剩餘農產品外銷到對岸去，否則無法取得家庭維生所需的手工業產品。[27] 換言之，清初臺灣的市場經濟就已經是農業與商業資本主義，清代臺灣並未經過所謂的封建經濟到資本主義的轉型過程。

事實上，不僅清代臺灣經濟史的研究完全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封建停滯論觀點，中國學界以清代中國為整體範圍的清代經濟史研究，戰後以來也慢慢修正直至完全否定了封建停滯論的說法。封建停滯論的說法是在 1930 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期間，開始成為解釋清代經濟的主流典範。1937 年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呂振羽提出了資本主義萌芽論的修正說法，主張明清之際中國的封建經濟達到高峰並且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現象（但仍是封建生產關係為主的社會），而且若非外國帝國主義入侵導致中斷，中國自身也將慢慢發展至資本主義社會。這一說法原本只是少數觀點，但 1939 年經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作了經典性的表述，肯定這一理論。在戰後，資本主義萌芽論因此成為官定的清代經濟史觀。這一史觀基本上主宰了 1950-1980 年代中國境內的清代經濟史研究。[28]

1990 年代以後，封建論與相關的資本主義萌芽論等馬克思主義觀點，逐漸被中國經濟史家所拋棄。舊有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慢慢有被兩個國外引入的新典範取代的跡象：首先是 1980 年代黃宗智的過密化論（involution），這個理論否定中國學界 1930 年代占據主流的封建停滯論，也不同意其後的資本主義萌芽論。黃宗智強調清代中國並非封建式的自然經濟，而是已經有著商品（市場）經濟的發展，但他強調這與同時期西方的亞當斯密式的市場經濟並不相同，其未能發展為真正的資本主義，也非因為外國帝國主義入侵所中斷。而是因為明清的商品經

---

27 林文凱，〈再論清代臺灣開港以前的米穀輸出問題〉，收於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頁 99-133；林文凱，〈再論晚清臺灣開港後的米穀輸出問題〉，《新史學》22: 2（2011 年 6 月），頁 215-252。

28 仲偉民，〈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學術史回顧與反思〉，《學術界》2003: 4=101，頁 223-240；趙曉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學術研究與論爭》（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4）。

濟是一種人口壓力下驅動的經濟增長，人們的勞動生產率並未如同西方一樣的大量增長，因此中國的市場經濟無法如西方一樣導致資本主義的產生，人們的物質生活實際上並未提高，而是持續處於糊口的水平。[29]

但是近年來原本佔據主流的過密化論，遭到 Kenneth Pomeranz（彭慕蘭）提出的大分流論（Great Divergence）之批判。彭慕蘭主張中、英兩國在十六至十八世紀晚期為止的經濟型態都是所謂的亞當斯密式經濟，勞動生產率都有一定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都有提高，而且清代中國生活水平並不輸於英國。同時，中國的土地生產關係與土地、勞動和商品市場都是基於契約的自由市場，絕非封建這一概念所能詮釋，且其市場自由的程度未必輸於同時期的英國。他認為英國的經濟真正超越中國乃是在十八世紀晚期與十九世紀初率先發展出工業革命，也就是由商業資本主義步入工業資本主義的時候。而英國之所以能夠發展出工業革命，與其之前的市場經濟發展無關，而是因為美洲大陸的殖民以及英國煤礦特殊位置等偶然性的外在因素所致。[30]

接著，我們看看中國與臺灣改造論的討論中，有關開港以來到日治中期的中國與臺灣經濟史分析，到底是陳逢源等人的右派說法，還是左派的許乃昌與蔡孝乾的說法能夠得到近代經濟史研究成果的肯認？還是兩者的說法都有問題？這個部分我們從中國經濟史的討論著手，事實上，許乃昌與蔡孝乾的中國社會改造論點，基本上就是中國社會史論戰期間左派學者參照第三國際論綱所提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論」，該理論由毛澤東在 1930 年代後期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理論。[31]

---

29 黃宗智，《中國農村的過密化與現代化：規範認識危機及出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頁 131-169。

30 Kenneth Pomeranz（彭慕蘭）著、史建云譯，《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關於彭慕蘭對黃宗智的批判筆者基本上同意，但對於中、西經濟分流過程與機制的機遇論觀點有所疑慮，不過，此處重要的是，如其所說清代市場經濟的性質與同時期的西方有其類似性，絕非封建停滯論所可解釋。參見林文凱，〈清代中國與近代早期英國（16-18 世紀）經濟發展的比較：以土地所有權制為焦點的分析〉，發表於河南大學法學院主辦，「中英比較視野下的國家、法律與經濟社會變遷」國際研討會，2013 年 7 月 24-25 日。

31 當中國社會史論戰之時，其實有些隸屬托洛斯基派與新生命派的學者主張，當時的中國已是一資本主義社會，不過這個觀點遭到蘇聯史達林主導的第三國際與中共理論家等的反對，尤其在毛澤東掌權、定調為半殖民地半封建論之後，更是完全沒有發展的餘地。參見魯凡之，《東方專制主義論：亞細亞生產模式研究》，頁 69-150；緒形康，〈1930 年代の封建遺制論争、資本主義論争におけるアジア〉，頁 195-200、203-207。

這派理論主張強調1840-1940年代的中國，是在帝國主義入侵背景下（半殖民地）、封建勢力殘餘嚴重的社會（半封建）。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只有在沿海的通商口岸城市有所發展，而且也有本土的買辦與民族資本家出現，但這些資本家受到外國資本家的控制並成為其附庸；至於廣大的農村地區仍然處於封建停滯的狀態，封建地主持續透過高額地租等方式壓迫農民階級。且在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與交互作用下，中國經濟將持續「停滯於一定狀態之下」。最終，只有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才能完成反帝與反封建革命的勝利，完成中國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並快速轉換到社會主義的革命。[32]

這一個理論，主張1840年晚清開港以來的外國資本與帝國主義並未促進中國正面的經濟發展，而是造就中國經濟的嚴重災難與剝削（與前述的資本主義萌芽論說法相配合）；至於民初以來的軍閥與國民黨政府基本上都是帝國主義的附庸與工具，無力抵抗帝國主義的支配，而使中國社會淪落為半殖民地，另一方面不僅維護封建生產關係，同時也只保護如江浙財閥與孔宋家族等少數官商資本家的利益。然而這樣的理論，從現在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來看，比較像是1920-1930年代大量左派知識分子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下所發展出來的意識形態，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為了破壞國民黨統治正當性的刻意宣傳產物，並不是那麼合乎當時的歷史事實。

從現代歷史學的研究來說，相對於儒家王朝循環史觀，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是中國社會現代性史觀的開創理路之一，當然有其重要的學術意義。但好的歷史研究必須要有史料與史觀（概念與理論）的不斷對話、修正，而且史料與史觀都不能侷限於單一，必須多元而得以相互參照、辯駁。只有透過這樣的過程，從西方引入的學問才能完成本土化的繼受。然而，1920-30年代一方面還沒有蒐集足夠的史料，當然說不上史料與理論相互驗證的工作；另一方面，因為當時馬克思主義席捲東亞（甚至全球），擁有極大權威，以致很少學者懷疑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正確性，以及其是否能夠適用於中國社會。而且，當時也沒有太多機會認識到其他西方的社會理論思想。因此，無論是臺灣的中國改造論戰與中國的中國

---

32 有關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的內涵與發展過程，參見任俊偉，〈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的認識與思考〉，《理論學刊》2007: 6=160，頁84-87；李紅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的來龍去脈〉，收於李紅岩，《中國近代史學史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頁49-86。

社會史論戰，都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詮釋之間的相互辯論，真正當代意義下的歷史研究還相當少。[33] 共產新中國建立後，將近三十年間半殖民地半封建論成為中國共產黨指導理論，當時的學術環境並無超然於政治的獨立性，因此雖開始有一些紮實的史料收集與研究工作，但基本上這一理論並未受到挑戰。

然而，1980 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使得半殖民地半封建論的革命史觀之言說效力窘態畢現，不再有其說服力。儘管為了避免危及自身的統治正當性，官方並未正式修改這一史觀，但民間的經濟史觀實際上已經大大改變，尤其國外的中國經濟史研究者更是早已否定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史觀的解釋力。事實上除了史學史與學術思想史的研究者還會提到這些半殖民地半封建史觀的理論或研究之外，中國經濟史研究者除非研究回顧的需要，已很少人會提到這些理論觀點。他們發現開港以來的晚清，以及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時期的中國經濟，儘管有帝國主義剝削的一面，但也同時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逐步發展與正面效應。不僅少數的買辦與官僚資本家在帝國主義與國家的羽翼支持下發展起來，而且有許多的中小資本家也都慢慢發展起來。此外，無論晚清、北洋與國民政府都很難說僅是西方帝國主義與外國資本家的附庸與工具，相反的他們的確透過其財稅與經濟政策促進了民族工業與民族資本家的發展。同時，這樣的經濟演變雖然從沿海開港區域發展起來，但只要時間許可，也在慢慢擴及廣大腹地的社會經濟發展。[34]

事實上，從這些學者的研究看來，改革開放後鄧小平採取的中國經濟發展政策——「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某個程度上是重新走上了之前中國共產黨半殖民地半封建論所反對的國民黨經濟改造的路線，即利用外資、外國技術以及關稅

---

33 參與中國社會史論戰的重要國民黨左派學者陶希聖，1934 年在《食貨》半月刊創刊號的〈編輯的話〉裡就說：「有些史料，非預先有正確的理論和方法，不能認識，不能評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論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證實，不能精緻，甚至於不能產生。中國社會史的理論爭鬥，總算熱鬧過了。但是如果不經過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局部歷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進一步的理論爭鬥，斷斷是不能出現的。」參見陶希聖，〈編輯的話〉，《食貨》創刊號（1934 年 12 月），頁 29。

34 比較重要的作品舉例，如 Thomas G. Rawski,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Loren Brandt, *Commerc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al and Eastern China, 1870-1937*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村上衛，《海の近代中国：福建人の活動とイギリス・清朝》（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3）；顧琳（Linda Grove）著，王玉茹、張瑋、李進霞譯，《中國的經濟革命：二十世紀的鄉村工業》（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吳松弟主編，《中國百年經濟拼圖：港口城市及其腹地與中國現代化》（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奧村哲，《中国の資本主義と社会主義：近現代史像の再構成》（東京：桜井書店，2004）。

自主等經濟與財稅政策，促進本土經濟與資產階級的發展。因此，依據這些新的近代中國經濟史研究以及中國共產黨掌權後以至改革開放的實際歷史來看，臺灣與中國改造論爭中，右派陳逢源雖受到歷史唯物論的影響，仍採用了封建殘餘等說法，並忽略外國資本家對於中國經濟改造的許多正面影響，但他對於歷史的觀察以及預測其實是相對正確的，而非看起來較具批判性與道德制高點的許乃昌與蔡孝乾之半殖民地半封建史觀。

此處可以附帶提到的是，黃俊傑曾在其有關中國改造論爭的研究裡，主張：

> 如果我們將上述三位臺灣知識份子關於「中國改造論」的爭論意見，取而與二十世紀三〇年代中國大陸知識份子關於同樣問題的論點互作比較，我們就發現：臺灣知識份子思考中國之前途，基本上將中國當作某種「概念」，思考社會進化的各種階段在中國的適用性；但身處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思考中國前途時，則常將中國當作「實體」，因此，他們較能考慮中國發展的複雜性。[35]

然而，這一說法是很有問題的。大多數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參與者，尤其是代表第三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新思潮派者（即半殖民地半封建論）者，方是將中國當作某種「概念」來思考，而未進行有關中國社會經濟史的正式研究。他並沒有注意到，其實陳逢源的觀點，與當時開始從事實證性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生命派，如陶希聖等人的觀點接近，較為符合歷史事實，即都注意到中國已經有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主張是不適合中國的。

接著，我們參照臺灣經濟史研究的成果，來看前述臺灣社會改造論爭中何者的觀點比較符合新的研究觀點，還是左、右兩派的論點都有些分析不準確之處。但討論之前，我們應該將開港以來的經濟史分成兩期，一個是開港到殖民之前，另一個是殖民初期到中期論戰時期。首先，我們注意到矢內原忠雄與東嘉生這兩位馬克思主義臺灣經濟史學者，皆認為英國等外國商業資本家進入臺灣之後，基本上控制了臺灣的貿易，導致臺灣原有商業勢力（郊商）的瓦解。近年來，陳映

---

35 黃俊傑，〈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對中國前途的看法：以一九二〇年代「中國改造論」的辯論為中心〉，收於黃俊傑，《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頁113。

真仍相信這些左派經濟史家的錯誤說法，而認為：「鴉片戰爭後臺灣也被迫開港，強迫貿易，洋行取代了傳統行郊，外國銀行資本全面控制了臺灣的經濟商品作物的生產與貿易過程，買辦資產階級興起，但一般地人數少，力量弱，沒有集居新興工商城市的厚實的資產階級」。[36]

然而，實際上林滿紅、林玉茹與筆者的研究都顯示，開港後外國商業資本家初期因為掌控了國際商品的最終銷售渠道，而且透過西方銀行等金融資本的支持得以透過出口前貸金等方式控制出口品的買收，因此開港早期得以快速增加其在茶、糖、樟腦與煤等國際商品的貿易份額。然而，在這個過程中臺灣原有的郊商並未完全受到壓制而失去其勢力，他們透過傳統的家族與合股或其他金融工具也得以擁有一定的資本從事商品買賣，同時他們透過本地情況資訊認識的優勢，也能與外國資本家進行一定的商業競爭。結果開港後期，本土商業資本家不但在茶與糖的出口貿易份額上有所回升，而且整體的貿易數量也是增加的。更重要的，這些傳統的漢人郊商也透過與外國資本家的合作，學習到新的國際貿易知識與技巧，為其資本積累與產業擴展奠定更多的實力。[37]

接著，有關殖民初期到中期的殖民經濟史，實際上半殖民地半封建論的說法也已經被近來的臺灣經濟史研究成果所否定了。首先，矢內原忠雄在其 1929 年的作品裡，運用馬克思與列寧的經濟理論來分析臺灣的糖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他注意到在殖民政府的政策協助下，臺灣的蔗糖產業資本主義化演變有兩個層面的發展，一方面蔗糖生產的方式越來越資本主義化，原有傳統的舊式糖廍陸續為日本資本家的大規模新式製糖廠所取代。另一方面，也看到糖廠為了有效掌控蔗糖原料的生產成本，因此努力兼併土地，發展大規模的栽植農場，僱用農業勞工來

---

36 東嘉生著、周憲文譯，《臺灣經濟史概說》，頁 211-271；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35-38；陳映真，〈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批評陳芳明先生的〈臺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頁 145。但有意思的是陳逢源 1945 年為上述東嘉生一書寫的書評，已經注意到東嘉生誇大了外國資本家對於本土資本家與郊商勢力的驅逐（參見以下討論）。參見陳逢源，〈書評：東嘉生著「臺灣經濟史研究を讀む」〉，《民俗臺灣》5: 1=43（1945 年 1 月），頁 45-46。

37 林滿紅，〈清末大陸來臺郊商的興衰：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之一結合思考〉，《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4: 2（1994 年 7 月），頁 173-193；林玉茹，〈從屬與分立：十九世紀中葉臺灣港口城市的雙重貿易機制〉，《臺灣史研究》17: 2（2010 年 6 月），頁 1-37；林文凱，〈再論晚清臺灣開港後的米穀輸出問題〉，頁 215-252；李佩蓁，〈依附抑合作？：清末臺灣南部口岸買辦商人的雙重角色（1860-1895）〉，《臺灣史研究》20: 2（2013 年 6 月），頁 31-76。

耕作蔗田，藉以提高生產原料的自給率。換言之，矢內原認為原有的封建土地生產關係（地主與佃農）會日漸為農業資本家與農業勞工的資本僱傭關係所取代，而傳統的家戶式小農生產，則日漸被資本家的大規模栽植農場發展所取代。他並相信正在蔗糖業產生的這種壟斷資本主義化演變，也會在稻米生產這個產業上發生。

對於矢內原忠雄來說，雖然運用馬克思與列寧的理論，但他的觀點並非前述的殖民地半封建論那樣強調封建的土地生產關係將持續存在，而是比較像連溫卿的山川派那樣強調日治中期臺灣社會已經高度資本主義化，相信壟斷性的日本資本家將會促成臺灣社會各個產業部門的高度資本主義化，以及傳統封建生產方式的完全瓦解。[38] 然而，儘管矢內原忠雄一書關於製糖產業的壟斷資本主義化部分是正確的，但是他對於甘蔗種植與稻米種植等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終將瓦解的說法卻是錯誤的，因為實際上傳統的地主、佃農關係以及家戶式的小農生產方式一直都是頑固地存在著。

凃照彥在《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一書中，認為矢內原忠雄在分析臺灣的資本主義化時，忽略了臺灣本地社會的傳統經濟社會結構——以地主制為基礎的本地資本的存在。他強調：

> 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經濟結構，基本上是由一方面是受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所制約的、以日本資本家企業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化」，另一方面則是深受其影響，但又繼續留存下來的臺灣本地資本（地主制）為中心的傳統社會。因此，如欲描繪臺灣經濟的全貌，就必須是兩項兼顧，既不能僅從日本帝國主義統治而產生外在壓力的一面來看臺灣經濟，也還要從臺灣經濟內部來掌握殖民地化這樣一個內容必不可少的觀點。[39]

凃照彥的研究結論為：

> 臺灣經濟之被被殖民地化，是經過日本資本的侵入、統治與臺灣本地資本的抵抗、到弱體化為內容的對抗關係而實現。[40]

---

38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294-298、316-317。
39 凃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出版社，1992），頁 11。
40 凃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頁 11、13。

凃照彥的分析比起矢內原忠雄，更進一步的從兩個面向否定了許乃昌等人的經濟史觀點，一是儘管他不無矛盾地使用封建概念來形容本地地主與資產家，似乎認為地主與佃農之間的地租關係不是一種純粹契約關係，而是仍帶有封建性質的關係。但是他清楚地注意到臺灣從清代初期就已經與對岸之間有著發達的貿易關係，因此臺灣的商品經濟原來就已經很發達，並非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型態。二是，他強調臺灣的本地資本不但存在著，且非如過去所說的那樣完全受制於日本資本家，而是經歷了一種抵抗、從屬化到弱體化的演變關係。

儘管凃照彥強調了本地資本的對應與變化，但他的整個論述基調，仍然是強調日本壟斷資本的難以對抗，以及殖民統治使整個臺灣農村陷入貧困化狀態。然而，二十餘年後，另一位左派經濟史學者柯志明在《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41] 一書中，則對日本資本主義對於本地資本的宰制，以及對於農家經濟的剝削能力提出不同的看法。他把臺灣的經濟分成兩個階段，首先是 1920 年代以前糖業資本主義為主的時期，當時日本糖業資本家透過臺灣總督府（以下簡稱「總督府」）的政策協助（財稅、農業改良）一方面大力提升甘蔗製糖生產力，另一方面則透過甘蔗採集區等制度有效壓低甘蔗原料的收購成本，從而促成糖業資本家的巨額經營利潤，而在這個製糖產業蓬勃發展的時期，臺灣的農民並無法大量分享這些產業利潤。

其次，在 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晚期戰時計畫經濟時期為止，臺灣的新品種米，即蓬萊米開始大量輸出到日本，由於一般小米商無法過度壓低米收購價，而一般地主也無法過度提高佃租，因此隨著蓬萊米輸日的發展，臺灣農家（包括佃農）也都得以分享這些經濟收益，並且因此得以購買土地，提升自耕的比率。與此同時，由於蔗糖業在收購甘蔗原料時，為免收購價格過低導致蔗農轉作其他作物，因此單位面積水田收益的提高，也間接導致了蔗農收益的提高。這就是所謂的米糖相剋現象，導致臺灣的日本糖業資本家的剩餘價值積累之危機。日本糖業資本家雖然配合總督府經由各種政策試圖解決這一危機，但因為臺米輸出受到日本米出口商、本地地主資本與土礱間、日本工業資本家（希望藉以降低日本米價、以降低勞動成本）以及本地農民的支持，因此總督府直到 1930 年代晚期、戰時

[41] 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3）。

計畫經濟的時期，才得以採取政策壟斷臺米輸出的收益，以解決米糖相剋問題。

柯志明的研究顯示，即使同樣是左派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概念（但柯志明完全不使用「封建」這一概念），但實際用來分析日治時代臺灣經濟史的時候，其結果與許乃昌、臺共、矢內原忠雄以及凃照彥等人的分析都不相同。[42] 日治初到中期為止，日本製糖業與甘蔗生產力都有驚人的成長，但糖業資本家配合總督府的力量一直得以有效維持其剩餘價值積累體制，因此臺灣種甘蔗的農民無法一起分享取得的經濟收益，這一時期可以說是「低度發展的發展」，也就是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經濟從屬階段。但 1920 年代開始蓬萊米輸日以後，米糖相剋現象的出現，以及米作部門階級支配模式不像糖業部門那般嚴密的情況下，導致了日本資本積累體制的破綻，並使得臺灣本地地主與農民經歷了「平衡而均惠式的發展」，這可說是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階段。[43]

---

42 不過，柯志明的分析也不是完全沒有問題，他認為：「臺灣農業納入市場生產的過程當然不是始自殖民時代，早在十九世紀末期就已經明顯可見。但農業生產真正大規模有系統向商品的生產及交換轉變的過程則是在日治時代才發生。……商品生產對農民而言，已經不再是額外附帶的生產，農民事實上已無法在市場生產與自給自足式的維生生產兩者間自由進出。因為，農民甚至連自己生存所需也必須仰賴市場。因此，我們要繼續追問的問題毋寧是：『日治時代臺灣農村從傳統自給自足式的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農民的家户生產方式何以能繼續存在？殖民政府與外來資本對這個轉型過程以及家庭農場的存續又扮演了什麼角色？』」這種說法把臺灣農業商品化的時期訂得太晚了，其實清初開始，臺灣主要的米作與蔗作就是市場經濟的作物，農家必須在市場上銷售以便取得貨幣購買維生所需商品。事實上柯志明自己計算的統計表顯示，臺灣的稻米銷售率從日治初期就已經有百分之五十左右了。參見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頁 81，以及頁 60「表 1.9　米的銷售率，1905-193」。

43 此外，晚近臺灣社會經濟史的其他研究者如洪詩鴻、高淑媛、堀內義隆等人的研究，則顯示在日治時期臺灣本地的中小商業與工業資本家其實並未在經濟演變中缺席，而是經歷了同樣的成長與發展。參見洪詩鴻，〈台湾資本主義の発展と商人資本：日本植民地期を中心として〉，《經濟論叢》154: 3（1994 年 9 月），頁 42-62；洪詩鴻，〈日本植民地期の台湾人産業資本に関する一考察：中小零細資本の成長を中心に〉，《經濟論叢》155: 2（1995 年 2 月），頁 59-79；高淑媛，《經濟政策與產業發展：以日治時期臺灣鳳梨罐頭業為例》（臺北：稻鄉出版社，2007）；堀内義隆，〈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の米穀産業と工業化：籾摺·精米業の発展を中心に〉，《社会経済史学》67: 1（2001 年 5 月），頁 23-46；堀内義隆，〈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中小零細工業の発展〉，《調查と研究》30（2005 年 4 月），頁 23-44；堀内義隆，〈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台湾人小経営：工業化の周辺〉，《地域総合研究》33: 1（2005 年 9 月），頁 83-96；堀内義隆，〈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民族工業の形成：製帽業を事例として〉，《日本史研究》556（2008 年 12 月），頁 26-53；堀内義隆，〈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機械市場の形成と機械工業の発展〉，《現代台湾研究》35（2009 年 3 月），頁 36-56；堀内義隆，〈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農村工業の発達と労働供給〉，《三重大学法経論叢》27: 2（2010 年 3 月），頁 45-62。

總之，左、右派學者引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於臺灣的社會經濟史認識，的確提供了概念與分析架構上的重要啟發與認識。然而，如果我們逕自相信這些理論觀點，而沒有將這些理論概念放在實際的歷史脈絡下加以檢驗、修正的話，我們將犯了把歷史想像當作歷史現實的謬誤，也無法提出適切的社會改革方案。

四、戰後以來西方與日本社會主義實踐與思想史的轉變

二次大戰結束、冷戰結構形成以來，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與思想史都慢慢有了極大的轉變。在共產陣營方面，蘇聯與其所屬的東歐陣營推動激烈的共產革命，但在 1950 年代的匈牙利革命與 1960 年代的布拉格之春等事件後，蘇聯共產黨與其社會主義實踐的專制性與反民主，不僅導致社會主義在共產陣營內號召力的降低，更使得其在西方民主世界的號召力大為降低；1980 年代晚期蘇聯與東歐的民主化與資本主義化，則導致社會主義實踐與思想的最大挫敗。而在中共部分，1949 年內戰中擊敗國民黨取得政權以後，毛澤東掌權下的中共持續推動新民主主義革命，並在數年後推動社會主義革命，更於 1960 年代發動文化大革命，引起世界上左派社會革命者的熱情與讚頌；1970 年代晚期鄧小平重新掌權以後，中共開始推動改革開放政策，與此同時文化大革命真相陸續為世界所知，這導致中國共產黨與其社會主義實踐的號召力消失。

而在西方與日本的民主國家陣營，1919 年第三國際成立後，走社會改良路線而遭排擠的社會民主主義重新振作，摒棄軍國主義、極權主義與暴力革命，主張透過普選的民主程序推動漸進式的社會改革。這派社會主義雖然肯定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想，但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專政），主張透過合法程序與民主政治以推動社會主義理想。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戰後發展，這派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陸續取得政權，並推動了社會福利體制，在保持資本主義經濟生產體制的同時，透過各種福利體制重新分配經濟剩餘，以提供勞工、殘障、老年與其他社會弱勢者足夠的福利保障，藉以打造相對公平、正義與平等的社會。隨著中國與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西方社會民主政黨認為社會主義的經濟生產體制只能導致經濟災難，因此放棄廢除資本主義生產的過時理想，改以社會福利體

制的建立來達成社會主義的分配正義理想。[44] 但1980年代以來社會福利體制造成的國家財政負擔過高，以及資本主義經營效率的下降，造就了新自由主義（主張進一步的經濟自由化，以及社會福利的市場化與削減）主張的出現，正對以社會福利主義為主軸的既有社會民主主義運作帶來威脅。不過，並沒有哪個社會主義政黨認為可能走回頭路、以傳統第三國際的方式，來應對這一新的社會主義危機。[45]

伴隨社會主義政治運動的轉變，世界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想也面臨全面變革，尤其1960年代晚期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或者說新馬克思主義）興起。西方馬克思主義嚴厲批判了第三國際時期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與階級鬥爭詮釋：首先，有關下層結構（經濟，也就是階級關係）與上層結構（政治、宗教與文化等）的關係：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依照馬克思的名言：「是社會存在決定意識，而非意識決定社會存在」，主張經濟結構決定了政治、宗教與文化的結構。然而，戰後的馬克思主義者依照馬克思的早期作品，或參考了其他西方社會理論家如韋伯（M. Weber）等人的觀點，強調下層結構和上層結構乃是「交互影響」，而且上層結構有其「相對自主性」。

其次，國家與階級關係之間的關聯：第三國際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國家是階級關係的反映，基本上只是該社會統治階級的階級壓迫工具。而且依據這個理論，當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後，所成立的人民專政國家，代表的則是所有無產階級。因此無論資本主義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國家機關本身都無其自主性。然而，戰後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發現馬克思這一觀點是錯誤的，一方面，不僅戰前戰後的資本主義政府都顯示其相對於資產階級（統治階級）之相對自主性，因而可能

44 有關社會主義運動在二戰之前的歷史，參見G. D. H. Cole,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Carl Landauer, *European Socialism: A History of Ideas and Movements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Hitler's Seizure of Power*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76); Geoff Eley, *Forging Democracy: The History of the Left in Europe, 1850-2000*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二戰以來的社會主義運動史，參見Donald Sassoo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The West Europe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I. B. Tauris, 2010); Archie Brown,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New York: Ecco, 2009)；和田春樹，《歴史としての社会主義》（東京：岩波書店，1992）。有關日本的社會主義政黨的歷史，參見岡田一郎，《日本社会党：その組織と衰亡の歴史》（東京：新時代社，2005）。

45 有關社會福利主義與其面臨的危機，參見Gøsta Esping-Andersen,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Gøsta Esping-Andersen, ed., *Welfare States in Transition: National Adaptations in Global Economies*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96)。

為了社會的整體運作而加以壓制資產階級的利益；另一方面，蘇聯與中國等共產國家在成立以後，政府官僚本身也顯現出其自主性，為了自身權力的維持而行使其權力，而非如馬克思原先期待的全心為無產階級謀求福利之無產階級專政工具。

其三，馬克思曾預測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生產關係將會兩極分化成資本家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個類屬，而無產階級將會從自存（in itself）的階級，透過階級意識的建構而變成自為（for itself）的階級，並因而集結起來，在無產階級政黨的引導下發動社會革命以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然而兩個世紀以來的歷史實驗顯示，這套歷史唯物論的分析與預測無論在已開發和未開發國家都不成立。在西方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社會分化的情況不是兩極分化，而是由無數的中間階級發展出來，而且各種的勞動階級也並未建立集體的無產意識連帶，因此社會革命並未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歐美與日本等國家發生。且在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引導下，他們接受了資本主義的存在而追求社會福利體制的修正。另一方面，未開發或開發中的第三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相當有限，卻反而以違背馬克思主義預測的方式發生了社會主義革命，以至於其發生本身不代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正確，反而是矛盾的展現。而第三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也證明了馬克思主義實踐的失敗。[46]

必須強調的是，第三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失敗，並非代表社會主義政治理想的全盤失效，事實上歐美社會民主主義的成功，代表了提供烏托邦想像的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弊端的有效修正，並顯現了目前所能想像的社會主義實踐的最佳樣態，儘管近年來它也面對新自由主義等右派全球化的挑戰危機。[47]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與相關預測的嚴重錯誤，並非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經失去其在社會科學上的解釋力，事實上馬克思主義不但在戰後到 1960 年代期間成為最重要的社會科學理論，並且在其後仍持續刺激了種種後殖民主義

---

46 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於第三國際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相關批判，參見以下西方左派學者的解析，C. Wright Mills 著、商務印書館譯，《馬克思主義者》（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第六章，頁 108-137；Perry Anderson（安德森）著，高銛、文貫中、魏章玲譯，《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Perry Anderson 著、余文烈譯，《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北京：東方出版社，1989）；Perry Anderson、Patrick Camiller 主編，張亮、吳勇立譯，《西方左派圖繪》（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Leszek Kołakowski (Author), P. S. Falla (Trans.),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The Founders, the Golden Age, the Breakdow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5)。

47 近年來，西方社會民主主義面對的挑戰與可能回應，參見 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著、鄭戈譯、黃平校，《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與後現代主義等派生社會理論的出現。儘管馬克思主義在許多議題與領域都被其它社會理論所挑戰或取代，但譬如階級支配分析等概念在政治經濟學等廣泛分析議題上，或文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文化社會學議題的研究上，都仍然是許多重要解釋框架的必要成分。[48]

那麼以上這些社會主義運動與思想的發展，對於我們討論 1920-1930 年代的中國與臺灣社會改造論爭有何意義呢？左派學者陳芳明在其研究結論裡，曾經提到：「這場論戰並未得到具體的答案，因為歷史沒有提供餘裕空間讓左右兩派運動者得到充分的發展。史實已經顯示，左翼路線在一九三一年就遭到中止，右翼路線則延續到一九三六年因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的解散而停頓下來。階級運動者憧憬的臺灣革命，終於沒有發生，民族運動者期盼的臺灣議會，最後也未實現。」[49] 另兩位仍堅持第三國際左派革命目標的學者陳映真與邱士杰，則沒有注意到許乃昌等人依照第三國際革命史觀在歷史分析以及實踐目標上的問題性。[50] 而是持續肯定半殖民地半封建論的歷史解釋正確性，同時似乎遺憾許乃昌等人期待的臺灣階級革命之未能（與中國共產革命一起）完成。[51]

以上幾位研究者在分析這場論爭的左、右派人士的思想時，似乎也把自己固著在 1920-1930 年代的時空中，而忘記馬克思等社會主義者「科學社會主義」所要求的，依照「後見之明」來理解歷史事件的意義，以便提出更為適切的社會實踐目標與策略。[52] 事實上，雖然殖民政府的鎮壓，使得臺灣左派與右派運動者的

---

48 Andrew Gamble, David Marsh, and Tony Tant, eds.,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1999); Crystal Bartolovich and Neil Lazarus, eds., *Marxism, Modernity,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49 陳芳明，〈「中國改造論」：論戰與 20 年代臺灣左翼思想的傳播〉，頁 200-201。

50 不過，這其中連溫卿與許乃昌等並不相同，他不採臺共的第三國際暴力革命路線，也非採（半）殖民地半封建論的理論觀點，而是比較傾向於戰前日本山川均—勞農派的合法左派無產階級政黨的路線。但這時山川勞農派的合法改良主義與二十世紀後期的西歐社會民主主義立場並不相同，前者仍持有以平和革命廢除資本主義的最終目標。但承繼戰前山川勞農派的日本社會黨，在 1986 年發布「日本社會黨的新宣言」，放棄廢除資本主義的政治目標，即全面現代社會民主主義化。

51 陳映真，〈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批評陳芳明先生的〈臺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頁 138-160；邱士杰，〈從〈黎明期的臺灣〉走向「中國改造論」：由許乃昌的思想經歷看兩岸變革運動與論爭（1923-1927）〉，頁 69-140。1980 年代中國共產黨推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在官方正統說法上持續堅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左派史觀，但實質上走的是其以前否定的國民黨的實踐路線。因此令人疑惑的是，陳映真等左統學者似乎對此轉變視而不見，不知為何還能堅持中共的革命史觀，並認為其半殖民地半封建論的革命史觀是正確的。

52 十九世紀晚期馬克思在批判之前的社會主義思想時，稱他們是空想社會主義（utopian socialism），而

理念都沒有實踐的機會，但戰後第三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與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的成功經驗就像是這些相關理念的替代性實驗，提醒我們論爭當中陳逢源等右派的經驗分析是比較合於歷史發展，其實踐目標比較接近西方社會民主主義，是較有實踐成功可能的。實際上，戰後臺灣歷史發展的成功路徑，走的其實也是這樣的道路——前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後期透過民主化過程模仿西方社會民主主義建立社會福利體制。[53]

儘管如此，許乃昌與臺共等的左派主張並非因此完全失去其歷史價值，這些激進的主張儘管錯誤分析了歷史的進程，或提出了既有人性基礎下缺乏實踐可能的社會主義理想，如果成功了也可能是帶來經濟與政治災難；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時空裡，這些主張的確提供臺灣民眾現代性認識的重要來源，對於臺灣社會的整體知識啟蒙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在殖民政治與文化壓制下，這些左派理念對於臺灣人的反殖民與民主意識的啟蒙，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我們也可以想像在一個社會中如果只有右派政黨與思想的存在，而沒有左派政黨與意識的存在和挑戰，那麼資本主義的改良與追求分配政治的社會福利體制也不太有實現的可能。

然而另一方面，如同上一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的諸多概念框架對於中國與臺灣近代歷史研究雖然提供了重要了啟發，但應用其進行經驗性的歷史研究時，一不小心就容易陷入勉強套用的陷阱中。很多學者一開始就認為馬克思（列寧）理論不可能會錯，認為取自西方社會史的分析架構——五個社會歷史階段論，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發展路徑，或者無產階級革命不但具有歷史必然性，而且帶著道德正當性。又或當推動蘇聯共產革命成功的第三國際，其為東亞共產革命所設定的革命綱領也必然具有經驗認識與社會實踐的權威性。無論從學術相對於政治與道德主張的自主性，以及學術研究的本土化，或是東亞社會的後殖民主體史觀來說，這種對待馬克思主義或第三國際的態度實際上很有問題，該種態度實際上造成了馬克思主義本身的意識形態化效果，而破壞了其原先具有的啟蒙效果。

把自己經由科學性的社會歷史研究所確立的社會主義，稱為科學社會主義。

53 林萬億，《臺灣的社會福利：歷史與制度的分析》(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第 2 版)。

西元 2000 年，臺灣著名作家與文學史家陳映真與文學史家陳芳明之間發生激烈的文學史觀論爭。先是陳芳明在建構臺灣新文學史時，主張：「不能只是停留在文學作品的美學分析，而應該注意到作家、作品在每個歷史階段與其所處時代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他依照政治為中心的演變，將日治以來的臺灣史分成三個時期：殖民時期（1895-1945）、再殖民時期（1945-1987）與後殖民時期（1987 迄今），依其定位，殖民之前的清代則是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傳統封建時期。[54] 陳映真則基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嚴厲批判陳芳明的社會歷史分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性質論，他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經濟史觀，將臺灣的社會性質分成以下幾個階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晚清開港以來）、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日治時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戰後前五年至土地改革為止）、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或後來的新殖民地-波拿巴國家-脆弱資產階級）（1950-1980 年代中期）、新殖民地-壟斷資本主義社會（1980 年代中期-2000 年）。[55]

兩人史觀的差異不僅在於陳芳明著眼政治支配面，而陳映真則服膺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還與兩人的民族主義立場（陳芳明左獨、陳映真左統）之差異有關，這個部分因與本文主軸無關，我們不在此討論；同時，本文也不討論戰後以來臺灣歷史分期的問題。[56] 這裡我們關切的是，兩人有關清代與日治時期的社會經濟史認識是否適切的問題。嚴格來說，兩人都是使用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史觀來看待清代與日治時期的臺灣社會史，譬如兩人都基本承認清代臺灣是封建社會，以及日治時代是殖民與半封建的社會狀態。但是兩人觀點的差異在於陳芳明在強調殖民統治者對殖民地的政治、經濟壓迫時，願意承認殖民統治所帶來的「資本

---

54 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上冊，頁 23-42。

55 關於晚清的臺灣史，陳映真參考了左派經濟史學者戴國煇的看法；至於戰後以來的臺灣歷史演變，陳映真主要參考了以左派依賴理論為典範的劉進慶之看法。參見陳映真，〈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批評陳芳明先生的〈臺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頁 138-160；邱士杰，〈從中國革命風暴而來：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與他的馬克思主義觀〉，頁 241-299；劉進慶，《戦後台湾経済分析：一九四五年から一九六五年まで》（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5）；戴國煇，〈研究臺灣史的經驗談(1)-(5)、(完)〉，「夏潮聯合會」，下載日期：2014 年 6 月 23 日，網址：http://chinatide.net/xiachao/content_95.htm。

56 嚴格來說，現在臺灣社會經濟史學界很少有人採用劉進慶、陳映真等人這種純粹左派依賴理論的觀點來定位臺灣戰後經濟史。這些看法不願意面對臺灣戰後經濟快速發展的正面事實，而僅關切百年來在經濟演變過程中「殖民地性格與半封建性格」持續不變的負面表徵。比較值得重視的是另一位原也受依賴理論深刻影響的臺灣經濟史家涂照彥，他在 1980 年代以來修正過去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改採取國際經濟理論觀點，考察包括臺灣在內的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三角成長」模式。

主義與現代化」；同時他的文學史觀不再是僅重視階級主體的馬克思主義史觀，而是重視多元主體的後殖民史觀。而陳映真則堅持否定日本殖民統治期間曾為臺灣帶來「資本主義化與現代化」。

在批評陳芳明的社會經濟史觀之前，我們必須肯定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歷史研究與社會科學理論之關係其實已有許多反省，因此他對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作出的許多反批判也是中肯的。陳芳明正確指出：一、陳映真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唯一的科學知識，然後以這樣的知識作為面具來巧妙掩飾他的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二、他並未針對臺灣文學史料做過充分研究，因此相關討論流於印象式與跳躍式。三、陳映真在討論到臺灣歷史時就強調存在（經濟）決定意識的唯物論，而在討論到中國與臺灣的關係時，則無意中變成以意識決定存在的唯心論。四、他也忽略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已經否定了傳統馬克思主義認為的經濟與文化的單面向關係，並強調文化的複雜性和相對自主性。[57]

但就社會經濟史的層面來說，根據上一節有關臺灣經濟史的分析，陳映真與陳芳明兩人同時使用的封建社會論、殖民地半封建論等馬克思主義經濟史概念，就現在的歷史認識來說已經有修正的必要。陳芳明的臺灣文學史研究堅持反殖民的後殖民立場，但同時避免僵化、教條式的後殖民立場，強調「臺灣經驗在全球的殖民史中所具備的特殊性與差異性，絕對不能以第三世界的普遍經驗來概況」。[58] 可惜他並未將這種堅持本土歷史主體性的後殖民史觀，應用於作為文學史與文化史研究基礎的社會經濟史之重新認識上，他對於臺灣經濟史的認識，一直停留在 1980 年代以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點，而未反省到這種經濟史觀在解釋臺灣經濟史時有著「去臺灣主體性」問題。因此陳芳明儘管肯定殖民統治帶來的「資本主義與現代化」，但他基本上認為這是殖民者帶來的，而非被殖民者自身的參與、抵抗與協同等多重複雜回應的結果，這與他在討論臺灣文學時的多重主體回應觀點，形成強烈的對比。

陳芳明在討論臺灣文學史時，曾引用臺灣文學研究者張誦聖《現代主義與本土抵抗》一書的觀點，來批判陳映真對於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錯誤批判。陳芳明認為：

---

57 陳芳明，〈馬克思主義有那麼嚴重嗎?：回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收於陳芳明，《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第二版），頁 243-260。

58 陳芳明，〈自序：我的後殖民立場〉，收於陳芳明，《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頁 9-20。

> 從歷史事實觀察，現代主義之介紹到臺灣，乃是島上殖民者與西方殖民者相互勾結之後的結果。因此，主張現代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是帝國主義文化的延伸，其實是無需爭辯的。然而，要建構文學史，並不能讓歷史停格於臺灣受到文化侵略的階段。臺灣作家在最初接受現代主義的影響之後，便開始對現代主義進行改造與擴充，使其本土化、在地化。[59]

其實同樣的看法，也可以用來觀察殖民者把工業資本主義引入臺灣以後，臺灣的經濟主體（本土資本階級、農民與勞動者等）的回應方式。過去馬克思主義者為了訴諸革命主張的正確性，把臺灣的經濟主體看作傳統的封建主體，認為他們缺乏資本與能力抵抗西方與日本資本主義的新體制，只能淪為這個體制中被動的受剝削者。卻忽略了這些經濟主體絕不封建，他們其實早已熟悉商業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更有不少人擁有雄厚的資本與學習能力，參與新體制的運作。因此儘管不少人在這個新體制下承受嚴重的剝削，但他們事實上也可能如上述的文學作家一樣，發揮自己的主體性，透過抵抗、順應、協同與改造等多重方式，推動資本主義在臺灣的本土化與在地化。因此工業資本主義的確是有外來引入的部分，但其帶來的影響，則必須根據本地既有條件以及其回應過程才能確定，而這必須從經驗研究中才能確認，無法單憑某一理論觀點就預先決定。

陳芳明曾批評陳映真將馬克思過度神聖化，沒有注意到馬克思對於印度殖民歷史的解釋有著為西方殖民主義辯護的意涵，含有濃厚的「東方主義色彩」，馬克思主義因此某個程度上是「殖民主義的變相延伸」。[60] 可惜的是，陳芳明沒有注意到馬克思主義的封建社會論與半殖民地半封建論並不能充分解釋中國與臺灣的社會經濟史（因此也不能如他認為的有效支撐其臺灣文學史的許多解釋觀點）。到目前為此，陳芳明基本上還是贊同馬克思的想法，認為直到晚清的中國與臺灣都是封建生產關係為主的社會；而且西方是從四百年前就已經成為全球霸權，開始其殖民的事業。臺灣的現代性是在日治初期展開的，是一種壓縮的現代

---

59 陳芳明，〈當臺灣文學戴上馬克思面具：再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收於陳芳明，《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頁 280-281。

60 陳芳明，〈有這種統派，誰還需要馬克思？：三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收於陳芳明，《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頁 288-296。

性，即西方發展四百年的現代性在二十年內移植到臺灣。[61] 這些看法與當代的世界史和東亞經濟史看法有著很大的差距，也忽略了臺灣得以快速現代化的本土歷史基礎（參見上一節的相關討論）。

總之，日治中期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運動與思想引入臺灣社會，本身就是臺灣社會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下，追求對於自身現代性認識的一種啟蒙事業。但評估其在當代社會的歷史意義時，研究者不能僅將自身固著於那個特定的歷史時空，而必須注意到社會主義運動與思想在戰後的東亞、以至於西方世界的演變，否則我們無法充分認識臺灣社會是怎麼從過去走到那個時間點，又如何從那個時間點走到當代社會的。

五、結論

西方社會科學在討論西方從傳統到現代的變遷時，往往著眼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民主政治的建立與民族主義意識建構這三個重要面向。臺灣在 1920-1930 年代社會史論爭期間的種種歷史言說，如上所述實際上就是圍繞在以上三個重要面向的不同思想考察，以及為達成這些重要發展所提出的不同實踐策略。當時臺灣的左、右派知識分子，透過其言說訴說著他們各自對於資本主義經濟、民主政治以及民族主義意識的看法與認識。同時，這些考察不但提供當時的閱聽大眾，政治、經濟、文化等新的社會科學概念，同時啟蒙其認識到政治、經濟與文化等社會現象相互之間的緊密關聯。就此說來，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歷史言說儘管粗糙，卻是臺灣社會追求自我認識的第一波現代性啟蒙，同時也是近代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人類學、歷史學以及文學（史）的第一波知識移植工程。可見這一個社會史論爭在臺灣史上的重要性。

過去針對這一論爭的既有研究，著重於臺灣政治思想史與文學史面向的討論，對於其如何影響臺灣的政治思想，尤其是政治與文化民族主義層面的討論尤為詳細，同時對於這一論戰與臺灣左派思想的傳播或相關文化思想的影響，也有很豐富的討論。然而，本文也注意到既有研究卻常忽略了與該論爭密切相關的社

---

[61] 陳芳明，〈有這種統派，誰還需要馬克思？：三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頁 296-303。

會經濟史議題，同時也沒有關注二次大戰以來國際社會有關社會主義的思想與運動的轉變。本文的研究一方面嘗試把經濟史的討論納入討論中，希望提醒臺灣政治思想史與文學史研究者注意到近年來臺灣社會經濟史研究與相關議題的關聯；另一方面，也希望把臺灣的這波左、右派論爭納入更廣泛的世界社會主義思想與運動的演變中加以考察。

事實上筆者以為歷史研究難以避免具有當代史的意義。因為進行寫作言說的我們本身是當代的人，不僅無法完全迴避當代的價值觀，且必然依據這些價值觀而決定那些問題值得研究，並探究其意義；同時，歷史寫作的基本意義也是為了透過說明那一段歷史，而直接或間接有助於我們理解當前的社會。另一方面，歷史也很難避免或者不應避免後見之明，因為不論歷史是延續或者斷裂，它總是發生在當代之前的現象，與當代事物之間總有某些關係存在，所以我們有必要把後來歷史演變的知識納入對於過去歷史的詮釋之中。[62]

雖然歷史有時對想要探討過去的人來說顯得殘酷，因為真相可能消融在遍尋不著的時空隙縫裡，已經追索不到是怎麼發生與流變的了。然而，歷史也可能對當時的人展現其冷酷，因為當事人當時可能只看得清周圍的事情（沒有精確統計數字），也可能只能掌握有限的工具（馬克思主義概念），眼光因而受到遮蔽而看不到真相。或有時事件還在發展過程中，必須等到一段時間之後，事情才有比較清晰的圖像。以本文研究的臺灣社會史論爭來說，無論就史料還有觀察工具，1990 年代以來的臺灣史學界總算有了比較完備的機會去評估那一個歷史事件，因此我們發現封建論與半殖民地半封建論這些概念框架，其實並不合於歷史的真實，而是我們的前輩們在那個時空中受限於史料與認識工具所能得出的不真實想像。

進一步來說，歷史之流並未被截斷在日本殖民統治中期的那個短暫時空，社會主義運動、社會主義思想仍然持續流淌過冷戰時期以至於現代，這些運動與思想也在不同的地理空間被以不同方式實驗著，有的失敗了，有的改良則成功了，儘管可能也面臨著危機。因此，當代的我們思考這一社會史論爭的意義時，有必要參照戰後以來的社會主義運動與思想流變來重新考察其意義，看看歷史的後見

[62] 有關歷史研究與個人當代價值觀的關聯，參見 Max Weber 著、李秋零譯，《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第一篇，〈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頁 1-42；第三篇，〈社會學和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頁 92-124。

之明所能帶給我們的不同評價與認識。就此來說，也許有些人仍然不願承認第三國際暴力革命實驗之失敗，以及社會民主改良主義之相對成功，而從信念倫理的角度堅持更具理想性的第三國際之革命綱領與史觀是正確的。

但對筆者來說，目睹這麼多東亞社會主義革命的真實結果，我們應該承認擁有類似史觀與實踐綱領的臺灣共產黨當時若革命成功，不但無法帶來經濟上的成功，也不能帶來民主的政治文化，反而可能帶來社會的整體倒退。因此透過「反事實的歷史實驗」方式來評斷臺灣社會史論爭時，[63] 我們將會注意到當時較具有理想性的左派想法，不但未能有效描繪出日治時期臺灣的資本主義演變，而且其所提出的社會革命策略也缺乏成功的社會條件。與此相較，右派如陳逢源等人提出的經濟史考察其實較接近真實，同時其社會實踐主張：「追求資本主義的成功，然後再進行社會問題的改良」，或許帶有維護自身階級利益的現實考量，因而不那麼具有理想主義，但卻是比較具有實踐成功可能性的。

[63] 反事實的歷史實驗是韋伯所提出的歷史學研究方法，他強調歷史儘管無法實驗，也無法進行計量統計，但我們透過比較某些相近事件的反事實結果之比較，從而對另一事件的歷史意義作出客觀且合理的詮釋。韋伯舉的例子是，如果我們想要研究西元前 490 年希臘、波斯之間的馬拉松戰役希臘戰勝之意義，可以用其他同時期波斯人在耶路撒冷、埃及與小亞細亞等地戰勝的結果來對照比較，透過這種反事實的比較，將可發現希臘在這場戰爭的勝利對於希臘與西方文明的後來發展，帶有相當重大的意義。參見 Max Weber 著、李秋零譯，《社會科學方法論》，第二篇，〈文化科學邏輯領域的批判研究〉，頁 43-91。

引用書目

《臺灣民報》

〈Cold War〉，「Wikipedia」，下載日期：2013 年 9 月 15 日，網址：http://en.wikipedia.org/wiki/Cold_War。

戴國煇，〈研究臺灣史的經驗談(1)-(5)、(完)〉，「夏潮聯合會」，下載日期：2014 年 6 月 23 日，網址：http://chinatide.net/xiachao/content_95.htm。

Anderson, Perry 安德森（著）、余文烈（譯）

1989 《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北京：東方出版社。

Anderson, Perry 安德森（著），高銛、文貫中、魏章玲（譯）

1990 《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Anderson, Perry、Patrick Camiller（主編），張亮、吳勇立（譯）

2002 《西方左派圖繪》。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Dirlik, Arif 德里克（著）、翁賀凱（譯）

2005 《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Giddens, Anthony 紀登斯（著）、鄭戈（譯）、黃平（校）

2000 《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Mills, C. Wright（著）、商務印書館（譯）

1965 《馬克思主義者》。北京：商務印書館。

Pomeranz, Kenneth 彭慕蘭（著）、史建云（譯）

2003 《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Weber, Max（著）、李秋零（譯）

1999 《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小林文男

1970 〈日本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ルな思考：「中国改造論争」の意味と周辺（1）〉，《アジア経済》11(9): 40-51。

1971 〈日本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ルな思考：「中国改造論争」の意味と周辺（2）〉，《アジア経済》12(2): 14-30。

方孝謙

2000 〈一九二〇年代殖民地臺灣的民族認同政治〉，《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0: 1-46。

台湾総督府警務局（編）、戴國煇（解題）

1986 《台湾総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状況（中巻）台湾社会運動史》。東京：緑蔭書房。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

1999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仲偉民

2003 〈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學術史回顧與反思〉，《學術界》2003(4)=101: 223-240。

任俊偉

2007　〈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的認識與思考〉，《理論學刊》2007(6)=160: 84-87。

吳松弟（主編）

2006　《中國百年經濟拼圖：港口城市及其腹地與中國現代化》。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

吳叡人

2001　〈「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反殖民鬥爭與臺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1919-1931〉，收於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頁 43-110。臺北：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

2006　〈福爾摩沙意識型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1919-1937）〉，《新史學》17(2): 127-218。

2008　〈誰是「臺灣民族」？：連溫卿與臺共的臺灣解放論與臺灣民族形成論之比較〉，收於陳慈玉主編，《地方菁英與臺灣農民運動》，頁 199-229。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李佩蓁

2013　〈依附抑合作？：清末臺灣南部口岸買辦商人的雙重角色（1860-1895）〉，《臺灣史研究》20(2): 31-76。

李紅岩

2011　〈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的來龍去脈〉，收於李紅岩，《中國近代史學史論》，頁 49-8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村上衛

2013　《海の近代中国：福建人の活動とイギリス・清朝》。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和田春樹

1992　《歴史としての社会主義》。東京：岩波書店。

岡田一郎

2005　《日本社会党：その組織と衰亡の歴史》。東京：新時代社。

東嘉生（著）、周憲文（譯）

2000　《臺灣經濟史概說》。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林文凱

2011　〈再論晚清臺灣開港後的米穀輸出問題〉，《新史學》22(2): 215-252。

2011　〈清代臺灣熟番地權的創設與流失：以竹塹社為個案的歷史分析〉，收於詹素娟主編，《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施添福教授榮退論文集》，頁 133-183。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2　〈再論清代臺灣開港以前的米穀輸出問題〉，收於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頁 99-133。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3　〈清代中國與近代早期英國（16-18 世紀）經濟發展的比較：以土地所有權體制為焦點的分析〉，發表於河南大學法學院主辦，「中英比較視野下的國家、法律與經濟社會變遷」國際研討會，2013 年 7 月 24-25 日。

林玉茹

2010　〈從屬與分立：十九世紀中葉臺灣港口城市的雙重貿易機制〉，《臺灣史研究》17(2): 1-37。

林萬億

2012 《臺灣的社會福利：歷史與制度的分析》。臺北：五南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第2版。

林滿紅

1994 〈清末大陸來臺郊商的興衰：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之一結合思考〉,《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4(2): 173-193。

邱士杰

2007 〈從〈黎明期的臺灣〉走向「中國改造論」：由許乃昌的思想經歷看兩岸變革運動與論爭（1923-1927）〉,《史繹》35: 69-140。

2009 〈從中國革命風暴而來：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與他的馬克思主義觀〉，收於文訊雜誌社編，《陳映真創作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41-299。臺北：文訊雜誌社。

2009 《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凃照彥（著）、李明峻（譯）

1992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出版社。

施添福

2001 《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柯志明

2001 《番頭家：清代臺灣的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2003 《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洪詩鴻

1994 〈台湾資本主義の発展と商人資本：日本植民地期を中心として〉,《經濟論叢》154(3)：42-62。

1995 〈日本植民地期の台湾人産業資本に関する一考察：中小零細資本の成長を中心に〉,《經濟論叢》）155(2): 59-79。

高淑媛

2007 《經濟政策與產業發展：以日治時期臺灣鳳梨罐頭業為例》。臺北：稻鄉出版社。

堀内義隆

2001 〈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の米穀産業と工業化：籾摺・精米業の発展を中心に〉,《社会経済史学》67(1): 23-46。

2005 〈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台湾人小経営：工業化の周辺〉,《地域総合研究》33(1): 83-96。

2005 〈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中小零細工業の発展〉,《調査と研究》30: 23-44。

2008 〈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民族工業の形成：製帽業を事例として〉,《日本史研究》556: 26-53。

2009 〈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機械市場の形成と機械工業の発展〉,《現代台湾研究》35: 36-56。

2010 〈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農村工業の発達と労働供給〉,《三重大学法経論叢》27(2): 45-62。

許乃昌

1926 〈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臺灣民報》126: 10-13。

1926 〈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續）〉,《臺灣民報》127: 10-12。

1926 〈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續）〉,《臺灣民報》128: 9-11。

1926 〈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續・完）〉,《臺灣民報》129: 9-11。

1927 〈給陳逢源氏的公開狀（上）〉,《臺灣民報》142: 11-12。

1927 〈給陳逢源氏的公開狀（下）〉,《臺灣民報》143: 11-14。

連溫卿

1928 〈臺灣社會運動概觀〉，《臺灣大眾時報》創刊號: 15-16。

1928 〈臺灣殖民政策的演進（一）：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及其發展〉，《臺灣大眾時報》6: 12-14。

1928 〈臺灣殖民政策的演進（二〔按：三〕）：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及其發展〉，《臺灣大眾時報》7: 13-14。

1928 〈臺灣殖民政策的演進（二）：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及其發展〉，《臺灣大眾時報》8: 14。

1975 〈台湾に於ける日本植民政策の実態〉，《史苑》35(2): 61-83。

連溫卿（著），張炎憲、翁佳音（編校）

2003 《臺灣政治運動史》。臺北：稻鄉出版社，再版。

陳芳明

1998 《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5 〈「中國改造論」：論戰與 20 年代臺灣左翼思想的傳播〉，收於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編，《第六屆「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文化與臺灣文化——延續與斷裂》，頁 183-201。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

2007 《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 2 版。

2011 《臺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映真

2000 〈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批評陳芳明先生的〈臺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學》16(9)=189: 138-160。

2000 〈陳芳明歷史三階段論和臺灣新文學史論可以休矣！：結束爭論的話〉，《聯合文學》17(2)=194: 148-172。

2000 〈關於臺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答陳芳明先生〉，《聯合文學》16(11)=191: 138-161。

陳逢源（芳園）

1945 〈書評：東嘉生著「臺灣經濟史研究を讀む」〉，《民俗臺灣》5(1)=43: 45-46。

1926 〈最近之感想（二）：我的中國改造論〉，《臺灣民報》120: 8-10。

1926 〈答許乃昌的駁中國改造論（一）〉，《臺灣民報》130: 11-12。

1926 〈答許乃昌的駁中國改造論（二）〉，《臺灣民報》131: 11-12。

1926 〈答許乃昌的駁中國改造論（三）〉，《臺灣民報》132: 10-11。

1926 〈答許乃昌的駁中國改造論（四）〉，《臺灣民報》133: 11-12。

1926 〈答許乃昌的駁中國改造論（五）〉，《臺灣民報》135: 8-9。

1926 〈答許乃昌的駁中國改造論（六）〉，《臺灣民報》136: 11。

1926 〈答許乃昌的駁中國改造論（七）〉，《臺灣民報》137: 11-12。

1927 〈答許乃昌的駁中國改論造〔按：造論〕（八・完）〉，《臺灣民報》139: 12-13。

陳翠蓮

2008 《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〇~一九五〇》。臺北：財團法人曹永和文教基金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陶希聖

1934 〈編輯的話〉，《食貨》創刊號: 29-30。

馮天瑜

2006　〈封建概念辨析〉，《社會科學戰線》2006(5): 251-255。

馮天瑜、樊良樹

2007　〈關於「封建」概念的對話〉，《社會科學論壇》2007(4 上): 133-136。

黃石輝

1928　〈「改造」之政〔按：改〕造（一）〉，《臺灣大眾時報》9: 13-14。

1928　〈「改造」之改造（二）〉，《臺灣大眾時報》10: 11-13。

黃宗智

1992　《中國農村的過密化與現代化：規範認識危機及出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黃俊傑

2006　〈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對中國前途的看法：以一九二〇年代「中國改造論」的辯論為中心〉，收於黃俊傑，《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頁 99-124。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奧村哲

2004　《中国の資本主義と社会主義：近現代史像の再構成》。東京：桜井書店。

葉榮鐘

2000　《日據下臺灣大事年表》。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2000　《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緒形康

2013　〈1930 年代の封建遺制論争、資本主義論争におけるアジア〉，收於緒形康編，《アジア・ディアスポラと植民地近代：歴史・文学・思想を架橋する》，頁 193-219。東京：勉誠出版。

趙曉華

2004　《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學術研究與論爭》。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劉進慶

1975　《戦後台湾経済分析：一九四五年から一九六五年まで》。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蔡孝乾

1926　〈駁芳園君的「中國改造論」〉，《臺灣民報》134: 10-13。

魯凡之

1987　《東方專制主義論：亞細亞生產模式研究》。臺北：南方叢書出版社。

蕭阿勤

2010　《回歸現實：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第 2 版。

2012　《重構臺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謝國興

2003　〈中國往何處去：1930 年前後臺灣的左右論辯〉，《近代史研究》2003(2)=134: 44-76。

顧琳（Linda Grove）（著），王玉茹、張瑋、李進霞（譯）

2009　《中國的經濟革命：二十世紀的鄉村工業》。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Bartolovich, Crystal, Neil Lazarus (eds.)

2002　*Marxism, Modernity,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andt, Loren

1989 *Commerc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al and Eastern China, 1870-1937*.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own, Archie

2009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New York: Ecco.

Cole, G. D. H.

2002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Eley, Geoff

2002 *Forging Democracy: The History of the Left in Europe, 1850-2000*.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sping-Andersen, Gøsta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sping-Andersen, Gøsta (ed.)

1996 *Welfare States in Transition: National Adaptations in Global Economies*.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Gamble, Andrew, David Marsh, and Tony Tant (eds.)

1999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Kołakowski, Leszek (Author), P. S. Falla (Trans.)

2005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The Founders, the Golden Age, the Breakdow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Landauer, Carl 蘭道爾

1976 *European Socialism: A History of Ideas and Movements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Hitler's Seizure of Power*.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Rawski, Thomas G.

1989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assoon, Donald 薩松

2010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The West Europe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I. B. Tauris.

Shepherd, John R. 邵式柏

1993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1600-180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21, No. 2, pp. 69-110, June 2014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Knowledge and Imagination of Taiwan's Socio-economic History:
Taiwan's Social History Debate (1920-1930s) Reexamined

Wen-kai Lin

ABSTRACT

Between 1920s and 1930s, East Asia saw extensive scholarly discussion on Social History Debate. During the same era, there was an influx of Western modern social theories including liberalism, anarchism, and Marxism, thus contributing to a climate of influential Social History Debate. Among these social theories, Marxist ideology had the most profound impact on the modern concept of knowledge and imagination among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Different theoretical concepts on Taiwan and China's economic history were developed and different opposing programs of social revolution and social reform were formulated. Since the late 1980s, democratization led to freedom of speech and discussion. Hence, Taiwanese scholars on literary history and political history re-examined the essence of the Debate and its impact on Taiwan history, and used it as a weapon to get involved in Taiwan's political and social issues at that time. Of note is the significant change in knowledge on Taiwan and China's socio-economic history among socio-economic historians since the 1990s and the total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ist movements and ideas in western societies and Japan. Nevertheless, the analysis of Social History Debate by Taiwanese scholars was still made on basis of prior and outdated knowledge, making these analyses fragmented and far from complete.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historical features of the Debate and its meaning in Taiwan history in the light of new knowledge on Taiwan and China's socio-economic history and global socialist history.

Keywords: Taiwan Intellectual History,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Chinese Reform Debate, Taiwan Socio-economic History, Global Socialist History

《臺灣史研究》
第 21 卷第 2 期，頁 111-165
民國 103 年 6 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戰後臺灣的免疫學專科化：
國際援助、學術外交與邊界物*

許宏彬**

摘　要

在今日臺灣社會，如過敏性鼻炎、氣喘及紅斑性狼瘡等難以根除的免疫相關疾病，是現代人最感到困擾的疾病類型之一，而免疫學則是我們藉以理解及面對這些嶄新疾病情境的權威資源。本文不把臺灣免疫學的發展當成現代醫學進步的自然結果，而將之視為由不同行動者在特定歷史時空中所共同促成的現象。以「見證者工作坊」(Witness Seminar)、免疫學會檔案資料及相關醫學期刊為主要文本，本文分析戰後醫療發展及分化背後的動力與機制，並藉由臺灣免疫學史來提供另一個思考戰後醫療的視角。本文提出並回答下列四個彼此關連的問題：首先，支持新專科（免疫學）出現的脈絡與資源為何？其次，新專科與既有專科（細菌學與微生物學）之間如何進行資源與議題的重新界定與劃分？再者，不同既有專科中的行動者「為何」及「如何」共同參與新專科的形構？最後，臺灣作為一個長期吸收歐美醫學知識的醫療後進國，其新興專科的發展與在地政治及學術環境之間的關係為何？本文認為，免疫學在臺灣的發展除了呼應戰後國際免疫學專科化的潮流外，也與既有的研究網絡（細菌學與微生物學）、在地的疾病情境（過敏病與鼻咽癌），以及特定時空背景下的政治環境密不可分。特別是戰後廣義的國際醫療援助及合作計畫，以及臺灣與中共自 1970 年代中期開始的激烈學術外交攻防，

* 本文在資料收集及寫作過程中，承蒙多位臺灣免疫學界的前輩及學者鼎力協助，尤其是韓韶華、鄧昭雄、黎煥耀、胡承波、蔡嘉哲、楊倍昌、許秉寧、王志堯、林以行等，特此致謝。中華民國免疫學會張榛云秘書以及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STM）助理李筱嬋、王芸卿協助籌辦「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口述史研討會」(2011 年 6 月 12 日)，在此一併致謝。本文初稿曾以〈從零散到整合：初探戰後新興學科的專業建構，以免疫學為例〉為題，發表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主辦之「公共衛生與現代國家」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 年 5 月 20-21 日），感謝評論人白裕彬教授及與會學者的提問與建議。致謝：本文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美援下的身體：探索戰後臺灣免疫及免疫學的發展」(NSC99-2410-H005-063-MY3）研究成果，筆者感謝國科會的支持，以及計畫助理卓雯琴（前期）及周湘雲（中後期）的辛勞與付出。

**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來稿日期：2014 年 4 月 7 日；通過刊登：2014 年 7 月 4 日。

都意外地成為臺灣免疫學快速專科化的重要推手。此外，本文亦強調戰後免疫學的「自我辨識」理論及免疫檢測技術，是促使不同領域的行動者得以一起加入並共同形構臺灣免疫學專科不可或缺的邊界物。

關鍵詞：免疫、過敏、醫療援助、邊界物、學術外交

一、前言
二、文獻回顧、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
三、1960 年之前的臺灣免疫研究與實作
四、從細菌學及微生物學中開展：1960 年代國際免疫學的發展與引介入臺
五、在診間與實驗室之間：1970 年代的國際援助、免疫檢測技術與臨床免疫學
六、1970 年代後期的學術外交與早熟的免疫學專科
七、小結與討論

一、前言

在今日臺灣社會，過敏性鼻炎、氣喘及紅斑性狼瘡等免疫相關疾病無疑是最令人感到困擾的疾病類型之一，而免疫學則是我們藉以理解及面對這些疾病情境的權威資源。目前臺灣有中華民國免疫學會（以下簡稱「免疫學會」）、風濕病醫學會以及臺灣兒童過敏氣喘免疫及風濕病醫學會等三個與免疫研究直接相關的專業學會。除此之外，幾乎各大醫院內都有免疫相關的病科（如一般常見與風濕科、過敏科合併命名的過敏免疫風濕科），各大學醫學院也幾乎都設有免疫相關科系所，包括臺大、陽明、成大、中山、長庚、慈濟、北醫、中國，以及非醫學院校的嘉義大學等等。然而，相較於免疫相關醫療體制的高度發展，免疫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專科在臺灣的發展卻相當晚近。1976 年臺北榮民總醫院成立了臺灣第一個免疫病科，而以「提高免疫學水準及促進學術研究與發展為宗旨」的免疫學會遲至 1978 年才正式成立。1979 年由免疫學會所發行的《中華民國免疫學會雜誌》則是第一份以免疫學研究為主的本土期刊。

為何臺灣戰後的免疫學發展如此快速？借用醫療史以及科技與社會研究的洞見，本文不把臺灣免疫學的專科化當成現代醫學發展中的自然結果，而將之視為由不同行動者在特定歷史時空中所共同促成的現象。藉由分析免疫學專科化的過程，本文希望能藉此深入理解戰後臺灣醫療發展的面貌，釐清戰後臺灣醫療快速發展及分化背後的動力、機制與影響，並回答下列彼此關連的問題：支持新專科（免疫學）出現的脈絡與資源為何？新專科與既有專科（微生物學）之間如何進行資源與議題的重新界定與劃分？如細菌學、微生物學、內科及皮膚科等不同固有專科中的行動者，「為何」及「如何」共同參與新專科的形構？臺灣作為一個長期輸入西方醫療知識與實作的醫學後進國，其新興專科的發展與其在地政治、社會及學術脈絡之間的關係為何？如果說細菌學及微生物學是因為傳染病防治而得到國家大量資源的投入與重視，那麼免疫學又如何得到國家的資源與社會的認可，並促成其快速專科化？本文認為，特定醫學分科的在地發展除了呼應國際醫學研究的潮流外，也與不同地區的醫療文化、疾病情境以及特定時空背景下的政治及社會環境密不可分。而戰後臺灣特殊的國際關係與政治情勢，特別是戰後初期廣義的美國及國際醫療援助，以及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共」）自 1970 年代中期開始的激烈學術外交攻防，都是促成臺灣免疫學快速專科化的重要推手。

二、文獻回顧、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

雖然西文中免疫（英文 immunity，拉丁文 immunis）的概念起源甚早，但最初與疫病及醫療並無關連；其於羅馬時代是指「免役」，也就是免除法律所規定勞役或其他義務。最遲自十四世紀起，immunis 一詞已與現代意義相近，意指免於傳染病的威脅。但一直到十九世紀牛痘疫苗普遍施打後，免疫一詞作為一種抵抗傳染病的生理現象才廣為使用，成為醫學研究的新領域。[1] 從免疫概念的更迭

---

1 陳定信，〈免疫學發展史〉，《當代醫學》27（1976 年 1 月），頁 24-33；Arthur M. Silverstein and Alexander A. Bialasiewicz, “History of Immunology: A History of Theories of Acquired Immunity,” *Cellular Immunology* 51: 1 (Apr. 1980), pp. 151-167; Arthur M. Silverstein, *A History of Immunology* (Amsterdam; Boston: Academic Press, 2009 2 edition), p. 3. 值得注意的是，若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製作的「英

來看，免疫學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生理學階段（1880-1910 年）、化學階段（1910-1950 年）以及生物學階段（1950 年代至今）。[2] 在生理學階段，由於十九世紀末細菌學說以及傳染病研究的蓬勃發展，許多早期重要的細菌學、病理學及生理化學研究者如巴斯德（Louis Pasteur）及科霍（Robert Koch）等都相繼投入免疫相關研究，如疫苗及血清療法等。這些研究除了有強大的臨床效益之外，也帶動當時醫學研究中的樂觀氣氛，認為在不久的將來所有的疾病都將有疫苗可以對抗。雖然免疫學在此時尚未形成一獨立專科，但無疑地，免疫已然成為實驗室及臨床研究共同關注的焦點。然而，到了 1910 年代由於免疫生理現象的複雜以及疫苗運用在許多疾病上所遭遇的瓶頸，這樣的樂觀期待不再。免疫相關研究者逐漸由臨床回歸實驗室，免疫學遂成為細菌學或蛋白質化學中的一個分支。研究者專注於研究抗體分子的化學結構及其與抗原作用的機制，慢慢地從一般臨床的生理及病理研究中分離。

二次大戰後國際免疫學研究逐漸轉向，研究者開始不再聚焦於免疫分子的化學結構，而是將免疫視為一種用以區辨自身與他者的基礎生物反應。而戰後新興的臨床需求，如器官移植、癌症治療、自體免疫疾病以及過敏症等等，都吸引臨床乃至於基礎醫學研究者去思考，免疫現象在臨床上的多樣運用及其背後的機制。此時免疫不再僅是純然對人體有益的保護機制，同時也是導致對人體傷害的負面反應，如器官移植的排斥現象、對日常物產生不適症狀的過敏症，以及免疫系統攻擊自身組織的自體免疫疾病等等。現代免疫學的重要開創者，澳洲免疫學家 Frank M. Burnet，在其 1960 年榮獲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的演說〈自我的免疫辨識〉（Immunological Recognition of Self）中便強調「新免疫學的誕生」，並認為新免疫學（生物免疫學）在「醫學的實際運用以及對於生命過程的更佳認知」這

華字典」資料庫中，所收藏的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的字典來考察 immunity 一詞漢譯的過程，亦可發現直到十九世紀末，各家英華字典仍將 immunity 譯為「自由、自如」或「特恩、免納」，取其免除義務、稅捐之義。隨著西方細菌學說及疫苗的發展，二十世紀初的英華字典才開始將 immunity 新譯為，具有能對抗傳染病之意涵的「敵瘽能、敵瘽症能或免疫」。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英華字典」資料庫，下載日期：2014 年 3 月 17 日，網址：http://140.109.152.25:8080/dictionary。

2 Ilana Löwy, "The Strength of Loose Concepts-Boundary Concepts, Federative Experimental Strategies and Disciplinary Growth: The Case of Immunology," *History of Science* 30: 4 (Dec. 1992), pp. 371-372, 385-387; Arthur M. Silverstein, *A History of Immunology*, pp. 347-365.

兩方面都超越了古典的免疫化學研究。[3]

由於免疫相關疾病在全球的普遍盛行，再加上免疫在現代社會中扮演著重要的日常隱喻功能，許多不同領域的學者及跨領域的研究團隊相繼投入免疫相關的人文與社會研究，特別是歷史、哲學、人類學以及科技與社會研究（STS）。在歐美免疫學史方面，如 Thomas Söderqvist 以及 Craig Stillwell 在回顧西方免疫學史書寫時所指出，[4] 早期免疫學史書寫的出現是伴隨著 1960 及 1970 年代免疫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專業化及機構化而來的，主要可分為以下三種類型：一、新編免疫學教科書中有關於學科發展的經典人物及研究的介紹；[5] 二、重要免疫學家之自傳、回憶錄及紀念文集；[6] 三、1980 年代之後開始出現，由資深免疫學家所撰寫的免疫學史專書。這些書寫詳細介紹重要免疫學家、概念及研究的轉變，希望提供年輕研究者及學生一個所屬學科的前世今生概述。[7]

然而，上述免疫學史都將學科的發展視為自然而然、理所當然的過程，且受到學科內部當下所認可的問題意識及合法討論所侷限。1990 年代以來，研究者已從不同的角度對這些免疫學史書寫提出質疑與挑戰，試圖提供免疫及免疫學史更豐富的討論面向。其中一個重要的共通點，就是將免疫學的發展與其疆界從「自

---

3 Frank M. Burnet 於 1960 年獲獎時的演講全文，可從諾貝爾獎官方網站下載。參見 Frank M. Burnet, "Immunological Recognition of Self,"「Nobelprize.org」，下載日期：2014 年 4 月 1 日，網址：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medicine/laureates/1960/burnet-lecture.pdf。

4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1986 年第一次全球免疫學史會議，其實是當時第六屆國際免疫學大會之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說，是在免疫學專業發展的脈絡下舉行的。參見 Thomas Söderqvist and Craig Stillwell, "Essay Review: The Historiography of Immunology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32: 1 (Mar. 1999), pp. 205-215.

5 例如 J. H. Humphrey 與 R. G. White 廣為閱讀的教科書 *Immunology for Students of Medicine*（Oxford: Blackwell, 1963）。J. H. Humphrey 為 IUIS（International Union of Immunological Societies）第二任理事長，他這本不斷改版的免疫學經典教科書在臺灣也廣為使用。

6 知名免疫學者的紀念文集、傳記或自傳相當多，茲舉數例如下：Frank M. Burnet, *Changing Patterns: An Atypical Autobiography* (Melbourne: Heinemann, 1968); Peter Medawar, *Memoir of a Thinking Radish: An Autobiography*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傳記作為一種嚴肅的人文社會研究類型，近來也重新受到重視，其中不乏歷史學者及哲學家針對重要免疫學者，進行超越聖徒傳書寫的研究。參見 Thomas Söderqvist (Author), David Mel Paul (Trans.), *Science as Autobiography: The Troubled Life of Niels Jern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7 如 Leslie Brent, *A History of Transplantation Immunology* (San Diego, Calif.: Academic Press, 1997); Arthur M. Silverstein, *A History of Immunology*. Silverstein 原是一資深的免疫學者，後來轉為免疫學史研究者。雖然在 *A History of Immunology* 書中，他主要仍強調免疫學領域中的人物、發現及概念的演變，但卻也吸收並運用了科學史、醫學史及科技與社會研究的相關資源及概念，進行部分社會史的討論。

然」轉為「不自然」。[8] 如醫學史家 Warwick Anderson 等人認為，免疫學家常將其自身的科學發展史視為「觀念的更替及其系譜」，而不是「去探究事物如何成為研究分析的對象，由此讓科學中的新領域得以建構」，意即「關於知識生產的物質及社會條件」。[9] 如果說免疫學的發展並非自然而然，那麼學科建制所需的資源，無論是方法概念上的資源（如理論、語言與隱喻[10]）或是社會及物質方面的資源（如技術、實驗建置、臨床運用、研究經費及人力網絡[11]）便成為學者關

---

8 Alberto Cambrosio, Peter Keating, and Alfred I. Tauber, "Introduction: Immunology as a Historical Objec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27: 3 (fall 1994), p. 376. 學術專書以及期刊論文之外，近年來西方免疫史相關學術會議所累積的成果也相當可觀，除了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1994 年及 1997 年的兩期專刊，還有數本論文集於 2000 年之後出版。參見 Peter Keating, Miriam Balaban, Alberto Cambrosio, and Alfred I. Tauber, "Introduction: Historiographic Issu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30: 3 (Sep. 1997), pp. 317-320; Anne Marie Moulin and Alberto Cambrosio, eds., *Singular Selves: Historical Issues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Immunology* (Amsterdam; Oxford: Elsevier, 2001); Kenton Kroker, Jennifer Keelan, and Pauline M. H. Mazumdar, eds., *Crafting Immunity: Working Histories of Clinical Immunology* (Aldershot,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8).

9 Warwick Anderson, Myles Jackson, and Barbara Gutmann Rosenkrantz, "Toward an Unnatural History of Immun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27: 3 (fall 1994), p. 576.

10 與免疫相關的概念、語言及隱喻的研究吸引了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及哲學家等不同領域學者的興趣，試舉數例如下：Anne Marie Moulin, "The Immune System: A Key Concept for the History of Immunology,"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he Life Sciences* 11: 2 (June 1989), pp. 221-236; Donna J. Haraway, "The Biopolitics of Postmodern Bodies: Constitutions of Self in Immune System Discourse," in Donna J.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203-230; Emily Martin, *Flexible Bodies: Tracking Immunity in American Culture from the Days of Polio to the Age of AIDS* (Boston: Beacon Press, 1994); Thomas Söderqvist, "Darwinian Overtones: Niels K. Jerne and the Origin of the Selection Theory of Antibody Forma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27: 3 (fall 1994), pp. 481-529; Pauline M. H. Mazumdar, *Species and Specificity: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Immunolog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Alfred I. Tauber and Scott H. Podolsky, *The Generation of Diversity: Clonal Selec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Molecular Immunolog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Edward Cohen, "Figuring Immunity: Towards the Genealogy of a Metaphor," in Anne Marie Moulin and Alberto Cambrosio, eds., *Singular Selves: Historical Issues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Immunology*, pp. 179-201; James M. Wilce, Jr., ed., *Social and Cultural Lives of Immune System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11 與免疫學相關的技術、實驗、臨床、機構與國際網絡部分，參見 Craig R. Stillwell, "Thymectomy as an Experimental System in Immun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27: 3 (fall 1994), pp. 379-401; Thomas Söderqvist and Arthur M. Silverstein, "Participation in Scientific Meetings: A New Prosopographical Approach to the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Science-The Case of Immunology, 1951-72,"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4: 3 (Aug. 1994), pp. 513-548; Alberto Cambrosio and Peter Keating, *Exquisite Specificity: The Monoclonal Antibody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Ilana Löwy, *Between Bench and Bedside: Science, Healing, and Interleukin-2 in a Cancer War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Mark Jackson, *Allergy: The History of a Modern Malady*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6); Gregg Mitman, *Breathing Space: How Allergies Shape Our*

注的焦點。換言之，原本分屬不同領域、懷抱著不同動機的歷史行動者，是如何在特定的時間及空間中，共同參與免疫學的形構？

在這些研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Ilana Löwy 一系列開創性的免疫學史研究。她借用科學史及 STS 研究中關於「邊界物（boundary object）」以及「交易區（trading zone）」的概念來討論現代免疫學的發展。Löwy 一方面針對「自我辨識」這個當代免疫學的重要概念進行討論，分析這個定義鬆散且彈性十足的概念如何成為一種有效的邊界物，吸引異質且跨越基礎／臨床學科的行動者一同投入 1960 年代新興的現代免疫學。另一方面她關注實驗工具的重要性，並指出大量培育標準化純種小鼠品系之技術在組織移植及癌症免疫研究發展中的重要性，使得大規模跨越不同實驗室間的整合與比較研究成為可能，讓癌症研究成為尖端生物科學研究的一部分。這種同時關照理論概念以及實驗技術的書寫是本文討論戰後臺灣免疫學發展的重要參考。[12] 此外，Mark Jackson 在討論過敏此一重要免疫疾病的全球研究網絡建構時，也提及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WHO」）這個戰後重要的國際醫療機構在建置全球免疫學研究上所扮演的重要地位，提醒我們去注意新興學科建置背後常常隱而不見但扮演重要角色的國際組織及其各種研究資源挹注。[13] 上述這些研究一方面關注免疫知識發展與全球學術網絡的建制，另一方面也注意學科之間的疆界劃分／重劃、在地行動者的位移與動員以及學科生成所需的社會及物質條件，相當值得參考。

Lives and Landscap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Angela N. H. Creager, "Molecular Surveillance: A History of Radioimmunoassays," in Kenton Kroker, Jennifer Keelan, and Pauline M. H. Mazumdar, eds., *Crafting Immunity: Working Histories of Clinical Immunology*, pp. 201-230.

12 Ilana Löwy, "The Strength of Loose Concepts-Boundary Concepts, Federative Experimental Strategies and Disciplinary Growth: The Case of Immunology," pp. 371-396; Ilana Löwy, "Experimental Systems and Clinical Practices: Tumor Immunology and Cancer Immunotherapy, 1895-1980,"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27: 3 (fall 1994), pp. 403-435. 關於交易區這個概念的簡介，參見 Peter Galison, "Trading Zone: Coordinating Action and Belief," in Mario Biagioli, ed., *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 137-160. 至於有關邊界物此一概念的實例及反思，則可參見 Susan Leigh Star and James R. Griesemer, "Institutional Ecology, 'Translations' and Boundary Objects: Amateurs and Professionals in Berkeley's Museum of Vertebrate Zoology, 1907-39,"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9: 3 (Aug. 1989), pp. 387-420; Susan Leigh Star, "This is Not a Boundary Object: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of a Concept,"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35: 5 (Sep. 2010), pp. 601-617.

13 Mark Jackson, *Allergy: The History of a Modern Malady*, pp. 116-118.

近年來，臺灣醫療史的研究也逐漸注意到戰後的發展。自二次大戰結束到1971年衛生署成立期間，不但臺灣衛生相關經費多倚賴美援支持，在實際執行方面也以美國專家來臺進行定點大型計畫為主。[14] 也因此，美援成為目前學界討論戰後初期醫療發展的主要架構，而相關研究中以與美援公衛政策或計畫相關的歷史研究較多。[15] 然而，戰後臺灣醫學專業的快速專科分化則較少學者著墨，特別是新興專業學科的形構與疆界劃分、人才的流動與其養成之管道、研究與臨床治療的互動及相關資源的爭取與動員等議題。雖然劉士永及張淑卿已針對公共衛生、護理學與復健醫學等新興醫療專業展開研究，但其討論仍集中在與具有強烈實用價值且與當時醫療政策緊密關連的美援架構之中。[16] 相較於殖民時期乃至戰後初期當局重視的傳染病防治與公共衛生，免疫相關疾病相對症狀溫和且對政治經濟沒有立即危害，因此當局往往並不積極規劃或投資相關的研究與診療。因此，戰後免疫學史的研究提供了另一個視角，來觀察這些不受政策青睞的新興醫學領域，如何在廣義的國際醫療合作援助以及國際政治局勢中逐漸成形。

關於免疫及免疫學在臺灣的歷史，至今系統性的研究仍少。沈佳姍從殖民統治的考量為出發點，探討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與防疫相關的細菌學免疫研究及疫苗生產之博論及單篇論文，是目前唯一可見由歷史研究者執筆的論文。其研究雖是在醫療發展受政策強烈影響的殖民醫學脈絡下進行討論，且集中於防疫實作相關的早期細菌學免疫實作，與本文探討的戰後免疫專科形構有相當區隔，但也提供不少免疫學早期發展的線索，特別是在戰後初期延續殖民血清疫苗實作及研究

---

14 郭文華，〈建構臺灣衛生體制：美援醫療的背景及其衛生政策〉，收於經典雜誌編著，《臺灣醫療400年》（臺北：經典雜誌出版社，2006），頁142-147。

15 與美援公衛相關的歷史研究和討論有：楊翠華，〈美援對臺灣的衛生計畫與醫療體制之形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2（2008年12月），頁91-139；郭文華，〈美援下的衛生政策：1960年代臺灣家庭計畫的探討〉，收於李尚仁主編，《帝國與現代醫學》（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325-365；張淑卿，〈1950、60年代臺灣的卡介苗預防接種計畫〉，《科技、醫療與社會》8（2009年4月），頁121-172；范燕秋，〈臺灣的美援醫療、防癩政策變動與患者人權問題，1945至1960年代〉，《臺灣史研究》16: 4（2009年12月），頁115-160；郭文華，〈如何看待美援下的衛生？一個歷史書寫的反省與展望〉，《臺灣史研究》17: 1（2010年3月），頁175-210。

16 參見張淑卿，〈美式護理在臺灣：國際援助與大學護理教育的開端〉，《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8（2010年12月），頁125-173；Michael Shiyung Liu（劉士永）, "From Japanese Colonial Medicine to American-Standard Medicine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in the Medical Profession and Practices in East Asia," in Liping Bu, Darwin H. Stapleton, and Ka-che Yip, eds., *Science, Public Health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Asia*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 161-176；張淑卿，〈復健、輔具與臺灣小兒麻痺病患生活經驗（1950s-1970s）〉，《臺灣史研究》20: 2（2013年6月），頁123-174。

的臺大醫學院細菌學科。[17]

其他由醫師或免疫學者所執筆或翻譯的介紹免疫學發展短文，則自 1970 年代臺灣免疫學社群逐漸成形之後，零星散見於各種醫學專科雜誌或者醫學報導雜誌中。例如，陳定信於 1976 年所發表的〈免疫學發展史〉一文中，簡要介紹十九世紀末期至今免疫學在西方的發展，並將之分為防範疫病的「免疫」、強調疾病診斷的「血清學」、以化學觀點探討免疫反應的「免疫化學」，以及研究抗體形成理論、過敏、免疫容忍、自體免疫、免疫系統等的「免疫生物學」，並強調免疫學是「一門與每一位醫者有密切關係的科學」。[18] 而曾任免疫學會理事長（1996-2000 年）的蔡嘉哲，於其 1996 年發表的〈免疫學之發展歷史〉一文中，也將免疫學的發展分為歷史早期、免疫學黃金期（1880-1910）、免疫學黯淡期（1910-1960）以及現代免疫學（1960 至今）四個階段，並將臺灣免疫學之發展與 1978 年免疫學會的成立緊密扣連，同屬現代免疫學蓬勃開展的國際潮流之中。[19] 由這些免疫學相關研究者所自述的免疫學發展史可以清楚的看出，歷史書寫是專科形構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近年來，史學界也逐漸開始重視並進行免疫學研究者的訪談及資料收集。2004 年由國史館出版的《臺灣免疫學拓荒者：韓韶華先生訪談錄》一書，翔實記錄這位出身於國防醫學院，後任職於國防醫學院、榮民總醫院（以下簡稱「榮總」）及陽明大學的早期重要免疫學研究者之求學與研究經歷。韓韶華是臺灣免疫學專科化背後的重要推手，其訪談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自「國防－榮總－陽明」體系的觀點，來描述臺灣免疫學發展的軌跡。韓對 1960 及 1970 年代臺灣免疫學的社群發展、機構化及國際化有相當詳細的描述，是研究戰後臺灣免疫學史不可不參考的重要資料。[20] 除此之外，2012 年由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

---

17 沈佳姍，〈日治時期臺灣防疫體制下的預防接種與人事變遷〉（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沈佳姍，〈日治時期臺灣細菌性免疫醫學發展之研究：從中央研究機構的制度面考察〉，《臺灣學研究》13（2012 年 6 月），頁 161-184。

18 陳定信，〈免疫學發展史〉，頁 24-33。

19 蔡嘉哲，〈免疫學之發展歷史〉，《內科學誌》7: 4（1996 年 12 月），頁 298。

20 韓韶華口述，喻蓉蓉訪問，喻蓉蓉、藍玉人記錄整理，《臺灣免疫學拓荒者：韓韶華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4）。韓韶華早年於樂生院針對痲瘋病所進行的免疫相關研究，其中所涉及的美援醫療連結與早期臨床試驗倫理發展近來也頗引起學界關注。參見范燕秋，〈臺灣的美援醫療、防癩政策變動與患者人權問題，1945 至 1960 年代〉，頁 115-160；范燕秋，〈樂生療養院與臺灣近代癩病醫學研究：醫學研究與政策之間〉，《臺灣史研究》21: 1（2014 年 3 月），頁 151-218。

近代史研究所訪談出版的《臺中榮民總醫院三十載：口述歷史回顧》一書中，也收錄了同樣長期服務於榮總系統，投入並開創早期臨床免疫體系的藍忠亮訪談，可與韓韶華的敘述做對照參考。[21] 然而，整體而言，相較於歐美醫學史及科學史學界對於免疫學發展相關資料的系統性廣泛收集與研究，臺灣相關資料的收集及訪談仍屬初步階段。特別是臺灣免疫學發展另一個重要軸線，「臺大醫學院／臺大醫院」，其相關臨床醫師及基礎研究者的活動紀錄仍相當零散，未見系統性的整理與討論。[22]

為了突破目前資料上的限制並廣泛納入相關的歷史行動者，本文採用國際醫學史界常見的「見證者工作坊」（Witness Seminar）研究法。見證者工作坊是一種針對特定領域議題所舉辦的口述史研討會，強調的是一種同領域專家們之間對於同一事件的陳述與相互評論、爭辯，藉此探求關鍵歷史事件的多元及深層面貌。英國的衛康醫學史中心（The Wellcome Trust Centre for History of Medicine）有感於二十世紀現代醫學的快速專業化及進展，於 1990 年代開始以特定醫學議題或領域為題定期舉辦見證者工作坊，至今已有超過四十本的工作坊紀錄編輯整理出版。[23] 在臺灣免疫學界及國科會的支持下，臺灣醫療史首次見證者工作坊便以「免疫學在臺灣」為主題，於 2011 年 6 月 12 日舉辦，共有 28 位早期參與免疫學教學、研究及行政的研究者及醫師參與，包括數位參與創辦中華民國免疫學會的第一代免疫學者。[24] 本文所參考主要的原始資料除了前述見證者工作坊紀錄之外，還包括與會者所提供的文件，工作坊前後筆者針對特定人士或議題所進行的深度訪談，以及免疫學會提供的相關檔案資料，包括公文、會議紀錄、訓練活動課表、

---

21 張淑卿訪談、柯小菁紀錄，〈藍忠亮先生訪問紀錄〉，收於游鑑明等訪問、周維朋等紀錄，《臺中榮民總醫院三十載：口述歷史回顧》（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上篇：歷任院長、副院長，頁 607-639。

22 徐茂銘的近文是探索早期臺大醫院鼻咽癌研究與免疫學發展的重要參考。參見徐茂銘，〈臺灣鼻咽癌研究的故事（上）、（下）〉，《臺灣醫界》55: 7（2012 年 7 月），頁 38-41、42-45。

23 E. M. Tansey, "The Witness Seminar Technique in Modern Medical History," in H. J. Cook, A. Hardy, and S. Bhattacharya, eds., *Social Determinants of Disease* (London: Orient Longman, 2008), pp. 279-295. 英國當代醫學史見證者工作坊活動之相關資料，及線上下載已出版的見證者工作坊出版品，參見 Members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Biomedicine Research Group, ed., "Wellcome Witnesses to Twentieth Century Medicine,"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下載日期：2014 年 2 月 20 日，網址：http://www.history.qmul.ac.uk/research/modbiomed/wellcome_witnesses/index.html。

24 此次工作坊的成果也已整理出版，參見周湘雲、許宏彬主編，《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臺北：中華民國免疫學會，2013）。

研習活動議程、各式會議手冊、國際書信往返等等。此外，與免疫相關的專業期刊、醫學院學生刊物、早期免疫學講義與實驗手冊，以及各種免疫學相關的醫學普及報導也是本文藉以討論專科形構的重要資料。

三、1960 年之前的臺灣免疫研究與實作

雖然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已開始針對蛇毒、傳染病及畜牧業製作各種血清及疫苗，並進行免疫相關研究，但如同前述歐美早期免疫研究發展的情形一般，日治臺灣的免疫相關研究主要是在細菌學及血清學的範疇下進行。例如 1909 年成立的臺灣總督府研究所，其衛生學部第一、第二研究室便有鼠疫及瘧疾免疫及各種動物疫苗的研究，並從 1916 年起開始製造人用傳染病疫苗。其後，1921 年成立的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其衛生部下有三個細菌學研究室，負責一般細菌學及血清學等與免疫相關的研究。[25] 此外，在殖民醫學教育的課程中，也可以清楚看見早期免疫研究與廣義公共衛生中的細菌學、血清學密不可分的關係。例如 1924 年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的職員一覽表中，校長堀內次雄即為「（熱帶）衛生學、（熱帶）微生物學、內科學、熱帶病學、免疫血清學、殖民地衛生制度」教授。1919 年為了南進殖民準備所成立的熱帶醫學專攻科中，為期一學年的課程中上學期有防疫學及病原微生物學，下學期則有免疫及血清學。[26] 在殖民時期的臨床診療部分，由於早期醫界將人體的免疫反應視為一種抵禦疫病的良性防護機制，因此在臨床診療實務中免疫並不是一個有害的，需要特別關注的疾病類型，也尚未有如今日過敏、自體免疫疾病等將免疫視為有害反應的思維。大體來說，日治時期的免疫相關醫療實作雖已頗為常見，但還是在廣義的疫病防治脈絡下，於細菌學及血清學的架構中發展。也就是說，此時的免疫學尚未形成一個具有清楚學科疆界的專科。

---

25 小田俊郎著、洪有錫譯，《臺灣醫學五十年》（臺北：前衛出版社，1995），頁 103-104；鄭志敏，《杜聰明與臺灣醫療史之研究》（臺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2005），頁 172-173；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6），頁 325；沈佳姍，〈日治時期臺灣細菌性免疫醫學發展之研究：從中央研究機構的制度面考察〉，頁 161-184。

26 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編輯小組編，《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日治時期（1897-1945 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1997），頁 44、101。

戰後初期，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改制為臺大醫學院，其免疫學研究基本上延續殖民時期的模式，在細菌學的脈絡下發展。早年臺大醫學院重要的學生刊物《青杏》，在其 1955 年創刊號中如此介紹由嚴智鍾[27] 擔任科主任的臺大細菌學科：

> 本科分細菌學，免疫學，黴菌學，及濾過性病毒學等四部門，……科內保存有傷寒、赤痢、鼠疫、結核、腦膜炎等病原菌，抗生素檢驗用標準菌株，及最近分離之小兒痲痺症病毒等，凡二百餘種，並曾得到美援及教育部等撥助大批研究及實習用器材，教學設備尚稱完善。又以本科與士林血清疫苗製造所，及附設醫院有密切聯繫，工作研究均感便利。[28]

引文中所提之「士林血清疫苗製造所」，其前身即為位於臺北士林，隸屬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後改隸於臺北帝國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戰後歸屬臺大醫學院熱帶醫學研究所），並負責 1938 年後人用疫苗及血清製造的「血清及預防劑製造所」。[29] 1952 年在 WHO 專家的建議下，血清及預防劑製造所與臺灣省衛生試驗所整合為「臺灣血清疫苗製造所」，所址設於原士林血清疫苗製造所處。[30]

除了臺大醫學院之外，另一個戰後初期臺灣免疫實務發展的重要機構是國防醫學院。1947 年國防醫學院由當時的軍醫學校及陸軍衛生勤務訓練所於上海合併成立。國防醫學院在其前身軍醫學校時期即設有血清疫苗製造所，隸屬於醫科基礎醫學部細菌學系，負責生產人體生物免疫製劑。1947 年國防醫學院設立後，成立衛生研究院，並利用美國醫藥助華會（American Bureau of Medical Aid to China, ABMAC）[31] 戰時所提供的靜脈注射液（如生理食鹽水、葡萄糖液等）設備及血

---

27 嚴智鍾，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隨後進入東大傳染病研究所研究細菌學。曾任北京傳染病醫院院長及北京醫專細菌學教授，後任中央防疫處副處長、南京國民政府衛生部醫政司司長、軍醫學校校長。1947 年來臺後先後擔任臺大醫學院院長（1947-1948）、細菌學科主任、臺灣血清疫苗製造所所長、國防醫學院醫學生物形態系細菌學組主任教官。參見徐世澤，〈我國醫學界老戰士：嚴智鍾教授〉，《大眾醫學》8: 12（1958 年 9 月），頁 398-400；國防醫學院院史編纂委員會編，〈微生物及免疫學科〉，收於國防醫學院院史編纂委員會編著，《國防醫學院院史》（臺北：國防醫學院，1995），頁 753-759。

28 編輯室，〈本院基礎學科簡介〉，《青杏》1（1955 年 6 月），頁 11。

29 沈佳姍，〈日治時期臺灣細菌性免疫醫學發展之研究：從中央研究機構的制度面考察〉，頁 177。

30 行政院衛生署編，《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臺北：行政院衛生署，1995），第 1 冊，頁 305-313。

31 美國醫藥助華會於 1937 年由一群熱心中美關係的在美華僑所集資成立。戰後改名為美國在華醫藥促進局（The 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援助範圍也移到臺灣，英文縮寫仍維持 ABMAC。參見國防醫學院院史編纂委員會編，〈美國醫藥助華會〉，收於國防醫學院院史編纂委員會編著，《國防醫學院院史》，頁 557-562。

庫血漿生產設備，負責軍用注射液及免疫血清疫苗生產，並及於民間。與此相關的行政、教學與研究早年則隸屬於醫學生物形態系（以下簡稱醫態系）下的細菌學組，細菌學組並支援疫苗製作，其第一任主任教官亦為嚴智鍾（1949-1952 年）。[32] 由此可知，如臺大一般，早年國防醫學院內的免疫學相關教學及研究也都與細菌學密切相關，基本上以傳染病防治及疫苗製作為主，且人員交流相當密切，如嚴智鍾便同時教授臺大的「細菌學」及國防的「細菌血清學」。韓韶華是這樣回想早年嚴智鍾的教學：

> 嚴教授上課簡單明瞭，學生非常輕鬆，一堂課兩個小時下來，筆記一頁都不到。那個時候沒有什麼免疫學，有關這方面的是叫血清學。我記得只有四個小時的課，分四個題目：抗原抗體反應，血清診斷，血清治療，預防接種。四小時兩堂課下來，只有兩頁。現在可不得了，一堂課下來，共同筆記就是一大本。……民國 43 年高雄醫學院成立，45 年中國醫學院成立，47 年臺北醫學院成立。所有醫學院都差不多，細菌學內有四到六個小時的血清課，只有教學，很少研究。[33]

從韓韶華[34] 早年的研究與求學歷程能看出，戰後初期臺灣免疫學研究是如何在以傳染病防治為主的細菌學領域中開展，以及在此一過程中，美援對臺灣醫療研究的重要影響。韓韶華 1955 年畢業於國防醫學院，1959 年結束國防系統醫院輪調醫師生活，回任母校醫態系細菌學組助教，並入住美國在華醫藥促進局募款興建的宿舍「學人新村」（ABMAC Village）。同時，韓在中華醫學基金會（China Medical Board, CMB）的支援下開始進行結核桿菌鑑定與抗藥性等研究。[35]

---

32 國防醫學院院史編纂委員會編，〈微生物及免疫學科〉，頁 753-759；國防醫學院院史編纂委員會編，〈藥品研究製造所〉，收於國防醫學院院史編纂委員會編著，《國防醫學院院史》，頁 847-853。

33 周湘雲、許宏彬主編，《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頁 26-27。

34 韓韶華，1948 年考入國防醫學院，隔年遷抵臺北。1955 年國防醫學院畢業，1962 年考取長期科學發展基金會獎學金，隔年赴美國華盛頓大學攻讀免疫學。歷任過敏病防治基金會董事長、臺灣過敏病中心主任、中華民國微生物學會理事長、中華民國免疫學會首屆理事長、國防醫學院研究部主任、陽明醫學院／醫學大學校長、振興復健醫學中心院長等。關於韓韶華詳細生平，參見韓韶華口述，喻蓉蓉訪問，喻蓉蓉、藍玉人記錄整理，《臺灣免疫學拓荒者：韓韶華先生訪談錄》，頁 295-303。

35 韓韶華口述，喻蓉蓉訪問，喻蓉蓉、藍玉人記錄整理，《臺灣免疫學拓荒者：韓韶華先生訪談錄》，頁 97-98。

1959 年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長科會」，為今科技部之前身）[36] 成立，是戰後初期研究資源匱乏時，可供研究者申請研究經費的少數機構之一。長科會除了支援韓進行葡萄球菌的感染研究外，更在 1962 年選拔韓赴美進修兩年。主管國防醫學院醫態系細菌學組的戴佛香教授建議韓赴美攻讀免疫學以改良國防醫學院的疫苗製造，因為「細菌學組負責軍中疫苗供應，在疫苗製造過程中常出問題」。[37] 當時美軍駐在臺北的遠東重要醫療研究機構「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U.S. Naval Medical Research Unit 2，簡稱 NAMRU-2）[38] 中，研究沙眼疫苗的 Thomas J. Grayston 推薦韓前往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微生物系，在當時免疫學界巨噬細胞權威 Russel S. Weiser 門下攻讀免疫學博士。[39] 韓日後回憶道，前往華盛頓大學後才知道「原來免疫學已不只是做疫苗的學問而已」，還包括如腫瘤免疫、自體免疫、過敏病、移植免疫等全新的研究課題。[40]

四、從細菌學及微生物學中開展：1960 年代國際免疫學的發展與引介入臺

當 1962 年韓韶華在華盛頓大學訝異於免疫學「不只是做疫苗的學問」時，臺灣的研究者也以不同的方式關注著國際免疫學的快速發展。1960 年澳洲學者 Frank M. Burnet 以及英國學者 Peter Medawar 因獲得性免疫耐受性（acquired immunological tolerance）概念的提出與證實，共同獲頒諾貝爾生理／醫學獎，是戰後免疫學研究的早期重要成果。在免疫學理及概念的轉變與擴張方面，Burnet

---

36 長科會成立於 1959 年，初期經費亦多來自於美援「科學教育計畫」，參見楊翠華，〈王世杰與中美科學學術交流，1963-1978：援助或合作？〉，《歐美研究》29: 2（1999 年 6 月），頁 42；楊翠華，〈臺灣科技政策的先導：吳大猷與科導會〉，《臺灣史研究》10: 2（2003 年 12 月），頁 71-73。

37 韓韶華口述，喻蓉蓉訪問，喻蓉蓉、藍玉人記錄整理，《臺灣免疫學拓荒者：韓紹華先生訪談錄》，頁 97。

38 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早年於二戰期間駐在紐約洛克斐勒醫學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並於戰爭後期派駐太平洋關島地區，於 1946 年停止活動。1955 年經過臺美數次協商後，海軍第二醫學研究中心於臺北重新成立，以遠東地區傳染病為研究重點。參見 Stephen J. Savarino, "A Legacy in 20th-Century Medicine: Robert Allan Phillips and the Taming of Cholera,"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35: 6 (Sep. 2002), pp. 713-720.

39 韓韶華口述，喻蓉蓉訪問，喻蓉蓉、藍玉人記錄整理，《臺灣免疫學拓荒者：韓紹華先生訪談錄》，頁 97-98。

40 韓韶華口述，喻蓉蓉訪問，喻蓉蓉、藍玉人記錄整理，《臺灣免疫學拓荒者：韓紹華先生訪談錄》，頁 103。

強調現代免疫學的發展不再聚焦於傳染病防治，而是去理解一連串臨床上的更為細緻複雜的問題。例如，為何在母體內共用一個胎盤的異卵雙胞胎，可以擁有兩個血型且接受互相移植皮膚，而不致於發生一般移植或輸血常見的排斥現象？又為何有些病人會對本身的組織或細胞產生免疫反應，因此產生自體免疫病？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從抗體的生成機制入手，而抗體生成機制也成為此一時期最重要的免疫研究議題。[41] 換言之，戰後免疫學的發展慢慢的由戰前重視血清抗體（又稱為體液免疫），轉向開始關注抗體生成背後的各種細胞之分化與增殖機制（細胞免疫），包括如巨噬細胞、淋巴細胞、T 細胞、B 細胞等。[42]

古典免疫化學認為抗體的生成機制是由外來入侵的抗原（如病毒及細菌等微生物）促成了體內與之對應抗體的生成；也就是說抗原入侵在先，像是個「模組」（template）提供訊息並「指導」對應抗體的生成，而人體藉此特定抗體與之對抗。然而，指導說並無法說明許多的臨床現象，如自體免疫疾病：抗體在缺乏外來抗原指導的情況下大量生成並與自體組織及細胞產生有害反應。1950 年代後期，參考其他學者的研究後，Burnet 提出株系選擇理論（clonal selection theory），認為抗體的製造與蛋白質的合成一樣，都是由基因來決定，而非外來的抗原所指引。人體免疫系統是在胚胎時期先製造大量不同的株系細胞，再藉由與子宮內環境互動學習辨識「自我」（會與自體組織反應的株系消亡），之後才「選擇」留下得以與各種可能的「他者」作用的株系。到了胚胎發育末期，成熟免疫細胞碰到自體的抗原時就不再被消滅。相反地，外來抗原會開始刺激特定抗體的生成機制。這種個體從自我辨識開始，逐漸學習如何區辨「自我」與「非我」的過程，便成為免疫最重要的功能。[43]

Peter Medawar 在 1950 年代透過一系列的移植實驗證實了 Burnet 的株系選擇

---

41 Frank M. Burnet, “The Mechanism of Immunity,” *Scientific American* 204: 1 (Jan. 1961), pp. 58-67. 根據 Thomas Söderqvist 以及 Arthur M. Silverstein 針對 1951-1972 年間國際間所舉辦之免疫相關會議的研究，抗體生成機制是此時期最重要的核心研究議題。Thomas Söderqvist and Arthur M. Silverstein, “Participation in Scientific Meetings: A New Prosopographical Approach to the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Science-The Case of Immunology, 1951-72,” p. 528.

42 關於體液免疫及細胞免疫兩個免疫學說的發展與彼此間的消長，可參見 Arthur M. Silverstein, *A History of Immunology*，特別是第二~四章。

43 Frank M. Burnet, “A Modification of Jerne’s Theory of Antibody Production Using the Concept of Clonal Selec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Science* 20: 3 (Oct. 1957), pp. 67-69.

理論。Medawar 發現，在動物胚胎發育過程中注入同種但不同個體之生物皮膚組織液，則該動物在出生發育成熟後進行皮膚移植將不會產生排斥反應。也就是說，在個體胚胎發育過程中，免疫系統會將人為注入胚胎環境中的外來組織液辨識為「自我」，於是會與此產生免疫反應的株系細胞便凋萎不再發育，日後便不會對此組織產生排斥；亦即該實驗動物人為地得到了某種獲得性免疫耐受性。[44]

在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戰後的研究者已經開始嘗試重新定義現代免疫學的研究取徑與疆界，將免疫學與細菌學等關注熱帶傳染病等學科的「疫苗免疫」進行切割或重組。如前述，Burnet 在其 1960 年諾貝爾獎演說中便提出新免疫學的誕生。進一步地，Burnet 更指出，「選擇」這個自達爾文《物種原始》（*Origin of Species*）出版以來生物學中的中心概念，同樣也可以用來理解免疫學的核心作用：分別自我與非我。他因此宣稱，「現代免疫學不再只是醫學的一個分支。它本身已經是一個可以對吾人理解生物學核心問題作出巨大貢獻的學科（discipline）。」[45] 至此，免疫不再只被視為製造特定抗體以對抗外來微生物病原體的單純反應，而是一種不間斷的，個體自胚胎時期起不停地在體內辨識「自我」（不產生免疫反應）及「非我」（會引起免疫反應）的重要機制，提供一種重新理解人類生長及演化的新視野，也帶入如胚胎免疫、免疫耐受性及免疫轉移（adoptive immunity）等新研究課題。另一方面，在臨床上免疫不再被視為純然對人體有益的保護機制，而是也有可能導致對人體傷害的負面反應，因此得以納入如移植、過敏、腫瘤免疫及自體免疫病等新興醫療議題。

從機構化與專業化的角度觀之，1960 年代也是免疫學發展的重要關鍵年代。與二戰前成立，著重於傳染病防治的國際衛生組織如國際公衛局（Office International d'Hygiène Publique）及國聯衛生組織（League of Nation Health Organization）等不同，戰後成立的 WHO 於 1960 年代起便開始採取更廣泛的措施來進行疾病預防及治療，以提昇整體健康情況。[46] 這其中便包括於日內瓦 WHO

---

44 R. E. Billingham, L. Brent, and P. B. Medawar, "Quantitative Studies on Tissue Transplantation Immunity III. Actively Acquired Toleranc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 Biological Sciences* 239: 666 (Mar. 1956), pp. 357-414.

45 Frank M. Burnet, "The Mechanism of Immunity," pp. 58-61.

46 Theodore M. Brown, Marcos Cueto, and Elizabeth Fe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International' to 'Global' Public Health,"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6: 1 (Jan. 2006), p. 66.

總部及世界各地進行重點研究計畫。WHO 認為免疫學是戰後發展最迅速的生物醫學領域且在臨床上有重要的影響，於是 WHO 的第一個中央研究小組便是免疫學研究小組，並在隨後數年間於奈及利亞的伊巴丹（Ibadan, 1964-1965）、巴西的聖保羅（1966）、瑞士的洛桑（Lausanne, 1967）、新加坡（1969）及墨西哥（1969）成立免疫學研究及訓練中心，並提供資源支援在倫敦、雅典、埃及以及馬德里進行免疫學研究計畫或開設短期課程。[47] 1984 年獲頒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的重要免疫學者 Niels K. Jerne，便於 1956-1962 年間擔任 WHO「生物標準及免疫學部門」（the Sections of Biological Standards and of Immunology）的負責人，並自 1962 年後長期擔任 WHO「免疫學專家諮詢委員會」（the Expert Advisory Panel of Immunology）成員。[48]

除此之外，與免疫相關的研究組織、機構與會議也快速增加，無論是基礎研究（如抗體機制與免疫系統概念）或臨床應用（如過敏、移植及免疫腫瘤）方面。[49] WHO 亦積極串連全球免疫學家及各地免疫學會，促成跨國性免疫研究組織的成形。1969 年 12 個國家的免疫學會共同組成國際免疫學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Immunological Societies, IUIS），並自 1976 年起成為國際科學聯合總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 ICSU）這個創辦於 1931 年，國際間最大的非政府科學組織中的會員之一。[50] 早期 IUIS 除了舉辦國際免疫學大會並在各會員國推動免疫教學及研究外，還協助 WHO 在世界各地推動免疫學的教學、研究及專科化（包括獨立的免疫系所等），並強調現代免疫學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細菌學所著重的疫苗血清免疫之間的區別。如 IUIS 的創會理事長 Bernard Cinader 所言，IUIS 希望將免疫學從傳統微生物學中解放出來，因為微生物學將免疫研究局限於與傳染病防治相關的部份。但 Cinader 也強調，將免疫學獨立出來是一個相當艱

47 Mark Jackson, *Allergy: The History of a Modern Malady*, pp. 116-118.

48 關於 Niels K. Jerne 生平的介紹，參見“Niels K. Jerne: Biographical,”「Nobelprize.org」，下載日期：2014 年 3 月 2 日，網址：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medicine/laureates/1984/jerne-bio.html。

49 Thomas Söderqvist and Arthur M. Silverstein, “Participation in Scientific Meetings: A New Prosopographical Approach to the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Science-The Case of Immunology, 1951-72,” pp. 513-548.

50 國際科學聯合總會於 1998 年更名為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s），但簡稱仍維持 ICSU。下文中提到的各國際科學學會之中文名稱，統一參照國際科學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官方網站之中譯。參見〈所轄學會〉，「國際科學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下載日期：2014 年 3 月 29 日，網址：http://icsu.sinica.edu.tw/societyindex.htm。

鉅的工作並遭遇相當多阻力，就如同自 1940 年代起生物化學（biochemistry）希望脫離生理學而獨立的情況一般。[51] 早期重要的免疫學教科書 *Immunology for Students of Medicine* 於 1963 年出版，很快隔年即 1964 年推出大幅修改的第 2 版，並於 1970 年快速地再次修訂 3 版，足見現代免疫學在 1960 年代的發展之速。[52] 在第 1 版的前言中，作者直言這本新教科書的意義在於讓醫學生能夠「從醫療實作中理解免疫學的基本原理與當今議題，而不是從細菌學、免疫化學、生物分類學等角度觀之。」[53] 簡言之，自 1960 年代起無論是在學理、機構及臨床等方面，現代免疫學都快速發展，且逐漸離開傳統細菌學的範疇。

1960 年代初期臺灣醫界也密切關注現代免疫學的快速發展。1961 年 1 月臺大醫學院的學生刊物《青杏》刊載介紹前述 Burnet 與 Medawar 榮獲諾貝爾獎的文章，詳述獲得性免疫耐受性研究與臨床移植現象的緊密關連。[54] 這篇文章是由當時臺大細菌學科張學賢，[55] 指導醫科學生黃文哲所完成的。與此同時，1961 年 5 月《臺灣醫學會雜誌》也刊登了一篇由當時臺大醫科生，日後成為臺灣重要放射腫瘤權威的林芳仁，以及生化學科主任及知名營養學家董大成，所共同譯自同年一月份的 *Scientific American*，[56] 原文由 Burnet 執筆的〈免疫的原理（Mechanism

---

51 B. Cinader, "The Origins and Early Years of IUIS," *Immunology Today* 13: 8 (Aug. 1992), pp. 323-326. 生物化學界要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學科，除了須要與生理學界保持距離之外，也必須與化學界劃清界線，因此相當不容易；而加入 ICSU 並取得其認可也是早期生物化學發展的策略之一。世界生物化學學會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Biochemistry, IUB）於 1955 年成為 ICSU 會員。參見 E. C. (Bill) Slater, "This is the IUBMB History: The History of IUB (MB)," *IUBMB Life* 57: 4/5 (Apr./May 2005), pp. 203-211.〔按：IUB 於 1991 年改為 IUBMB（International Union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迄今〕。

52 此書的兩位作者之一是重要的免疫學家，也是 IUIS 早期副會長（1971-1974）及會長（1974-1977）J. H. Humphrey。

53 目前臺大圖書館仍藏有本書第 2 版（1966 年由臺北環球書社取得代理權後出版）及第 3 版。

54 黃文哲，〈器官移植：免疫耐性—抗體產生機序〉，《青杏》11（1961 年 1 月），頁 3-5。

55 張學賢，1951 年臺大醫科畢業，1960 年取得東京大學博士，先後曾任臺大醫學院細菌學科講師、副教授及教授。張早期從事結核疫苗（BCG）研究，1956 年以 WHO 獎學金前往澳洲墨爾本大學的微生物學系及聯邦血清實驗室進修，並曾在 Burnet 主持的澳洲 Walter and Elisa Hall Institute 進行研究。張學賢也於 1962-1964 年以美國國家科學院獎學金前往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微生物及免疫學系進行病毒及免疫研究。任職細菌學科期間，1957-1958 年間張亦兼職於前述「臺灣血清疫苗製造所」，主持臺灣 BCG 製造事宜。關於張學賢的研究歷程，參見 R. R. Bowker, ed., *American Men & Women of Science, 1998-99: A Biographical Directory of Today's Leaders in Physical, Biological, and Related Sciences*, Vol. 2, C-F (New Providence, N. J.: Bowker, 1998), p. 170; 陸坤泰、黃文哲採訪，〈我們的細菌學科〉，《青杏》8（1959 年 7 月），頁 9-10；鄭吉男，〈閒話當年〉，收於臺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研究所編，《臺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研究所三十週年紀念專輯》（臺北：臺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研究所，1996），頁 69-72。

56 *Scientific American* 為知名的美國科學普及雜誌，也是戰後臺灣的重要科學及醫學資訊來源。2002 年之後由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此雜誌中文版《科學人雜誌》。

of Immunity）〉。[57] 1964 年《青杏》刊載了由林芳仁以筆名 Mr. Slow 所寫的〈胸腺與免疫〉一文，介紹 1961-1963 年國際免疫學界針對胸腺此一人體最大淋巴器官所進行的一系列實驗。[58] 而 1965 年甫自美國完成進修的張學賢則整理了其於臺大醫院及省立醫院小兒科的演講內容，發表了〈漫談免疫學的新觀念〉，統整性地介紹了 1960 年代初期全球免疫學界的快速發展。[59] 除了學理的介紹之外，現代免疫學的運用，特別是與癌症及器官移植之間的關聯也是 1960 年代初期引介的重點。[60]

從這些早期免疫學譯介文章可以看出幾個本文關切的重點。首先，是戰後初期的知識流通管道方面，除了專業醫學期刊雜誌的引介之外，外文的科普刊物以及學生刊物在戰後初期臺灣現代醫學知識傳播上，也扮演相當的重要性。與當下學生刊物著重於生活及交誼性質不同，1950 及 1960 年代的《青杏》除了扮演臺大醫學生與當時許多留外的學長姊的交流平臺之外，更在早期醫學知識傳播管道有限的情況下，肩負相當濃厚的醫學知識傳播使命。[61] 其次，從這些文章的書寫脈絡也可以看出，在 1960 年代初期現代免疫學是透過哪些歷史行動者、哪些管道，並借助於哪些資源被帶入臺灣。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臺大醫學院細菌學科及生化學科的師生。而也正是從細菌學及生化學這兩個向來最重視（傳染病）免疫研究的學科中，現代免疫學開始發芽茁壯。而早期引介現代免疫學研究進入臺灣的學者，如張學賢、韓韶華等人，一開始也是在傳統細菌學的範疇中，為了要提昇臺灣的疫苗製作水平，才取得資源留學進修，進而踏入免疫學的領域。至於醫學生免疫知識的取得，根據當時臺大醫科生鄧昭雄的回憶，1960 年代中期臺大醫科的授課中，與免疫學相關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大四的細菌學課程，主要是古典的免疫預防注射、蛇毒血清、破傷風、百日咳、白喉、小兒痲痺等。反而是透過

---

57 Frank M. Burnet 著，林芳仁、董大成譯，〈免疫的原理（Mechanism of Immunity）〉，《臺灣醫學會雜誌》60: 5（1961 年 5 月），頁 562-568。本文譯自 Frank M. Burnet, "The Mechanism of Immunity," pp. 58-67.

58 Mr. Slow，〈胸腺與免疫〉，《青杏》19（1964 年 12 月），頁 37-38。

59 張學賢，〈漫談免疫學的新觀念〉，《青杏》20（1965 年 5 月），頁 15-20。

60 參見 Mr. Slow，〈癌起於病毒乎？〉，《青杏》12（1961 年 7 月），頁 21-23；林長春，〈癌、病毒與疫苗〉，《青杏》11（1961 年 1 月），頁 8-10。〔按：本文譯自 1960 年 10 月份品珍（*Pageant*）雜誌，一份 1944-1977 年於美國發行的文摘類雜誌〕。

61 關於《青杏》的初步整理與討論，參見許宏彬，〈年輕醫師的徬徨與抉擇：從《青杏》看 1950 及 1960 年代臺灣醫學教育、醫師出路及外流問題〉，《興大歷史學報》27（2013 年 12 月），頁 53-81。

一些雜誌的閱讀以及同學間的小組書報討論，鄧及其同學們（包括陳定信、賴明詔等）開始認識如胚胎免疫等現代免疫學的內容。[62]

1965 年臺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研究所成立，共分為細菌學組與寄生蟲學組。其中，甫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完成博士後研究進修的細菌學組教師張學賢，自第一屆起便指導兩位研究生進行免疫學研究，並在微生物學研究所開設臺灣首見的免疫學獨立課程「高等免疫學」，開始在臺大推動現代免疫學研究。根據臺大微生物學研究所第一屆學生鄭吉男的回憶，張學賢自美國「回國後，首先講解 Burnet's clonal selection theory」。[63] 不久，1968 年張學賢離開臺大赴美發展，同年自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系取得博士學位的居小燕加入臺大醫學院細菌學科及微生物學研究所，繼續進行並指導免疫學相關的研究、授課與實驗，是最早自國外取得博士學位回臺的免疫學家之一。[64] 早期免疫學相關實驗設備相當缺乏，居小燕除了需要自編實驗手冊之外，還需要與研究生一同自製上課用的實驗儀器。居小燕的早期研究生胡承波（1969-1971 年就讀臺大微生物學研究所）便回憶，居小燕曾帶領她到光華商場採購壓克力板與白金絲，並到學校的機械工坊自製電泳設備。[65] 1973 年居小燕彙集了返臺後的授課講義，編纂並出版了臺灣相當早期的中文免疫學教科書及實驗講義。相較於前述嚴智鍾四個小時的傳染病免疫血清學課程（包括抗原抗體反應、血清診斷、血清治療及預防接種），居小燕的免疫學課程已相當不同且豐富許多。居的免疫學教材分為四大章節，包括抗原與抗體、抗原抗體之相互作用、過敏反應，及細胞免疫及個體免疫的調節（包括株系選擇理論及其修正等發展），其中後兩章節為過往免疫學教學所無。即便如此，從居的講義自序中也可看出，至少在 1978 年之前臺大醫學院大學階段的免疫學教學，仍多放在細菌學、微生物學或醫用微生物學的總論或比

---

[62] 鄧昭雄 1961-1968 年就讀臺大醫科，歷任臺大醫院皮膚科住院醫師（1968-1972 年）、臺大醫學院皮膚科講師（1972-1976 年）及副教授（1976-1979 年）。參見許宏彬訪談、周湘雲記錄，〈鄧昭雄訪談逐字稿〉（未刊稿），2011 年 6 月 15 日，於臺大醫學院皮膚科；周湘雲、許宏彬主編，《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頁 31-32、195-196。

[63] 鄭吉男，〈閒話當年〉，頁 69-72。

[64] 居小燕 1962 年畢業於臺大醫科，1966 年取得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博士學位，自 1968 年起成為臺大醫學院細菌學科及微生物學研究所教師。參見臺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研究所編，《臺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研究所三十週年紀念專輯》，頁 2、13、69-73、123；周湘雲、許宏彬主編，《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頁 68、76。

[65] 周湘雲、許宏彬主編，《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頁 39-40。

較前面的單元中講授，大體上仍從屬於微生物學的範疇。[66]

在國防醫學院方面，原本以改良疫苗製造之目標而公費赴美的韓韶華，於1966年取得博士學位，並帶著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支持的三年痲瘋細胞免疫研究計畫（後又展延三年，直到1973年為止共六年），回任國防醫學院醫態系細菌學組教官，兼任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研究員，負責免疫學教學及研究。自此，韓韶華便積極推動臺灣免疫學相關教學及研究活動。1967年韓在《中華醫學雜誌》中發表〈細胞免疫與傳染病〉一文，介紹現代免疫學的新概念與臨床應用，便清晰地將現代免疫學強調的細胞免疫概念與傳統微生物研究所關注的體液免疫作一區隔，簡要地描述現代免疫學在傳統傳染病研究的新應用。[67] 在教學方面，1966年國防成立生理學研究所，下設微生物學組，開始招收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生。韓韶華除了在國防醫學院開設大學部「醫用免疫學」（第一個大學部等級的獨立免疫課程）及研究所「高等免疫學」之外，也前往臺大微生物學研究所兼課，開設高等免疫學。同時，他也積極在各醫學院（臺大、高醫、中國、北醫）及各大學生物系（如輔仁、東海、臺大動物系及師大）推介「現代免疫學」的新觀念。韓韶華形容自己當時四處兼課是「膽大包天，什麼地方都敢去，什麼地方都敢闖」。[68]

韓韶華不僅從美國帶回免疫學的新觀念，更在臺灣跨校免疫研究社群的形構上扮演關鍵的角色。首先，是韓所帶回的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研究計畫經費充裕，可以支持各校對免疫學有興趣的學生，至其研究室進行半年或一年的短期研究。許多日後臺灣知名的免疫學者早年都曾在韓的實驗室進修。[69] 根據韓韶華的自述，當時他三年NIH計畫的經費為每年美金15,000元，共45,000元，折合臺

---

66 居小燕編著，《免疫學》（臺北：合記圖書出版社，1974）；居小燕編著，《免疫學實驗手冊》（臺北：合記圖書出版社，1973）。其中《免疫學》顯然相當受到歡迎，曾於1978年再版。參見周湘雲、許宏彬主編，《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頁76。

67 韓韶華，〈細胞免疫與傳染病的關係〉，《中華醫學雜誌》復刊14: 2（1967年6月），頁219-227。

68 臺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研究所編，《臺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研究所三十週年紀念專輯》，頁39-40；周湘雲、許宏彬主編，《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頁29-30。

69 這些曾在韓韶華研究室進修的學者包括：沈豐文（輔大生物系畢業，臺大免疫所第一任專任所長）、張瑞峰（曾任榮總免疫科主任、高雄醫學院教授）、龔忠恕（輔大生物系畢業，生技公司T Cell Science總裁）、鄭吉男（臺大微生物研究所第一屆畢業生，Illinois大學免疫學博士，曾任Walter Real陸軍研究所實驗病理系主任）及許國雄（臺大微生物研究所第四屆畢業生，曾任衛生署檢疫總所所長）等人。參見周湘雲、許宏彬主編，《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頁47、165；韓韶華口述，喻蓉蓉訪問，喻蓉蓉、藍玉人記錄整理，《臺灣免疫學拓荒者：韓韶華先生訪談錄》，頁113、149。

幣 1,800,000 元，比整個榮總醫學研究部的經費還要多！[70] 有興趣出國深造免疫學的人，即使不是國防的學生，韓也會透過其人際網絡為之引介。[71]

除了串連起臺灣與美國間的免疫研究網絡之外，更重要的是，1966 年韓韶華創辦「免疫學討論會」，以北部的機構如臺大、國防、北醫、三總、榮總的老師、學生、臨床醫師及醫技人員為主，定期在國防醫學院聚會，討論並分享最新的基礎免疫學研究，形構臺灣最早的免疫學研究社群。這個免疫學討論會成為 1960 及 1970 年代臺灣最重要的免疫學交流平臺。周成功便回憶道，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期當他甫從美返臺任職於中研院生物化學研究所時，對臺灣的整個科學社群都還相當陌生，「免疫學討論會」是他早期可以參與的，「感覺非常溫暖」的學術社群。也因此日後周成功才由中研院生物化學研究所轉入榮總，並參與陽明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的籌辦。[72] 簡言之，隨著 1960 年代國際免疫學在學理、機構及組織的快速發展，臺灣的醫學界也開始關注、引介現代免疫學的發展，並注意其與過往傳染病免疫的區別。而 1960 年代以細菌學科為主的留外返臺學人開始推廣並介紹現代免疫學，使免疫學慢慢從細菌學的範疇中逐漸發展出獨立的課程、跨國的研究網絡以及在地的研究社群。

五、在診間與實驗室之間：
1970 年代的國際援助、免疫檢測技術與臨床免疫學

1960 年代隨著國際免疫學界在學理及機構建置上的快速發展以及早期留美學者的返臺引介，免疫學在臺灣也逐漸從細菌學及微生物學的領域中發展出新面貌。自 1960 年代後期起，現代免疫學在臨床上的應用，特別是各種免疫檢測技術的引入及其在臨床疾病的運用與推廣，更吸引跨國及跨科別的醫師一同投入相

70　韓韶華口述，喻蓉蓉訪問，喻蓉蓉、藍玉人記錄整理，《臺灣免疫學拓荒者：韓韶華先生訪談錄》，頁 148。

71　如韓韶華便介紹沈豐文前往美國 New Mexico 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跟隨其師兄（同為華盛頓大學 Weiser 的學生）Sei Tokuda 進修免疫學，也介紹另一位學生張瑞峰去北卡羅萊納州的 Bowman Gray 醫學院，跟隨韓氏的另一師兄 Q. W. Mayrvik 進修免疫學。參見周湘雲、許宏彬主編，《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頁 165。

72　周湘雲、許宏彬主編，《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頁 89-90。

關研究及診療工作，進一步擴大免疫學在臺灣的發展網絡。如 1968 年臺大醫院完成亞洲首例腎臟移植，是免疫學在臨床上的重要運用及發展，不但吸引了許多學生的投入，也讓院方開始重視並培養免疫人才。[73] 1972-1973 年臺大醫院選送李治學至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外科見習移植免疫學，學習腎臟移植的免疫配對。[74] 然而，真正讓臺灣的免疫學得以在 1970 年代進一步發展的契機，卻是在國際醫療合作及援助下所開展的鼻咽癌及過敏研究。

1968 年起，臺大醫學院與日本團隊開始長期合作進行鼻咽癌的相關研究，意外地為臺灣免疫學研究投入新血。自日治時期開始，日本耳鼻喉科醫師及研究者便對在臺灣特別好發的鼻咽癌保持高度興趣，1940 年代初期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山下憲治便曾為文探討之。[75] 戰後，鼻咽癌持續引起研究者的注意。1949 年臺大醫院病理科的葉曙及耳鼻喉科的杜詩綿一同蒐集 1946 年 1 月至 1949 年 5 月，臺大醫院共 49 例的鼻咽癌，發表了〈鼻咽癌之組織病理學研究〉。[76] 此後，整個 1950 年代鼻咽癌一直是臺大醫院病理科及耳鼻喉科的關切所在，葉曙更在 1962 年集結了一千個病例，在國際期刊 *Cancer* 上發表。[77] 1960 年代起，國際學界開始關注癌症與病毒之間的關係，而鼻咽癌被認為極有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人類癌症之一，引發日本學者的高度興趣。[78]

至 1972 年臺日斷交為止，以東京大學醫科學研究所免疫學教室的川村明義[79]

---

73 如 1965 年畢業於臺大牙科，日後成為臺大病理學研究所教授的許輝吉，便是因為對腎臟移植的排斥反應現象感興趣，而開始接觸免疫學研究。參見周湘雲、許宏彬主編，《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頁 67-68。關於早期臺大進行腎臟移植的歷程，參見李俊仁，《生命的火焰：李俊仁回憶錄》(臺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74 梁妃儀、陳妤嘉、劉滄柏、蔡篤堅，《臺灣癌症醫學發展史：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三十週年紀念專刊》(臺北：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記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 38。

75 山下憲治，〈臺湾に於ける上咽頭悪性腫瘍の頻度に就いて〉，《熱帶醫學》1: 1 (1942 年 7 月)，頁 80-89。

76 葉曙、杜詩綿，〈鼻咽癌之組織病理學研究〉，《臺灣醫學會雜誌》48: 11/12(1949 年 12 月)，頁 113-136、287-289。

77 Shu Yeh, "A Histo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Carcinomas of the Nasopharynx with a Critical Review as to the Existence of Lymphoepitheliomas," *Cancer* 15: 5 (Sep./Oct. 1962), pp. 895-920.

78 有關鼻咽癌與病毒研究的簡介，參見林宗洲，〈醫學新貌：從 EB 病毒談到鼻咽癌〉，《當代醫學》17 (1975 年 3 月)，頁 41-46。

79 川村明義先後曾於東京大學醫科學研究所免疫學教室、東京大學傳染病研究所任職，也是 1972 年日本免疫學會會長，並於 1989 年因為免疫螢光抗體法的確立與普及獲得日本醫界重要的「野口英世」記念醫學獎 (第 33 回)。野口英世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日本重要的細菌學者，也是家喻户曉的

為主的日本學者，便與臺大跨科別的團隊開始跨國合作。日方提供研究經費及技術(主要是日本厚生省的研究獎助以及日本海外技術協力事業團 Overseas Technical Cooperation Agency〔OTCA）的經費)，臺灣方面則主要提供鼻咽癌樣本。透過這樣的合作計畫，日方將檢測血清中病毒抗體的重要技術「免疫螢光抗體法」引入臺灣，同時 OTCA 也提供經費資助三位臺大的年輕醫師前往日本進修此一重要技術。當時團隊中年輕的臺大醫師林宗洲也因此拜入川村門下，以鼻咽癌之抗體免疫取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日後成為免疫學會的重要成員（第一、二屆總幹事）。[80] 1968 年進入臺大微生物學研究所就讀的陳振陽便回憶道，「川村教授來教我們怎麼樣分離 IgG（G 型免疫球蛋白），怎麼樣 conjugate（接合）這個螢光的色素，這種技術是他帶進來的。在那時候我們都很羨慕能參與並學習操作的同事。我們那時候剛進來，沒有機會學做這個高深的技術。」[81] 徐茂銘也認為，臺日合作計畫讓臺灣的鼻咽癌研究進入免疫學和病毒學方面的領域，也引領自己進入腫瘤免疫學的領域。[82]

從臺日合作的鼻咽癌計畫可以看出，技術在臺灣免疫學的在地發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免疫螢光抗體法除了成為臺日跨國癌症及腫瘤免疫研究計畫中引進的重要技術之外，也很快地成為其他疾病臨床診斷的重要工具，在免疫學專科形構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邊界物」角色；亦即，透過此一應用廣泛的基本免疫檢測技術，讓多元的行動者開始接觸，進入免疫學的研究。當耳鼻喉科林宗洲等人在 1960 年代末及 1970 年代初期，跟著川村團隊學習免疫螢光抗體法時，臺大

生物醫學研究者，其記念醫學獎主要頒給對傳染病及免疫學有重要貢獻的學者。參見〈野口英世記念医学賞受賞者一覧〉，「公益財団法人野口英世記念会」，下載日期：2013 年 7 月 22 日，網址：http://www.noguchihideyo.or.jp/igakusyo/。

80 臺大醫學院方面先後參與的跨科際研究者包括病理科（葉曙、林文士人）、耳鼻喉科（杜詩綿、徐茂銘、林宗洲）、細菌學科（楊照雄）、公共衛生科（林東明）、血液腫瘤科（劉禎輝）等人。有關臺日鼻咽癌合作計畫的敘述，主要參考當時計畫參與者之一、中華民國免疫學會第四屆理事長（1984-1986）徐茂銘的回顧，參見徐茂銘，〈臺灣鼻咽癌研究的故事（上）〉，頁 38-41。日方對此合作計畫的回顧，包括自 1965 年開始由厚生省提供資源所進行的人類癌症病毒的免疫學研究，可見川村明義，〈日本の海外医療協力(46)台湾：上咽頭癌の病因探究をめぐる日台共同研究〉，《臨床科学》14: 4（1978 年 4 月），頁 538-545；亦可參見梁妃儀、陳妤嘉、劉滄柏、蔡篤堅，《臺灣癌症醫學發展史：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三十週年紀念專刊》，頁 25-27、49-52；周湘雲、許宏彬主編，《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頁 40-44。

81 周湘雲、許宏彬主編，《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頁 44。

82 梁妃儀、陳妤嘉、劉滄柏、蔡篤堅，《臺灣癌症醫學發展史：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三十週年紀念專刊》，頁 52。

皮膚科的年輕醫師，也是日後免疫學會第一屆總幹事鄧昭雄，便很快地意識到這是一個臨床上重要的診斷工具，並將之運用在皮膚科對紅斑性狼瘡的診斷上。此種免疫研究的臨床運用得到臺大醫院院方的重視，並提供資訊協助鄧昭雄向國科會、教育部以及衛生署申請經費，於 1972 年成立了罕見的開放性臨床免疫研究室（實驗室）。這個早期的臨床免疫實驗室除了提供皮膚科研究診療之外，也開放給其它基礎及臨床學科的研究者使用，讓越來越多人能藉由使用免疫檢驗工具來接觸現代免疫學。[83] 1970 年代中期臺大外科、病理科及解剖學科合作進行腎臟移植手術時，免疫螢光技術已被認為是觀察移植排斥反應不可或缺的兩大技術之一。[84] 前述臺大微生物學研究所的陳振陽便回憶其 1973 年升任講師之後，在鄧昭雄實驗室從事研究的情形：

> 剛剛鄧醫師已經提到他的實驗室是很公開的。我是在 1968 年進入臺大醫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在升任講師以後，由於當時研究經費很缺乏，所以很多的工作是在鄧醫師實驗室進行，他很鼓勵我，而且常說：「有什麼需要材料、儀器，你不用客氣提出來。」他盡量去想辦法。[85]

鄧昭雄日後回想其創設這個開放性免疫實驗室的緣由時，便清楚地指出免疫檢測技術以及開放性實驗室在形構免疫研究社群上的重要性：

> 我堅持的一個構想就是：這個實驗室不應該只限制於皮膚科，應該是還能讓好多人一起加入進來參與，於是就把耳鼻喉、細菌科、小兒科、婦產科都拉進來，無形中大家就透過參與就產生出相互的認可與肯定，並相互合作，於是申請到的錢就會越來越多，就能買很多的機器，有很多的計畫也

---

83 鄧昭雄在訪談中也提到，當時其實驗室「主要大部分還是東大的技術把我帶出來的。」許宏彬訪談、周湘雲記錄，〈鄧昭雄訪談逐字稿〉（未刊稿）；亦可參見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編輯小組編，《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下）：系科所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1999），頁 129；周湘雲、許宏彬主編，《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頁 33-34。

84 另一個重要的技術是電子顯微鏡，參見周湘雲、許宏彬主編，《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頁 67。關於免疫學在器官移植的早期運用，參見許輝吉、李俊仁、李治學，〈人類腎移植之過急性排斥〉，《臺灣醫學會雜誌》74: 4（1975 年 4 月），頁 251-262；許輝吉、李俊仁、李治學，〈同種人類腎臟移植慢性排斥之腎小球與動脈病變〉，《臺灣醫學會雜誌》75: 11（1976 年 11 月），頁 519-527。

85 周湘雲、許宏彬主編，《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頁 49-50。

可以一起做出來。[86]

如果說，1960 年代後期及 1970 年代初期臺日合作的鼻咽癌研究所引入的免疫檢測技術，是形構臺大醫學院／醫院免疫社群的重要邊界物，那麼 1970 年代中期開始由非正式美援所支持的過敏病研究，則進一步串連、擴大臺灣的免疫學社群，並加深基礎免疫學理與一般臨床開業醫師間的關連。自殖民後期起臺日醫學研究者便對如氣喘等過敏病感到興趣，並展開初步的過敏原調查及試驗。[87] 戰後初期，提供過敏病診療的機構已不少，包括臺大醫院內科、榮民總醫院過敏病科等。然而，與今日醫界普遍將過敏視為特定類型的免疫反應不同，一直到 1970 年代中期為止，臺灣的過敏病的研究與診療一般都不涉及免疫原理的討論與應用，而是在個別醫師的專科領域下進行診療，如內科（氣喘）、皮膚科（皮膚過敏）及小兒科（小兒過敏氣喘）等。[88]

這種過敏臨床診療與免疫學理分離的情況並不是臺灣獨有的現象。雖然自二十世紀初期起，西方學者開始關注並從事過敏的研究與診療，但這些活動與此時重視抗體化學結構的免疫學研究並無關連。一直到 1960 年代起，歐美研究者才開始透過免疫學學理來重新檢視過敏病的生成機制，希望能將過敏研究從早期的症狀描述與治療，提升到有免疫學理可依循且有檢驗數據可佐證的現代科學醫療。[89]

86　周湘雲、許宏彬主編，《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頁 33-34。

87　如黃文陶，〈気管支喘息ニ対スル外科的療法効果ノ良否並ニ其レニ伴フ二三臨床的症狀ニ就イテノ討檢〉，《嘉義醫會醫學雜誌》2（1934 年 3 月），頁 19-39；小田俊郎，〈臺灣に關係深き疾病診療の最近の進步〉，收於臺北帝國大學編，《臺北帝國大學紀念講演集：第七輯》（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41），頁 15-23。關於過敏病這個重要的免疫疾病在臺灣的發展，筆者將另文討論之。

88　即使榮總自 1961 年便創設過敏病科，但只有第一任主任趙懿族為過敏病專科醫師，其後便由國防皮膚科教授張新湘兼任。參見韓韶華口述，喻蓉蓉訪問，喻蓉蓉、藍玉人記錄整理，《臺灣免疫學拓荒者：韓韶華先生訪談錄》，頁 121-125。與過敏反應相關的疾病，由發病部位所屬各專科來進行診療的情況，可參見呂耀卿，〈皮膚病學講座（五）：蕁麻疹樣苔癬・結節性痒疹〉，《當代醫學》19（1975 年 5 月），頁 26-29；蘇肇凱講述、蘇仁和整理，〈專題講座：鼻副竇炎與全身各器官的關係〉，《當代醫學》21（1975 年 7 月），頁 27-33。呂耀卿時為臺大醫院皮膚科教授兼主任，蘇肇凱則為臺大醫院耳鼻喉科副教授。

89　例如 1963 年由 P. G. H Gell 以及 R. R. A. Coombs 所提出的，基於免疫學理的新過敏分類類型：Type I 無防禦性（anaphylactic）快速反應型、Type II 細胞毒性（cytotoxic）型、Type III Arthus 反應以及 Type IV 遲緩型（"delayed" type）或細胞免疫（cellular immunity），參見 Mark Jackson, *Allergy: The History of a Modern Malady*, pp. 122-123。關於新過敏分類在臺灣的早期引進與介紹，參見蘇益仁、莊哲彥，〈基礎與臨床：過敏疾患的免疫基礎〉，《當代醫學》13（1974 年 11 月），頁 69-70。

一直到 1960 年代後期起，E 型免疫球蛋白（IgE）作為過敏診斷中重要的生理指標，才逐漸得到過敏研究社群的認同，並於 1968 年得到 WHO 的認可。[90] 換言之，過敏病在某種程度上開始被「免疫學化」了。

1973 年 ABMAC 希望協助臺灣發展過敏病的防治，並將資源交由臺大及國防來運用，提供了臺灣免疫學研究從基礎到臨床運用的另一個重要管道。臺大方面選派長期投入氣喘診療及研究的內科醫師，日後曾擔任免疫學會理事長（1982-1984 年）的莊哲彥赴美進修，並協助其回國後建置實驗室。[91] 赴美進修的莊哲彥也很快地將過敏的免疫機轉介紹給臺灣的醫界。在其 1974 年發表於《當代醫學》，與蘇益仁合著的〈基礎與臨床：過敏疾患的免疫基礎〉一文中便強調，過敏與免疫乃一體之兩面，唯有充分瞭解免疫機制才是解決過敏病的根本之道。[92]

國防醫學院則運用 ABMAC 這筆資源成立「財團法人過敏病防治基金會」，由韓韶華擔任執行秘書，並在國防醫學院成立「過敏病中心」。過敏病中心的首要任務就是開始進行大規模的過敏原調查及製備。在 1975 年韓韶華寫給美方的進度報告中提到，過敏病中心已製備了 263 種過敏原萃取液以供皮膚測試及減敏治療之用。[93] 自 1974-2000 年，過敏病中心所提供的過敏原供應全臺各醫院及個人診所使用。[94] 除此之外，過敏病中心也於 1975 年 6 月在國防醫學院健康中心設立「過敏病示範門診」。[95] 自 1975 年起韓也開始籌辦過敏病訓練班。這個訓練班匯集了跨領域的臨床醫師與研究者，總共舉辦三屆，訓練了 24 位過敏病醫師，主要以軍醫醫院（第一屆）、省立醫院（第二屆）及民間醫療機構（第三屆）中

---

90 Thomas Söderqvist and Arthur M. Silverstein, "Participation in Scientific Meetings: A New Prosopographical Approach to the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Science-The Case of Immunology, 1951-72," pp. 513-548; Mark Jackson, *Allergy: The History of a Modern Malady*, pp. 122-125.

91 莊哲彥，〈亦師亦友：悼詹紹啟先生〉，收於編者不詳，《詹紹啟先生紀念集》（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95），頁 231-232。莊哲彥，臺大醫科畢業，日本神户大學醫學博士。曾於美國西奈山醫院（M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研究，哥倫比亞大學附設聖路加醫院（St. Luke's Hospital）研究、羅斯福醫院（Roosevelt Hospital）研究。歷任利比亞醫療團團長、臺大醫院內科醫師、中沙醫療團團長、中華民國免疫學會理事長、臺大免疫學研究所所長、衛生署愛滋防治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等。

92 蘇益仁、莊哲彥，〈基礎與臨床：過敏疾患的免疫基礎〉，頁 66-70。

93 韓韶華, "Allergy Program in Taiwan, Progress Report (Nov. 1975)," pp. 1-2（韓韶華提供）。

94 韓韶華口述，喻蓉蓉訪問，喻蓉蓉、藍玉人記錄整理，《臺灣免疫學拓荒者：韓韶華先生訪談錄》，頁 127；周湘雲、許宏彬主編，《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頁 99。

95 〈過敏病門診下月初開始〉，《聯合報》，1975 年 5 月 26 日，第 3 版。

的內科及小兒科醫師為主。1978 年免疫學會成立之後，過敏病訓練班便為免疫學會所舉辦的「臨床免疫學長期訓練班」所取代。[96]

以過敏病中心的教學、研究及診療為基礎，在韓韶華的主持下，榮總於 1976 年成立免疫病科，收治如紅斑性狼瘡等一切免疫病，並與外科合作器官移植、與癌病治療中心合作癌症免疫治療。這是臺灣第一個獨立的臨床免疫病科（獨立於內科之外，與各大專科平行），也帶動其他醫院設置免疫病科、過敏免疫病科或過敏免疫風濕病科的風潮，提供過敏免疫醫師的訓練，讓對免疫學有興趣的醫師能有一個相對應的臨床選擇。[97] 而免疫學在臨床上所提供的新思維、技術資源與挑戰性也吸引了臨床醫師的加入。榮總免疫病科第一任總醫師藍忠亮便回憶道，早期的榮總免疫病科成立之初其實就是「疑難雜症科」，免疫病科的醫師會在「每天下班後就到急診室去尋找疑難雜症，別人看不懂的、不收的就收進來免疫病科好好診療」；[98] 而「當年榮總最熱門的是心臟科與胃腸科，免疫學的觀念才剛開始萌芽，醫界許多不清楚的疾病，其實就是免疫病，對我來說十分具有挑戰性，於是決定加入免疫病科」。[99]

同樣地，實驗室技術實作在此亦是重要關鍵。無論是過敏原的純化分析、紅斑狼瘡腎炎病人的腎臟病理切片檢驗，亦或者器官移植手術中的配對，背後都需要實驗室及相關技術的支援。由於接任過敏病中心主任並主持榮總免疫病科，韓韶華的研究也慢慢轉移至臨床免疫的方向，並從各種免疫指標的檢驗技術及測量入手（包括血清抗體、免疫複合物、免疫螢光檢查、淋巴球功能等等），進行如過敏原調查、臺灣民眾免疫學指數以及自體免疫疾病如系統性紅斑狼瘡的研究，同時提供免疫病科良好的實驗室支援。[100] 如藍忠亮便回憶道，早期榮總免疫病科的實驗室支援主要是由韓韶華來帶領進行。這種對於實驗室實作的重視，也促

---

96 韓韶華口述，喻蓉蓉訪問，喻蓉蓉、藍玉人記錄整理，《臺灣免疫學拓荒者：韓韶華先生訪談錄》，頁 127；周湘雲、許宏彬主編，《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頁 98-100。

97 韓韶華口述，喻蓉蓉訪問，喻蓉蓉、藍玉人記錄整理，《臺灣免疫學拓荒者：韓韶華先生訪談錄》，頁 145-146。

98 周湘雲、許宏彬主編，《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頁 117-118。

99 張淑卿訪談、柯小菁紀錄，〈藍忠亮先生訪問紀錄〉，頁 609。

100 韓韶華口述，喻蓉蓉訪問，喻蓉蓉、藍玉人記錄整理，《臺灣免疫學拓荒者：韓韶華先生訪談錄》，頁 153-154。

成現在許多大醫院的免疫科醫師都有規模不小的實驗室。[101]

透過 ABMAC 所支援的過敏研究及診療，韓韶華及莊哲彥等人試圖以其免疫學專業為基礎，重新架構、描繪並推廣「標準的」過敏病診療的知識、診療實作與物質環境。而透過過敏病此一普遍發生於臺灣民眾身體各個部位的疾病，免疫學提供了一個超越並整合既有分科架構的思考及診療方式，將原本分屬不同臨床專科的醫師及研究者招募進入新興的免疫專科之中，並為免疫病科以及免疫學會的成立提供良好的基礎。[102] 正如同莊哲彥所言：

> 人體有了這麼完善的一套防衛機構，使人體得以生存，在此一充滿「抗原」的環境中而能相安無事，然則，天下事不幸的是好與壞似乎永遠並存；故差錯了的免疫反應，也為人類帶來了許多疾病，其解決之道，惟有去徹底瞭解此一免疫原理，而後天下事乃能操之在我，疾病也就能迎刃而解。不過免疫學目前尚只是微露曙光，好戲還在後頭，如免疫治療，器官移植，免疫法抗癌都是剛在起步，對人類健康之保障，還有待有心人之全力奮進。[103]

在跨國計畫及多方資源的整合與推動下，1970 年代臺灣免疫研究社群逐漸成形，且逐漸與各類臨床醫師整合，免疫學開始成為各種疾病診療或醫療實作的重要指引。除了如韓韶華、莊哲彥及鄧昭雄等主要推動者透過國際援助或合作計畫，來吸引並招募對免疫學有興趣的基礎及臨床研究者之外，1970 年代開始出現的本土醫學推廣刊物，如《當代醫學》（創刊於 1973 年）及《醫學文摘》（創刊於 1975 年），也成為進一步推廣免疫學的重要平臺。

《當代醫學》將自己定義為「屬於絕大多數醫師的綜合性中文醫學雜誌」，要為臺灣醫界「建立一條靈活的補給線，把最新、最實用的醫學新知和一些心靈

---

101 1981 年藍忠亮獲得行政院公費出國進修，便選擇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及德州大學達拉斯西南醫學院（Southwestern Medical School, University of Texas, Dallas)，繼續學習各種抗體的檢測，包括讓腎臟移植配對能更快速進行的雙色免疫螢光顯微鏡法，再次說明了檢測技術在臺灣免疫學發展歷程的重要性。參見周湘雲、許宏彬主編，《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頁 117-119；張淑卿訪談、柯小菁紀錄，〈藍忠亮先生訪問紀錄〉，頁 610-613。

102 到了 1970 年代後期，臺灣主流醫界關於過敏病的討論已無法不從免疫學的角度開展，參見謝貴雄，〈臨床免疫學：臺灣小兒過敏病〉，《當代醫學》64（1979 年 2 月），頁 42-49；陸坤泰，〈臨床免疫學：肺的免疫疾病〉，《當代醫學》71（1979 年 9 月），頁 59-65。

103 蘇益仁、莊哲彥，〈基礎與臨床：過敏疾患的免疫基礎〉，頁 70。

上有用的東西加以消化整理，直接地貢獻給醫師們」。[104] 自 1973 年 11 月《當代醫學》創刊起，關於免疫學的報導與介紹便一直相當穩定，且有逐步增加的趨勢。而這樣的趨勢也呼應了前述 1970 年代臺灣免疫社群及相關研究及診療計畫的逐漸成形。1970 年代共 106 篇與免疫相關的文章，散見於幾個不同的專欄，包括「基礎與臨床」、「專科講座」、「皮膚病學講座」、「海外文摘」、及「醫學新貌」 等等。這些文章由陳定信、鄧昭雄、莊哲彥、李治學等人所執筆，這些人大多是具有國際醫療合作及豐富臨床經驗的中生代副教授學者，文章內容包含前述的免疫檢測技術、過敏及移植等等。從這些專欄名稱、執筆者及內容可以看出，免疫學在 1970 年代對臺灣醫界來說，是一個相當新穎但擁有豐富臨床潛力的領域。

1976 年，《當代醫學》新增「臨床免疫學」專欄，正式將免疫學當成一個獨立的學科介紹給一般醫師，並直言：「免疫學是現代醫學中最重要的一環，幾乎每一學科都不能與他脫離關係，『臨床免疫學』的推出，正是希望對開業醫師做增進新知的服務」；[105] 而這個專欄的第一篇文章便是有強烈學科建制意涵的〈免疫學發展史〉。[106] 1978 年免疫學會成立後，《當代醫學》更於 1979 年再次針對免疫學的學理與臨床應用，增闢「臨床免疫學講座」；除了密集刊登免疫學相關文章之外，同時也強調：「由於免疫學的蓬勃發展，使許多臨床上的疑難雜症逐一得到解答。免疫學這個時髦的學問，如今就要展開在讀者的面前，這便是本期新刊的『臨床免疫學講座』。在此講座中，我們將分期介紹最近有關免疫學的各種知識」。[107]

除了《當代醫學》之外，1975 年徐茂銘、鄧昭雄及李治學等人為了「快速與正確地摘譯世界各國最新醫學文獻，提供醫界人士閱讀文獻之機會，以彌補目前醫學雜誌之短缺」，以臨床醫師為主要讀者群，共同編輯創辦了醫學版的讀者文摘：《醫學文摘》。[108] 《醫學文摘》基本上採臨床分科的方式摘譯並評論介紹海外最新醫學文獻，其中免疫雖不是一個獨立的分項，但卻常見於各分科的相關論

[104] 陳炯明，〈創刊詞〉，《當代醫學》1（1973 年 11 月），頁 4。
[105] 編輯部，〈我們的話〉，《當代醫學》27（1976 年 1 月），頁 10。
[106] 陳定信，〈免疫學發展史〉，頁 24-33。
[107] 編輯部，〈我們的話〉，《當代醫學》63（1979 年 1 月），頁 44。
[108] 編輯部，〈關於本雜誌〉，《醫學文摘》1（1975 年 5 月），卷首無頁碼。

文中。[109] 此外，自 1975 年 8 月第 4 號起，《醫學文摘》增設「醫學新境界」分區，也成為介紹免疫學最新研究的管道。該期編輯部強調：「由於現在已進入了免疫學的時代，大部分的疾病脫離不了免疫學的範圍，因此在各科中都有提到此類的文章，用心細讀將獲益非淺。」[110] 在此，我們也可以清楚看出各種免疫球蛋白及淋巴球已成為當時備受矚目且國內大力推廣的診斷指標及技術。鄧昭雄在摘譯文後不斷以註記的方式，介紹如何將免疫螢光等技術運用於臨床診療中，並強調「臺大皮膚科實驗室有足夠之設備……可提供全省同業在診斷及豫後方面的幫助。在治療前，抽取 5 c.c.以上之血液即足供檢查之需。」[111] 從《醫學文摘》及《當代醫學》中可以看出，到了 1970 年代後期免疫學相關的生物指標，如抗體、免疫球蛋白及淋巴細胞等等，已成為臨床重要的診斷依據，而免疫螢光法及免疫放射線法等技術也因此廣為運用在各類型的疾病診療及研究上，吸引臨床醫師開始關注、甚至進入免疫學的領域中。[112]

《當代醫學》及《醫學文摘》中的這些介紹，除了讓臺灣的醫師們及醫療從業人員能夠看到此時免疫學在臺灣的蓬勃發展，也提供了年輕醫師們（尤其是「非」臺大及國防系統的年輕醫師）一個接觸免疫學的管道，進一步招募免疫學研究的新血。曾任中山醫學大學校長及免疫學會理事長的蔡嘉哲便提到，當 1970 年代初期自己仍是中山醫學專科學校醫科生及住院醫師的時期，是如何透過《當代醫學》開始接觸到免疫學的世界：

109 以 1975 年 6 月《醫學文摘》第 2 號為例，與免疫相關的文摘在內科部分有謝博生摘譯，〈服用阿斯匹靈後淋巴球變形之抑制〉，《醫學文摘》2（1975 年 6 月），頁 31；謝博生摘譯，〈神經疾患時血清免疫球蛋白 E 之濃度〉，頁 32。小兒科部分有，王作仁摘譯，〈罹患播散性紅斑性狼瘡的 1 歲幼兒〉，頁 61。婦產科部分則有，周松男摘譯，〈葡萄胎懷孕在淋巴球抗原中系統 HL-A 中的免疫生成性〉，頁 70。耳鼻喉科部分有李宏生摘譯，〈唾液腺之良性淋巴上皮疾患〉，頁 78；林宗洲摘譯，〈頭頸部之粘膜黑色素瘤〉，頁 81。在皮膚泌尿科部分，有鄧昭雄摘譯，〈Phenybutazone 所引起之皮膚反應：免疫學上之探討〉，頁 88；鄧昭雄摘譯，〈皮膚及血清螢光試驗之運用〉，頁 89。

110 編輯部，〈編者的話〉，《醫學文摘》4（1975 年 8 月），頁 12。

111 莊祖儀摘譯，〈抗核抗體：紅斑性狼瘡中核免疫螢光型態所表現之豫後意義〉，《醫學文摘》1（1975 年 5 月），頁 91。

112 《當代醫學》中亦有多篇文章提及各種免疫檢測技術在臨床上的運用，例如鄭庚申、陳寶輝，〈臨床免疫學：全身性紅斑狼瘡症〉，《當代醫學》70（1979 年 8 月），頁 94-99；邱浩彰、鄧昭雄，〈臨床免疫學：藥物過敏與食物過敏〉，《當代醫學》66（1979 年 4 月），頁 40。

> 那個時候《當代醫學》大概是我們住院醫師看最多的一個雜誌……事實上我接觸是從《當代醫學》，那個時候莊哲彥就會寫一些 T 細胞、B 細胞，如果再回去看《當代醫學》，會有一些早期寫那種介紹。所以我覺得我可能是《當代醫學》看最多，接觸到免疫學的 knowledge。[113]

要之，1970 年代臺灣免疫學快速發展，為 1978 年免疫學會的成立提供良好的基礎。免疫學成為連結各個醫學臨床專科與基礎研究的重要媒介，無論是從臺日鼻咽癌計畫、ABMAC 援助的過敏病研究，或者醫學刊物中許多不同科別臨床醫師的描述中，我們都可以看出，在面對各種臨床上難解的疑難雜症之時，醫師及研究者需要對於疾病的病理機制有進一步的了解，而免疫學則常常是醫師或研究者思考並尋求資源的方向。而各種免疫生物指標的定性及定量分析技術，則成為臨床診療上不可或缺的技術與利器，提供醫師及研究者更精準地掌握疾病發生的規模、部位及軌跡的可能。換言之，免疫學一方面提供了理解疾病深層機制的可能解答方向，另一方面也是實用的診療資源與手段。此時，免疫相關的實作技術及知識的傳遞途徑與資源雖仍以美國及日本等醫療先進國所提供的各式援助為主，但已逐漸發展出更多元及在地的聲音。

六、1970 年代後期的學術外交與早熟的免疫學專科

1978 年 6 月免疫學會正式成立。數月之後，美國於 1978 年 12 月宣布將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並終止與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間的正式外交關係。這兩件先後發生於 1978 年的事件，乍看之下並無關連：前者是戰後臺灣醫療專科的快速分化與發展，而後者則是國際政治的外交角力。然而，1970 年代隨著中華民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角力，以及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等國際外交事件的發生，臺灣外交處境的困難卻意外地成為免疫學會成立的重要推手，而臺灣免疫學界也因此必須肩負起拓展臺灣國際空間的學術外交使命。

113 許宏彬訪談、周湘雲記錄，〈蔡嘉哲醫師訪談逐字稿〉（未刊稿），2010 年 12 月 24 日，於中山醫學大學研究大樓十樓微生物免疫學研究所蔡嘉哲研究室。

1970年代臺灣的外交困境對於學術活動的影響，主要集中在各個國際學術組織的會籍問題，特別是國際科學聯合總會（ICSU）以及旗下各個科學學門的國際學會聯盟。中研院最早是以中華民國的一個科學組織名義，於1937年加入ICSU。早在1960年代，在兩岸政權皆堅持「漢賊不兩立」的情況下，臺灣也曾經在美國的運作及協助下，1964年藉由在中研院底下特別設立「生物化學國家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for Biochemistry, NCB)，並申請加入ICSU中的世界生物化學學會聯盟（IUB），最後促成中共代表於1965年主動退出。[114] 由於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動盪與影響，兩岸在國際科學組織上的角力在1960年代後期暫時休兵。然而，自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在ICSU及其他科學學門的聯合會中，便開始出現邀請中共代表參與的聲音。由於在國際學術交流上兩岸均有高層的政治指導，以及中共代表堅持必須先排除中華民國的會籍後才願意加入，在錢思亮、吳大猷及王紀五等人的運作與努力下，在1970年代前半臺灣雖還能保有會籍，但局勢逐漸惡劣。1975年，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藉口對ICSU有財務補助，要求ICSU以中共取代中華民國的會員資格。1976年和1977年，中共在堅持排除中華民國會藉的前提下，成功加入了兩個科學學會聯盟。[115] 顯然，臺灣學術外交此時正面臨重大危機。恰巧，1976年國際免疫學會聯合會（IUIS）正式成為ICSU會員，因此成為兩岸學術外交角力的新戰場。[116]

---

114 E. C. (Bill) Slater, "This is the IUBMB History: The History of IUB (MB)," p. 204. 關於當於加入IUB的始末及其背後的政治運作，參見與會者蘇仲卿的自述：蘇仲卿，〈中研院的國際科學活動與我〉（2007年6月），『歷史緣起：校友專欄—蘇仲卿教授專區』，「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網頁，下載日期：2014年4月2日，網址：http://www.mbc.ntu.edu.tw/history/AC.htm#Su。

115 中央研究院八十年院史編纂委員會主編，《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2008），卷一：任重道遠　全院篇，頁173-175。因中共加入而受到影響的學會為國際大地測量學及地球物理學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Geodesy and Geophysics, IUGG），以及國際地質學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Geological Sciences, IUGS），參見阮維周，〈動態報導：一、中央研究院與國際科學聯合會（ICSU）地球科學部門之交流〉，《地質》12: 1（1992年4月），頁117-120。

116 各科學學會聯盟加入ICSU的時間可參見ICSU官方網站："Our Members,"「ICSU」，下載日期：2014年3月18日，網址：http://www.icsu.org/about-icsu/our-members/?icsudocid=scientific-unions。其他兩岸角力的ICSU旗下學術組織，還有國際純粹及應用化學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IUPAC）、世界生物化學學會聯盟（IUB）、國際天文聯合會（International Astronomical Union, IAU）、國際大地測量學及地球物理學聯合會（IUGG）以及國際地質學聯合會（IUGS）等。參見劉兆玄，〈王紀五與中國化學會〉，《聯合報》，2012年5月23日，D3版聯合副刊；蘇仲卿，〈中研院的國際科學活動與我〉；沈君山，〈理性・自尊・敵來不走！參加國際天文學會歸來的感想和建議〉，《聯合報》，1979年9月20日，第3版；黃申如，〈1970年代的學術外交〉，收於檔案管理局編，《檔案的故事：第四集》（臺北：檔案管理局，2006），頁33-37；阮維周，〈動態報導：一、中央研究院與國際科學聯合會（ICSU）地球科學部門之交流〉，頁117-120。

如前述，雖然 1970 年代臺灣的免疫學研究已有長足的發展，並扮演著基礎與臨床醫學研究之間的重要橋樑，但從專科機構化的角度來看，大體仍尚未成熟。免疫基礎研究還是在微生物學的架構中發展，而臨床的工作也仍在各自專科或主題計畫中推動（榮總免疫病科是唯一的例外）。例如，國防醫學院雖然自 1966 年韓韶華學成歸國後便開始發展免疫學的基礎研究，但一直要等到 1980 年國防微生物學系方改名為微生物及免疫學系。1983 年起至今，微生物及免疫學系改名為微生物及免疫學科。在研究所部分，1968 年起生理學研究所微生物學組獨立成「醫學生物形態學研究所（醫態所）」，下設微生物學及熱帶醫學兩組，微生物學組仍舊招收微生物和免疫學研究生。直到 1986 年醫態所微生物學組才獨立為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117] 同樣地，在臺大方面雖然 1960 年代初期起，張學賢以及居小燕等人已開始進行並指導學生從事免疫學相關研究，但主要還是在細菌學科及微生物學研究所細菌學組底下進行。一直到 1993 年臺大才成立臺灣第一個獨立的免疫學研究所。[118] 在 1978 年免疫學會創立之前，臺灣的免疫學研究者主要隸屬於中華民國微生物學會，理事長為臺大細菌學科的資深微生物學家楊照雄。1977 年韓韶華便是由中華民國微生物學會推薦參加於澳洲雪梨所舉辦的第三屆國際免疫學大會，發現「其他國家均由數人或數十人組成之代表團參加，我國僅本人一人出席」，並在會後藉此建議臺灣醫學院大學部應開設臨床免疫學課程，以及教學醫院應成立免疫病科。但即使是熱心推動免疫學發展的韓韶華等人，此時也還沒有在微生物學會之外另創免疫學會的想法。[119]

新興專科或學術領域的成立往往並不如一般想像中的容易，而是涉及相當複雜的資源、機構與人才的分配整合以及專業認同等工作，且往往需要各式資源的挹注與投入。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戰後的免疫學研究者多隸屬於微生物學會，且微生物學研究在臺灣是一個已有悠久歷史及穩固機構的研究領域，但微生物學還不是 ICSU 認可的會員之一，而是屬於國際生物科學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

117 韓韶華口述，喻蓉蓉訪問，喻蓉蓉、藍玉人記錄整理，《臺灣免疫學拓荒者：韓韶華先生訪談錄》，頁 118-120；國防醫學院院史編纂委員會編，〈微生物及免疫學科〉，頁 753-759。

118 楊照雄、呂森吉，〈微生物學研究所之回顧〉，收於臺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研究所編，《臺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研究所三十週年紀念專輯》，頁 1。

119 許宏彬訪談、周湘雲記錄，〈韓韶華訪談逐字稿〉（未刊稿），2012 年 3 月 24 日，於新北市新店燕子湖韓宅；韓韶華，〈出席第三次國際免疫學會議報告書〉（1977），「中華民國免疫學會檔案資料」，檔號：CSI-6769-0069-D（韓韶華提供）。

of Biological Sciences, IUBS）的一個分支。直到 1980 年國際微生物學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Microbiological Societies, IUMS）才正式成立並脫離 IUBS，並於 1982 年才成為 ICSU 會員。[120] 也就是說，在 1970 年代後期的國際學術外交角力上，新興的免疫學反而比資深的微生物學更能為臺灣爭取國際能見度及外交參與。幾位參與創立免疫學會的資深學者，如楊照雄、韓韶華及鄧昭雄等，也都不約而同地提到免疫學會的成立並非由免疫研究者所主導，而是由當時負責臺灣國際學術合作及學術外交的王紀五所發動。

王紀五是前外交部長、總統府秘書長及中研院院長王世杰之子，而王世杰乃 1960 及 1970 年代臺美學術交流的重要推手。在父親的影響下，王紀五後來擔任國科會國際科學發展合作組組長、副主任委員，在 1970 及 1980 年代主導臺灣學術的國際交流及合作事宜。[121] 王紀五最遲於 1974 年起開始積極處理中華民國在 ICSU 及相關國際學術團體的會籍問題。根據《王世杰日記》，王紀五曾於 1974 年 3 月協助當時的中研院院長錢思亮以及 ICSU 會長白朗（Harrison Brown）簽訂「共同聲明書，指明中研院所代表之科學團體，以屬于中華民國法權所及之地域者為範圍」，並以此作為抵制中共代表試圖排除中研院 ICSU 會籍的聲明。[122] 王紀五並於同年 9 月、1976 年 10 月以及 1978 年 9 月代表臺灣出席 ICSU 第 16 次（土耳其伊斯坦堡）、第 17 次（美國華盛頓）及第 18 次（希臘雅典）大會，參與各項運作以保留中央研究院的會籍。[123]

1978 年王紀五致電韓韶華，提及國際免疫學聯合會（IUIS）乃 ICSU 的正式會員之一，希望韓能夠發動成立免疫學會以便申請加入 IUIS，進而確保中華民國在 ICSU 的地位。當時韓韶華雖然有心發展免疫，但自認輩份尚淺，不敢在微生

120 關於國際微生物學聯合會的介紹，參見 Scientific Union Member, “Detailed Information: IUMS, International Union of Microbiological Societies,”「ICSU」，下載日期：2014 年 3 月 20 日，網址：http://www.icsu.org/publicdb/frmDisplayMember?docid=aa665bf2202f52a609c35f3e15b92e49。

121 楊翠華，〈王世杰與中美科學學術交流，1963-1978：援助或合作？〉，頁 41-103；韓韶華口述，喻蓉蓉訪問，喻蓉蓉、藍玉人記錄整理，《臺灣免疫學拓荒者》，頁 291；劉兆玄，〈王紀五與中國化學會〉。

12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世杰日記》數位資料庫，1974 年 3 月 22 日之記載。「《王世杰日記》數位資料庫」，下載日期：2014 年 4 月 2 日，網址：http://www.mh.sinica.edu.tw/PGDigitalDB_Detail.aspx?htmContentID=23。

12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世杰日記》數位資料庫，1974 年 9 月 18 日、29 日及 10 月 2 日，1976 年 10 月 5 日、15 日、24 日，以及 1978 年 9 月 21 日、10 月 2 日之記載。「《王世杰日記》數位資料庫」，下載日期：2014 年 4 月 2 日，網址：http://www.mh.sinica.edu.tw/PGDigitalDB_Detail.aspx?htmContentID=23。

物學會之外另創免疫學會，於是建議王紀五先徵詢微生物學會理事長楊照雄的意見。王紀五便商請臺大醫學院的元老，同時也是當時中研院院士的李鎮源代為向楊照雄說明此事。有了學術外交的正當性並在楊照雄的首肯及協助下，韓韶華及前述早期免疫研究者如莊哲彥、鄧昭雄、徐茂銘及居小燕等人共同發起成立免疫學會，其目的就是為了要參加 ICSU。[124] 隔年，免疫學會向 IUIS 申請加入，但未獲回應。1979 年，臺灣與中共的學術會籍問題在 IUB 以及 IUPAC 兩個國際學會聯合會中獲得解決，兩方以獨立平等的會員方式參與。在同年 9 月由吳大猷所主持的「國際科學組織關係專案小組第三次座談會」中，王紀五除了提到先前因中共參與而退會的 IUGG 及 IUGS 可以循 IUB 模式申請重行入會之外，也再次提到 ICSU 之下尚有包括 IUIS 在內的四個學會臺灣尚未入會，宜設法申請入會。[125]

1980 年 7 月第四屆國際免疫學大會於巴黎舉辦時，有別於前次 1977 年雪梨第三屆國際免疫學大會臺灣只有韓韶華一人參加的情況，為了爭取加入 IUIS 免疫學會廣邀學者組成 7 人代表團與會，並均獲得政府各單位補助。在事後提交免疫學會的報告書中，韓韶華直言臺灣代表團除了積極參加各種學術活動外，更利用各種關係與各國代表聯繫，為免疫學會加入 IUIS 鋪路。雖然此次會議中免疫學會已符合 IUIS 之規定，成立全國性免疫學會且活動兩年以上，具備申請入會資格，但由於中共方面尚未成立全國性學會且其代表不願意討論臺灣的入會申請，再加上 IUIS 堅持臺灣方面不得先於中共入會，因此仍舊無法加入。[126] 為順利加入 IUIS，免疫學會更於 1983 年在臺北舉辦第五屆國際免疫學大會（京都）

---

124 許宏彬訪談、周湘雲記錄，〈韓韶華訪談逐字稿〉（未刊稿）；許宏彬訪談、周湘雲記錄，〈楊照雄訪談逐字稿〉（未刊稿），2011 年 3 月 11 日，於臺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科暨研究所辦公室。

125 William J. Whelan, "China and the IUB (MB)," *Bulletin of the Canadian Society of Biochemistry, Molecular & Cellular Biology* (2002), pp. 41-42; 〈國際科學組織關係專案小組第三次座談會記錄〉（1979 年 9 月 19 日），「中華民國免疫學會檔案資料」，檔號：CSI-6769-0006-D（韓韶華提供）。

126 此次會議臺灣參加者包括韓韶華、林宗洲（此二人由中研院經費支援）、謝貴雄、張仲明、胡承波（此三人由國科會經費支援）、劉武哲（教育部經費支援）及王文成（榮總經費支援）；王紀五則居中聯繫當時 IUIS 的會長並安排臺灣代表先行與其私下會面。報告書中仍以「共匪」來稱呼中共方面代表並提及免疫學會可以「在學術上打垮共匪」，可見當時兩岸學術外交攻防之激烈。韓韶華、林宗洲，〈出席第四屆國際免疫學會議報告書〉（1980 年 8 月 10 日），「中華民國免疫學會檔案資料」，檔號：CSI-7072-0035-D（韓韶華提供）。值得注意的是，為了讓國際免疫學界承認臺灣的免疫學會，除了需要外交工作的斡旋之外，學會的學術及教育活動也必須有良好的表現。免疫學會檔案資料中便有一份為 1980 年巴黎國際免疫學大會所準備的英文文件 "Scientific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Immunology (June 3, 1978 - July 10, 1980),"「中華民國免疫學會檔案資料」，檔號：CSI-7072-0027-F（韓韶華提供）。細數自成立以來免疫學會的重要學術及教育活動，作為臺灣加入 IUIS 的宣傳文件。

的會前會，事先邀得多位 IUIS 理事與會並藉此討論臺灣入會事宜。1983 年 IUIS 修改章程，將原本的「國家代表制」改為「區域代表制」。1984 年 IUIS 第 22 屆理事會於瑞士舉行，韓韶華、徐茂銘（第四屆免疫學會理事長）及王紀五都前往參加，免疫學會才與中共方面同時以「區域代表」成為 IUIS 會員。[127]

雖然 1978 年免疫學會的成立背後有強烈的外交需要，但其成立也成為臺灣免疫學教育、傳播交流與專科醫師認證的重要平臺，推動學科的進一步發展。前述早期參與創辦免疫學會的鄧昭雄，在回想免疫學會成立的緣由之時，便認為除了學術外交之外，另一個重點便是免疫學的教育訓練：

> 所以李鎮源教授打電話給我，就跟我講這個事情，那麼我的看法是說，好吧，利用這個機會，把學會成立。把學會成立以後呢，給一些人去搞政治，去弄外交，但是我不做這樣的事情，我就把學會弄好，把臺灣之間弄好。但是我的最大的一個目標就是要把臺灣的醫界水準要提高，怎麼樣要提高？postgraduate education，我主要要用這個 model 去弄，把它推廣過去的。[128]

自 1978 年成立起，免疫學會便定期籌辦各式免疫學推廣教育活動，包括每年舉辦為期兩個月的「長期訓練班」（Postgraduate Training Course in Clinical Immunology）、不定期舉辦為期兩天的「短期訓練班」、每月舉辦免疫學討論會，以及演講形式的「免疫新知」等等。自 1978 年 6 月至 1980 年 7 月，免疫學會共舉辦了 3 次長期訓練班、6 次短期訓練班、19 次免疫學討論會等教育推廣活動。[129] 由免疫學會所提供的 1978-1986 年的學員名單來看，長期訓練班成員的第一個特點是來源相當多元，並不限於醫師或生物醫學研究者。其中，以住院醫師或總醫師階段的年輕醫師（多為內科、小兒科，亦有少數皮膚科、婦產科、耳鼻喉科、病理科等等）以及醫檢師（多畢業於醫技系）為主，但也不乏中醫、護士或其他

---

127 韓韶華口述，喻蓉蓉訪問，喻蓉蓉、藍玉人記錄整理，《臺灣免疫學拓荒者：韓紹華先生訪談錄》，頁 290-292；周湘雲、許宏彬主編，《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頁 72-75。

128 許宏彬訪談、周湘雲記錄，〈鄧昭雄訪談逐字稿〉（未刊稿）；亦可參見周湘雲、許宏彬主編，《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頁 34。

129 “Scientific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Immunology (June 3, 1978 - July 10, 1980)”。

對免疫有興趣的業界人士。相較於其他的醫學專科，免疫學長期訓練班中多元的學員組成也呼應了前文中所提及，檢驗技術及其於各臨床專科之應用在免疫學發展上的重要性。也因此，長期訓練班的課程安排除了每天上午有免疫學原理與各種臨床運用之講授外，也特別強調「實驗室實作」的訓練，並在每天下午安排學員前往不同的實驗室進行實作訓練。[130] 多元的學員組成與課程安排也彰顯免疫學作為一個時髦、應用廣泛且詮釋空間具彈性的新興學科，在吸引及招募各種新成員上的優勢。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特徵是，早期長期訓練班中的醫師學員多來自中國醫藥學院、高雄醫學院、臺北醫學院以及中山醫學院等私立醫學院校，較少見臺大醫學院及國防醫學院的畢業生。[131] 這也反映出早期臺灣免疫學研究的推動以臺大及國防兩大機構為主，其他醫學校的學生相對來說便少有機會能接觸到免疫學的教學與研究，因此較積極主動參與免疫學會的長期訓練班，並藉此進入免疫學的研究社群。如前述 1973 年畢業於中山醫學專科學校的蔡嘉哲，便是第一屆免疫學會舉辦的長期訓練班的學員。蔡直言在學生時代，除了微生物學課程的簡介之外，幾乎沒有接觸到任何現代免疫學知識。當免疫學會成立時，蔡還是內科第三年住院醫師，但已透過如前述《當代醫學》等刊物對時髦的免疫學感到興趣，並經由參加第一屆長期訓練班，開展其免疫研究的道路。[132] 1984 年畢業於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的王志堯，更戲稱長期訓練班為引領年輕醫師進入免疫學界的「免疫補習班」，並指出免疫學會除了舉辦免疫訓練班、討論會及演講之外，還支援當時缺乏免疫相關師資的中國醫藥學院開設免疫學課程。[133] 透過訓練班及相關教育推廣活動，免疫學會引領許多對免疫學感興趣的年輕醫師進入臺灣及國際免疫學社群。[134] 部分早期訓練班的成員也在完成課程之後，接受資深免疫學者如

---

130 周湘雲、許宏彬主編，《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頁 23-24。

131 〈1978-1986 年長期訓練班學員名單〉，「中華民國免疫學會檔案資料」（中華民國免疫學會提供）。

132 許宏彬訪談、周湘雲記錄，〈蔡嘉哲醫師訪談逐字稿〉（未刊稿）。

133 許宏彬訪談、周湘雲記錄，〈王志堯訪談逐字稿〉（未刊稿），2013 年 4 月 26 日，於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10 樓王志堯過敏免疫研究室。

134 如蔡嘉哲便憶起，「那個時候[訓練班]訓練完了以後，我們很多學員要求說有沒有外國的機會可以去進修……後來韓[韶華]教授就寫了一堆他認識的外國學者。」後來蔡嘉哲便利用這個名單申請到澳洲進修一年。許宏彬訪談、周湘雲記錄，〈蔡嘉哲醫師訪談逐字稿〉（未刊稿）。〔按：括弧[ ]內文字為筆者自加〕。

韓韶華等人的指導，在《當代醫學》的「專題講座：臨床免疫學」專欄中，進一步為文推廣免疫相關的醫療知識。[135]

另一個免疫學會與臨床醫師的重要連結則是專科醫師的認證。1986 年醫療法制定公布，規定專科醫院、專科診所之負責醫師必須具有專科醫師資格。同時，在醫師法中增訂：「醫師經完成專科醫師訓練，並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甄審合格者，得請領專科醫師證書」以及「非領有專科醫師證書者，不得使用專科醫師名稱」。自此，專科醫師成為法定制度。[136] 值得注意的是，免疫相關專科醫師並非官方認可的專科醫師之一，而是各學會受衛生主管機關委託，自行訂定教育訓練及考核辦法所產生。免疫相關專科醫師一般也被稱為次專科，屬於內科專科之內。[137] 免疫學會於 1985 年制定臨床免疫專科醫師甄審及甄試辦法，並於 1986 年舉辦第一次專科醫師甄審與甄試。[138] 值得注意的是，最早學會稱其專科醫師為「臨床免疫專科醫師」，基本上符合韓韶華將免疫病視為不屬於特定器官的全身病，因此需要在榮總創設與內科平行且獨立之免疫病科的想法。然而，或許是受限於免疫疾病在臨床上仍以過敏病為主的現實以及資源整合的考量，包括榮總在內的各大醫院逐漸將免疫病科與過敏合併為內科部的次專科，成為「過敏免疫科」或者「過敏免疫風濕科」。[139] 1987 年免疫學會將專科醫師的名稱由「臨床免

---

135 蔡嘉哲，〈臨床免疫學：免疫球蛋白〉，《當代醫學》64（1979 年 2 月），頁 36-41；鄭庚申，〈臨床免疫學：自體免疫疾病〉，《當代醫學》65（1979 年 3 月），頁 37-40。〔按：蔡嘉哲與鄭庚申皆為第一屆長期訓練班學員〕。

136 根據 2000 年修正發布的「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目前臺灣的醫師之專科計有家庭醫學科、內科、外科、小兒科、婦產科、骨科、神經外科、泌尿科、耳鼻喉科、眼科、皮膚科、神經科、精神科、復健科、麻醉科、放射診斷科、放射腫瘤科、解剖病理科、臨床病理科、核子醫學科、急診醫學科、職業醫學科、整形外科。參見〈專科醫師制度概況〉，「衛生福利部醫事司」網站，下載日期：2014 年 3 月 31 日，網址：http://www.mohw.gov.tw/CHT/DOMA/DM1.aspx?f_list_no=608&fod_list_no=1022。

137 目前衛福部醫事司所制定的「內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中，也涵蓋基礎免疫風濕過敏等疾病的訓練課程，參見〈專科醫師訓練相關業務〉，「衛生福利部醫事司」網站，下載日期：2014 年 2 月 20 日，網址：http://www.mohw.gov.tw/CHT/DOMA/DM1.aspx?f_list_no=608&fod_list_no=787。

138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甄審及甄試臨床免疫專科醫師章程（草案）〉（1985），「中華民國免疫學會檔案資料」，檔號：CSI-7678-0004-F（韓韶華提供）；周湘雲、許宏彬主編，《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頁 115-116。

139 1982 年臺中榮民總醫院成立全臺灣第一個過敏免疫風濕科，1984 年臺北榮總的免疫病科與過敏病科及一般內科合併，成立過敏免疫風濕科，改隸內科部。參見韓韶華口述，喻蓉蓉訪問，喻蓉蓉、藍玉人記錄整理，《臺灣免疫學拓荒者：韓韶華先生訪談錄》，頁 146；張淑卿訪談、柯小菁紀錄，〈藍忠亮先生訪問紀錄〉，頁 614。

疫專科醫師」改為「免疫過敏專科醫師」，並限制申請者必須在「本會認定之免疫過敏專科醫院訓練至少兩年」。在同年修訂的專科醫師訓練綱要中，免疫學會組成評鑑委員會，用以考核指定醫院之免疫過敏相關的設備、師資及教學活動是否符合標準，進一步推動各大醫院的免疫臨床教育訓練工作。[140]

除了免疫學的教育推廣及專科醫師認證之外，學會的另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扮演學術研究交流的平臺。這部份主要有每年舉辦的免疫學會年會、發行免疫學術雜誌以及舉辦基礎與臨床的免疫學討論會。1978 年 6 月至 1980 年 7 月間，免疫學會共舉辦了 2 次年會（各有 35 及 57 篇論文發表）、19 次免疫學討論會（9 次基礎及 10 次臨床），還發行了兩期《中華民國免疫學會雜誌》以及兩期《中華民國微生物及免疫學雜誌》。[141] 然而，從前述臨床科別的整併以及免疫相關雜誌的沿革可以看出，1978 年學會成立時的免疫學在臺灣發展的早熟與限制。1979 年 1 月免疫學會創辦《中華民國免疫學會雜誌》半年刊，以「凡與免疫學、過敏學及其有關學科之研究著作」為徵稿對象。然而，從第 1 卷第 1 號的目錄中可以看出，投稿的論文主要還是來自國防／榮總及臺大這兩個臺灣免疫學研究的重心，且作者的重複性相當高，顯示此時雖然學會已成立，但有能力從事原創性免疫研究的研究者仍不多。在第 1 卷第 1 號的 6 篇「原著」（original articles）中，便有三篇來自於韓韶華實驗室，其餘三篇則來是臺大。三篇「病例報告」中，則有兩篇來自於榮總免疫病科，一篇來自臺大內科。綜說（review articles）中則是一篇來自國防醫學院，一篇來自臺大。至於「常用免疫檢查方法」則由臺大鄧昭雄及莊哲彥介紹免疫螢光法。[142] 1979 年 6 月出版的第 1 卷第 2 號中，雖然原著已增加至 11 篇，但韓韶華實驗室的論文仍然有 4 篇，且所有文章仍全出自國防／榮總以及臺大的研究者，其中還有兩篇是傳統微生物學的免疫研究。[143] 也因為稿源的不足，《免疫學會雜誌》便於 1980 年與《微生物學會雜誌》合併，成為《微生物及免疫學雜誌》季刊。新期刊由微生物學會理事長楊照雄擔任發行人，

---

140 〈甄審及甄試免疫過敏專科醫師規則〉、〈免疫過敏專科醫師訓練綱要〉，《中華民國免疫學會章程》（1988），「中華民國免疫學會檔案資料」，檔號：CSI-7678-0033-F（韓韶華提供）。

141 "Scientific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Immunology (June 3, 1978 - July 10, 1980)"。

142 〈目錄〉，《中華民國免疫學會雜誌》1: 1（1979 年 1 月）。

143 〈目錄〉，《中華民國免疫學會雜誌》1: 2（1979 年 6 月）。

以「凡與微生物學，免疫學及其有關之研究著作」為徵稿對象，並下設「免疫學會編輯委員會」及「微生物學會編輯委員會」兩個獨立的編輯委員會。[144] 從《免疫學會雜誌》到《微生物及免疫學雜誌》，可以看出臺灣的免疫學即使經過戰後1960及1970年代的快速發展，且因1970年代後期學術外交的因素得以取得從微生物學中獨立的正當性，但仍無法支援一個獨立的學術期刊，而必須在資源整合的考量下，與微生物學重新進行平行整合。[145]

七、小結與討論

戰後現代醫學快速分化以及新興專科形構的動力及機制是什麼？原本分屬不同既有領域且懷抱著不同動機的行動者，為什麼能共同參與新專科的形構？為了回答科學活動中，異質且多元的行動者（包括專家及業餘者）如何彼此合作並共同促成集體行動，Susan Leigh Star 以及 James R. Griesemer 提出了邊界物（boundary objects）的概念，提醒我們去注意那些位處於不同社會世界邊界間的物件（objects），以及人們如何透過彈性地詮釋、操作及運用這些物件來進行「沒有共識的合作」（work together without consensus）。[146] 這些邊界物可能是一間儲藏室、一張地圖、一個標準表格或一種理論。Ilana Löwy 進一步提出邊界概念（boundary concepts）的概念，並以前述 Burnet 於戰後所提出的「自我的免疫辨識」概念為例，說明不同領域的研究者與臨床醫師如何透過這一個定義鬆散的概念彼此合作，共同促成1960及1970年代國際免疫學研究的快速發展。[147] 在臺灣的免疫學發展中，我們也看到隨著「自我的免疫辨識」概念的引入，許多原本分屬不同領域的行動者開始加入並進行免疫相關研究，包括生物學、器官移植（自

144 1998年《中華民國微生物及免疫學雜誌》又與《中華民國感染症醫學會雜誌》合併，成為《微免與感染雜誌》。目前《微免與感染雜誌》雙月刊是臺灣微生物、免疫、感染症及寄生蟲等四個學會之共同官方期刊。參見周湘雲、許宏彬主編，《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頁85-86、157-158。

145 今日臺灣大部分的基礎免疫研究機構也都是「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只有臺大及中國醫藥大學有獨立的免疫學研究所。中山醫學大學曾於1999年成立免疫學研究所，但由於資源的考量，2010年與醫學應用微生物研究所合併，成為微生物免疫研究所。

146 Susan Leigh Star, "This is Not a Boundary Object: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of a Concept," p. 602.

147 Ilana Löwy, "The Strength of Loose Concepts-Boundary Concepts, Federative Experimental Strategies and Disciplinary Growth: The Case of Immunology," pp. 385-389.

我對他者組織的排斥)、過敏(自我對外來物的異常反應)以及自體免疫(自我對自我的攻擊)。但臺灣免疫學的發展也提醒我們，除了理論及概念之外，特定的技術實作也是重要的邊界物，如前述免疫螢光法的引入、推廣及運用。也唯有正視「邊界技術」在免疫學形構過程中的重要性，我們才能理解為何臺灣免疫學社群當中，除了臨床醫師與基礎研究者之外，還包括許多醫技相關的醫療從業人員及研究者。

如果說，自我的免疫辨識及免疫檢測技術是形構臺灣免疫學的重要邊界物，那麼免疫學本身也處在眾多學科的邊界交會處。回顧免疫學發展的歷程，我們可以發現許多的行動者都不斷且頻繁地移動，跨越許多既存的邊界，無論是不同學科之間、不同機構之間、基礎與臨床之間，或是學術與政治之間。韓韶華的生平或許最能夠說明這種頻繁的跨界。在學科歸屬方面，他一開始從事細菌學研究，但自美返國後便投入免疫學的研究與推廣。他是免疫學會的創會理事長，但也曾在 1980 年獲選為微生物學會第七屆理事長。在研究方面，韓的研究一開始是實用性強烈的細菌學研究，但返國後開始轉向基礎的痲瘋細胞免疫研究。1970 年代開始韓又回到與臨床密切相關的過敏原及一般民眾免疫指數的調查。在教學方面，他除了在國防／榮總進行教學研究之外，也積極至各校教授免疫學，並廣納不同背景、不同機構的學生到其實驗室進行免疫研究。換言之，免疫學在臺灣的發展並非原封不動地，由一批同質的行動者拷貝移植歐美既有的學理，而是不同的行動者在實作、移動及跨界中所共同促成的。而邊界概念及邊界技術便是這些行動者得以合作的關鍵，即便所有人想像中的免疫學及其目的都各自不同。[148]

移動、跨界及實作都需要資源。在形構臺灣免疫學的過程中，我們看到各種類型資源的出現與運用。1960 年代透過正式的美援而來的獎學金，讓韓韶華及張學賢得以出國進修。韓韶華自美國 NIH 帶回的六年研究計畫，也支撐起早期榮總的跨校免疫社群及實驗室。1970 年代 ABMAC 的過敏基金以及臺日合作的鼻咽癌研究計畫，進一步促使臨床醫師進入免疫學的領域。1970 年代後期起為了強化

---

148 即使是在免疫社群之間，關於「什麼是免疫？」的想法也各自不同。有些人強調自我／他者的辨識(如對外物、外界或非自體物質的反應)，也有人著重臨床上的應用(免疫是身體免除或抵抗疾病的能力)；有人從生命哲學發想，認為免疫是人與環境共存的哲學，也有人擺上一張太極圖，直言「免疫可以參透陰陽、體悟人生」。參見周湘雲、許宏彬主編，《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頁 182-200。

臺灣學術外交，讓免疫學會的成立得到政府奧援與政治正當性。這些異質而龐雜資源的出現，讓歷史行動者得以藉此進行位移並跨界，甚至逸出原本規劃的常軌，如從改良疫苗到細胞免疫、從過敏病防治到過敏的免疫學化，以及從學術外交到免疫學推廣教育。的確，免疫學從來就不是政府青睞的研究領域，也從未在戰後的醫療資源分配上占據獨立且重要的位置，但它卻在許多臨散的、機遇的、非固定的資源、行動者及其行動共同交織下，編織纏繞成為我們理解現代文明疾病與身體的最重要概念之一。如果我們將臺灣的醫療發展當成一條流域廣泛的大河，那麼免疫學或許不是那最醒目的主河道，而是由眾多無常不定的支流所匯集沖積而成，深遠地影響著我們現今的疾病情境與身體經驗的一片廣闊地景。

引用書目

"Scientific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Immunology (June 3, 1978 -July 10, 1980),"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檔案資料」，檔號：CSI-7072-0027-F（韓韶華提供）。

〈1978-1986 年長期訓練班學員名單〉，「中華民國免疫學會檔案資料」（中華民國免疫學會提供）。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甄審及甄試臨床免疫專科醫師章程（草案）〉（1985），「中華民國免疫學會檔案資料」，檔號：CSI-7678-0004-F（韓韶華提供）。

〈國際科學組織關係專案小組第三次座談會紀錄〉（1979 年 9 月 19 日），「中華民國免疫學會檔案資料」，檔號：CSI-6769-0006-D（韓韶華提供）。

〈甄審及甄試免疫過敏專科醫師規則〉、〈免疫過敏專科醫師訓練綱要〉，《中華民國免疫學會章程》（1988），「中華民國免疫學會檔案資料」，檔號：CSI-7678-0033-F（韓韶華提供）。

韓韶華, "Allergy Program in Taiwan, Progress Report (Nov. 1975)."（韓韶華提供）

韓韶華，〈出席第三次國際免疫學會議報告書〉（1977），「中華民國免疫學會檔案資料」，檔號：CSI-6769-0069-D（韓韶華提供）。

韓韶華、林宗洲，〈出席第四屆國際免疫學會議報告書〉（1980 年 8 月 10 日），「中華民國免疫學會檔案資料」，檔號：CSI-7072-0035-D（韓韶華提供）。

"Niels K. Jerne: Biographical," 「Nobelprize.org」，下載日期：2014 年 3 月 2 日，網址：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medicine/laureates/1984/jerne-bio.html。

"Our Members," 「ICSU」，下載日期：2014 年 3 月 18 日，網址：http://www.icsu.org/about-icsu/ourmembers/?icsudocid=scientific-unions。

〈所轄學會〉，「國際科學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下載日期：2014 年 3 月 29 日，網址：http://icsu.sinica.edu.tw/societyindex.htm。

〈專科醫師制度概況〉，「衛生福利部醫事司」網站，下載日期：2014 年 3 月 31 日，網址：http://www.mohw.gov.tw/CHT/DOMA/DM1.aspx?f_list_no=608&fod_list_no=1022。

〈專科醫師訓練相關業務〉，「衛生福利部醫事司」網站，下載日期：2014 年 2 月 20 日，網址：http://www.mohw.gov.tw/CHT/DOMA/DM1.aspx?f_list_no=608&fod_list_no=787。

〈野口英世記念医学賞受賞者一覧〉，「公益財団法人野口英世記念会」，下載日期：2013 年 7 月 22 日，網址：http://www.noguchihideyo.or.jp/igakusyo/。

Frank M. Burnet, "Immunological Recognition of Self," 「Nobelprize.org」，下載日期：2014 年 4 月 1 日，網址：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medicine/laureates/1960/burnet-lecture.pdf。

Members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Biomedicine Research Group, ed., "Wellcome Witnesses to Twentieth Century Medicine,"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下載日期：2014 年 2 月 20 日，網址：http://www.history.qmul.ac.uk/research/modbiomed/wellcome_witnesses/index.html。

Scientific Union Member, "Detailed Information: IUMS, International Union of Microbiological Societies," 「ICSU」，下載日期：2014 年 3 月 20 日，網址：http://www.icsu.org/publicdb/frmDisplayMember?docid=aa665bf2202f52a609c35f3e15b92e4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世杰日記》數位資料庫」，下載日期：2014 年 4 月 2 日，網址：http://www.mh.sinica.edu.tw/PGDigitalDB_Detail.aspx?htmContentID=2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英華字典」資料庫，下載日期：2014 年 3 月 17 日，網址：http://140.109.152.25:8080/dictionary。

蘇仲卿，〈中研院的國際科學活動與我〉（2007 年 6 月），『歷史緣起：校友專欄—蘇仲卿教授專區』，「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網頁，下載日期：2014 年 4 月 2 日，網址：http://www.mbc.ntu.edu.tw/history/AC.htm#Su。

許宏彬訪談、周湘雲記錄，〈王志堯訪談逐字稿〉（未刊稿），2013 年 4 月 26 日，於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10 樓王志堯過敏免疫研究室。

許宏彬訪談、周湘雲記錄，〈楊照雄訪談逐字稿〉（未刊稿），2011 年 3 月 11 日，於臺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科暨研究所研究室。

許宏彬訪談、周湘雲記錄，〈蔡嘉哲醫師訪談逐字稿（未刊稿）〉，2010 年 12 月 24 日，於中山醫學大學研究大樓十樓微生物免疫學研究所蔡嘉哲研究室。

許宏彬訪談、周湘雲記錄，〈鄧昭雄訪談逐字稿〉（未刊稿），2011 年 6 月 15 日，於臺大醫學院皮膚科。

許宏彬訪談、周湘雲記錄，〈韓韶華訪談逐字稿〉（未刊稿），2012 年 3 月 24 日，於新北市新店燕子湖韓宅。

Burnet, Frank M.（著），林芳仁、董大成（譯）

1961 〈免疫的原理 Mechanism of Immunity〉，《臺灣醫學會雜誌》60(5): 562-568。

Mr. Slow（林芳仁）

1961 〈癌起於病毒乎？〉，《青杏》12: 21-23。

1964 〈胸腺與免疫〉，《青杏》19: 37-38。

小田俊郎

1941 〈臺灣に關係深き疾病診療の最近の進步〉，收於臺北帝國大學編，《臺北帝國大學紀念講演集：第七輯》，頁 15-23。臺北：臺北帝國大學。

小田俊郎（著）、洪有錫（譯）

1995 《臺灣醫學五十年》。臺北：前衛出版社。

山下憲治

1942 〈臺湾に於ける上咽頭悪性腫瘍の頻度に就いて〉，《熱帶醫學》1(1): 80-89。

川村明義

1978 〈日本の海外医療協力(46)台湾：上咽頭癌の病因探究をめぐる日台共同研究〉，《臨床科学》14(4): 538-545。

中央研究院八十年院史編纂委員會（主編）

2008 《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卷一：任重道遠 全院篇。臺北：中央研究院。

王作仁（摘譯）

1975 〈罹患播散性紅斑性狼瘡的 1 歲幼兒〉，《醫學文摘》2: 61。

行政院衛生署（編）

1995 《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第 1 冊。臺北：行政院衛生署。

呂耀卿

1975 〈皮膚病學講座（五）：蕁麻疹樣苔癬・結節性痒疹〉，《當代醫學》19: 26-29。

李宏生（摘譯）
1975 〈唾液腺之良性淋巴上皮疾患〉，《醫學文摘》2: 78。
李俊仁
2002 《生命的火焰：李俊仁回憶錄》。臺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沈君山
1979 〈理性‧自尊‧敵來不走！參加國際天文學會歸來的感想和建議〉，《聯合報》，1979 年 9 月 20 日，第 3 版。
沈佳姍
2012 〈日治時期臺灣細菌性免疫醫學發展之研究：從中央研究機構的制度面考察〉，《臺灣學研究》13: 161-184。
2013 〈日治時期臺灣防疫體制下的預防接種與人事變遷〉。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阮維周
1992 〈動態報導：一、中央研究院與國際科學聯合會（ICSU）地球科學部門之交流〉，《地質》12(1): 117-120。
周松男（摘譯）
1975 〈葡萄胎懷孕在淋巴球抗原中系統 HL-A 中的免疫生成性〉，《醫學文摘》2: 70。
周湘雲、許宏彬（主編）
2013 《見證歷史：免疫學在臺灣》。臺北：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居小燕（編著）
1973 《免疫學實驗手冊》。臺北：合記圖書出版社。
1974 《免疫學》。臺北：合記圖書出版社。
林宗洲
1975 〈醫學新貌：從 EB 病毒談到鼻咽癌〉，《當代醫學》17: 41-46。
林宗洲（摘譯）
1975 〈頭頸部之粘膜黑色素瘤〉，《醫學文摘》2: 81。
林長春 1961 〈癌、病毒與疫苗〉，《青杏》11: 8-10。
邱浩彰、鄧昭雄
1979 〈臨床免疫學：藥物過敏與食物過敏〉，《當代醫學》66: 33-41。
范燕秋
2009 〈臺灣的美援醫療、防癩政策變動與患者人權問題，1945 至 1960 年代〉，《臺灣史研究》16(4): 115-160。
徐世澤
1958 〈我國醫學界老戰士：嚴智鍾教授〉，《大眾醫學》8(12)：398-400。
徐茂銘
2012 〈臺灣鼻咽癌研究的故事（上）〉，《臺灣醫界》55(7): 38-41。
2012 〈臺灣鼻咽癌研究的故事（下）〉，《臺灣醫界》55(7): 42-45。

國防醫學院院史編纂委員會（編著）

1995 《國防醫學院院史》。臺北：國防醫學院。

張淑卿

2009 〈1950、60年代臺灣的卡介苗預防接種計畫〉，《科技、醫療與社會》8: 121-172。

2010 〈美式護理在臺灣：國際援助與大學護理教育的開端〉，《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8: 125-173。

2013 〈復健、輔具與臺灣小兒麻痺病患生活經驗（1950s-1970s）〉，《臺灣史研究》20(2): 123-174。

張淑卿（訪談）、柯小菁（紀錄）

2012 〈藍忠亮先生訪談紀錄〉，收於游鑑明等訪問、周維朋等紀錄，《臺中榮民總醫院三十載：口述歷史回顧》，上篇：歷任院長、副院長，頁607-639。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張學賢

1965 〈漫談免疫學的新觀念〉，《青杏》20: 15-20。

梁妃儀、陳好嘉、劉滄柏、蔡篤堅

2012 《臺灣癌症醫學發展史：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三十週年紀念專刊》。臺北：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記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莊哲彥

1995 〈亦師亦友：悼詹紹啟先生〉，收於編者不詳，《詹紹啟先生紀念集》，頁 231-232。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

莊祖儀（摘譯）

1975 〈抗核抗體：紅斑性狼瘡中核免疫螢光型態所表現之豫後意義〉，《醫學文摘》1: 91。

許宏彬

2013 〈年輕醫師的徬徨與抉擇：從《青杏》看1950及1960年代臺灣醫學教育、醫師出路及外流問題〉，《興大歷史學報》27: 53-81。

許輝吉、李俊仁、李治學

1975 〈人類腎移植之過急性排斥〉，《臺灣醫學會雜誌》74(4): 251-262。

1976 〈同種人類腎臟移植慢性排斥之腎小球與動脈病變〉，《臺灣醫學會雜誌》75(11): 519-527。

郭文華

2006 〈建構臺灣衛生體制：美援醫療的背景及其衛生政策〉，收於經典雜誌編著，《臺灣醫療400年》，頁142-147。臺北：經典雜誌出版社。

2008 〈美援下的衛生政策：1960 年代臺灣家庭計畫的探討〉，收於李尚仁主編，《帝國與現代醫學》，頁325-36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如何看待美援下的衛生？一個歷史書寫的反省與展望〉，《臺灣史研究》17(1): 175-210。

陳定信

1976 〈免疫學發展史〉，《當代醫學》27: 24-33。

陳炯明

1973 〈創刊詞〉，《當代醫學》1: 4。

陸坤泰

1979 〈臨床免疫學：肺的免疫疾病〉，《當代醫學》71: 59-65。

陸坤泰、黃文哲（採訪）

1959 〈我們的細菌學科〉,《青杏》8: 9-10。

黃文哲

1961 〈器官移植：免疫耐性—抗體產生機序〉,《青杏》11: 3-5。

黃文陶

1934 〈気管支喘息ニ対スル外科的療法效果ノ良否並ニ其レニ伴フ二三臨床的症狀ニ就イテノ討檢〉,《嘉義醫會醫學雜誌》2: 19-39。

黃申如

2006 〈1970 年代的學術外交〉，收於檔案管理局編，《檔案的故事：第四集》，頁 33-37。臺北：檔案管理局。

楊照雄、呂森吉

1996 〈微生物學研究所之回顧〉，收於臺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研究所編，《臺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研究所三十週年紀念專輯》，頁 1-3。臺北：臺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研究所。

楊翠華

1999 〈王世杰與中美科學學術交流，1963-1978：援助或合作？〉,《歐美研究》29(2): 41-103。

2003 〈臺灣科技政策的先導：吳大猷與科導會〉,《臺灣史研究》10(2): 67-110。

2008 〈美援對臺灣的衛生計畫與醫療體制之形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2: 91-139。

葉　曙、杜詩綿

1949 〈鼻咽癌之組織病理學研究〉,《臺灣醫學會雜誌》48(11/12): 113-136、287-289。

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編輯小組（編）

1997 《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日治時期（1897-1945 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1999 《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下）：系科所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劉兆玄

2012 〈王紀五與中國化學會〉,《聯合報》，2012 年 5 月 23 日，D3 版聯合副刊。

歐素瑛

2006 《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編輯室

1955 〈本院基礎學科簡介〉,《青杏》1: 11。

編輯部

1975 〈編者的話〉,《醫學文摘》4: 12。

1975 〈關於本雜誌〉,《醫學文摘》1: 卷首無頁碼。

1976 〈我們的話〉,《當代醫學》27: 10。

1979 〈我們的話〉,《當代醫學》63: 44。

蔡嘉哲

1979 〈臨床免疫學：免疫球蛋白〉,《當代醫學》64: 36-41。

1996 〈免疫學之發展歷史〉,《內科學誌》7(4): 298-303。

鄧昭雄（摘譯）

1975 〈Phenybutazone 所引起之皮膚反應：免疫學上之探討〉,《醫學文摘》2: 88。

1975 〈皮膚及血清螢光試驗之運用〉,《醫學文摘》2: 89。

鄭吉男
1996 〈閒話當年〉，收於臺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研究所編，《臺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研究所三十週年紀念專輯》，頁 69-72。臺北：臺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研究所。

鄭志敏
2005 《杜聰明與臺灣醫療史之研究》。臺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鄭庚申
1979 〈臨床免疫學：自體免疫疾病〉，《當代醫學》65: 37-40。

鄭庚申、陳寶輝
1979 〈臨床免疫學：全身性紅斑狼瘡症〉，《當代醫學》70: 94-99。

謝博生（摘譯）
1975 〈服用阿斯匹靈後淋巴球變形之抑制〉，《醫學文摘》2: 31。
1975 〈神經疾患時血清免疫球蛋白 E 之濃度〉，《醫學文摘》2: 32。

謝貴雄
1979 〈臨床免疫學：臺灣小兒過敏病〉，《當代醫學》64: 42-49。

韓韶華
1967 〈細胞免疫與傳染病的關係〉，《中華醫學雜誌》復刊 14(2): 219-227。

韓韶華（口述），喻蓉蓉（訪問），喻蓉蓉、藍玉人（記錄整理）
2004 《臺灣免疫學拓荒者：韓韶華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

蘇益仁、莊哲彥
1974 〈基礎與臨床：過敏疾患的免疫基礎〉，《當代醫學》13: 66-70。

蘇肇凱（講述）、蘇仁和（整理）
1975 〈專題講座：鼻副竇炎與全身各器官的關係〉，《當代醫學》21: 27-33。

Anderson, Warwick, Myles Jackson, and Barbara Gutmann Rosenkrantz
1994 "Toward an Unnatural History of Immun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27(3): 575-594.

Billingham, R. E., L. Brent, and P. B. Medawar
1956 "Quantitative Studies on Tissue Transplantation Immunity III. Actively Acquired Toleranc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 Biological Sciences* 239(666): 357-414.

Bowker, R. R. (ed.)
1998 *American Men & Women of Science, 1998-99: A Biographical Directory of Today's Leaders in Physical, Biological, and Related Sciences,* Vol. 2, C-F. New Providence, N. J.: Bowker.

Brent, Leslie
1997 *A History of Transplantation Immunology*. San Diego, Calif.: Academic Press.

Brown, Theodore M., Marcos Cueto, and Elizabeth Fee
2006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International" to "Global" Public Health."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6(1): 62-72.

Burnet, Frank M.
1957 "A Modification of Jerne's Theory of Antibody Production Using the Concept of Clonal Selec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Science* 20(3): 67-69.

1961 "The Mechanism of Immunity." *Scientific American* 204(1): 58-67.

1968 *Changing Patterns: An Atypical Autobiography*. Melbourne: Heinemann.

Cambrosio, Alberto and Peter Keating

1995 *Exquisite Specificity: The Monoclonal Antibody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osio, Alberto, Peter Keating, and Alfred I. Tauber

1994 "Introduction: Immunology as a Historical Objec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27(3): 375-378.

Cinader, B.

1992 "The Origins and Early Years of IUIS." *Immunology Today* 13(8): 323-326.

Cohen, Edward

2001 "Figuring Immunity: Towards the Genealogy of a Metaphor." In Anne Marie Moulin and Alberto Cambrosio, eds., *Singular Selves: Historical Issues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Immunology*, pp. 179-201. Amsterdam; Oxford: Elsevier.

Creager, Angela N. H.

2008 "Molecular Surveillance: A History of Radioimmunoassays." In Kenton Kroker, Jennifer Keelan, and Pauline M. H. Mazumdar, eds., *Crafting Immunity: Working Histories of Clinical Immunology*, pp. 201-230. Aldershot,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Galison, Peter

1999 "Trading Zone: Coordinating Action and Belief." In Mario Biagioli, ed., *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pp. 137-160.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Haraway, Donna J.

1991 "The Biopolitics of Postmodern Bodies: Constitutions of Self in Immune System Discourse." In Donna J.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pp. 203-230. New York: Routledge.

Humphrey, J. H. and R. G. White

1963 *Immunology for Students of Medicine*. Oxford: Blackwell.

Jackson, Mark

2006 *Allergy: The History of a Modern Malady*. London: Reaktion Books.

Keating, Peter, Miriam Balaban, Alberto Cambrosio, and Alfred I. Tauber

1997 "Introduction: Historiographic Issu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30(3): 317-320.

Kroker, Kenton, Jennifer Keelan, and Pauline M. H. Mazumdar (eds.)

2008 *Crafting Immunity: Working Histories of Clinical Immunology*. Aldershot,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Liu, Michael Shiyung 劉士永

2012 "From Japanese Colonial Medicine to American-Standard Medicine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in the Medical Profession and Practices in East Asia." In Liping Bu, Darwin H. Stapleton, and Ka-che Yip, eds., *Science, Public Health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Asia*, pp. 161-176.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Löwy, Ilana
1992 "The Strength of Loose Concepts-Boundary Concepts, Federative Experimental Strategies and Disciplinary Growth: The Case of Immunology." *History of Science* 30(4): 371-396.
1994 "Experimental Systems and Clinical Practices: Tumor Immunology and Cancer Immunotherapy, 1895-1980."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27(3): 403-435.
1996 *Between Bench and Bedside: Science, Healing, and Interleukin-2 in a Cancer War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rtin, Emily
1994 *Flexible Bodies: Tracking Immunity in American Culture from the Days of Polio to the Age of AIDS*. Boston: Beacon Press.

Mazumdar, Pauline M. H.
1995 *Species and Specificity: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Immunolog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edawar, Peter
1986 *Memoir of a Thinking Radish: An Autobiography*.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tman, Gregg 2007 *Breathing Space: How Allergies Shape Our Lives and Landscap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oulin, Anne Marie
1989 "The Immune System: A Key Concept for the History of Immunology."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he Life Sciences* 11(2): 221-236.

Moulin, Anne Marie and Alberto Cambrosio (eds.)
2001 *Singular Selves: Historical Issues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Immunology*. Amsterdam; Oxford: Elsevier.

Savarino, Stephen J.
2002 "A Legacy in 20th-Century Medicine: Robert Allan Phillips and the Taming of Cholera."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35(6): 713-720.

Silverstein, Arthur M.
2009 *A History of Immunology*. Amsterdam; Boston: Academic Press, 2 edition.

Silverstein, Arthur M. and Alexander A. Bialasiewicz
1980 "History of Immunology: A History of Theories of Acquired Immunity." *Cellular Immunology* 51(1): 151-167.

Slater, E.C. (Bill)
2005 "This is the IUBMB History: The History of IUB (MB)." *IUBMB Life* 57(4/5): 203-211.

Söderqvist, Thomas
1994 "Darwinian Overtones: Niels K. Jerne and the Origin of the Selection Theory of Antibody Forma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27(3): 481-529.

Söderqvist, Thomas (Author), David Mel Paul (Trans.)
2003 *Science as Autobiography: The Troubled Life of Niels Jern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öderqvist, Thomas and Arthur M. Silverstein

1994 "Participation in Scientific Meetings: A New Prosopographical Approach to the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Science-The Case of Immunology, 1951-72."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4(3): 513-548.

Söderqvist, Thomas and Craig Stillwell

1999 "Essay Review: The Historiography of Immunology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32(1): 205-215.

Star, Susan Leigh

2010 "This is Not a Boundary Object: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of a Concept."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35(5): 601-617.

Star, Susan Leigh and James R. Griesemer

1989 "Institutional Ecology, 'Translations' and Boundary Objects: Amateurs and Professionals in Berkeley's Museum of Vertebrate Zoology, 1907-39."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9(3): 387-420.

Stillwell, Craig R

1994 "Thymectomy as an Experimental System in Immun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27(3): 379-401.

Tansey, E. M.

2008 "The Witness Seminar Technique in Modern Medical History." In H. J. Cook, A. Hardy, and S. Bhattacharya, eds., *Social Determinants of Disease*, pp. 279-295. London: Orient Longman.

Tauber, Alfred I. and Scott H. Podolsky

1997 *The Generation of Diversity: Clonal Selec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Molecular Immunolog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helan, William J.

2002 "China and the IUB (MB)." *Bulletin of the Canadian Society of Biochemistry, Molecular& Cellular Biology*, pp. 41-42.

Wilce, James M., Jr. (ed.)

2003 *Social and Cultural Lives of Immune System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Yeh, Shu 葉曙

1962 "A Histo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Carcinomas of the Nasopharynx with a Critical Review as to the Existence of Lymphoepitheliomas." *Cancer* 15(5): 895-920.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21, No. 2, pp. 111-165, June 2014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Framing the Specialty of Immunology in Postwar Taiwan:
Medical Aids, Academic Diplomacy and Boundary Objects

Hung-bin Hsu

ABSTRACT

Immunological diseases, like allergic rhinitis, asthma and autoimmune disease, are irritating modern ailments in our modern society, and immunology provides the authoritative knowledge regarding how to deal or cope with these new medical conditions. Instead of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immunology in Taiwan as a natural consequence of advancement in biomedicine, this article situates immunology, the then new medical specialty, with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and describes the historical agent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immunology as a specialty in Taiwan. According to the primary materials collected from Witness Seminar, medical journals, and archive from the Chinese Society of Immunolog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sources and mechanisms behind the development and specialization of biomedicine in post-war Taiwan. The following interrelated questions are raised and discussed. First, what were the local context and social resources that enabled the institution of a new medical specialty (immunology)? Second, how did the new specialty build up its own resources and research topics, and negotiate a new boundary with the existing specialties (like bacteriology and microbiology)? Third, how and why specific historical actors of various existing specialties could work together to construct this new specialty? Finally, what was the relationship of this new specialty with local political and academic environment in post-war Taiwan, a developing country that eagerly absorbed advanced medical knowledge and system from Euro-American countri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immunology in Taiwan corresponds with the general speci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mmunology in the global context, local research networks, disease conditions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also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foundation of this new specialty, especially the medical aids and the political fights between Taiwan and P.R.C. in variou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unions in the 1970s. Moreover, it was boundary

objects like “self-recognition” and immunological measurement techniques that made it possible for actors with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purposes to work together and establish the immunological specialty in Taiwan.

Keywords: Immunology, Allergy, Medical Aids, Boundary Objects, Academic Diplomacy

《臺灣史研究》
第 21 卷第 2 期，頁 167-196
民國 103 年 6 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近二十年來應用
歷史地理資訊系統的回顧與展望：
以臺灣區域史研究為例*

李宗信、顧雅文**

摘　要

歷史地理資訊系統（Historical GIS，以下簡稱「歷史 GIS」）的發展已近廿年，期間應用歷史 GIS 的環境已有極大變化，這些改變意味著研究者不見得必須仰賴大型計畫或團隊合作的模式應用 GIS，個人的歷史 GIS 研究變得更容易達成。而區域史作為一門將歷史現象放回其產生區域（空間）脈絡中加以審視的研究領域，似乎是臺灣史學中最能體現歷史 GIS 價值的領域之一。由此，本文分三部分回顧近廿年來臺灣區域史研究應用 GIS 的情況。第一部分探討應用 GIS 最深入的三個區域史主題，觀察 GIS 扮演的角色，第二部分進一步檢視研究者如何以 GIS 處理不同類型的區域史料，而第三部分則探討 2003 年 THCTS 等 Web-GIS 發展以來，在臺灣區域史應用上的不同趨勢。

關鍵詞：歷史地理資訊系統、區域史、THCTS、Web-GIS

---

* 本文初稿曾以〈近二十年來應用歷史地理資訊系統於區域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為題，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主辦之「二十年來臺灣區域史研究回顧暨 2013 年林本源基金會年會」（2013 年 9 月 26-27 日），感謝與談人及與會學者惠予意見，並感謝匿名審查人對本文提供許多寶貴建議，在此謹表謝忱。

** 李宗信，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顧雅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通訊作者）。

來稿日期：2014 年 2 月 20 日；通過刊登：2014 年 6 月 13 日。

一、前言
二、應用 GIS 最深入的三個區域史主題
三、以史料為主的觀察
四、應用 Web-GIS 的回顧：
以「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THCTS) 為例
五、結論

一、前言

廿年前的《臺灣史研究》創刊號，張光直、莊英章及賴澤涵等學者曾在〈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文中共同呼籲展開多學科（multidisciplinary）或科際整合的臺灣史研究，[1] 此一時刻恰好是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 GIS）[2] 被介紹至歷史研究領域之際。隨著日後「歷史 GIS（historical GIS）」新名詞的創出，此一工具的能見度越來越高，[3] 進而引起一些注重空間議題的臺灣史研究者之關注，當然也包含區域史研究者在內。

區域史透過區域來探究整體歷史現象，此一取向可說是實踐科際整合下的臺灣史研究最重要的場域之一。作為一種「逼近歷史現象或問題」的研究方法，[4] 區域史與地理學區域研究傳統的核心概念不謀而合，不僅讓歷史研究者從熟悉的時間思考跨足空間思考，也吸引不少地理學者從空間跨足處理時間的學問。然而，

1 編輯組編，〈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1: 1（1994 年 6 月），頁 12-23。

2 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 GIS）是用以擷取、儲存、處理、分析和展示各種形式的地理資訊之系統。參見〈What is GIS?〉，「ESRI」網站，下載日期：2014 年 6 月 26 日，網址：www.gis.com/whatisgis/index.html。

3 近幾年更為常見的是 Humanities GIS，強調 GIS 在人文學科上的應用。

4 此語出自 2006 年 6 月 1 日施添福教授在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的演講稿。參見施添福，〈社會史、區域史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北部內山的研究方法論為中心〉，「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暨研究所：學術活動」網站，下載日期：2014 年 4 月 14 日，網址：http://www.ts.ndhu.edu.tw/ezfiles/44/1044/attach/9/pta_6100_9321126_77216.doc。

本文最主要的關懷在於，GIS 這個統合空間資訊的工具在近廿年來發展的同時，是否對跨足空間研究的文史學者產生影響；此一原不屬於歷史學科的工具之發展，是否為立足於史學主體性的區域史研究帶來更具創新的敘事方式。[5]

關於 GIS 在歷史學可能扮演的角色，1990 年代的歷史 GIS 學者曾提出許多美好的期待和願景，如最早的倡導者 Anne Kelly Knowles 與 Ian N. Gregory 等人，各就研究經驗及方法學的觀點提出 GIS 在歷史研究上的優勢，認為 GIS 不僅是整合史料的研究工具，也是視覺化的發布媒體，更有助於將複雜的空間分析技巧納入歷史分析中。[6] 不過，當時使用 GIS 的門檻極高，如軟體售價昂貴，個人研究者難以應用；而大部分專業的 GIS 軟體缺少執行時間分析的功能，並非友善的歷史研究環境；更棘手的是，研究歷史需要古地名或歷史行政邊界，這些圖資往往必須自行數位、建置，不僅耗時、耗費，加上可作為底圖（base map）的古地圖，又大多被零散保存於各機構，必須進一步徵集或申請才能使用。因而，早期的歷史 GIS 學術成果幾乎都必須仰賴大型計畫之支持，並著眼於基礎平臺的架構。如英國樸資茅斯大學（University of Portsmouth）主持的 Great Britain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BHGIS)、美國哈佛大學及復旦大學合作的 China Historical GIS (CHGIS)、美國明尼蘇達人口中心（Minnesota Population Center, MPC）發展的 National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NHGIS)、比利時根特大學（University of Ghent）的 Belgian historical GIS，及日本筑波大學村山祐司所建置的一系統歷史 GIS 平臺，皆以 Web-GIS（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形式發展，使用者不需購買昂貴的 GIS 單機版軟體，透過瀏覽器的簡單操作就能檢視歷史行政邊界、檢索古地名、或將歷史統計以地圖方式表現。[7]

---

[5] 換言之，地理學界也累積了不少應用 GIS 進行區域研究的重要成果。然而，學科之不同的訓練仍體現了區域研究與區域史研究不同的主體性，因而地理學界的成果較難置於本文的問題意識及有限篇幅下充分討論，有待另文加以探討。本文僅基於個人的學術興趣與關懷，以近二十年來臺灣區域史的發展為例，探討研究者是否或如何在 GIS 輔助下得到啟發，從時間到空間，實現跨學科的理想。

[6] 兩人都是地理學者。參見顧雅文，〈再現、認知與解釋歷史的新工具：GIS 與臺灣史研究的對話〉，收於賴進貴等編，《數位典藏地理資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地理資源學系，2008），頁 106。

[7] 有關上述計畫的介紹，參見「Reports on National Historical GIS Projects」專題，收於 Anne Kelly Knowles 主編，*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33 (2005)，轉引自「Historical Geography」網站，下載日期：2014 年 6 月 26 日，網址：https://ejournals.unm.edu/index.php/historicalgeography/issue/view/456/showToc；日本的發展可參見 Onoda Kazuyuki, Miyamoto Shinji, Fujita Hirotsugu, Komeie Taisaku, Kawahara Norifumi, and Kawaguchi Hiroshi,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Japan since 1980," *Japanese Journal of Human Geography* 65: 1 (Apr. 2013), pp. 12-16；《アジア遊学　特集：地域情報学の創出》113（2008 年 8 月）。

相較之下，臺灣的歷史 GIS 發展甚早，在 1990 年代初期已進行了一些先驅性的工作，並著手將一些古地圖數化為可以編修的向量式（vector）圖檔，開啟了歷史學界應用 GIS 的契機。2002 年，以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為基礎的「中華文明時空基礎架構系統（CCTS）」正式上線，翌年又開始建置「臺灣歷史文化地圖」（THCTS）。[8] 後者以明治 37 年（1904）縮製的二萬分一《臺灣堡圖》及大正 10 年間（1921-1928）發行的二萬五千分一《臺灣地形圖》為主要骨幹，最大的貢獻是重建不同時期的歷史行政邊界及地名，並提供地形圖上諸如學校、派出所、車站等基本主題圖層。此一「時空對位系統」的建置，雖然有屬性內容不完備及部分數化疏漏等缺陷（後詳），仍可說是大幅降低歷史 GIS 門檻的革命性發展。除基礎環境建置外，該單位亦展開技術人員與研究人員的合作，推動兼具時空特色的人文歷史研究。

上述發展至今十年以來，歷史 GIS 的發展環境又有急遽改變：電腦運算效能及網路傳輸速度大幅提高；開放源碼軟體（open source software）蓬勃發展，[9] 免費的 QGIS 大有取代商業 GIS 軟體之勢；類 GIS 的 Google Earth 加入了時線特性，使用者可以就空間資料進行簡單的時間軸切換觀察，而這種鳥瞰式的視野也越來越為文史研究者所熟悉。另一方面，起步較早且具國際領先地位的數位典藏計畫成果，頗有助於基本圖形及屬性資料的擴充，如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的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業已成為全世界典藏最多中國及臺灣圖資的單一機構，並逐漸以各種方式對外開放圖資。更重要的是，有越來越多的大專院校提供短期教育

8 1990 年代初期，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范毅軍，延續其在美國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求學時期使用地圖研究歷史的興趣，嘗試在中研院建置 GIS 的使用環境，並在當時計算中心主任林誠謙的支援下，於 1996 年底，先後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及計算中心成立相關工作室及實驗室。此後，范毅軍、劉翠溶等研究人員結合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及計算中心等單位的力量加以推動，陸續完成 CCTS 及 THCTS。2003 年，中研院成立發展跨領域研究的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其下設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計畫」以統籌相關資源，2006 年正式實體化，即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以下簡稱中研院 GIS 中心」。參見范毅軍，〈試論地理資訊系統在歷史研究上的應用〉，《古今論衡》2（1999 年 6 月），頁 93-96；顧雅文訪談，〈劉翠溶口述資料〉（未出版），2014 年 4 月 9 日，於中央研究院；李宗信、顧雅文訪談，〈范毅軍口述資料〉（未出版），2014 年 4 月 15 日，於中央研究院。

9 一般商用軟體僅讓使用者安裝，但看不到軟體源碼，更禁止修改或散布，開放源碼軟體則允許使用者自由使用及接觸程式原始碼，保障使用者自由修改、複製及散布的權利。

訓練或正規 GIS 課程。[10] 這些改變意味著，歷史研究者不見得必須仰賴大型計畫或團隊合作的模式應用 GIS 輔助研究，個人的歷史 GIS 研究變得更容易達成。

論者已指出，臺灣史的史料特性使其在發展歷史 GIS 上獨具優勢，[11] 在經濟史、族群史、環境史、疾病史或歷史人口學上，已有不少出色的歷史 GIS 研究出現，[12] 而就史料的角度來看，區域史研究應能算是臺灣史學中最能體現歷史 GIS 價值的領域之一，此因區域史「將歷史現象放回它產生的區域（空間）脈絡加以審視」，[13] 此一研究對象與方法促使研究者走入地方挖掘在地史料，而那些小尺度的個人、家族或土地的零碎史料，如果都能精確地置於時空坐標上，將更能看出區域內相互關聯的各種自然或人文現象，並進行整體性的歷史探討。

因此，本文將試圖回顧近廿年來臺灣史學界應用 GIS 研究區域史的情況，探討歷史 GIS 應用環境的改善是否有助於這些研究者親近此一工具，而 GIS 又是否能為區域史研究帶來具體貢獻。本文的回顧對象以歷史專著、史學相關系所碩博士論文及史學期刊為主，以最寬鬆的認定來看，用 GIS 作為輔助工具者的區域史研究計有近二百篇。以下的回顧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以區域史研究主題來觀察 GIS 扮演的角色，第二部分進一步檢視研究者如何以 GIS 處理不同類型的區域史料，這兩個部分將以應用單機版 GIS 軟體的研究者為主，而第三部分則探討 2003 年 THCTS 等 Web-GIS 發展以來，在臺灣區域史應用上的不同趨勢。

---

10 如中研院、國立臺灣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東華大學、東吳大學等，均曾舉辦將 GIS 應用於人文研究的工作坊。目前有開設相關課程的歷史相關系所，包括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國立中興大學人文數位典藏與加值應用學程、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等。

11 顧雅文，〈再現、認知與解釋歷史的新工具：GIS 與臺灣史研究的對話〉，頁 103-119；李宗信，〈淺談地理資訊系統（GIS）於臺灣史研究上之應用〉，收於蔡美蒨總編輯，《臺灣學系列講座專輯（一）》（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8），頁 119-146；李宗信，〈臺灣歷史人口統計資料 GIS 建置與應用〉，《臺灣學通訊》69（2012 年 9 月），頁 12-13；顧雅文，〈日治時期臺灣的衛生調查與疾病統計：兼論以 GIS 輔助疾病史研究〉，《白沙歷史地理學報》14（2012 年 10 月），頁 203-253。

12 舉例來說，葉高華、吳聰敏、許世融、劉士永、顧雅文等人，都曾將 GIS 應用在各自的研究主題中，提出新的問題或新的解答，這些研究不屬於臺灣區域史領域因此不在本文回顧範圍之內，值得另文加以探討。

13 施添福，〈社會史、區域史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北部內山的研究方法論為中心〉。另參見吳進喜、陳鴻圖，〈2009 年臺灣區域史研究回顧與展望〉，發表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主辦，「2009 年臺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2010 年 12 月 16-17 日。

二、應用 GIS 最深入的三個區域史主題

就數量而言，近廿年來的區域史研究成果，不管是將 GIS 當作單純的繪圖工具，或進一步利用其分析功能，其應用頻率皆有增加的趨勢。大部分的論文利用古今地圖的套疊表現出研究區，或區域範圍內行政邊界的變化，這些空間區劃的隨時變化是文字描述難以表現的。進一步來說，較深入的應用集中在以下三個主題上：族群與地權研究、區域水利史研究以及區域性宗教活動研究。以下分別回顧之，並說明 GIS 在個別研究中扮演的角色。

（一）族群與地權研究

柯志明自 1999 年起有關族群與地權的一系列研究，可說是區域性歷史研究中最早應用 GIS 的成果。[14] 首先，在〈理性的國家與歷史的機遇：清代臺灣的熟番地權與族群政治〉一文及《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一書中，利用 GIS 將乾隆年間的「臺灣番界」繪製在今日的地形圖上。僅管作者並未清楚說明番界的位置如何確定，但該文中的番界圖層，卻成為日後尺度較小的區域史研究不斷援引或修正的重要依據。此外，柯志明整理出「土地申告書」與「淡新檔案」隘租清冊中的岸裡社番租資料，以明治 34 年（1901）「臺灣堡圖（以下簡稱堡圖）」的街庄界呈現竹塹地區的番租數額及其坐落。這些數據資料不僅龐雜，且必須經過轉換計算才能得到統一的單位，因而 GIS 也成為建置資料庫、計算量化數據的工具。透過視覺化的地圖，柯氏驗證了施添福在該地區田野調查所得的結果，並以熟番社番租數額在行政區上的空間分布來支持其「族群政治」理論下「三層制族群分布」的解釋架構。

陳秋坤的研究亦運用 GIS 繪製地圖。2002 年的〈清代塔樓社人社餉負擔與產權變遷（1710-1890）〉一文，[15] 放了一張以 GIS 重繪的昭和時期「下淡水溪治水

---

14 柯志明，〈理性的國家與歷史的機遇：清代臺灣的熟番地權與族群政治〉，《臺灣史研究》6: 2（1999 年 12 月），頁 1-76；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頁 317-319。前者中地圖由助理陳兆勇繪製。

15 陳秋坤，〈清代塔樓社人社餉負擔與產權變遷（1710-1890）〉，《臺灣史研究》9: 2（2002 年 12 月），頁 69-102。文中地圖一由中研院計算中心廖泫銘繪製。

計畫圖」，套疊上清代的聚落點，藉以呈現清代塔樓社人居住於洪水泛濫頻仍的維生環境中。2009 年〈帝國邊區的客庄聚落：以清代屏東平原為中心（1700-1890）〉一文，[16] 分別繪製了「清代屏東平原墾戶佔墾租業圖」及「客庄六堆坐落與地下水層分布圖」。前者僅以臺灣堡圖的聚落位置來呈現出清代不同族籍別墾戶分別佔墾屏東平原的大略區位；後者則是帶出後續論證的重要地圖。該圖套疊了清末六堆客庄聚落及屏東平原地下水層分布資訊。藉此，作者發現除了美濃右堆之外的六堆村庄聚落幾乎都聚集在富含地下水層的地帶。豐沛的地下水源，不僅讓早期在此活躍的鳳山八社得以能專憑種稻維生，毋需像中北部熟番那般游耕採捕，更讓日後在此定居的客家移民不必耗費心力建造水圳，即可形成狹長的農業稻作生產穀倉。綜言之，陳氏在屏東平原的區域史研究並不處理量化資料，而以 GIS 進行地圖套疊，除輔助行文外，亦從視覺化的結果來發掘問題、解決問題。

洪麗完自 2005 年起陸續撰寫了有關平埔族社群關係、遷徙擴散以及地權、租權的論文，試圖以 GIS 表現文字的空間描述，繪製諸如平埔族生活領域範圍等歷史地圖，這些地圖多屬示意性質，主要是幫助讀者理解文中述及的空間資訊，尚未有太多從繪圖結果來發現或解決問題的嘗試。GIS 扮演較關鍵的角色是在 2011 年的〈嘉南平原沿山地區之族群關係（1700-1900）：以「阿里山番租」為例〉一文，該文蒐集許多番食租與大社油香租的資料，並將其空間座落標示於現代地形圖上，即「阿里山番租分布示意圖」。藉由該圖，洪氏發現漢人早在界碑豎立時就已入墾阿里山生活領域；隨著漢人拓墾活動增加，阿里山番租的分布也隨之日廣。此外，番食租與大社油香租大多數位於（康熙 61 年〔按：1722〕）界碑甚至土牛界右側，說明在界碑之後挖築的土牛溝，其實並無法真正達到隔絕漢人入墾番界外的目的。[17]

16　陳秋坤，〈帝國邊區的客庄聚落：以清代屏東平原為中心（1700-1890）〉，《臺灣史研究》16: 1（2009 年 3 月），頁 7、16。文中地圖由中研院地理資訊中心劉揚琦繪製。

17　相關地圖多由計畫助理吳奇浩、鄭螢憶、李孟勳等人繪製。參見洪麗完，〈從清代「社」之多重性質看平埔社群關係發展：以臺灣中部為例〉，《臺灣史研究》12: 1（2005 年 6 月），頁 1-41；洪麗完，〈清代楠梓仙溪、荖濃溪中游之生、熟番族群關係（1760-1888）：以「撫番租」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4: 3（2007 年 9 月），頁 1-71；洪麗完，〈嘉南平原沿山地區之族群關係（1700-1900）：以「阿里山番租」為例〉，《臺灣史研究》18: 1（2011 年 3 月），頁 41-102；洪麗完，〈族群互動與遷徙、擴散：以清代哆囉嘓社人遷徙白水溪流域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8: 4（2011 年 12 月），頁 1-55。

2010 年後一些研究族群與地權的碩博士論文在不同層面上應用了歷史 GIS。李宗信的〈崩山八社租業的形成與終結〉一文，[18] 蒐集日治初期的戶口資料及「土地申告書」與「大租補償金臺帳」等地籍資料，與過去研究不同的是，該文以 GIS 為工具，整合地籍圖及上述史料，建立了崩山八社租業資料庫，以重現番社的確切位置及社域（租權）的範圍與邊界。該文發現，崩山八社的社域範圍直到日治初期仍有大量的（公、私）番租、口糧存在，故試圖論述其番租、口糧得以保全不致流失殆盡的原因。趙玉嫻在其碩論〈百年鈎沈璞石閣：花東縱谷中段的族群遷徙與土地開拓〉中，[19] 利用 GIS 建置 1920-1940 年國勢調查中有關番社聚落人口資料，繪製出不同年代番社人口分布圖，發現集團移住政策實施後，原本番地的番社消失了，但在山麓地帶的番社人口規模大增，由此驗證集團移住政策與 1920-1940 年番地人口分布之間的因果關係。鄭安睎的博士論文〈日治時期蕃地隘勇線的推進與變遷（1895-1920）〉，[20] 以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簡稱 GPS）輔助田野調查，並以 GIS 將 GPS 定位點、路線套疊在古地圖上，繪製出多幅日治初期隘勇線地圖，詳細說明隘勇線的空間布局、與蕃界的關係以及隘勇線推進（即蕃界的移動、原住民生活領域被壓縮）歷程。

尚有二篇較近期的期刊論文。李宗信〈大嵙崁溪中游漳州籍民優勢區域的形成〉，[21] 利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明治 34 年（1901）漢人祖籍的調查統計，藉 GIS 以堡圖的街庄界重新匯整計算，呈現了大嵙崁溪中游不同漢人祖籍的分布比率及其邊界，並據此探討臺北盆地的漳州籍移民如何在經歷多次分類械鬥後移墾大嵙崁溪中游，成為優勢族群。葉高華〈日本時代集團移住對原住民社會網絡的影響：新高郡的案例〉一文，[22] 以五萬分一「臺灣蕃地地形圖」上的空間資訊比對《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戶口》和《理蕃誌稿》等文獻、檔案，針對新高郡原住民部落的分布情形，分別繪製了 1915-1922、1923-1932、1933-1940 以及 1941

---

18 李宗信，〈崩山八社租業的形成與終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1）。

19 趙玉嫻，〈百年鈎沈璞石閣：花東縱谷中段的族群遷徙與土地開拓〉(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2012)。

20 鄭安睎，〈日治時期蕃地隘勇線的推進與變遷（1895-192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論文，2011）。

21 李宗信，〈大嵙崁溪中游漳州籍民優勢區域的形成〉，《臺灣文獻》62: 2（2011 年 6 月），頁 1-30。

22 葉高華，〈日本時代集團移住對原住民社會網絡的影響：新高郡的案例〉，《臺灣文獻》64: 1（2013 年 3 月），頁 107-128。

年以後等四個不同時段的歷史地圖，經套疊地形圖層後發現，新高郡蕃地原住民部落的地理位置，在大正 12 年（1923）殖民政府實施集團移住政策前、後出現變動。昭和 5 年（1930）霧社事件爆發以前的集團移住，主要是就近將部落往地勢較低平之處遷徙，而事件之後推動的大規模集團移住，則徹底改變了新高郡原住民部落的人口分布。

（二）水利研究

另一個應用 GIS 有成的區域史成果要屬水利議題。顧雅文 2000 年的碩士論文〈八堡圳與彰化平原人文、自然環境變遷之互動歷程〉，是臺灣史學位論文中首次利用 GIS 的研究成果。該文清查文獻中有關彰化平原水圳的紀錄，包括開圳時間、流經地點等，在當時缺乏古地圖及歷史行政邊界可用的情況下，作者參照古今地名研究，以水圳流經街庄對照現今村里界，再以村里界分別繪製康熙、雍正、乾隆及嘉慶以降不同時期的水圳灌溉區域圖。該圖印證了彰化平原水利開發的空間趨勢，與濁大計畫田野調查聚落、宗祠所得出的拓墾路線相互支持，亦更實證地顯示環境條件是影響拓墾先後的底層原因。[23]

李宗信、顧雅文、莊永忠的〈水利秩序的形成與崩解：十八至二十世紀初期瑠公圳之變遷〉一文於 2009 年出版，是自 2006 年即開始著手的研究。[24] 該文藉由 GIS 整合龐雜的水利史料，包括大量的清代的契約、日治時期的埤圳調查檔案及古地圖。GIS 將上述零散的史料歸到正確的時空架構下，藉此該文得以重建清代的霧裏薛圳、大坪林圳與瑠公圳之圳道，進而將水圳議題放入社會史與環境史脈絡中檢視。作者套疊漢庄聚落於水圳分布圖上，說明水圳開成是影響漢庄聚落空間結構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該文細緻地討論此三條水圳如何串起開圳主與沿線不同聚落中的引水人之社會關係，又如何形成管理者與各引水人間的水利秩序。水圳先天不同的地形條件及後天相異的管理方式，造成水利秩序在穩定程度上的差異；當圳主與管理者脫離了灌區空間，或變成以營利為考量的管理方

23 顧雅文，〈八堡圳與彰化平原人文、自然環境變遷之互動歷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24 李宗信、顧雅文、莊永忠，〈水利秩序的形成與崩解：十八至二十世紀初期瑠公圳之變遷〉，收於黃富三主編，《海、河與臺灣聚落變遷：比較觀點》（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頁 145-228。

式，水利秩序便漸趨瓦解。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歷史現象是，自十九世紀後半葉以來，大坪林圳與瑠公圳灌區中出現越來越多的水利糾紛，顯示原有的水利秩序受到衝擊，其原因在於缺水造成的分水不公與洪水造成的水利失修。GIS 疊合的地形圖與土地利用的地圖說明，新店溪上游的茶園開發是破壞水土保持的重要原因。藉此得以推論，茶園開墾增加了河流暴雨時的洪水與平時缺水的風險，並迫使自新店溪引水的大坪林圳與瑠公圳在用水秩序上做出相異的回應。

近期應用 GIS 的水利史研究，均大量運用日治時期及戰後的古地圖，以 GIS 進行校正、數化與套疊。陳文立於 2010 年的學位論文〈從自然到人文空間的轉化：宜蘭員山地區的拓墾行動（1802-1945）〉，[25] 擷取了 1925 年「官有林野圖」的堤防空間資訊，並與堡圖進行套疊分析，確認昭和 11 年（1936）堤防興建前的聚落狀況，及完工後的浮覆地空間範圍。此外，該文亦將土地臺帳中的地籍資訊整合於 1953 年「160 磅地籍藍晒圖」上，證論治水後的浮覆地如何被日籍資本家所占有，及後續土地權利的轉移情形。高敏雄的〈滄海桑田：石門水庫的興建與聚落變遷〉一文以石門水庫為探討對象，[26] 水庫雖為日治時期設計，但相關的文字資料早已散佚，故該文以當時的設計圖、地形圖為史料，重新確認最初由八田與一規劃的堰堤位置及淹沒範圍，再進一步套疊現今地圖。作者主張今日的壩址是沿用過去的規劃，而當時設定的水庫最大容量及淹沒區範圍皆遠比今日為大，主要是為了解決當時桃園大圳水量明顯不足的問題。張哲維的〈日治時期宜蘭濁水溪治水事業〉同樣探討蘭陽溪治水，[27] 較特別的是比對堡圖與清代「噶瑪蘭廳水利堤堰全圖」，透過 GIS 將五條堤防的大略位置繪出，並運用其計算長度的功能，檢視其是否與方志記錄的堤岸長度相符。

李進億〈由內而外：後村圳灌溉區爭水事件的歷史變遷（1763-1945）〉一文刊載於 2012 年《白沙歷史地理學報》的歷史 GIS 專號。[28] 該文作成歷年灌溉區

---

[25] 陳文立，〈從自然到人文空間的轉化：宜蘭員山地區的拓墾行動（1802-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26] 高敏雄，〈滄海桑田：石門水庫的興建與聚落變遷〉(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27] 張哲維，〈日治時期宜蘭濁水溪治水事業〉(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28] 李進億，〈由內而外：後村圳灌溉區爭水事件的歷史變遷(1763-1945)〉，《白沙歷史地理學報》14(2012 年 10 月)，頁 65-169。

域與圳道之變遷、各時期圳頭位置分布與網流河段之關係、埤圳主住居地分布、祖籍分布與爭水區域之關連、大嵙崁溪流域水利系統取水口與抽水站分布等主題圖，藉以呈現研究區與相關論述的空間特性，並從中發掘新的解釋觀點，如作者考證出大嵙崁溪流域各水利系統的取水口分布，發現後村圳位居水源最末端，取水量為大嵙崁溪沿岸水圳最少者，造成該區引水人旱季時爭水手段最為激烈。

（三）宗教活動研究

區域性宗教活動的相關研究，其共同的特色是利用 GPS 與 GIS。例如陳秋坤在〈清代萬丹地域的地主、神明信仰與下淡水社人的離散，1720-1900：以萬丹李家古文書為中心〉一文，將 GPS 記錄的萬丹萬惠宮天上聖母遶境路線套疊於屏東平原閩、客聚落分布圖上，[29] 該圖五發現，原為閩人聚落和媽祖祭祀圈的溝仔墘等村莊，雖然早在日治初期即因殖民統治考量而被劃歸客庄為主的竹田庄管轄，但萬丹街庄仍將該地納入繞境路線，形成「神境」與「村界」的模糊地帶，突顯出地方社會的運作與國家統治考量的邏輯差異。

蔣鎧俊的碩士論文〈霧峰宗教信仰發展與地方社會〉，[30] 定位臺中縣霧峰鄉的每一座土地公廟，並透過 GIS 套疊溪流、水圳和地形圖層，發現主要聚落均建有土地公廟，其在近山區域，分布上大致緊鄰溪流；在平原地區，則多建於圳路通過的沿線聚落。

李宗信於《續修臺中縣志・卷二：住民志—宗教篇》，利用 GPS 定位了臺中縣各鄉鎮寺廟坐落及主要神祇遶境路線，繪製於現代地圖之上，從而驗證其與漢人不同祖籍間的空間分布關係。[31]

張智傑、洪瑩發、邱彥貴等人，長期參與「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平臺的建置及應用，其一系列有關民俗與民間信仰的研究成果發表於 2013 年《民俗與

---

[29] 陳秋坤，〈清代萬丹地域的地主、神明信仰與下淡水社人的離散，1720-1900：以萬丹李家古文書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7: 3（2010 年 9 月），頁 1-37。該圖五由中研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聯合小組協助繪製。

[30] 蔣鎧俊，〈霧峰宗教信仰發展與地方社會〉（臺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0）。

[31] 例如旱溪媽祖的遶境路線與 1901 年漳州籍民優勢區的空間關係、九庄媽遶境路線與廣東籍民優勢區的空間關係等。參見溫振華、溫芝綺、李宗信、李進億、顧雅文，《續修臺中縣志・卷二：住民志》（臺中：臺中縣政府，2010），頁 385-397。

文化》的地理資訊科學專號中。作者或利用 GPS 記錄神祇遶境路線，搭配資訊平臺的寺廟資料庫進行分析；或從巨觀視角探討寺廟數量與分布的變化；或從微觀視角論述寺廟的時空分布差異與其中隱藏的社會歷史脈絡。[32]

綜觀上述區域史研究成果，大部分的專書論文及期刊論文集中在近五年內。較早期的研究，作者幾乎多出自中央研究院，最主要的原因是能就近取得院內 GIS 中心在軟硬體、圖資、甚至是技術人員上的奧援。近五年的發展顯示，前述歷史 GIS 環境的急遽改變越來越足以支持獨立研究者應用 GIS，不管是軟硬體、圖資都更容易取得。尤其，部分歷史學系所開設 GIS 課程，讓中南部、東部等相對來說較難取得資源的大學也出現應用 GIS 的區域史學位論文。

從內容來看，上述研究中，GIS 扮演的角色大致可以歸納為三種類型：一是作為空間化、視覺化的工具，研究者或將文獻中的陳述與古地圖互相比對並繪製其上，或利用史料的特殊性與地圖整合（如地籍、戶籍資料與地籍圖的整合），或利用古今地名的既有研究繪製於今地圖上，或將 GPS 定位古蹟或古道的結果呈現於地圖上；二是作為處理圖像的工具，研究者針對符合研究內容的主題地圖進行影像對位，再將不同主題或年代的圖層互相套疊；三則是作為建置資料庫的工具，建立量化或質化的屬性資料，並加以匯整、計算、分析。這些不同類型的應用也出現不同層次的效果，有些繪製出來的地圖是為了輔助文字說明，有些可以驗證過去經驗式的研究，有些則能誘發新的問題意識，或提出具空間意涵的解釋觀點。

三、以史料為主的觀察

歷史 GIS 應用的關鍵在於研究者對史料空間特性的了解。[33] 區域史研究之史料具有強烈的在地性，而 GIS 正可以讓這些史料回歸其生產的時空脈絡。下文進

32 張智傑、洪瑩發、廖泫銘、范毅軍，〈GIS 與地方社會和民間信仰〉，《民俗與文化：民間信仰與地理資訊科學專刊》（以下簡稱「《民俗與文化》）8（2013 年 7 月），頁 5-15；洪瑩發、張耘書、張智傑、張珣、范毅軍、廖泫銘，〈歷史與空間：臺灣媽祖廟數量與分佈探討〉，《民俗與文化》8（2013 年 7 月），頁 17-39；洪瑩發、張智傑、廖泫銘、范毅軍，〈馬鳴山鎮安宮信仰空間研究初探〉，《民俗與文化》8（2013 年 7 月），頁 41-84；邱彥貴，〈雲嘉南地區三山國王廟時空分布討論〉，《民俗與文化》8（2013 年 7 月），頁 85-94。

33 顧雅文，〈再現、認知與解釋歷史的新工具：GIS 與臺灣史研究的對話〉，頁 105-108。

一步將觀察的是臺灣區域史研究在應用 GIS 時最常利用的史料，除了說明這些史料的特色，亦回顧研究者如何藉 GIS 整合、運用這些史料。

（一）古地圖

古地圖是區域史或任何領域的歷史研究應用 GIS 的基礎。歸因於臺灣特殊的歷史際遇，各個時期的殖民者或移入者，均基於各異的理由，為其統治下的臺灣留下不同測繪方法與比例尺的地圖。研究者不僅研究古地圖本身，也在此基礎下以地圖為史料，輔助地方研究。這些地圖研究者的耕耘，擴大了區域史研究者的史料應用範圍。

荷西時代的古地圖研究著重於古地名考釋與海岸線的變遷研究，如翁佳音對「淡水與其附近村社暨雞籠島略圖」（Kaartje van Tamsuy en omleggende dorpen, zoo mede het eilandje Kelang）的地名考證即為一例。冉福立（Kees Zandvliet）、江樹生、[34] Christine Vertente，[35] 及黃清琦等，[36] 均有相關研究。[37] 清代各種臺灣輿圖多屬非實測的山水式或計里畫方（按照比例尺繪製地圖的方法）地圖，直到 1860 年展開洋務運動以後，才融入更多實測製圖的成份。[38] 有關清代地圖的研究亦多偏重於地名等文字資訊的考釋、解讀和分析。包括夏黎明、[39] 施添福、[40] 姜道章、[41] 高傳祺、[42] 黃清琦、[43] 林玉茹[44] 等人均有所貢獻。

---

34 Kees Zandvliet（格斯・冉福立）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臺北：漢聲雜誌社，1997）。

35 Christine Vertente（維爾騰）、許雪姬、吳密察，《先民的足跡：古地圖話臺灣滄桑史》（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1）。

36 黃清琦，〈地圖繪製與解說〉，收於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臺南：臺南市政府，2011），第 4 冊：1655-1662，頁 VI。

37 高祥雯，〈荷據時期大員的空間變遷〉（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7）。

38 賴進貴、黃清琦、葉高華，〈古地圖的空間認知探索：以 1878 年《全臺前後山輿圖》為例〉，《地理學報》42（2005 年 12 月），頁 48。

39 夏黎明，《清代臺灣地圖演變史：兼論一個繪圖典範的轉移歷程》（臺北：知書房出版社，1996）。

40 施添福，〈「臺灣地圖」的繪製年代〉，《臺灣風物》38: 2（1988 年 6 月），頁 95-96；施添福，〈紅線與藍線：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9（1991 年 6 月），頁 46-50。

41 姜道章及其指導的研究生，有一系列關於臺灣地圖的研究成果。如鍾美淑，〈臺灣地圖測繪史〉（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賴弘文，〈清代方志地圖的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童約信，〈臺灣主題地圖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42 賴志彰、魏德文、高傳棋，《竹塹古地圖調查研究》（新竹：新竹市政府，2003）。

日治時期以來留下大量由科學測繪方法繪製的地形圖或主題圖，許多古地圖至今仍具有使用價值，地圖史研究的質與量亦最為豐富。早期研究者如施添福，其對「臺灣堡圖」及「臺灣地形圖」的考證和研究奠定了這些基本圖作為史料的重要地位。[45] 隨著古地圖的陸續「出土」，解讀地圖的後進研究者也越來越多，甚至利用 GIS 進行幾何糾正、數化並建立資料庫。如林祥偉以花蓮溪流域（不含番界）內計 28 幅的堡圖為底圖，建立了當地百年來完整的等高線地形數值資料庫，進而分析近百年來東臺灣從日治時代以來的都市發展歷程。[46] 該文開啟了一個重要嘗試，重現了歷史時期的自然地理資訊，讓後續東部區域史研究者得以比較地形、河道的變化。郭俊麟等人以日治時代測繪的五萬分一地形圖為主題，[47] 運用 GIS 的套疊分析功能，說明霧社事件、中部大地震及戰爭如何造成調查與測繪事業的的空間差異，該文對於該套地圖的各種版本亦有系統性的釐清。高祥雯於其碩論中，利用 GIS 影像幾何改正技術，分別校正了 1903 年六百分一的「安平庄圖」及兩萬分一的堡圖，考證荷蘭時代古地圖中大員的空間範圍及其變遷。[48]

上述古地圖研究闡明地圖的測繪時間、典藏、版本、內容與特色，讓研究者得以藉 GIS 整合不同時期的地圖，深化區域性歷史研究。舉例來說，陳秋坤繪製兩幅不同時期的交通路線圖，以突顯出萬丹地域在交通樞紐上的重要性。他考證、校正、數化荷蘭人於 1645-1652 年間繪製的「卑南圖」（從臺灣南端前往卑南的採金地圖），套疊 1910 年代的臺灣蕃地地形圖，呈現荷治時代參加「南部地方會議」的主要土著部落，重建了兩條分別從赤崁城堡連結到麻里麻崙社和放索

---

43 黃清琦編著，《臺灣輿圖暨解説圖研究》（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0）。

44 林玉茹、畏冬，〈林爽文事件前的臺灣邊區圖像：以乾隆 49 年臺灣番界紫線圖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9: 3（2012 年 9 月），頁 47-94。

45 施添福，〈臺灣聚落研究及其史料分析：以日治時期的地形圖為例〉，收於張炎憲、陳美蓉編，《臺灣史與臺灣史料：臺灣史料評析講座紀錄（一）》（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頁 131-184；施添福，〈日治時代的基地測量部和臺灣地形圖〉，收於施添福監製，《日治時代二萬五千分之一臺灣地形圖使用手册》（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頁 3-27；施添福，〈「臺灣堡圖」：日本治臺的基本圖〉，收於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調製，《臺灣堡圖》（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前頁。

46 林祥偉，〈東臺灣臺灣堡圖的等高線數化與應用〉，《地圖》20: 1（2010 年 4 月），頁 1-10。

47 郭俊麟、黃清琦、廖泫銘，〈二戰謎圖：日治後期（1924-1945）臺灣五萬分一地形圖再考〉，《白沙歷史地理學報》14（2012 年 10 月），頁 255-284。

48 高祥雯，〈荷據時期大員的空間變遷〉，頁 1-93。

社，以及臺灣南端跨越山峰直到卑南的交通路線，進而比較 1650 至 1910 年代臺南經由屏東到臺東卑南的主要幹道。[49] 其次，該文也依據堡圖、明治 30 年（1897）屏東平原行政區域和交通路線圖，參照「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重新繪製「清末至日治初期屏東平原主要道路圖」。[50] 從該圖可知，阿猴街為當時的行政和經濟中心，乃「官道」所通達之地；萬丹街則是港西下里的農產市集和商業中心，不僅道路支線可順沿下淡水溪河道，若是跨越東港溪通抵東港河口，則可轉換漁船往來臺南府城或中國沿海市場。易言之，藉由該圖所見道路的集中和運輸路線，均可清楚呈現出萬丹地域的商業地位。

（二）歷史統計

臺灣歷史上的統計資料多已透過數位典藏而獲得不同形式的記錄和保存，[51] 應用 GIS 繪圖表現，不僅所有數據的空間界線都得以清楚，亦能藉其計算功能將數據彙集至較大行政區，更精確、彈性地分析統計資料的空間特徵及差異。以 GIS 繪製統計地圖的基本前提在於重建統計當時的歷史行政邊界，而這些圖層已如前所述，自 2003 年起由中央研究院陸續建置，因而區域史研究亦共享了這份成果。如顧雅文蒐集、整理臺中縣範圍內 1901-2006 年的各類人口統計資料，並應用 GIS 製成各種人口統計地圖，以觀察臺中縣各鄉鎮市人口的時、空間分布現象。[52]

附帶一提的是，對於番地、花東地區等缺乏完整基礎空間單元的地區，或行政邊界因不同歷史階段而變動的地區，地理學者藉 GIS 建立網格（grid-based population）來解決問題。如郭俊麟及辜冠程、許伯任等人的研究認為，鑑於日治時代花蓮港廳人口分布極度不均，加上行政邊界變遷頻仍，若以行政空間作為統計單

---

49 陳秋坤，〈清代萬丹地域的地主、神明信仰與下淡水社人的離散，1720-1900：以萬丹李家古文書為中心〉，頁 5。該圖一（2）由中研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李玉亭繪製。

50 陳秋坤，〈清代萬丹地域的地主、神明信仰與下淡水社人的離散，1720-1900：以萬丹李家古文書為中心〉，頁 6。該圖二由中研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白壁玲繪製。

51 如「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網址：http://tcsd.lib.ntu.edu.tw/info_about/about.php）以影像檔呈現原始表格；「日治時期户口調查資料庫」（網址：http://www.rchss.sinica.edu.tw/popu/index.php）提供 1915 年國勢調查成果。「臺灣歷史人口統計資料 GIS」整合「日治時期户口調查資料庫」與日治時期行政區劃圖層資料，透過 GIS 地圖介面，提供主題地圖與統計圖表等查詢功能；「臺灣經社指標資料 GIS」則蒐集自 1960 年迄今之人口特性、內政指標、工商普查、教育與政治等公開統計資料，提供整合式查詢及繪匯主題地圖等功能（兩者合併網址：http://140.112.152.124/gistaiwan_portal/）。

52 溫振華、溫芝綺、李宗信、李進億、顧雅文，《續修臺中縣志．卷二：住民志》，頁 1-146。

元，將導致不同時期各種統計數據在比較上的盲點與困難。[53] 因而他們參考日本國勢調查人口網格的建置方法，建置花蓮的歷史人口資料庫，參考老地形圖建立跨越不同歷史階段的人口網格，並以網格為最小單元，呈現並比較統計資料的分布及變化。[54] 此一方法頗能提供區域史研究者參考，進行長期性的人口分布研究。

（三）古文書

古文書即古書契，亦稱為契字或字據，是區域史研究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在歷史 GIS 的輔助下，契約與地圖的整合不再是窮盡時間與精力而使個別研究者卻步的工作，因而至今也蓄積了部分研究成果。這些古文書空間化的研究基本上可歸納為宏觀與微觀兩種視野，宏觀的研究取向主要是藉由人工的標示或關鍵字的檢索，以 GIS 或 Web-GIS 的界面，視覺化大量具有相同屬性內容的結果，使研究者得以據此檢索結果展開進一步的分析研究，其特徵是每一筆契字毋須精細地對應到每筆土地，只需看出大略的分布、發展趨勢以及空間差異。項潔主持的臺灣大學「數位典藏與自動推論實驗室」網站致力以資訊技術改善數位人文研究環境，注意到 GIS 整合契約文書的效益，2009 至 2011 年的一系列研究成果顯示他們欲將臺大數位典藏中心的典藏結果作更好的地理呈現。[55] 如歐仲翔處理該中心「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aiwan History Digital Library，簡稱 THDL）」收集的古文書之最大宗——15899 件的臺灣總督府檔案抄錄契約文書，嘗試建置一個更友善的 Web-GIS 界面，即以程式自動判讀契約地號，並盡可能對應到堡圖中越底層的行政區域。由此，使用此一系統的歷史研究者得以透過地名、地理範圍或不同年代區間等不同的檢索策略，快速掌握契約文書的空間分布及其數量。[56] 蔡炯民

---

53 例如大正 9 年（1920）地方制度改正前、後的五鄉與街庄，在行政空間和界線上的不一致。

54 參見郭俊麟，〈GIS 與老舊地形圖在網格式歷史人口分布之應用〉，收於賴進貴等編，《2010 數位典藏地理資訊論文選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2010），頁 155-170；許伯任，〈不均的醫療空間：以東臺灣為研究場域〉（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2011）；辜冠程，〈衛生史料的空間意涵：以 1920-1945 年的花蓮港廳為例〉（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2011）。

55 該實驗室的研究成果，請參見「數位典藏與自動推論實驗室」網站，下載日期：2014 年 6 月 27 日，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a/lab303.csie.ntu.edu.tw/www/Home。

56 歐仲翔，〈使用者取向之歷史地理資訊系統：古契書與統計資料呈現〉（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論文，2011），頁 1-51。

等人也指出，不同時間區段的契約分布圖像提供了一個初步觀察，可以合理推測拓墾的時序差別，進而呈現金廣福向新竹東南山區推進的拓墾情形。[57]

這些研究構想最後多落實於 THDL 的古契書資料庫中，[58] 讓使用者迅速掌握具有相同性質（關鍵字）的契字分布之宏觀圖像。然而，就目前的應用成果來看，歷史研究者似乎仍傾向利用資料庫搜尋契字進行解讀，而較少應用該 Web-GIS 介面進行宏觀分析。或許因為資料母體並不完備，若僅檢視抄錄契約數量及分布的空間差異，研究者必須顧慮這些差異所代表的即是受限於抄錄契字本身的數量所致，抑或是因抄錄契字的空間化資訊不足所造成。再者，該系統僅以堡圖或現今地圖為底圖，無法因應研究所需加入水圳、寺廟及不同時期行政區等主題圖層套疊分析，以更實證地探討拓墾路線或趨勢。最後，該系統將抄錄契約對應到堡圖的最底層行政區界，就宏觀的研究尺度具有意義，然而如果研究者的研究取向是尺度必須精確呈現單筆土地的層級，則抄錄契約就有必要更細緻地對應到其坐落的地號，而 GIS 將能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微觀的古文書研究取向通常著重於單一土地契約的空間化，往往需要藉由地籍圖與相關古地圖的套疊，找出契字的精確空間座落，進而呈現傳統研究者無力精確判定的土地座落位址或四至範圍等蘊藏於土地契約內容的空間資訊。至今，特別是在平埔族社址、社域、古地名及地權的研究方面，已累積了一些成果，但大多數的研究者僅是針對契字內容來推測其約略位置。2005 年溫振華主持「臺中縣平埔族史研究計畫」時，首先利用 GIS 及 GPS 精確考證／驗證了臺中縣平埔族各社的社址坐落。[59] 李宗信進一步以 GIS 整合古文書、總督府抄錄契字、《土地申告書》、《民有大租名寄帳》、《大租補償金臺帳》、《戶口舊簿》與地籍圖等檔案史料，重現了崩山八社各社社址及居住地的空間位址。[60] 溫振華的「陽明山國

57　蔡炯民、歐仲翔、翁稷安、項潔，〈時空資料的地方再現：GIS 與數位典藏的交會〉，《國土資訊系統通訊》78（2011 年 6 月），頁 18。

58　「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下載日期：2014 年 6 月 27 日，網址：http://thdl.ntu.edu.tw/THDL/RetrieveDocs.php；「臺灣總督府抄錄契約文書歷史地理資訊系統」，下載日期：2014 年 6 月 27 日，網址：http://140.112.30.230/map。

59　溫振華主持、臺中縣政府文化局委託，〈臺中縣平埔族史調查研究計畫〉，執行期間：2005 年 12 月-2007 年 1 月。

60　李宗信，〈日治初期崩山八社租權的地理歷史分析〉，《臺灣學研究》8（2009 年 12 月），頁 31-81；李宗信，〈平埔族社址／居住地的考證與推定：以崩山社群為例〉，《臺灣文獻》63: 2（2012 年 6 月），頁 1-52。

家公園淡新檔案相關資料之搜集整理」計畫，將每筆契字上登載的地號，精確地在古地圖或今日衛星影像圖上呈現，而得以在空間上歸納出凱達格蘭族各社的社域或地權範圍。[61] 基本上，上述研究主要是利用微觀的尺度，整合、歸納出宏觀的視覺化效果，有關平埔族各社的土地契約，藉由 GIS 得以如拼圖般被貼回其空間座標之中，儘管各社傳統社域範圍的歷史圖像仍因契字數量的不完整而出現部分的留白，然而卻也呼之欲出，使得研究者可以進一步追問各社原始的社域界線、與行政區、地形、河流的關係等有關空間的討論。

（四）日治時代戶口舊簿

戶口舊簿乃指明治 38 年（1905）年起實施的「第一回臨時臺灣戶口調查」，及其後歷次同性質調查所記錄的全臺人口普查資料，包括《本籍戶口調查簿》、《寄留戶口調查簿》、《本籍戶口除戶簿》及《寄留戶口除戶簿》等。這些戶口資料目前大多完整保存於全國各鄉鎮市區戶政事務所，數量十分龐大，亦成為了解地方灣社會結構、婚姻網絡、職業變遷等問題的憑藉。基於日治時代殖民政府「以地統人」的統治原則，戶口舊簿中登載的「戶籍番號」即為「地籍番號」。因此，透過 GIS 便能結合日治時代的地籍圖，使得戶口與地籍資訊，家戶甚至個人層級的資訊，均得以被放置於正確的時、空座標之中，進而針對區域性研究展開更細緻的時、空分析。[62] 基本上，除了少數因尚未完成土地調查而以「番戶」登記的地區外，戶口資料中所有欄位的資訊都能藉由 GIS 套疊地籍圖層而空間化。若蒐集的戶口資料數量夠多，將能更為完整地呈現各種族群或家族活動的空間分布。

利用 GIS 建立戶口舊簿資料庫的研究案例，如康豹在噍吧哖的研究中，藉由 GIS 探討了噍吧哖事件相關之歷史地理特點。該文蒐集了日治時代與該事件相關的 10 個村庄戶口資料，證實在事件期間的大正 4 年（1915）7-12 月間，這 10 個村庄的死亡人數共計 1789 人。為了論證這些死亡者與日本軍憲的屠殺有關，該文將日本軍憲的行軍路線與事件期間的各庄死亡人口數圖層套疊，驗證了大正 4

---

61 溫振華主持、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局委託，〈陽明山國家公園淡新檔案相關資料之搜集整理〉，執行期間：2012 年 3-12 月。

62 李宗信，〈淺談地理資訊系統（GIS）於臺灣史研究上之應用〉，頁 119-146；廖泫銘、李玉亭，〈日治時期住所番地查詢現今位置〉，《數位典藏與學習電子報》9: 12（2010 年 12 月），下載日期：2014 年 6 月 27 日，網址：http://newsletter.teldap.tw/news/HaveYourSayContent.php?nid=4242&lid=479。

年 7-8 月間以成年男性為主的高死亡人數，主要與參與事件的戰鬥而陣亡或被屠殺有關；至於同年 9-12 月間的死亡人數雖然有減少，但其實多為老幼婦孺，死因推斷應與事件後該地區的生活和健康因素惡化有關。[63] 此外，溫振華在其主持的「臺中縣平埔族史調查研究計畫」中，大量蒐集當時臺中縣境內各鄉鎮戶政事務所庋藏的日治時代戶口資料，同時套疊日治時代地籍圖層，最後在現代的地圖上，精確地標示出平埔族的居住地位址，對於日後田野調查工作的展開，也提供了確切的空間資訊。

四、應用 Web-GIS 的回顧：以「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THCTS）為例

Web-GIS 可以簡單定義為在網際網路上的 GIS，使用者毋須購買、安裝 GIS 軟體，只需利用網際網路瀏覽軟體即可操作，亦可在網上直接讀取應用 GIS 所需的各種電子或影像地圖，因此成為歷史 GIS 發展初期的最佳選擇。如前所述，2003 年上線的 THCTS，即是利用 Web GIS 技術，將各種圖資及研究成果以分散式的概念整合在 Web GIS 系統中，[64] 對於臺灣區域史的研究者而言，THCTS 無疑提供了利用 GIS 的另一個選擇。故下文將回顧 THCTS 建置十年以來如何為區域史研究所用，並進一步檢討 THCTS 的特色與問題。

與應用單機版 GIS 的研究成果比較起來，應用 THCTS 的研究多以學位論文為主。相同的是，九成的論文僅以該系統表現研究區，或研究區內行政邊界在不同時期的變化，或甚至直接引用該系統網站上的主題圖，而未實際操作 THCTS 介面，故在此並不一一列舉。

在幾篇應用較為深入的論文中，THCTS 最主要被當成讀取各種圖、資的管道。然而，此一便利性同時也造成其限制，使用者往往只能遷就 THCTS 擁有的圖層，缺乏所需圖層時，往往造成歷史地圖繪製上的不精確。李彥霖 2003 年的

63 康豹（Paul R. Katz），《染血的山谷：日治時期的噍吧哖事件》（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6）。

64 翁維瓏，〈漫談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Web GIS）〉，《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通訊》17: 7（2001 年 3 月 26 日），頁 52-58。

碩士論文〈陂塘到大圳：桃園臺地水利變遷（1683-1945）〉中，利用 THCTS 繪製桃園地區的多幅歷史地圖，然其中的河川分布圖，因 THCTS 並未數化相關戰前古地圖的河川資訊，作者只能利用現代的河川圖層來表現，造成與研究主題的不一致。[65] 許蕙玟〈交通、族群與埔里地區雜貨店經營之變遷（1814-1945）〉一文，依據史料中有關時人如何進入埔里盆地的描述，將 THCTS 建置的地名點（point）圖層串連而成線段（line），作成「清代入埔南路」、「清代入埔中路」以及「清代入埔北路」等不同路線。作者亦嘗試將上述圖層套疊現代河流圖層，進一步考證清末甘為霖（Rev. William CampbeII）的入埔路線，並據此探究以上入埔路線與商品交易間的關係。[66] 必須注意的是，地名通常是指涉一個空間的範圍，若以點來表現其空間座落，一般是指主要聚落的位置。而 THCTS 並未提供更多古地圖中不同等級道路圖層，作者僅能以直線連結既有的地名點，亦未能以當時的河流及地形圖層檢證路線圖的合理性，因而路線圖也只能視為一種示意圖。又如陳嬿羽在〈苗栗公館泥坡子陳立富家族在臺的拓墾與發展〉中，利用 THCTS 的 1904 年街庄圖層，標示出泥坡子陳氏家族所有土地座落，同時比較其地形、地勢，進而說明其拓墾趨勢。[67] 然而，作者僅能以土地所在的街庄（polygon）來表現，而無法更精確地呈現真正的土地位置。

綜觀這些區域史研究應用 THCTS 的情形，雖然該系統在當時難以取得軟體、圖資的情況下確實有效降低了門檻，提供在學研究生應用 GIS 的另一個選擇，但從研究結果來看，其主要貢獻仍限於行政區界變化的簡單呈現，缺乏更符合研究主題的地圖繪製或分析。某些有創意的使用方式，也因為系統本身的限制而削弱了地圖的價值。這些限制來自於三個方面：首先，如前所述，使用者必須遷就 THCTS 既有的圖層，然既有圖層並不充分，缺乏諸如歷史時期的河流、道路等基本圖層；甚至 THCTS 數化的圖層有所缺漏或錯誤時，使用者亦毫不懷疑地加以引用。[68] 第二，受限於操作界面簡單的套疊或數化功能，使用者無法將符

---

65 李彥霖，〈陂塘到大圳：桃園臺地水利變遷（1683-1945）〉（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4）。

66 許蕙玟，〈交通、族群與埔里地區雜貨店經營之變遷（1814-1945）〉（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67 陳嬿羽，〈苗栗公館泥坡子陳立富家族在臺的拓墾與發展〉（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1）。

68 如 THCTS 並未說明為何 1901 年會有明確的街、庄界，又如何界定清代的各種行政空間界線和範圍，然使用者通常直接引用而未質疑。

合研究主題的古地圖進行影像對位並加以數化，因而最終還是只能受限於既有圖層。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THCTS 缺乏建立屬性資料庫的功能，既有圖層中，如寺廟、學校、醫院的名稱等屬性資料亦不齊全，造成檢索查詢及分析上的限制。

在 THCTS 之後，中研院 GIS 中心陸續發展了「臺灣新舊地圖比對系統」及「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系統」。藉由該系統界面，使用者不僅可以任意流覽同一地區不同時期的古地圖，也可進行的套疊比對，更能線上將古地圖中的資訊直接數位化為點、線、面圖層，最後在 Google Earth 上進行古今的空間觀察和動態展示。[69] 這些進展也吸引區域史研究者加以應用，如田懷生、蔡秉辰分別利用該系統的古今圖層空間對位功能，精確考證出堡圖中中寮和汕尾地區的寺廟名稱及其分布。[70] 葉竹凱透過「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系統」追溯 1900 至 1982 年間花蓮市都市紋理的形成和變化，呈現了花蓮市街在空間發展上的歷史脈絡。[71] 這兩個系統雖然並不能稱得上是完整的 WEB-GIS，卻提供了研究者一個空前便利及相對簡易的使用環境。

該中心另一個發展中的 WEB-GIS 是 2013 年上線的「統計博覽繪－統計地理資訊系統」，該系統從「社區 GIS」的概念出發，欲提供地理單元較細緻（如日治時期的大字或戰後的村里層級）的空間資料，因而整合了前述「歷史人口統計資料庫」及「臺灣經社指標資料庫」，並結合中研院歷史人口研究計畫、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及行政院國土資訊系統小組等單位的研究資源。使用者可以查詢日治時期以來橫跨百年的統計資料，系統將對應出該時期的歷史行政邊界，繪製統計地圖。[72] 目前，該系統資料庫提供日治時期的歷史統計資料並不多，介面也在改

---

69 有關「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系統」的介紹和系統操作說明，參見「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資源網」，下載日期：2014 年 6 月 27 日，網址：http://digiarch.sinica.edu.tw/content/subject/resource_content.jsp?id=3044。CCTS 亦將改版為此種介面，並已於 2014 年開放。

70 田懷生，〈清代中寮地區的社會發展與民間信仰〉（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2），頁 63；蔡秉辰，〈民間信仰及其社會網絡之研究：以林園區汕尾里為例〉（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頁 92。

71 葉竹凱，〈花蓮舊火車站區都市空間的形塑歷程〉（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2012），頁 55-58。

72 有關「統計博覽繪」（網址：http://gis.rchss.sinica.edu.tw/statgis/）的介紹，參見范毅軍，〈「統計博覽繪：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系統」建置成果〉，發表於內政部統計處主辦，「102 年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庫推動及應用研討會」，轉引自「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庫分組入口網：訓練及研討—研討會」，下載日期：2014 年 6 月 27 日，網址：http://segis.moi.gov.tw/STAT/Web/Portal/TrainingSeminar/STAT_SeminarView.aspx?MESSAGEID=3182&ProAppID=1；李宗信、顧雅文訪談，〈廖泫銘口述資料〉（未出版），2014 年 4 月 9 日，於中央研究院。〔按：廖泫銘係中研院 GIS 中心研究助技師〕。

版當中，若未來能進一步擴充，以視覺化呈現趨勢、群聚現象，或以地圖顯示隱藏在數字背後的異常、特殊現象，對區域史研究者來說應是相當重要的研究工具。

上述幾個 WEB-GIS 的出現，或多或少取代或承接了 THCTS 的工作。從另一方面來看，在近年軟硬體發展及圖資開放的環境之下，THCTS 也可說是完成了階段性任務。個人研究者可以很方便地取得免費軟體及使用說明，此外，透過中研院 GIS 中心及其他圖資典藏、數化單位，研究者圖資取得的障礙也越來越小。[73] 尤其，包括百年歷史地圖在內的許多系統皆提供網路地圖服務（WMS），[74] 使用者無需向典藏單位申請或購買圖檔，即可在連線的情況下於單機版 GIS 軟體中介接古今圖資，進行更彈性而有效的利用。向量圖資亦有相同趨勢：過去僅能在 THCTS 核心系統中使用的圖層，也於 2013 年 4 月開放給單機版使用者下載。事實上，過去承擔歷史 GIS 基礎環境建置任務的中研院 GIS 中心，在自我定位上已有所改變，未來的發展重點將不再著重圖資蒐集與數化，而是轉型為圖資的應用及基礎研究工作，朝向專業學術平臺或資料庫發展。[75] 換句話說，作為使用者的區域史或其他領域的研究者，必須更積極數化圖資及建立屬性資料，而 THCTS 的發展也將被定位為資訊交換的平臺，善用 Web2.0 概念，[76] 讓資料使用者成為系統的共同發展者，透過回饋或交換機制進一步擴充資料庫，或協助圖層的修正、擴增及屬性資料的建置。

---

73 關於中研院 GIS 中心的圖資開放策略，由於該中心並非原始圖資典藏單位，而是數化單位，因而圖資的開放程度受制於與原典藏單位簽定之契約內容。目前，諸如「臺灣堡圖」等不具版權問題的圖資皆視為公共財，無償提供圖資影像檔予申請使用者，而具關鍵性、有版權問題或基於契約而在開放上有所限制的圖資，則需視情況提供研究者使用。李宗信、顧雅文訪談，〈廖泫銘口述資料〉（未出版）。

74 WMS 是 Web Map Service 的簡稱。1994 年成立的開放式地理資訊系統協會（Open GIS Consortium，OGC），為讓每個人都能從任一網路、應用程式或電腦平臺中方便獲得地理資訊和服務，因而製訂了一系列規範，WMS 為在網上發布或使用地圖影像時的規範，已廣泛被國際接受，其他尚有網路向量地圖服務（WFS）、網路網格地圖服務（WCS）、網路地形服務（WTS）等，透過這些協定，即可交換不同檔案格式之 GIS 資料。參見黃旭初，〈應用 GIS 新技術標準建置國土資訊流通共享平臺〉，發表於內政部主辦，「2003 國土資訊系統成果展示研討會」，2003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

75 李宗信、顧雅文訪談，〈廖泫銘口述資料〉（未出版）。

76 Web 2.0 的特色在於鼓勵使用者以對話方式、互動地創造數位內容。有別於傳統以網站創作者主導其內容，是由使用者主導，故定義為 Web 2.0。

五、結論

在大多數應用 GIS 的臺灣區域史研究中，GIS 扮演的角色並不十分重要，僅限於研究區的界定或呈現行政區界的變化。不過，若觀察歷史 GIS 發展以來廿年的變化，過去高築於研究者面前的 GIS 門檻已經降低許多，在質和量上都有助於區域史研究者應用此一工具。早期研究有賴於歷史學者與技術人員的合作，THCTS 的開發提供了在學研究生另一個選擇，而近五年來在軟硬體、史料、圖資應用環境、甚至是學習環境上的急遽進步，則促使個人研究者發展出更具突破性的研究。換句話說，區域史研究者在近廿年來並非沒有注意到這個工具，其應用的深度隨著歷史 GIS 同步發展，這是一個樂觀的趨勢。

從臺灣區域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區域史研究的濫觴本在對多學科對話、田野調查及區域差異的探求，[77] 這些原則或方法恰與歷史 GIS 能展現的優勢不謀而合。另一方面，自臺灣區域史隨著地方認同而興起以來，研究者一直不斷反省與檢討的便是小區域的代表性，憂心零碎化而格局過小的研究，以及區域史囿於資料而漸趨行政疆界化的問題。本文認為，GIS 作為一個以地理座標整合各式文獻史料的工具，將能更清楚地呈現出「邊界」，除了變動的行政區界或山脈河流等具體的界線之外，當我們具體繪出族群的分布、宗教祭祀或儀式活動的位置、水利系統的灌區、家族擁有的土地，我們看到的其實是人群的認同或緊張關係的界線，或者勢力、權力的範圍，這些無形的線共同在一個平臺上視覺化，將更容易定義出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的區域之邊界，因而它同時也帶來了研究方法上的翻轉，我們不再是研究某某村或某某鄉鎮的區域史，而將在看到問題後再來決定所謂的「區域」。[78]

在個人化的歷史 GIS 研究越來越便利之際，研究者對 GIS 的研究環境也有所期待，〈2010 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文即呼籲 GIS 在歷史取向研究之應

---

[77] 林玉茹，〈歷史學與區域研究：以東臺灣地區的研究為例〉，《東臺灣研究》7（2002 年 12 月），頁 111。

[78] 這應是臺灣歷史學界對區域史研究最初的理想。如在 1986 年的「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中，劉翠溶主張區域的劃分應以主題，而非地理區或行政區，施添福也認為必須先有問題，再作分區。參見林玉茹，〈歷史學與區域研究：以東臺灣地區的研究為例〉，頁 111-112。

用，並建議仿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口述歷史研習營」之方法，舉辦「歷史 GIS 研習營」，以加速並深化 GIS 在歷史取向研究之應用。[79] 除此之外，區域史研究者可以展望的是如何讓 THCTS 這樣的 Web-GIS 轉型成交流平臺，讓研究者同時也是系統協作者，進一步帶出更多區域差異及綜合式比較的研究視角。

[79] 謝國興、謝明如，〈2010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19: 2（2012年6月），頁251。

引用書目

〈What is GIS?〉,「ESRI」網站，下載日期：2014 年 6 月 26 日，網址：www.gis.com/whatisgis/index.html。

「Reports on National Historical GIS Projects」專題,收於 Anne Kelly Knowles 主編,*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33 (2005)，轉引自「Historical Geography」網站，下載日期：2014 年 6 月 26 日，網址：https://ejournals.unm.edu/index.php/historicalgeography/issue/view/456/showToc。

「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資源網」，下載日期：2014 年 6 月 27 日，網址：http://digiarch.sinica.edu.tw/content/subject/resource_content.jsp?id=3044。

「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下載日期:2014 年 6 月 27 日,網址:http://thdl.ntu.edu.tw/THDL/RetrieveDocs.php。

「臺灣總督府抄錄契約文書地理歷史資訊系統」,下載日期:2014 年 6 月 27 日,網址:http://140.112.30.230/map。

「數位典藏與自動推論實驗室」網站,下載日期:2014 年 6 月 27 日,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a/lab303.csie.ntu.edu.tw/www/Home。

施添福,〈社會史、區域史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北部內山的研究方法論為中心〉,「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暨研究所:學術活動」網站,下載日期:2014 年 4 月 14 日,網址:http://www.ts.ndhu.edu.tw/ezfiles/44/1044/attach/9/pta_6100_9321126_77216.doc。

范毅軍,〈「統計博覽繪：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系統」建置成果〉，發表於內政部統計處主辦,「102 年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庫推動及應用研討會」，轉引自「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庫分組入口網：訓練及研討─研討會」，下載日期：2014 年 6 月 27 日，網址：http://segis.moi.gov.tw/STAT/Web/Portal/TrainingSeminar/STAT_SeminarView.aspx?MESSAGEID=3182&ProAppID=1。

廖泫銘、李玉亭,〈日治時期住所番地查詢現今位置〉,《數位典藏與學習電子報》9: 12（2010 年 12 月），下載日期：2014 年 6 月 27 日，網址：http://newsletter.teldap.tw/news/HaveYourSayContent.php?nid=4242&lid=479。

溫振華主持、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局委託,〈陽明山國家公園淡新檔案相關資料之搜集整理〉，執行期間：2012 年 3-12 月。

溫振華主持、臺中縣政府文化局委託,〈臺中縣平埔族史調查研究計畫〉，執行期間：2005 年 12 月-2007 年 1 月。

李宗信、顧雅文訪談,〈范毅軍口述資料〉（未出版），2014 年 4 月 15 日，於中央研究院。

李宗信、顧雅文訪談,〈廖泫銘口述資料〉（未出版），2014 年 4 月 9 日，於中央研究院。

顧雅文訪談,〈劉翠溶口述資料〉（未出版），2014 年 4 月 9 日，於中央研究院。

Vertente, Christine（維爾騰）、許雪姬、吳密察

1991 《先民的足跡：古地圖話臺灣滄桑史》。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Zandvliet, Kees（格斯・冉福立）（著）、江樹生（譯）

1997 《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臺北：漢聲雜誌社。

田懷生

2012 〈清代中寮地區的社會發展與民間信仰〉。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吳進喜、陳鴻圖

2010 〈2009 年臺灣區域史研究回顧與展望〉，發表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主辦，「2009 年臺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2010 年 12 月 16-17 日。

李宗信

2008 〈淺談地理資訊系統（GIS）於臺灣史研究上之應用〉，收於蔡美蒨總編輯，《臺灣學系列講座專輯（一）》，頁 119-146。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2009 〈日治初期崩山八社租權的地理歷史分析〉，《臺灣學研究》8: 31-81。

2011 〈崩山八社租業的形成與終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2011 〈大嵙崁溪中游漳州籍民優勢區域的形成〉，《臺灣文獻》62(2): 1-30。

2012 〈平埔族社址／居住地的考證與推定：以崩山社群為例〉，《臺灣文獻》63(2): 1-52。

2012 〈臺灣歷史人口統計資料 GIS 建置與應用〉，《臺灣學通訊》69: 12-13。

李宗信、顧雅文、莊永忠

2009 〈水利秩序的形成與崩解：十八至二十世紀初期瑠公圳之變遷〉，收於黃富三主編，《海、河與臺灣聚落變遷：比較觀點》，頁 145-228。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李彥霖

2004 〈陂塘到大圳：桃園臺地水利變遷（1683-1945）〉。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李進億

2012 〈由內而外：後村圳灌溉區爭水事件的歷史變遷（1763-1945）〉，《白沙歷史地理學報》14: 65-169。

林玉茹

2002 〈歷史學與區域研究：以東臺灣地區的研究為例〉，《東臺灣研究》7: 103-133。

林玉茹、畏冬

2012 〈林爽文事件前的臺灣邊區圖像：以乾隆 49 年臺灣番界紫線圖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9(3): 47-94。

林祥偉

2010 〈東臺灣臺灣堡圖的等高線數化與應用〉，《地圖》20(1): 1-10。

邱彥貴

2013 〈雲嘉南地區三山國王廟時空分布討論〉，《民俗與文化：民間信仰與地理資訊科學專刊》8: 85-94。

施添福

1988 〈「臺灣地圖」的繪製年代〉，《臺灣風物》38(2): 95-96。

1991 〈紅線與藍線：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9: 46-50。

1993 〈臺灣聚落研究及其史料分析：以日治時期的地形圖為例〉，收於張炎憲、陳美蓉編，《臺灣史與臺灣史料：臺灣史料評析講座紀錄（一）》，頁 131-184。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1996 〈「臺灣堡圖」：日本治臺的基本圖〉，收於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調製，《臺灣堡圖》，前頁。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9 〈日治時代的基地測量部和臺灣地形圖〉，收於施添福監製，《日治時代二萬五千分之一臺灣地形圖使用手冊》，頁 3-27。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柯志明

1999　〈理性的國家與歷史的機遇：清代臺灣的熟番地權與族群政治〉，《臺灣史研究》6(2): 1-76。

2001　《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洪瑩發、張耘書、張智傑、張珣、范毅軍、廖泫銘

2013　〈歷史與空間：臺灣媽祖廟數量與分佈探討〉，《民俗與文化：民間信仰與地理資訊科學專刊》8: 17-39。

洪瑩發、張智傑、廖泫銘、范毅軍

2013　〈馬鳴山鎮安宮信仰空間研究初探〉，《民俗與文化：民間信仰與地理資訊科學專刊》8: 41-84。

洪麗完

2005　〈從清代「社」之多重性質看平埔社群關係發展：以臺灣中部為例〉，《臺灣史研究》12(1): 1-41。

2007　〈清代楠梓仙溪、荖濃溪中游之生、熟番族群關係（1760-1888）：以「撫番租」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4(3): 1-71。

2011　〈族群互動與遷徙、擴散：以清代哆囉嘓社人遷徙白水溪流域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8(4): 1-55。

2011　〈嘉南平原沿山地區之族群關係（1700-1900）：以「阿里山番租」為例〉，《臺灣史研究》18(1): 41-102。

范毅軍

1999　〈試論地理資訊系統在歷史研究上的應用〉，《古今論衡》2: 93-96。

夏黎明

1996　《清代臺灣地圖演變史：兼論一個繪圖典範的轉移歷程》。臺北：知書房出版社。

翁維瓏

2001　〈漫談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Web GIS）〉，《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通訊》17(7): 52-58。

高敏雄

2011　〈滄海桑田：石門水庫的興建與聚落變遷〉。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高祥雯

2007　〈荷據時期大員的空間變遷〉。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

康　豹（Paul R. Katz）

2006　《染血的山谷：日治時期的噍吧哖事件》。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張哲維

2013　〈日治時期宜蘭濁水溪治水事業〉。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智傑、洪瑩發、廖泫銘、范毅軍

2013　〈GIS 與地方社會和民間信仰〉，《民俗與文化：民間信仰與地理資訊科學專刊》8: 5-15。

許伯任

2011　〈不均的醫療空間：以東臺灣為研究場域〉。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

許蕙玟

2011　〈交通、族群與埔里地區雜貨店經營之變遷（1814-1945）〉。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郭俊麟

2010　〈GIS 與老舊地形圖在網格式歷史人口分布之應用〉，收於賴進貴等編，《2010 數位典藏地理資訊論文選集》，頁 155-17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郭俊麟、黃清琦、廖泫銘

2012 〈二戰謎圖：日治後期（1924-1945）臺灣五萬分一地形圖再考〉,《白沙歷史地理學報》14: 255-284。

陳文立

2010 〈從自然到人文空間的轉化：宜蘭員山地區的拓墾行動（1802-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秋坤

2002 〈清代塔樓社人社餉負擔與產權變遷（1710-1890）〉,《臺灣史研究》9(2): 69-102。

2009 〈帝國邊區的客庄聚落：以清代屏東平原為中心（1700-1890）〉,《臺灣史研究》16(1): 1-28。

2010 〈清代萬丹地域的地主、神明信仰與下淡水社人的離散，1720-1900：以萬丹李家古文書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7(3): 1-37。

陳嬿羽

2011 〈苗栗公館泥坡子陳立富家族在臺的拓墾與發展〉。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童約信

1998 〈臺灣主題地圖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辜冠程

2011 〈衛生史料的空間意涵：以 1920-1945 年的花蓮港廳為例〉。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

黃旭初

2003 〈應用 GIS 新技術標準建置國土資訊流通共享平臺〉，發表於內政部主辦，「2003 國土資訊系統成果展示研討會」，2003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

黃清琦

2011 〈地圖繪製與解說〉，收於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4 冊：1655-1662，頁 VI。臺南：臺南市政府。

黃清琦（編著）

2010 《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溫振華、溫芝綺、李宗信、李進億、顧雅文

2010 《續修臺中縣志・卷二：住民志》。臺中：臺中縣政府。

葉竹凱

2012 〈花蓮舊火車站區都市空間的形塑歷程〉。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

葉高華

2013 〈日本時代集團移住對原住民社會網絡的影響：新高郡的案例〉,《臺灣文獻》64(1): 107-128。

趙玉嫻

2012 〈百年鈎沈璞石閣：花東縱谷中段的族群遷徙與土地開拓〉。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

歐仲翔

2011 〈使用者取向之歷史地理資訊系統：古契書與統計資料呈現〉。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論文。

編集部（編）
2008 《アジア遊学　特集：地域情報学の創出》113。
編輯組（編）
1994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1(1): 12-23。
蔡秉辰
2013 〈民間信仰及其社會網絡之研究：以林園區汕尾里為例〉。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炯民、歐仲翔、翁稷安、項潔
2011 〈時空資料的地方再現：GIS 與數位典藏的交會〉，《國土資訊系統通訊》78: 13-20。
蔣鎧俊
2010 〈霧峰宗教信仰發展與地方社會〉。臺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鄭安睎
2011 〈日治時期蕃地隘勇線的推進與變遷（1895-192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論文。
賴弘文
1997 〈清代方志地圖的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賴志彰、魏德文、高傳棋
2003 《竹塹古地圖調查研究》。新竹：新竹市政府。
賴進貴、黃清琦、葉高華
2005 〈古地圖的空間認知探索：以 1878 年《全臺前後山輿圖》為例〉，《地理學報》42: 47-68。
謝國興、謝明如
2012 〈2010 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19(2): 209-258。
鍾美淑
1995 〈臺灣地圖測繪史〉。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顧雅文
2000 〈八堡圳與彰化平原人文、自然環境變遷之互動歷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8 〈再現、認知與解釋歷史的新工具：GIS 與臺灣史研究的對話〉，收於賴進貴等編，《數位典藏地理資訊》，頁 103-119。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地理資源學系。
2012 〈日治時期臺灣的衛生調查與疾病統計：兼論以 GIS 輔助疾病史研究〉，《白沙歷史地理學報》14: 203-253。
Kazuyuki, Onoda, Miyamoto Shinji, Fujita Hirotsugu, Komeie Taisaku, Kawahara Norifumi, and Kawaguchi Hiroshi
2013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Japan since 1980.” *Japanese Journal of Human Geography* 65(1): 12-16.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21, No. 2, pp. 167-196, June 2014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GIS to Taiwan Regional History Studies in the last 20 Years

Chung-hsin Li, Ya-wen Ku

ABSTRACT

The past two decades witnessed rapid 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and significant changes in its applications. Of note is that applications of historical GIS are no longer restricted to large-scale projects or collaborations; hence, individual investigators can easily apply historical GIS for their own research. Among various disciplines of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regional history, as a study which unfolds history in the context of regional analysis, seems to be one that can realize most the values of historical GIS.

As a review of the applications of historical GIS to Taiwan regional history studies in the past 20 years, this paper comprises three parts. First, it discusses how GIS is applied in three key themes of regional history studies. The second part details how GIS can be used as a tool to deal with different regional historical materials. Finally, it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Web-GIS based infrastructure, such as THCTS (Taiwan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ime and Space), examining the role it plays in regional history studies.

Keywords: Historical GIS, Regional History, THCTS, Web-GIS

《臺灣史研究》
第 21 卷第 2 期，頁 197-204
民國 103 年 6 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評介吳蕙芳著《基隆中元祭：史實、記憶與傳說》

鄭螢憶*

書名：基隆中元祭：史實、記憶與傳說
作者：吳蕙芳
出版社：臺灣學生書局
出版時間：2013 年 9 月
頁數：477 頁

一、前言

寺廟作為傳統臺灣地方社會人群活動的重要場域，吸引不少臺灣史研究者關注，藉以研究廟會活動、風俗節慶，理解其背後祭祀空間、人群動員與地方社會網絡關係。目前學界對此研究途徑已有豐厚的學術積累，從日治時期岡田謙以來的祭祀圈、信仰圈研究，乃至 2002 年張珣所提出後祭祀圈研究。[1] 此外，康豹（Paul R. Katz）自 1990 年代另闢研究途徑，利用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或權力的文化網絡（culture nexus of power）等概念，

*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來稿日期：2014 年月 1 月 14 日；通過刊登：2014 年 5 月 9 日。

1 岡田謙，〈臺灣北部村落に於ける祭祀圈〉，《民族學研究》4: 1（1938 年 1 月），頁 1-22；林美容，〈由祭祀圈來看草屯鎮的地方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2（1986 年秋季號），頁 53-114；張珣，〈祭祀圈研究的反省與後祭祀圈時代的來臨〉，《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58（2002 年 6 月），頁 78-111。

研究地方菁英參與宗教活動的動力問題。[2] 2010 年謝國興提出「交陪境」概念與祭祀圈、信仰圈理論對話。[3]

本書作者吳蕙芳教授，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博士，任職於國立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著有《明清以來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與傳遞》、《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等多本論著。本書為其長年研究基隆地方社會與中元祭的重要成果，也是地方史研究中關於宗教信仰與其組織的歷史研究。[4] 但作者並未將此個案研究，置於前述研究脈絡，反是另闢蹊徑援引「公共歷史學」（Public History）作為本書核心概念，足見其突破既有地方民間信仰研究取徑的企圖。作者認為戰後所形塑的基隆中元祭圖像，是經過學院內外、不同背景學科者一再強調、突顯與複製，成為一般民眾廣泛接受、認知而流傳的內容，此現象可視為公共歷史學課題，亦為本書重要的問題意識。

二、內容介紹

全書共分為八章，除第一章、第八章為緒論、結論外，計分為兩部，第一部「戰後的記憶、傳說與運作」（二、三章）、第二部「歷史事實的追溯與建構」（四、五、六、七章）。在史料運用方面，不僅涵蓋清代奏摺、地方志書，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等官方檔案，也引用《臺灣日日新報》、《新高新報》、《臺灣民報》、《南瀛佛教》等報紙期刊及日人調查紀錄、宗教調查資料，並配合地方碑刻、契約文書、宗親會資料等民間文獻，實為本書的特點之一。而作者在緒論中也說明中元節慶在臺灣全島發展之概況，並詳細耙梳基隆地方史、中元祭相關研究，並指陳人文學者、社會科學研究者或歷史學者對於「基隆中元祭課題探討之異同？」、「造成何等影響？」等疑問與研究多集中在戰後，較少關注日治、清領時期的觀察。

---

2 Paul R. Katz（康豹），〈慈祐宮與清代新莊街地方社會之建構〉，《臺北縣立文化中心季刊》53（1997 年 6 月），頁 71-78；康豹，〈新莊地藏庵的大眾爺崇拜〉，《中央大學人文學報》16（1997 年 12 月），頁 123-159。

3 謝國興，〈南瀛地區廟會的繞境模式：兼論祭祀圈、信仰圈與交陪境〉，收於戴文鋒主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II》（臺南：臺南縣政府，2010），頁 235-254。

4 本書第一章第二節、第二～七章皆以期刊、會議論文形式發表於重要學術期刊。

第二章〈基隆中元祭的圖像：從官方到民間〉指出中元祭的圖像，乃是在民國六〇、七〇年代，以舊版重修本《基隆市志》為基礎，加上宗親會報告書、老大宮廟碑刻等形塑而成，將咸豐年間漳泉械鬥、姓氏輪值主普制度相連結，形成中元祭具有「賽陣頭代替打破頭」、「血緣關係化解地域衝突」之論述，再透過官方、民間出版品不斷地被複製與傳布。

第三章〈宗親組織與基隆中元祭：以黃姓宗親會為例〉說明黃姓宗親會是在1920年代全臺修譜建祠的風氣下成立，創會後不僅參與水燈、花車等陣頭遊行，也負責三大柱主壇工作，甚至在戰後成為第14輪值主普姓氏。從其2次輪值主普活動觀察，作者認為中元祭主普活動體現黃姓在基隆地區血緣、地緣、業緣的網絡關係。

第四章〈地緣衝突的血緣化解：基隆中元祭與姓氏輪值主普制〉考訂姓氏輪值主普制度是在咸豐5年（1855）成形，實與咸豐3年（1853）的漳泉械鬥、咸豐4年（1854）的福建小刀會竄擾基隆事件攸關。但漳泉械鬥在咸豐9-10年（1859-1860）仍舊發生，是故作者認為「以賽陣頭代替打破頭」應是戰後強調族群融合而形成的論述。另外，日治時期11姓輪值制度擴大成同姓宗族認同，也強化「金基貂石」地緣認同範疇，遲至民國36年（1947）才納入基隆其他外姓輪值。

第五章〈普度中的競賽：基隆主普壇的演變與發展〉指出昭和3年（1928）由地方士紳、慶安宮、市役所協議出資，在高砂公園內建立永久主普壇，消弭每年建築工事之耗。該壇於隔年落成後，輪值各姓皆利用此壇外觀裝飾或增加副壇的方式相互競逐。戰後主普壇因受戰火波及，於民國40年（1951）重修，民國63年（1974）遷建中正公園。

第六章〈地方領袖與民間社會：基隆中元祭裡的許梓桑〉以許梓桑為例，描述其具有慶安宮管理人、同風會會長、地方領袖等多重身分，並憑一己之力承擔經濟力衰退的許姓主普重責，主導普度活動項目改良與祭典之節約。

第七章〈社會動員和政治參與：日治時期的基隆中元祭〉論及日治時期基隆中元祭活動由於具備商業性的因素，除了吸引除宗親會外，日、臺人工商團體、新式社團等亦參與其中。至於行政部門雖有節約、衛生等考量而提出改革與限制，但也提供交通運輸的配套措施，顯示節慶文化空間已呈現跨族群、階級的多

重接觸與交流。

在結論的部分，作者認為本書探究、分析基隆中元祭的圖像形塑，與清代、日治時期的歷史事實建構之不同歷程，應可作為公共歷史學的參考例證。

三、綜合評述

全書雖由作者已發表的單篇論文集結而成，在章節安排方面，採取「以今思古」的方式由戰後追溯至清、日治時期，以戰後基隆中元祭相關論述為起點，進而就論述內容之史實加以考證，不僅反映作者對本書問題意識緣起、當代宗教文化現象的關懷，也足見其深厚的筆力和歷史學的考證功夫。至若利用宗親會主普資料、報紙資料、民間出版品，輔以口述訪問、田野調查，重建黃姓宗親會參與中元節慶的運作實態，並清晰梳理姓氏輪值制度、祭典成員組成、動員模式，則提供思索地方菁英「文化權力網絡」重要的代表性個案。

本書論述核心為基隆中元祭制度流變、地方菁英如何參與慶典及其背後動員組織運作，雖然作者未將本書置於傳統民間宗教研究的範疇，但此研究課題亦是現今學界研究民間信仰與地方社會的重要命題。是故，本書對基隆中元祭的論證，不只釐清基隆地方節慶的相關疑問，此個案研究也對既有如祭祀圈、象徵資本等研究範式，有其貢獻與值得關注之處。首先，利用詳實史料，在官方、民間疊加的敘事中，細緻論證節慶源流、祭典制度轉變，也建構節慶背後人群動員及其網絡關係、歷時性與共時性的變化，並突破祭祀圈研究僅能靜態性描繪人群組成和信仰空間研究侷限，將地方社會的宗教活動納進時間的縱度。第二，描繪日治時期中元祭時，作者論證宗親組織、工商團體等地方菁英之所以積極參與，主要是緣於商業因素的考量。此論點補充了過往地方菁英參與公共事務是為取得「象徵資本」的既定論述。

第三，在日治時期慶典活動人員的分析上，作者並未遵循殖民者、被統治者或日、臺人的分析框架，而是討論傳統宗親、廟宇組織、工商團體與行政部門、基隆同風會等新式社團體複雜交織的人群分布，揭示漢人地方領袖間彼此競爭、合作，及受日本殖民者約束或協助等多元運作之情形。第四，本書援引「公共歷史學」理論，開闢另一研究蹊徑，其影響值得後續注意。

儘管本書有上述特色值得推介，但仍有些許須加以商榷之處，茲爰述如下：

（一）作者在第三章指出黃姓宗親會之成立，乃是因應 1920 年代開始修譜建祠風氣，而非為參與中元祭（頁 121-122）。雖然作者亦指出新興姓氏可藉由參與水燈、花車展現自身的社會地位，然而筆者認為這畢竟與進入中元祭典核心內壇慶安宮、外壇四大柱（又以主普壇最為重要）制度有所區別，只有掌務內、外壇才能真正融入地方社會文化權力網絡。若以此觀之，11 姓輪值由宗親會掌握主普壇祭祀，因此黃姓若欲加入主普壇，成立宗親會乃是先決條件之一。

（二）第四章指出慶安宮與中元祭關係密切，不僅是祭典內壇，也是基隆地區信仰重心。[5] 作者引用昭和 17 年（1942）一位筆名牽牛子的觀察家對慶安宮的描述（頁 191），並認為此史料代表日治末期基隆地方人士對中元祭與慶安宮的看法。這份資料說明 11 姓將神像寄放在慶安宮，於每年農曆 7 月 24 等連續三日日舉行義民普度。筆者認為這暗示輪值制度最初可能是以神明會的形式展開，或可回答作者對宗親會成立之前，如何組織、動員之疑問（頁 300）。如果從清領至日治的輪值制度，是歷經從神明會演變至宗親會的過程，則其轉變因素為何？筆者懷疑宗親會成立，是為突破地緣限制、擴大血緣網絡及凝聚財力，以支應輪值費用支出。[6] 轉成宗親會後的人群，是否也持續利用陣頭、神明會形式參與慶安宮祭典？這是必須延伸討論之課題。

（三）談及日治時期普度活動，主普壇輪值以 11 姓為主體，而其它主會、主醮、主壇三大柱則以推選人員負責，讓其他黃、周等新興姓氏也參與其中（頁 227）。筆者認為此現象顯示，日治時期基隆中元祭已整合兩個時代、不同的地方群體。在日治時期 11 姓中，許、謝等姓雖已中衰，主普制度仍排除新興姓氏，因此只能透過參與三大柱的籌備，進入中元祭的核心。作者提出戰後外壇祭祀只

---

[5] 作者可能因篇幅、主題考量，並未對慶安宮的歷史源流有過多著墨。關於慶安宮與基隆地方社會，可參見作者另一著作：吳蕙芳，〈海港城市的傳統節慶活動：以慶安宮與基隆中元祭為中心之探討〉，收於劉石吉、王儀君、林慶勳主編，《海洋文化論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0)，頁 317-352。

[6] 筆者是透過第三章、第六章黃姓、許姓成立宗親會過程的觀察。第三章指出丁亥年（2007）黃姓輪值的贊助，主要是北臺灣黃姓宗親捐款。第六章昭和 2 年（1927）許姓宗親會創立之初，招募的會員涵蓋北臺灣，昭和 5 年（1930）宗親會解散，將剩餘會費八百六十六圓三十四錢留作明年輪值主普之費用。這兩個例子說明宗親會成員招募不僅突破地緣限制，擴及至北臺灣，也反映宗親會支應普度的經費來源之擴張。參見吳蕙芳，《基隆中元祭：史實、記憶與傳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3），頁 149、305-306。

有主普壇留下，是因為姓氏輪值制度的關係（頁 228）。若從整合角度觀之，戰後新興姓氏得以用「雜姓會」形式輪值主普，也是造成原具接納新群體的三大柱消失的原因之一。

（四）第六章敘述明治 36 年（1903）許梓桑由住持王六轉管理人手中接任慶安宮管理人一職，其因為王氏涉及不法變賣廟產被居民驅趕（頁 315）。但直接制度性的因素為明治 31 年（1898），殖民當局設立寺廟管理人制度之故。[7]

（五）第七章指出行政部門因治安、交通、衛生等諸多考量，一面對中元祭典提出改革、限制，另外也利用公權力協助維持秩序、照顧老幼，更對節慶活動提供增加班次的交通運輸、燃放煙火助興（頁 379-394）。筆者同意本書對於行政部門在祭典活動扮演角色的觀察，可是以報紙資料為主的論證恐流於片段，不易掌握行政部門對祭典態度的時間性變化，特別是 1920 年代官方本身對民間信仰活動舉辦存在振興經濟、節約浪費的矛盾，[8] 這是否會影響中元祭的舉行？同風會對中元祭的改革？乃至於太平洋戰爭末期，在官方禁止的前提下，改在內壇慶安宮舉行慰靈祭，又是歷經何等地方菁英與行政部門之間的拉鋸？以上諸問題，可能礙於史料侷限或個人關懷因素，未能有更深入探討。

（六）作者在結論指出，經詳實歷史考證下修正的基隆中元祭圖像，藉此作為專業歷史知識應用在公共事務之例證，並強調公共歷史學與學院歷史學有密切合作之必要與重要性（頁 437）。事實上作者在結論以外的篇章，較少與公共史學概念對話，殊為可惜。公共歷史學於 1970 年代由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環境史家 Robert Kelley 所提倡，強調將史學知識和史學技能運用在學術研究之外，甚至是公共事務之中。[9] 此觀點是本書作為公共歷史學依據的基礎，但公共歷史學從 1970 年代開始發展日益蓬勃，定義趨於多元，應用也擴及教學範疇外，[10]

---

7 鄭螢憶，〈臺灣總督府與民間信仰：以日治時期北港朝天宮為例〉，《臺灣風物》59: 3（2009 年 9 月），頁 27-60；林佩欣，〈日治前期臺灣總督府對舊慣宗教之調查與理解（1895-191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2）。

8 鄭螢憶，〈破除陋習：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金銀紙焚燒」的風俗改革〉，收於川島真、松永正義、陳翠蓮主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第四集》（新北：稻鄉出版社，2011），頁 123-154。

9 Robert Kelley, "Public History: Its Origins, Nature, and Prospects," *The Public Historian* 1: 1 (Autumn 1978), pp. 16-28.

10 王希，〈誰擁有歷史：美國公共史學的起源、發展與挑戰〉，《歷史研究》2010: 3，頁 34-47。〔按：中國期刊無卷期而以年份標示者，不另列出版年月〕。

不少研究開始關注群眾集體記憶如何在公共領域（public places）呈顯，藉此討論公共論述形成或當代社會公共議題，提供思索公共歷史學研究方法的重要個案。[11]

若以此觀點切入，本書其他章節仍有與公共歷史學研究方法的對話空間，可供作者著力之處。例如，第二章討論中元節祭典論述形成，未能點出公共歷史學（學術調查、方志編修者）與地方史論述之結合；第五章討論基隆主普壇演變與發展，可關注民眾意識對新、舊主普壇建立是否轉變，乃至戰後新建主普壇建築結構如何彰顯、承襲原本既有傳統，是否來自各方不同文化意識角力？亦即大眾（宗親會、官方代表、歷史專業研究者等）所形成的公共論述與意識，如何反映在新、舊主普壇結構的轉變、延續。關於此點，Christa Williford 梳理學者以何種形式修復伊麗莎白公共劇院重建的研究，值得作者參酌。[12]

（七）本書陳述內容豐富且多元，難免有所疏漏。例如，作者指出輪值主普壇的 11 姓之中，只有許姓完全不涉入三大柱任何事務，卻在同處又指出明治 35 年（1902）許梓桑曾在陳姓輪值主普時，任三大柱之一的負責人。雖然此次祭典後來因疫情嚴重，並未舉行，卻也證實許姓曾參與三大柱的籌備。筆者認為作者的看法，應是受到統計資料集中於大正 14 年（1925）至昭和 11 年（1936）侷限所致。[13] 另外，本書認為基隆同風會在昭和 10 年（1935）提出廢除焚燒金銀紙，為全島各地首倡。[14] 事實上，自 1920 年代開始，因為殖民當局與臺灣社會運動者的提倡，已有些許寺廟開始廢除焚燒金銀紙的習俗。[15]

總而言之，本書雖有上述筆者提出的疑點，但仍具高度可讀性，本書不只考訂基隆中元祭史實，在研究方法、視角與史料的蒐集與論證，對後進研究者都有提點之效，可說是此研究領域的重要著作。

---

[11] 這方面論著可參見 David Glassberg, *Sense of History: The Place of the Past in American Lif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1); Robert J. Cook, *Troubled Commemoratio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Centennial, 1961-1965*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2] Christa Williford，〈The Historiography of Reconstruction a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French Theatre〉，《臺大文史哲學報》62（2005 年 5 月），頁 47-70。

[13] 吳蕙芳，《基隆中元祭：史實、記憶與傳說》，頁 311-312。

[14] 吳蕙芳，《基隆中元祭：史實、記憶與傳說》，頁 338。

[15] 鄭螢憶，〈破除陋習：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金銀紙焚燒」的風俗改革〉，頁 151。

引用書目

Williford, Christa

2005 〈The Historiography of Reconstruction a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French Theatre〉,《臺大文史哲學報》62: 47-70。

王　希

2010 〈誰擁有歷史：美國公共史學的起源、發展與挑戰〉,《歷史研究》3: 34-47。

吳蕙芳

2010 〈海港城市的傳統節慶活動：以慶安宮與基隆中元祭為中心之探討〉，收於劉石吉、王儀君、林慶勳主編,《海洋文化論集》，頁 317-352。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013 《基隆中元祭：史實、記憶與傳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岡田謙

1938 〈臺灣北部村落に於ける祭祀圈〉,《民族學研究》4(1): 1-22。

林佩欣

2002 〈日治前期臺灣總督府對舊慣宗教之調查與理解（1895-191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林美容

1986 〈由祭祀圈來看草屯鎮的地方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2: 53-114。

康　豹（Katz, Paul R.）

1997 〈慈祐宮與清代新莊街地方社會之建構〉,《臺北縣立文化中心季刊》53: 71-78。

1997 〈新莊地藏庵的大眾爺崇拜〉,《中央大學人文學報》16: 123-159。

張　珣

2002 〈祭祀圈研究的反省與後祭祀圈時代的來臨〉,《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58: 78-111。

鄭螢憶

2009 〈臺灣總督府與民間信仰：以日治時期北港朝天宮為例〉,《臺灣風物》59(3): 27-60。

2011 〈破除陋習：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金銀紙焚燒」的風俗改革〉，收於川島真、松永正義、陳翠蓮主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第四集》，頁 123-154。新北：稻鄉出版社。

謝國興

2010 〈南瀛地區廟會的繞境模式：兼論祭祀圈、信仰圈與交陪境〉，收於戴文鋒主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II》，頁 235-254。臺南：臺南縣政府。

Cook, Robert J.

2007 *Troubled Commemoratio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Centennial, 1961-1965*.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Glassberg, David

2001 *Sense of History: The Place of the Past in American Lif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Kelley, Robert

1978 "Public History: Its Origins, Nature, and Prospects." *The Public Historian* 1(1): 16-28.

稿　約

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出版之《臺灣史研究》為季刊，每年三、六、九、十二月各出版一期，刊登有關臺灣史研究之中、英文論文，以及研究討論、資料介紹與書評。

二、投稿者請依本刊體例撰稿。

三、投稿請一律寄文稿 word 電子檔一份；如寄文稿紙本者，請再附 word 電子檔。

四、《臺灣史研究》編輯委員會已接受刊登之論文，作者需非專屬授權本所刊行電子版，或從事其他非營利性質之利用。每一期紙本出版後，電子全文將刊登於本所網頁。

五、作者可獲得當期《臺灣史研究》五份、發表之著作抽印本五十份，及可能衍生的出版品。

六、經《臺灣史研究》發表之論文，由作者自負文責。

七、來稿及通訊請寄：11529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編輯委員會　收；或將電子檔寄至：twhr@gate.sinica.edu.tw。

八、來稿以未發表者為限；如發表於研討會中，請告知本刊該研討會不出版論文集。

Guidelines for Submission of Manuscripts

1. The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THR*) is published quarterly in March, June, September, and December of each year. It publishes article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announcements, documents and source materials, and book reviews on historical subjects of Taiwan.
2. Preparation of manuscript for submission should consult the style sheet of the *THR* as a guide to format.
3. Please send only one paper copy; and if the manuscript is accepted following the *THR* review process, an electronic file in WORD format will be required.
4. Before manuscripts are published in the *THR*, contributors are required to fill ou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uthorization and Consent Agreement". Upon publication of the manuscript in print journal, its electronic version in verbatim will be published on the *THR*'s web site.
5. Contributor will be entitled to 5 copies of the issue of the *THR* in which his or her work is published, as well as 50 copies of offprint free of charge.
6. Articles in the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represent neither the views of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or those of the *THR* editors. The contributors are solely responsible for statements, whether of fact or of opinion.
7. All inquiries and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following address: The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Nankang, Taipei, 115, Taiwan; or to the following e-mail: twhr@gate.sinica.edu.tw
8. No manuscript will be considered if it has been published or if it is currently under consideration for publication elsewhere; reprinting of the journal's article requires prior notice and permission from the *THR*.

《臺灣史研究》撰稿體例

一、本刊於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出刊。本刊為一學術性刊物，刊行臺灣史研究之相關著作。凡屬此領域之學術論著（中文不超過四萬字，英文不超過30 頁為原則）、田野調查與文獻資料之相關短論（五千字為原則）、書評（三千字為原則）、研究動態與文化活動報導（三千字為原則）等，均歡迎惠賜稿件。文稿請用橫式寫作。論著請附中、英文摘要，各以一千字為限；並附關鍵詞。

二、英文稿件格式，請參照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三、中文格式部分

㈠本文部分

1.正文及註釋，平常引號請用「 」標示，書名、期刊用《》，文章篇名和碩、博士論文用〈 〉標示。臺灣之「臺」，書名或文章名，無論中、日文，均依照原書、原文之寫法，除此之外，內文中遇有臺灣之「臺」，一律採用繁體寫法。

2.中、日紀元（西元紀年）的情形，一律採用「咸豐 2 年（1852）」的形式，若單以西元紀年表記則不在此限。

3.括號一律採用全型（ ）；雙括號時，以（〔 〕）的方式表示。

4.文中數字與西元紀年以阿拉伯數字表示。

5.正文中引用外文文獻之「書名」、「引文」、「專有名詞」時，必須附中文翻譯；凡正文中使用特殊字型如明體改楷體、加粗或斜體等，強調特定語詞時，須加註說明，方便讀者閱讀。

6.獨立引文每行前空三格；遇多段之引文，則每段開頭多空二字。正文內之引文，請加「 」；若引文內別有引文，則使用『 』表明。引文原文有誤時，應附加（原誤）。引文有節略而必須表明時，不論長短，概以節略號六點……表示，如「╳╳╳……╳╳╳」；英文句中三點**...**，句末則為四點**....**。

7.註釋號碼，請用阿拉伯字數碼表示，並請置於標點符號之後。

8.所附之照片、圖表，需於縮版印刷後，仍然清晰可辨識。說明文字、數字及符號，須與內文一致，並以橫列為原則，由左至右書寫；如需直寫，則由右而左。表、圖均需編號，並加標題於表之上、圖之下；相關說明文字，則均置於圖、表之下。

9.文章或註釋當中，若出現作者「按」，無論係改正錯誤或僅為說明文字，均採取〔按：╳╳╳〕之形式表示。

㈡註釋部分

1.註釋中，作者與譯者之表現方式，如各僅為一人時，二者間以頓號表示，如「╳╳╳著、╳╳╳譯，……」；若作者或譯者有二人以上時，以「╳╳╳、╳╳╳著，╳╳╳譯，……」或「╳╳╳著，╳╳╳、╳╳╳譯，……」之方式表示之。

2.正文及註釋，平常引號請用「」標示，書名、期刊用《》，文章篇名和碩、博士論文用〈〉標示。

3.論著註釋，請依下列格式加註：

第一次出現時：

(1)專　　　著：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社，年分)，頁碼。

(2)論文著作集：作者，〈論文名〉，收於編者，《書名》(出版地：出版社，年分)，該文起迄頁碼。

(3)期 刊 論 文 ：作者，〈篇名〉，《刊物名》卷: 期 (年月)，頁碼。

再次出現時：

作者，篇名或書名，頁碼。

同出處連續出現在同頁時，採「同上註，頁碼。」之形式標示。

4.註釋中若遇合刊之期刊，以《期刊名》3: 3/4 的形式表示。

5.註釋或參考書目中之頁碼，以頁 1、2、3-4 的形式表示（採用頓號、以-取代～）。

6.文叢、研叢及原刊年的表現方式：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 47 種，1957；1852 年原刊)，頁 11-12。

7.期刊卷期之後需附上出版時間，或簡（只有年代）或繁（年月均有）皆可。

8.報紙的表現方式：

第一次出現時：

〈標題〉,《報紙名稱》，年月日，版次。

再次出現時：

〈標題〉。

9.引用電子資料時，請註明下列資料：

作者（年代）,〈篇名〉，下載日期，網址。

㈢引用書目部分

1.全篇論文之後，需詳列引用之書目。不分期刊論文、論文著作集，或是專著，中、日、西文並列時，中、日文在前，西文在後。中、日文書目，可按作者姓名筆劃，西文書目依字母次序排列，姓在前，名在後。

2.引用書目中，若有版本或原刊年等說明文字，皆於該書後加括號說明之。

3.書目範例：期刊論文、論文著作集、專著書目，依下列格式編排之。

(1)期刊論文：

王世慶

1985 〈從清代臺灣農田水利的開發看農村社會的關係〉,《臺灣文獻》36(2): 107-150。

Coe, Michael D.

1955 "Shamanism in the Bunun Tribe, Central Formosa." *Ethnos* 20(4): 181-198.

(2)論文著作集：

松田吉郎

1992 〈臺灣の水利事業と一田兩主制〉，收於陳秋坤、許雪姬主編，《臺灣歷史上的土地問題》，頁 105-138。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

Bourdieu, Pierre

1976 "Marriage Strategies as Strategie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In Forster, R. & O. Ranum, eds., *Family and Society*, pp. 117-144.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3)專著：

曹永和

1985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Shepherd, John R.

1993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史研究

第 21 卷　第 2 期

編 輯 者　臺灣史研究編輯委員會
出 版 者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
電話：(02)2652-5350
傳真：(02)2788-1956
劃撥帳號　17308795
製版印刷　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716 號 8 樓
電話：(02)8227-8766
定　　價　新臺幣 200 元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ISSN 1024-2805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21 NO. 2

CONTENTS

Spatial Hybrid of Reality and Imagination: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the Great Matzu Temple .... *Shao-chou Mao*

Emergence of Pig Trad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Economy
in North Taiwan, 1881-1900 .... *Pin-tsang Tseng*

Knowledge and Imagination of
Taiwan's Socio-economic History:
Taiwan's Social History Debate (1920-1930s) Reexamined ... *Wen-kai Lin*

Framing the Specialty of Immunology in Postwar Taiwan:
Medical Aids, Academic Diplomacy
and Boundary Objects .... *Hung-bin Hsu*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GIS to Taiwan Regional
History Studies in the last 20 Years .... *Chung-hsin Li, Ya-wen Ku*

Review of *The Mid-summer Ghost Festival in Keelung :*
***Historical Fact, Memory and Legend* by Huey-fang Wu** ...... *Yin-yi Cheng*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June 2014

ISSN 1024-2805